



# 社区环境治理的教训与经验研究报告

——以日本水俣市的工业污染及其社区再生为例



2014年11月

致谢

本课题为清华大学公管理学院  
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  
2011 年度重大课题

感谢丰田汽车株式会社提供资助!

感谢接受、参与、组织与关注调研的每一位朋友!

## 课题团队

本课题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NGO 研究所承担。

### 顾问：

钱易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教授

### 组长：

王名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NGO 研究所所长

### 副组长：

肖梦 中信出版社《比较》杂志执行编辑

### 成员：

田原真司 专业媒体人，原《日本经济 BP》社北京支局长

汪永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民间环保组织“绿家园志愿者”召集人

黄浩明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曾少军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高级研究员

清华大学公管理学院 CDM 研发中心执行主任

贺信 专业媒体人，财新传媒记者

陆海空 专业媒体人，纪录片导演

于绘锦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CDM 研发中心助理

杨丽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副教授

清华大学公管理学院 NGO 研究所博士后

## 摘要

水俣公害位居日本四大公害之首、在全球公害中也是名列第一。这个昔日受有机汞污染的公害小镇，如今已凤凰涅槃为环境友好与生态模范城市。今日中国，恰似日本 20 世纪 50 年代的翻版，工业污染严重，各级政府却唯 GDP 是举，遵循着先污染后治理的思路，经济的发展肆无忌惮地以无辜者的健康甚至生命做代价。

是否真的可以先污染后治理？一旦污染发生，又该如何治理？水俣究竟能带给中国什么样的启示？围绕这些研究问题，课题组采用文献研究、现场调研、深度访谈、会议交流，比较研究等方法开展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课题组成员一行 9 人组成水俣调研团，在王名教授的带领下，于 2011 年 11 月前往水俣实地调研。调研组一行参观了水俣病资料馆、水俣病历史考证馆、窒素公司现在与当年的排水口、全村博物馆等，访谈了 50 多年来依然在与水俣病奋斗的患者及其家属、与水俣病患者站在一起的医生、律师、记者、摄影家、学者、社会活动家等职业工作者与各类 NPO 组织、在解决水俣病灾害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各级政府官员以及致害企业窒素公司水俣本部等。

走近水俣，我们发现，发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水俣公害至今远未结束，先污染后治理只是一个神话。水俣公害带给中国的启示主要有六点：第一，汲取水俣公害及其治理的教训；第二，权衡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第三，协调公民社会发展与社区文化、本国文化冲突之间的矛盾；第四，将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博弈与合作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第五，发挥媒体作用，促进社会公平；第六，利用国内外合作交流平台，共同分享工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

基于水俣公害的经验和教训，课题组组长王名教授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分别于 2012、2014 年向全国政协提交《关于创新社会管理，加强工业污染治理的建议案》、《关于呼吁停止怒江水电开发，建立生态系统示范区的建议案》等相关政策建议，引起有关部门重视。

## **Abstract**

Minamata pollution ranked the first not only among Japan's four public hazards, but also among global hazards. Minamata, the town that used to be polluted by organic mercury, now has turned into a friendly and ecological city. China, just like Japan in the 1950s, is now suffering serious industrial pollution, while governments in different levels only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GDP, followed by ideas of "abatement after pollu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was made at the cost of innocent people's health and even their lives.

Is it possible to make abatement after pollution? Once pollution occurred, how to make the abatement? What exactly China can learn from Minamata pollution? With those questions, the research group conducted study through multiple methods, for example, literature analysis, field investigation, deep face-to-face interview, seminar, comparative research, and so on. Particularly, led by Professor WANG Ming, an investigation group consisting of nine members was organized to visit Minamata for field investigation in November 2011. The group visited Minamata Disease Museum, Minamata Disease Historical Museum, drain of Chisso company, village museum, and so on. The group also interviewed Minamata disease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who have been struggling for about 50 years, doctors standing together with patients, lawyers, journalists, photographers, academics, social activists, NPOs, governmental officials in different levels and even Minamata headquarter of Chisso Company.

In Minamata, the group found that Minamata pollution occurred in 1950s was far from the end. It is just a myth to conduct abatement after pollution. There are at least six points that China can learn from Minamata disaster: first of all, to learn lessons from Minamata disaster and its governance; secondly, to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rdly, to coordinate contradiction among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 community culture and country culture; fourthly, to develop the cooperation among different stakeholders at the basis of law; fifthly, to promote social equity by playing the role of social media; sixthly, to

share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during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Based on lessons of Minamata disaster, Professor WANG Ming, a member of CPPCC National Committee, submitted relevant reports to CPPCC National Committee in 2012 and 2014, titled “Recommendation on making social management innovation and strengthening industrial pollution governance” and “Appeal to stop Nujiang hydropower development and establish ecological demonstration zones” respectively. Related authority’s attention has been caught.

## 目录

致谢.....	1
课题团队.....	2
摘要.....	3
<b>ABSTRACT</b> .....	<b>4</b>
引言.....	9
0.1 研究缘起：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	9
0.2 文献综述：基本概念与研究现状.....	10
0.3 水俣公害及其治理的历史回顾.....	12
<b>一、走近水俣——清华水俣调查团的 10 天访日行程.....</b>	<b>17</b>
1.1 水俣病：污染与战后日本的民主斗争.....	19
1.2 和水俣病患者近距离接触.....	23
1.3 日本的乡村生活博物馆.....	27
1.4 记者在水俣病报道中的职责.....	32
1.5 不管任何时代，不能过信科学常识.....	36
1.6 少数人的不幸福不一定能让大多数人快乐.....	41
1.7 柳川美，美就美在柳川的水.....	47
1.8 水俣事件被告是国家，环境是人们生活的容器.....	50
1.9 油门和刹车在一个档上怎么走.....	55
<b>二、受害者之痛——访胎儿性水俣病患者.....</b>	<b>60</b>
2.1 水俣病资料馆馆长坂本直充.....	60
2.2 萤之家的坂本忍等.....	61
2.3 在 HOT HOUSE 工作的患者.....	63
2.4 讨论与思考.....	64
<b>三、医生的作用与反思——访原田正纯医生、藤野纠医生.....</b>	<b>67</b>
3.1 原田正纯、藤野纠简介.....	67
3.2 报告与交流.....	68
3.3 讨论与思考.....	73
<b>四、媒体的作用与反思——访高峰武先生.....</b>	<b>77</b>
4.1 高峰武简介.....	77
4.2 交流座谈.....	77
4.3 讨论与思考.....	93
<b>五、摄影家的作用与反思——访盐田武史先生.....</b>	<b>94</b>
5.1 盐田武史简介.....	94
5.2 报告与交流.....	95
5.3 讨论与思考.....	97
<b>六、律师的作用与反思——访受害者东京诉讼团两位律师.....</b>	<b>103</b>
6.1 铃木尧博、尾崎俊之简介.....	103
6.2 报告与交流.....	103
6.3 讨论与思考.....	104

<b>七. NGO 的作用与反思：访支援型、支持性组织</b> .....	<b>105</b>
7.1 谷洋一与萤之家.....	105
7.2 加藤竹子与“大家之家”(HOT HOUSE).....	105
7.3 弘津敏男与相思社.....	106
7.4 吉永利夫与环不知火海计划.....	106
7.5 实川悠太与水俣 FORUM.....	107
7.6 讨论与思考.....	107
<b>八. 企业的作为与反思——访窒素公司水俣工厂</b> .....	<b>109</b>
8.1 窒素公司.....	109
8.2 企业的反省.....	109
8.3 参观与思考.....	110
<b>九. 政府的作为与反思——访水俣市政府、熊本县政府和日本政府环境省</b> .....	<b>112</b>
9.1 访水俣市福祉环境部环境保护都市推进课课长田畑纯一.....	112
9.2 访熊本县知事蒲岛郁夫.....	114
9.3 访日本环境省上席参与顾问原副部长小林光.....	115
9.4 讨论与思考.....	117
<b>十. 水俣学的探索——访水俣学研究中心花田昌宣教授、宫北隆志教授</b> .....	<b>117</b>
10.1 熊本学园大学水俣学研究中心.....	117
10.2 与花田教授、宫北教授交流.....	118
10.3 讨论与思考.....	119
<b>十一. 关于水俣公害的经济学与法学思考——访寺西俊一教授、淡路刚久教授</b> .....	<b>120</b>
11.1 寺西俊一教授简介.....	120
11.2 淡路刚久教授简介.....	121
11.3 与寺西俊一教授交流.....	122
11.4 与淡路刚久教授交流.....	124
11.5 讨论与思考.....	125
<b>十二. 走出水俣病——全村生活博物馆、地元学</b> .....	<b>126</b>
12.1 水俣市首位谢罪市长吉井正澄.....	126
12.2 吉井正澄之女吉井惠理子导览全村博物馆.....	127
12.3 地元学的思考.....	129
<b>十三. 不止的行动：国际交流</b> .....	<b>130</b>
13.1 第二届水俣学国际论坛：环境污染及社会影响（日本熊本学园大学）.....	130
13.2 “水俣教训及其对中国水污染治理的启示”研讨会（中国 清华大学）.....	132
<b>十四. 对中国的启示与相关政策建议</b> .....	<b>137</b>
14.1 水俣公害及其治理对中国的启示.....	137
14.2 关于创新社会管理，加强工业污染治理的建议（全国政协王名委员 2012 年提案）.....	139
14.3 关于呼吁停止怒江水电开发，建立生态系统示范区的建议（全国政协王名委员 2014 年提案）.....	142
<b>结语</b> .....	<b>148</b>
<b>主要参考文献</b> .....	<b>150</b>



附件 1 本项目主要研究成果清单 .....	153
附件 2 清华大学调查团到水俣视察（《熊本日日新闻》） .....	155
附件 3 专访清华大学调查团团长王名（《熊本日日新闻》） .....	156
附件 4 感思水俣——全体调查团员的感悟和思考.....	156
1. 走近那些水俣的勇士（肖梦） .....	156
2. 水俣感思（王名） .....	169
3. 牺牲少数人的利益能获取大多数人的幸福吗？（汪永晨） .....	171
4. 日本水俣病事件之观察（黄浩明） .....	177
5. 访日随想——现代化与知识分子的责任（曾少军） .....	186
6. 水俣に学ぶための「想像力」（田原真司 フリージャーナリスト） .....	189
7. 从对比中看差距（贺信） .....	194
8.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水俣（陆海空） .....	197
9. 水俣：美得揪心，却令人敬畏（杨丽） .....	201
附件 5 对原田正纯先生的悼念与追思.....	210
1. 致原田正纯先生追悼词（清华大学调研团） .....	211
2. 致原田利惠女士的信（肖梦） .....	212
3. 难过与懊悔之后（薛澜） .....	213
4. 《新世纪》“逝者”专栏：医生要回到患者当中（肖梦 贺信） .....	213
5. 逝世一周年祭奠：给原田正纯老师的一封信（肖梦） .....	215

## 引言

### 0.1 研究缘起：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

水俣公害位居日本四大公害之首、在全球公害中也是名列第一。这个昔日受有机汞污染的公害小镇，如今已凤凰涅槃为环境友好与生态模范城市。今日中国，恰似日本 20 世纪 50 年代的翻版，工业污染严重，各级政府却唯 GDP 是举，遵循着先污染后治理的思路，经济的发展肆无忌惮地以无辜者的健康甚至生命做代价。是否真的可以先污染后治理？一旦污染发生，又该如何治理？水俣究竟能带给中国什么样的启示？这些主题催生了《社区环境治理的教训与经验研究——以日本水俣市的工业污染及其社区再生为例》课题，该课题为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2011 年重大课题，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NGO 研究所所长王名教授领衔承担。

围绕环境是否先污染后治理？一旦污染发生，又该如何治理？水俣究竟能带给中国什么样的启示？等研究问题，课题组采用文献研究、现场调研、深度访谈、会议交流，比较研究等多种方法开展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水俣调研，受日本海啸及福岛核泄漏事故的影响，原定于 2011 年 4 月进行的水俣调研，因无法获得签证而推迟至 11 月。2011 年 11 月 20-30 日，课题组成员王名、肖梦、汪永晨、黄浩明、曾少军、田原真司、贺信、陆海空、杨丽一行 9 人组成水俣调研团，在王名教授的带领下，前往水俣实地调研。调研组一行参观了水俣病资料馆、水俣病历史考证馆、窒素公司现在与当年的排水口、全村博物馆等，访谈了 50 多年来依然在与水俣病奋斗的患者及其家属、与水俣病患者站在一起的医生、律师、记者、摄影家、学者、社会活动家等职业工作者与各类 NPO 组织、在解决水俣病灾害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各级政府官员以及致害企业窒素公司水俣本部等。走近水俣，我们发现，发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水俣公害至今远未结束。

本研究报告以水俣调研为线索展开，遵循通过海量翻译文献了解水俣事件的基本情况、走入现场调研、审视中国、提出政策建议的逻辑框架。全文除引言、结语外，从受害者、医生、律师、记者、摄影家、NPO 领袖、学者、政府官员、致害企业等多个视角进行反思。

## 0.2 文献综述：基本概念与研究现状

### 1. 基本概念界定：水俣病、公害

“水俣病”以最初发生地水俣命名，但不是一种地域性疾病，水俣之后，新泻也发生了水俣病。水俣病指通过环境污染，由甲基汞中毒导致的疾病，工厂排入自然环境中的甲基汞化合物蓄积在鱼贝体内，人因食用这种受污染的鱼贝而引发中毒性神经系统疾病。主要症状表现为：手脚麻木、运动失调、向心性视野狭窄、眼球无法灵活转动、听力下降、发音含糊不清、震颤、保持身体平衡的动作出现障碍等。患者自我感觉症状有头疼、易疲劳、味觉退化等，同时也伴有与其它疾病难以区别的症状。孕妇食用这种受污染的鱼贝，可通过胎盘导致胎儿甲基汞中毒，生下患有类似于神经性小儿麻痹的胎儿，称胎儿性水俣病，具有与成人患者不同的症状。水俣病既不传染，也不遗传。但至今无法根治，暂时性止痛和康复是目前的主要治疗方法。被誉为水俣病医学巨人的原田正纯医生强调水俣病受害情况深不见底，现在医学所掌握的只是冰山一角，水俣病的全部反应还不清楚，绝对不能把水俣病的症状看成是固定不变的，也不可能用统一的标准来诊断个例。<sup>1</sup>

“公害”一词，由日本从英国引进，先是一个政治判断，后成为制度用语，1966年写入《公害对策基本法》。在日本，公害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指“人类活动对社会产生有害影响的结果”。公害不仅限于生产活动，还包括人类的消费行为，但产业公害占较大比重。日本医学界对制定公害标准感到力不从心，而国际上关于有害物质的“许可限度”等标准，与日本认为的公害造成的地区污染程度相比，差距很大。<sup>2</sup>因此，公害标准在日本一直存有有争议，但公害导致疾病成为一个重要的参考。熊本水俣病、新泻水俣病、痛痛病与四日哮喘病是日本最为著名的四大公害。1968年日本政府认定熊本水俣病与新泻水俣病为公害病。

### 2. 对水俣汞污染及其治理的研究

对日本水俣汞污染及其治理的研究，以日文资料最为丰富，也有为数不多的中英文文献。现有文献涉及医学、环境经济学、环境法学、社会学、行政学、文学等多个领域，日本甚至还产生了水俣学，熊本学园大学成立了水俣学研究中心。梳理迄今收集到的各类文献，除了精神病学与神经病学对水俣病进行病理诊断和

---

<sup>1</sup> [日] 原田正纯著，包茂红、郭瑞雪译：水俣病，217、23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sup>2</sup> [日] 桥本道夫著，冯叶译：《日本环保行政亲历记》，59-96页，中信出版社，2007。

医学研究，还有对医学以外问题的诸多探讨，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水俣汞污染的起源与发展。主要以编年体的形式，按年记录汞污染的发生、扩大与治理。因致害方是单一主体——窒素公司，这种以年表形式进行的梳理，均将 1908 年窒素公司在水俣建厂作为起点，并详细记录汞污染治理中的政策、措施与行动等。<sup>3</sup>

第二，关于水俣病患者的苦难、赔偿与抗争。水俣病的历史其实就是水俣病患者的抗争史。不管是文字、图片、动态影像还是诉讼，它们都从不同的视角记录了患者的艰难、无助与勇敢，及其与企业、政府、社会的博弈。<sup>4</sup>日本律师协会还与中国学者一起，对包括水俣病诉讼在内的日本环境诉讼的典型案进行了翻译出版。<sup>5</sup>

第三，关于环保行政。公害对各级政府是一种挑战，日本各级政府环保方面的行政经历了从公共卫生到公害对策，再到环保政策的过程。有政府官员在退休后将公害行政时期的经历记录下来，出版《日本环保行政亲历记》。<sup>6</sup>

第四，关于公害与文明、现代与传统等的反思。工业化、城镇化给传统社会、传统文化带来冲击，给人类尊严带来挑战。<sup>7</sup>原田医生还在亲历水俣病 40 多年后，总结提炼，形成跨学科跨领域、重视现场与反思的新学科——水俣学。<sup>8</sup>

第五，经验教训的总结与传播。日本学者、NGO、各级政府甚至窒素公司都有关于水俣教训的总结，水俣市政府建立水俣病资料馆，相思社（NGO）建立水俣病历史考证馆等，以展览、解说、会议、著述、交流、培训、环保旅行等各种形式，传播水俣的教训与经验。<sup>9</sup>甚至水俣还在开展社区再生的地元学实践项目，

---

<sup>3</sup> [日]原田正纯：水俣病，岩波书店，1972；[日]色川大吉：水俣的启示(上、下)，筑摩书房，1983；[日]财团法人水俣病中心相思社水俣病历史考证馆：图解水俣病，2010；[日]后藤孝典：沉默与爆发，集英社，1995。

<sup>4</sup> [日]原田正纯：水俣病，岩波书店，1972；[日]色川大吉：水俣的启示(上、下)，筑摩书房，1983；[日]栗原彬：证言 水俣病，岩波书店，2000；[美]Timothy S.George (2001).Minamata Pollution and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Postwar Japa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up>5</sup> 日本律师协会主编、王灿发监修、皇甫景山翻译：日本环境诉讼典型案例与评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

<sup>6</sup> [日]桥本道夫著，冯叶译：《日本环保行政亲历记》，中信出版社，2007。

<sup>7</sup> [日]栗原彬：证言 水俣病，岩波书店，2000；[日]东岛大：为什么水俣病无法解决，弘书房，2010。

<sup>8</sup> [日]原田正纯：富裕与弃民们——水俣学的起源，岩波书店，2007；[日]原田正纯：水俣学手册 2：从“负遗产”中学习，熊本日日新闻社，2006。

<sup>9</sup> [日]色川大吉：水俣的启示(上、下)，筑摩书房，1983；[日]水俣市“水俣病对我来说”编辑委员会：水俣市民要如何面对水俣病，葦书房，2000；[日]原田正纯：水俣学手册 2：从“负遗产”中学习，熊本日日新闻社，2006；[日]水俣市：水俣病 历史与教训，2007；[日]财团法人水俣病中心相思社水俣病历史考证馆：图解水俣病，2010；[日]水俣市：水俣病 历史与教训，2007；[日]环境省：水俣病的教训与日本的汞对策，2010；[日]东岛大：为什么水俣病无法解决，弘书房，2010。

衍生了一个正在形成的学科——地元学。<sup>10</sup>

近年来，随着国内环境污染事件增加，中日环境交流与合作增加，国内不少政府官员到水俣参观学习，但访问过水俣的学者还比较少。因此关于水俣的学术成果除几本译著<sup>11</sup>外，其他成果暂时不多，截止 2014 年 4 月 30 日，从知网检索到 13 篇论文，其中学术论文仅有 5 篇（除课题组成员发表的 2 篇外），<sup>12</sup>侧重历史反思、社会学思考与环境修复。另外，《比较》杂志基于对环境治理的关注，在 2012 年第 1 期上刊载了清华大学水俣课题组成员汪永晨的随笔《水俣纪行》。

13

### 0.3 水俣公害及其治理的历史回顾

水俣公害及其治理，与水俣病的起源、发生、确认、抗争与赔偿等息息相关，下文以水俣病年表形式进行简要梳理。

1908（明治 41）年 8 月 20 日，日本窒素肥料（株）成立（1950 年 1 月更名为新日本窒素肥料（株），1965 年 1 月更名为窒素公司（株），现在更名为 JNC），开始在水俣村工厂投产。

1912（大正 1）年 12 月 1 日，水俣村成为水俣镇。

1932（昭和 7）年 5 月 7 日，窒素公司水俣工厂开始制造乙醛。含有有机汞的废水开始排放到水俣湾百间港。

1949（昭和 24）年 4 月 1 日，水俣镇称为水俣市。此时，水俣市的人口为四万两千两百七十人。

1953（昭和 28）年 从此开始水俣湾周边原因不明的患者不时出现。

1956（昭和 31）年 5 月 1 日，新日本窒素附属医院向水俣保健所报告了 4 名出现原因不明的脑症状的患者病历（水俣病发生正式确认）。

1957（昭和 32）年 4 月 4 日，在水俣保健所的实验中，喂食了水俣湾鱼类的猫出现症状。8 月 1 日，水俣怪病罹灾者互助会（之后的水俣病患者家庭互助

---

<sup>10</sup> [日]吉本哲郎：地元学，岩波书店，2008。

<sup>11</sup> [日]桥本道夫著，冯叶译：日本环保行政亲历记，中信出版社，2007；日本律师协会主编、王灿发监修、皇甫景山翻译：日本环境诉讼典型案例与评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日]原田正纯著，包茂红、郭瑞雪译：水俣病，217、237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sup>12</sup> 宋德玲：日本水俣病事件的历史反思——以熊本水俣病事件为中心，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1 年第 20 卷第 1 期；张延：日本水俣病和水俣湾的环境恢复与保护，调查研究，2006 年第 5 期；程鹏立：日本水俣病的社会学研究，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10 卷第 4 期。

<sup>13</sup> 汪永晨：水俣纪行，比较，第 76 页，2012 年第 1 期。

会)成立。9月11日,厚生省针对熊本县的介绍,认为不能根据食品卫生法而采取禁止水俣湾的鱼类贩卖措施。

1958(昭和33)年9月,水俣工厂排放废水的出口由百间港秘密(直到59年2月)变更到水俣川河口。患者出现范围扩展到不知火海南部全境。

1959(昭和34)年7月14日,熊本大学研究班报告会上,有机汞原因说首次得到关注。10月6日,新日本窒素附属医院的实验中,被投入乙醛排放水的“猫400号”出现症状(该事实判明是在1968年)。11月2日,不知火海沿岸渔民要求停止排放废水等,并闯入水俣工厂(也被称为渔民暴动)。1月12日,根据厚生省食品卫生调查会、水俣食品中毒部会的结论,将有机汞说报告给厚生大臣。大臣即日解散同部会。12月28日,水俣病患者家庭互助会,一律要求300万日元的补偿金,并在水俣工厂前静坐(至12月27日)。12月25日,厚生省为了判定“问候金”的收受资格而创设了患者认定制度。12月30日,患者家庭互助会与新日本窒素签订了《问候金契约》。成人年金10万日元,儿童年金3万日元等。

1961(昭和36)年8月7日,水俣病诊察协会议会首次诊断确定胎儿性水俣病患者。

1962(昭和37)年 水俣工厂发生大的劳动争议。由此工会分裂。

1963(昭和38)年2月20日,熊本大学研究班正式公布原因物质是甲基汞,但没有得到重视。

1965(昭和40)年6月12日,正式确认新泻出现水俣病病例。

1968(昭和43)年5月18日,由于化学工业的原料石油化,水俣工厂停止制造乙醛,汞的排放停止。9月26日,政府正式发表见解,认定熊本县水俣病为公害。

1969(昭和44)年1月28日,石牟礼道子《苦海净土——水俣病》出版。4月5日,患者互助会围绕补偿金问题,由于窒素公司的建议,分裂为交由厚生省处理派及诉讼派。4月20日,水俣病告发会成立(熊本)。之后,全国出现了患者支援运动。6月14日,患者互助会诉讼派向熊本地方法院提起要求窒素公司进行损害赔偿的《水俣病裁判》诉讼。同日,川本辉夫他们这些未认定患者们首次会合。9月8日,28人提出认定申请。

1970(昭和 45)年 5 月 27 日、和解派和窒素公司、厚生省的补偿处理委员会的斡旋案上签字。不涉及公司的责任，生存者每人一次性补偿 80~200 万日元等。6 月 19 日，认定审查会否定了川本他们的患者认定申请。8 月 18 日，他们向厚生省提出了行政不服审查的请求。11 月 28 日，在窒素公司股东大会（大阪）上，“一株运动”的患者・支援者大约 1000 人出席，直接追究加害责任。

1971(昭和 46)年 7 月 1 日，环境省将水俣病相关业务移交给厚生省管理。8 月 7 日，环境省取消之前对川本等人的行政不服审查申请的拒绝处理，事务次官通知扩大患者认定。10 月 6 日，熊本县认定川本等人为水俣病患者。10 月 11 日，川本等人开始在水俣工厂进行交涉（即自主交涉抗争）。11 月 1 日，窒素公司拒绝交涉，川本等人开始在水俣工厂前静坐。11 月 16 日，针对自主交涉派，水俣市民中志愿者攻击传单开始出现。12 月 6 日，自主交涉派为实现与窒素公司社长的直接交涉的要求，开始在东京公司总部静坐（直至 1973 年 7 月 12 日）。

1972(昭和 47)年 6 月 5 日，在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斯德哥尔摩人民广场上，水俣病患者在呼吁宣传。12 月 27 日，东京地方检察院以对公司从业人员进行暴力为由，对自主交涉派川本辉夫代表提起起诉。“川本裁判”开始。

1973(昭和 48)年 3 月 20 日，熊本地方法院判决“水俣病裁判”。全部患者原告胜诉，每人 1600~1800 万日元等。同日，诉讼派和自主交涉派结成“水俣病东京交涉团”。3 月 22 日，开始与窒素公司交涉长达一生的补偿要求。5 月 22 日，因朝日新闻的独家新闻“有明海出现第三水俣病”，全国出现了汞恐慌（74 年 6 月 7 日，环境省否认了第三水俣病）。7 月 9 日，“补偿协定书”签订。在判决的基础上增加了年金・医疗费等。由此，潜在患者的认定申请不断进行。

1974(昭和 49)年 7 月 1 日，熊本县为了促进认定，开始集中检查诊断（至 8 月 31 日）。8 月 1 日，水俣病认定申请患者协议会结成。次日，认为“集中检查诊断是胡乱检查诊断”，并与之进行抗议（之后，围绕认定问题，环境省与认定申请者之间的对立激化）。

1975(昭和 50)年 1 月 13 日，东京地方法院裁决被告患者缓期执行并支付罚金。旁听患者等人以杀人・伤害罪提起诉讼告发历任窒素公司干部。8 月 7 日，抗议熊本县议会议员的“虚假患者发言”的未认定患者绪方正人等人被逮捕（也发生了发言方名誉损害的损害赔偿诉讼）。

1976（昭和 51）年 12 月 15 日，熊本地方法院将认定业务的延迟以县政府的怠慢为由判决违法。之后，熊本县强烈希望环境省提出改善政策。

1977（昭和 52）年 3 月 28 日，水俣病关系阁僚会议第一次召开。以探讨改善患者救济制度为目的，之后连续举行。6 月 7 日，窒素公司为了避免破产，向县知事提出了患者补偿金融资的请求。6 月 14 日，东京高级法院取消对“川本裁判”中被告患者的起诉，这是史上第一次公诉被拒的判决。7 月 1 日，环境省出示“后天性水俣病的判断条件”。由于“这缩小了患者认定范围”，申请者团体一起反对。10 月 11 日，熊本县开工处理水俣湾的淤泥。设置了封锁污染鱼类的隔离网。12 月，要求窒素公司水俣工厂继续存在的水俣市民运动开始展开。

1978（昭和 53）年 2 月 24 日，申请协会等未认定患者团体，要求取消行政上患者认定业务推迟，并于环境省静坐。3 月 19 日，环境省强制驱逐患者们。6 月 16 日，政府为了支援窒素公司而发行县债券，以及决定了要求患者认定需要高度可能性的新次官通知。12 月 15 日，申请协会的 22 人要求县支付与认定业务延迟相关的赔偿费，并提起“等待费用”的诉讼。

1979（昭和 54）年 3 月 28 日，未认定患者以窒素公司为诉讼对象，是 1973 年 1 月 20 日提起诉讼的“第二次诉讼”，熊本地方法院判决没有被行政的认定标准认可的患者们胜诉。

1980（昭和 55）年 5 月 22 日，未认定患者将窒素公司、国家和熊本县作为起诉对象，要求损害赔偿，并提起“第三次诉讼”。之后，在东京·京都·福冈也提起了诉讼。84 年，全国联合为一体，原告患者合计 2000 人巨大诉讼团。

1982（昭和 57）年 10 月 28 日，居住在关西的未认定患者，向国家·县·窒素公司要求损害赔偿，并向大阪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这就是所谓的“关西诉讼”。

1983（昭和 58）年 4 月 24 日，川本辉夫作为患者首次当选为市议会议员。7 月 20 日，熊本地方法院在“等待费用诉讼”中判决患者胜诉（85 年 11 月 29 日福冈高级法院也判决患者胜诉）。

1987（昭和 62）年 3 月 30 日，熊本地方法院在“第三次诉讼”中首次承认针对水俣病国家·县的责任，未认定患者胜诉。

1988（昭和 63）年 2 月 29 日，最高法院在“窒素公司刑事案件”中判决，一二审同样，原窒素公司社长、原工厂厂长有罪。9 月 4 日，申请协会认为“认



定制度没有发挥功能”，而直接要求窒素公司进行补偿，并于水俣工厂前开始静坐。

1989（平成1）年3月26日，申请协会中未认定患者在辩护律师的中间调解下，取消静坐。

1990（平成2）年3月31日，熊本县结束水俣湾淤泥处理工程。9月28日，东京地方法院依据患者原告方面的要求，劝告双方当事人和解。之后，各处法院进行同样的劝告。每个案例都是县与公司答应，而国家拒绝。

1994（平成6）年1月31日，吉井正澄当选水俣市长。之后，针对水俣病事件，他积极发表自己的意见，推进与市民的和解。

1995（平成7）年7月16日，村山首相道歉。9月28日，政府执政党提出最终解决方案。由此，全国联·患者联合（旧申请协会）等的未认定患者与窒素公司进行和解。每人260万日元等。

1996（平成8）年9月28日，在东京·品川“水俣·东京展”举办（至10月13日）。之后，全国各地开始举办水俣展。

1997（平成9）年10月16日，熊本县撤去水俣湾内封锁污染鱼的隔离网。时隔13年湾内重新可以捕鱼。

1999（平成11）年6月9日，政府决定在中央预算的一般会计中列入对窒素公司的救济资金。<sup>14</sup>

2003（平成15）年熊本县在汞淤泥疏浚后的百间排水道检测出高浓度的戴奥新，最后判明污染源是窒素公司工厂内老化的农药工厂，之后逐渐成为一个问题。

2004（平成16）年3月，确立在水俣市水源区域建立大型废物处理厂计划。市民·患者们开始反对运动。10月15日，最高法院判决“关西诉讼”。命令对

---

<sup>14</sup>日本的政府预算包括一般会计和特别会计，一般会计是指特别会计以外的所有财政预算和支出，主要用于福利、教育、消防等和国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事业。日本倾国库之力的金融支援措施如下：（1）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废除持续20年的以县债发行为主的支援方式。（2）窒素公司在从公司经常利润中支付患者赔偿金后，在有余力的情况下尽可能偿还县里的借款（县债），无法偿还的部分由国库一般会计和地方财政措施两种方式代为偿还，二者的比例为8比2。代为偿还的部分日后由窒素公司返还。（3）免除窒素债务中支付给未认定患者的一次性补偿金之国家补助270亿日元。因此，此处提到的救济金额包括免除部分和代为支付部分。参见《チッソ金融支援策の政府案》，载1999年6月10日《熊本日日新闻朝刊》，第1版。感谢肖梦老师的提问，感谢日本熊本学园大学水俣学研究中心宫北隆志教授与中国访日学者李墨竹女士不辞辛劳地帮助寻找资料，解答疑问。

未认定患者进行赔偿，并确定了国家和熊本县的加害责任。之后，新的申请者激增。

2005（平成 17）年 10 月 3 日，不知火患者会的新申请者针对国家·县·室素公司，向最高法院判决要求普通损害赔偿的诉讼。

2006（平成 18）年水俣病迎来 50 周年，4 月在东京、5 月在水俣等地举办水俣病牺牲者慰灵仪式。9 月 19 日，寻求与环境大臣进行水俣病问题相关的私下恳谈会、现行患者救助体系等根本性改革的提案公布。

2007（平成 19）年 10 月 11 日，被害者互助会中新的申请者针对国家·县·室素公司提起要求超出补偿协定的损害赔偿的诉讼。

2008（平成 20）年 2 月之前，未处理的申请者人数达到 15000 人。<sup>15</sup>

2009 年 7 月，《关于水俣病受害者的救济及水俣病问题解决的特别措施法》公布施行。

2010 年 3 月，不知火患者会诉讼在熊本地方法院达成和解的基本协议，10 月在新泻地方法院、11 月在大阪及东京地方法院达成基本协议；4 月，内阁会议通过《关于水俣病受害者的救济及水俣病问题解决的特别措施法》的救济措施方针，5 月开始受理救济申请，10 月开始支付基于救济措施方针的一次性金额。

<sup>16</sup>

2011 年 7 月 31 日，认定患者累计达 2237 名，其中熊本县 1782 名，鹿儿岛县 491 名。<sup>17</sup>

## 一、走近水俣——清华水俣调查团的 10 天访日行程

2011 年 11 月 20 日至 30 日，“社区环境治理的教训与经验研究——以日本水俣市的工业污染 及其社区再生为例”课题组，来自学界、媒体和 NGO 的一行 9 人，对世界十大环境公害的水俣病发生地进行为期 10 天的访问。调研团围绕水俣公害及其治理，以参观、访问、访谈、座谈会等调研方法，对患者及其家属、致害企业、NPO、政府官员、职业工作者等多方主体进行了调研，基本调研行程

<sup>15</sup> 如上梳理参见盐田武史：《镜头下可爱的水俣》，第 135-138 页，岩波书店，2008。

<sup>16</sup> 参见环境省环境保健部环境安全课：《水俣病的教训和日本的汞对策》，2011 年 10 月。

<sup>17</sup> 该数据来源于水俣病资料馆的公示，2011 年 11 月 21 日参观水俣病资料馆时记录。且课题组已经翻译的文献均旁证此数据。

如表 1。我们以汪永晨的日记体，随笔记录主要行程。

表 1 2011 年水俣调研行程

时间	调研对象	调研地
11 月 20 日		抵水俣
11 月 21 日	参观水俣环保公园 参观水俣病资料馆 访谈熊本学园大学原田正纯医生 访谈患者互助组织萤之家谷洋一和患者坂本忍等 访谈水俣协力病院藤野纠医生	水俣
11 月 22 日	在宫北隆志教授讲解带领下 参观全村博物馆（地元学实践） 参观水俣病多发渔村 访谈水俣市政府环境与福祉课田畑纯一	水俣
11 月 23 日	访谈《熊本日日新闻》社编辑长、记者高峰武 访谈水俣学研究中心花田昌宣、宫北隆志教授	熊本
11 月 24 日	参观室素公司水俣本部厂区 参观支援胎儿性患者 NGO HOT HOUSE 并访谈加藤理事长 参观水俣病考证馆（吉永利夫讲解） 访谈支援患者 NGO 相思社弘津理事 访谈环保教育旅游 NGO 环不知火计划吉永理事长	水俣
11 月 25 日	访谈熊本县环境生活部 访谈熊本县县长蒲岛郁夫 访谈摄影家盐田武史	熊本
11 月 26 日	水俣调研中期会议	柳川

11月27日	柳川-福冈-东京	往东京
11月28日	访谈中日韩跨国环保 NGO 东亚环保信息发 传所相川泰、广赖稔也等（日本亚洲经济研 究所的渡边真理子女士与大塚健司先生等 陪同） 访谈铃木尧博与尾崎俊一律师 访谈一桥大学环境经济学教授寺西俊一	东京
11月29日	访谈会展 NGO 水俣 FORUM 实川悠太 访谈环境省原副部长小林光 访谈早稻田大学法学教授淡路刚久	东京
11月30日	东京-北京	返京

### 1.1 水俣病：污染与战后日本的民主斗争

美国国会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蒂莫西·S. 乔治的书《水俣病：污染与战后日本的民主斗争》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在日本历史上，水俣事件不仅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工业污染案例之一，它也体现了新型公民运动发展的轨迹，体现了社会、企业、国家之间关系的发展，最重要的，它体现了战后日本公民权和民主的重新定义。这个在世界环保史上留有重大教训的环境事件被专家们认为：水俣病不仅是一种环境病、一种人类在加速现代化进程中所付出的代价。它也是一个无情的、犯有谋杀罪的企业隐藏罪恶的过程；是各级政府和社会包括科学团体和媒体互相勾结、混淆视听、容忍悲剧的发生并掩盖事实的过程；是当权者施压，反对说出真相和采取行动的过程；是对地方社会上一个城下町的黑暗面的描述；是主流政治和草根行动的博弈；是社会对这些行动和个人的约束；是对“传统的”语言使用、宗教、和道德经济概念的坚持和适应。

在中国经济改革飞速发展的今天，日本走过的这一段路，我们中国正在走着。今天的中国，媒体报道过的癌症村就有上百之多；在苹果产品中国加工厂工作的工人，身体被严重影响的现状，正在引起中国环境 NGO 的高度重视并开始与美国苹果企业总部的人对话。从厦门 PX 事件中市民上街散步，到康菲石油开采中的

溢油，让渔民们开始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这都是今天一些环境公害在中国发生，并一边影响着人们的正常生活，一边唤醒了中国公民社会的觉悟。

那么，日本昨天水俣病的发生和产生的影响及可汲取的经验教训，自然也就是中国公民社会，中国环保组织所关注的案例。由清华大学 NGO 研究所承担的这次考察我们会全程记录，把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有关环境污染中，污染后人们的应对、思考与行动记录下来。

事件的发生是这样开始的：

1955 年 7 月的一天，滨元二德从他位于水俣市 Detsuki 村的家中走向 Tsubodan 的小入口处，他家的渔船停靠在那里。他是去把昨天捕到的乌鱼处理一下，杀了然后拿到市场去。

路不好走，旧高速路又浪费时间，所以我几乎每天都沿着铁轨走。突然有一天，当我走到这，就是现在这个 Detsuki 汽车站的时候，我被自己的鞋带绊倒了。“真奇怪，我怎么会 被鞋带绊倒？”我想。之后，我又被绊倒了一次。中津雄从后面追上我，说“二德，你怎么了？样子这么滑稽”。那就是我第一次感到身体麻木并且双手颤抖的厉害。

中津说他也有相似的症状，并建议他俩一起去看医生。他们去了一家当地的诊所，一位市川医生给他们打了针开了药，说他们是因为高温下劳累过度导致的，要他们吃些有营养的食物并在阴凉处休息一周。当他们被要求写下自己的名字和地址时，中津发现他已经抓不住笔不能写字了。滨元几乎也不能写了。他们问医生什么是 有营养的食物，“他说有很多种，吃我们自己喜欢的就行了。我是个渔民，我们能打渔，我也喜欢吃鱼，所以回去后每天我就吃很多生鱼片，然后休息。”滨元说。

一周后，滨元的情况更加恶化了，麻痹感遍及全身。中津的视力下降，以至于他在公车上掉了一个 10 元的硬币，都无法找到。两个月里，滨元和中津不停的看医生，一家接着一家。

1952 年或者 1953 年起，周围年轻人的组织（seinendam）就开始抱怨工厂里的“坏水”。乌鸦和海鸥也不断的死亡。再早一些，在小渔村，海滨沿岸的松树开始变黄枯萎。并且造成鱼量的减产。

猫身上也发生了可怕的情况。它们常常会疯狂的“跳舞”然后死去。在 1953 年和 1954 年，滨元家就死了三只猫。1954 年 8 月，《熊本日日新闻》的报道中提到，一位茂道村的居民要求该市卫生部门帮助处理鼠患，由于猫的死亡，鼠的数量大量增加。在这个有 120 户家庭的小村庄里，两个月内大约死了 100 只猫。村民们从外面新带回来的猫不久后也开始不停旋转然后死去。从 1953 年到 1956 年，在患有水俣病的病人家中，61 只猫里死了 50 只。这种病同样对人有影响，虽然在 1956 年前，大家都像滨元一样被误诊。滨元家在 Detsuki 的一个邻居沟口丰子，在 1953 年出现了走路和说话障碍，死于 1956 年 3 月，当时只有 8 岁。

《水俣病：污染与战后日本的民主斗争》一书中描述了水俣病的三个应对阶段：

第一阶段从 1956 年发现该病开始，到 1959 年部分解决方案的出台结束。关于疾病，潜在的不便和为难的争论被地方精英们压在家里，没有上到法律和国家层面，这种不便和为难，不仅仅针对窒素公司，对于想要庇佑战后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增长计划的政府部门领导们来说，也是一样的。第一轮应对的“解决方案”，包括对受害者的“同情”补偿；对渔业合作社的少量补偿；而且没有出台清除汞的污水处理设施。该解决方案标志着一个阶段的结束，这一阶段以科学家们查找病因，化工厂隐瞒情况，受害者得到补偿，以及政府暗地解决为特点。整个事件似乎从未得到国家的重视。

1959 年后，日本和水俣发生的巨大变化——该市对窒素公司忠诚度的降低，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新左派势力的高涨，公民组织的成熟，以及其他地区出现的污染公害疾病，瓦解了第一阶段的解决方式，并推动成立新形式的组织，采取新行动。1960 年代末、1970 年代初，由于水俣病和其他一些出现在日本的环境病得到了政府迟到的确认（窒素公司排放的甲基汞正是造成水俣病的原因），民众的政治参与变成可能并且愈加积极。水俣事件在没有反对党的利用和官方协

助的情况下，得到了全国范围内的支持和重视。在第二阶段中，一些受害者及他们的支持者得到了更加完整和公平的对待。一些人起诉了窒素公司；一些人要求与公司高层直接谈判。总之，他们既赢得了金钱补偿，又使公司在法律层面承担了应有的责任。

但问题依然存在，许多受害者没有得到确诊的认定，因而无法获得赔偿，政府责任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社会对受害者的歧视和迁怒始终存在。第三种“完全解决方案”被认为始于1995年和1996年，许多未确诊认定的患者得到了补偿，但这一解决方案任然没有涉及政府的法律责任问题，也依然有部分受害者没有得到补偿。

在日本历史上，水俣事件不仅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工业污染案例之一，它也体现了新型公民运动发展的轨迹，体现了社会、企业、国家之间关系的发展，最重要的，它体现了战后日本公民权和民主的重新定义。

水俣病在日本，不仅仅是高速增长下的一个社会阴暗面，是公民运动的绽放，还是一出贫穷的受害者反抗只在乎权力、利润、增长和稳定的企业和国家的道德剧。它不仅仅是现代化所付出的社会代价（这点我们已经很清楚），同时也是一个定义平等与公正的斗争。水俣事件是日本人民不断修正那些不被他们认为是公民权、公民社会、公共空间或者简单说就是战后日本民主的最好案例。民主是一个过程，大部分是在进化而不是改革。

蒂莫西·S·乔治说：一个社会对环境灾难的应对极大程度地体现了动用什么样的资源去寻找原因并进行制止？如果犯罪者想阻止被检查或被罚，他们有着怎样的联盟或者权力？有多少受害者被发现，对于他们的补偿是否公平？特别对于水俣，受害者要想获得公正的对待，他们手里掌握着哪些资源？他们有何种历史遗产可以利用，有哪些支持，以及这些应对该如何随着时间变化？

这些是日本的历史，有不少却是我们中国的今天。污染者有污染的智慧，受害者有受害者的资源。如何把历史的经验让今天的我们知道，并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应对我们的今天与未来，这次考察我们要了解得更多，更多，然后再通过我的笔和镜头与更多的人一起分享。

在新水俣第一天晚饭后发生了这样一个小插曲。我们已经离开饭馆走了一段路了，一位年纪不小的女服务员追上我们，通过翻译我们知道了她追我们的原因。“刚才算帐时不好意思多算了，请你们回去我们还给你们。”

听到这儿，同行的记者贺信想起今年日本地震时他来采访，一次也是算帐出了错，那次不是收多了，而是说少了。不过服务员说，是我说错了，问题出在我身上，所以不改了，我说的多少钱就按多少钱付吧。

日本人的买卖原则和他们今天的经济发展有什么必然联系吗？这可能也会是我们此次访问日本希望寻找的。

明天，我们就会拍到当年水俣病发生的地方的一切保留的原状和改变了的今天。明天，发病时给受害者们以极大帮助的医生，也是我们要采访的对象。

## 1.2 和水俣病患者近距离接触

2011年11月21日上午，我们一行人来到了水俣海边。站在写有水俣填埋地的大牌子下仰望时，我想每个人心里有的一定不只是追思。

现在每年的五月一日，日本人都要在这里追思因发展付出代价致死的人们。这里当年被污染了的大海如今被两层海泥和山土所覆盖。堆出来的山坡上有一个个做出各种神情的小小的雕塑，以寄托人们的哀思。

孩子们折的千纸鹤旁的警钟边有两个小木槌。我们敲了一下，那绵长的钟声回响在海天之间；孩子们折的千纸鹤挂在这里，是祈福还是苦苦的回忆？还有那海边的“心”下面写着的“恋人圣地”，这样的圣地给人的遐想是甜蜜吗？这些都在提醒着我，此行我要为自己头脑中的这一个个问号寻找答案。

离开被填埋的海边，我们走进了水俣资料馆。在那里，我心中原有的问号成了我太多的没想到：

我没想到，今天水俣资料馆的馆长坂本直充就是一个在妈妈肚子里就被感染上了水俣病的患者；我没想到，身体受到了如此摧残的他，竟然没有申请国家赔偿，没算在被确定的水俣病的患者中，只因为他的父亲当年就是那家污染工厂的职工。活了92个春夏秋冬的父亲2010年去世了。馆长说：我要开始申请赔偿了；



1954年出生的馆长，为父亲所在的工厂已整整付出了57年的代价，并一直活在相当于隐名埋姓中。

我没想到，从1953年发现了水俣病到现在已有59年了。在那场人为的灾难中，到底有多少人付出了生命、付出了健康、付出了他们本应该有的权力，甚至改变了他们的一生。

我没想到，在水俣当了16年市长的人，也正是那家污染企业的厂长。他直到下台，也没有改变维护工厂的利益，高于维护事实，维护他自己的地位，高于维护受到严重伤害的人们的无辜与自己的良知；

我没想到，在这场如此大的人祸面前，站出来为自己讨个公道的是少数人。大多数人是躲在家里生怕别人知道。为的是他们不要歧视，他们要结婚，他们要生子，他们打的鱼要能卖出去。

我没想到一个人为了尊严可以付出那么大的忍耐。

我没想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发生的灾难，已经到了公元21世纪的今天，六十年代得上水俣病的潜在人已经知道的有6万之多，被确认的却只有2273，以至我问了坂本直充馆长好几遍来确认自己是不是听清楚了这个让我无法相信的数据。

11月21日，离开给了我那么多不相信的水俣资料馆，我们来到熊本学园大学水俣学研究中心，原田正纯医生向我们述说了他作为一个医生在这场灾难后是如何站出来履行一个医生的职责的。

原田医生说：1976年他就到中国做过有关水俣病的演讲。

原田医生说：2011年日本的地震是天灾，也是人灾。可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很好汲取水俣病的教训。天灾人类不可抗拒，可在水俣的天灾中，现在开始看到了公害因素。食物链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显现出来。

原田医生说：这样的灾难，总是发生在离自然最近的地方，发生在最穷的地方，这几乎成了规律。

原田医生说：水俣病没有被确诊时，他和记者们一户一户地去访问，去发现。可是渔民不欢迎他们，怕消息传出去鱼会卖不出去了。

原田医生说：水俣百分之五十的税收来自这家污染企业。政府，学界都在向我们这些不顾一切去走访、去调查、去证实病因的医生施加着压力。

原田医生说：在这场大的灾难中，日本政府采取的办法不是去调查，而是个人的申报。从 1953 年发现，到 1960 年没有人再去申报时，政府就认为这场灾难过去了。到了七十年代，竟然就说没有新的患者了。

原田医生说：患者都到哪儿去了，藏在家里。

原田医生说：水俣病患者都是吃了鱼的人。当在孩子中发现时，他们才修正了。以前以为胎盘可以保护婴儿的认知，后来他们发现毒素可进入胎盘。

原田医生说：他最后的突破口是在自己的女儿降落后得知的，在日本，母亲有收藏脐带的习惯。在征集了无数的脐带后，原田告诉人们，子宫是培育胎儿水俣病的温床。

原田医生说：1963 年发生水俣病后，当地政府制定了强硬措施，并对怀孕妇女说不许生孩子。很多孕妇女为此打胎，失去了做母亲的机会。

从水俣病被人类确认到今天，原田医生不离不弃地用自己做医生的良知，为水俣病患者讨着公道。他坚信水俣病是环境公害，政府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想改变这一不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提出诉讼，获取国家和企业的赔偿。

我们的车走到这里时，我隔着窗子举起了相机，我觉得家要是住在这里挺惬意。哪想到我们的车就停在了这儿，我被告之这里就是我们下午要走访的地方，水俣萤之家。这里 1996 年成立，现在是 20 位能得到帮助的水俣病患者的家。7 个工作人员。其中有 10 个水俣病患者是要这里的工作人员去家里护理的。

家门口的这种消毒我也拍了下来。

1956 年，坂本女士的女儿出生后不久，她就面临了女儿从不能走路，不能说话，不能吞咽到一年六个月后的死亡的现实。随后家里有了四个水俣病患者。在确认 女儿到底是得了什么病的过程中，坂本没有像一般人那样躲在家里不敢出来。她说女儿都成了这样，我还怕什么。她们家现在靠国家赔偿度日。有人问过她，你是要 水俣当年的发展，还是要家人的健康。这位妈妈说：我恨让我的家人生病、死亡的发展，我恨氮肥厂，它毁了我的家。

今天家里只坂本和一个患有水俣病的女儿一起生活。

坂本的二女儿 5 岁才开始讲话。从医院里去的小学残障班，吃力地上到初中。现在生活基本不能自理，要靠已经 86 岁的妈妈度日。

坂本女士说：即使她的家成了这样，当时在是不是要诉讼，家里人的意见也是不一样的。当时的水俣分成很多派，有要和解的、有要谈判的、有要赔偿的。即使现在，她的做法依然受到争议。

我们问为什么？她说，要发展，要生存，要面子。

坂本不要把人的生存权力放在这一切之上的做法让人敬佩。当她和不怕打击的人们一起到东京找总公司领导讨公道的时候，公司第一把手亲自把巨额赔款递到她的手中。而她一把就把钱打掉在地。她说我要的是我家人生存的权利，我要的是迫害我们的人站出来向我们道歉。我们坚信五十年代发病的这一群体到了七十年代的统计数字还是 120 人，是政府的失职，是企业的耻辱。10 万人的问卷调查，只发现十几个人。这种摆姿态的调查我不相信。

现在，一个中等程度的水俣病患者一年能拿到 70 万日元的赔偿。折和一个月 5000 元人民币。坂本母女就这样生活着。

虽然当年有 4000 人的窒素氮肥厂，现在只有 500 人，但是大街上的大牌子依然写有：没有氮肥厂就没有水俣发展。

藤野曾是水俣协立医院的院长，也是一个坚定地让政府认定水俣病的身体力行者。他曾参与过我们国家松花江水污染的治理。他们以医师团的形式支持受害者的诉讼。他说，在他们为此努力中，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孩子睡了不要叫醒。而他则认为，到现在国家还没有对污染进行全面调查，他们的奋斗就远没有结束。

53 年来，藤野除了让政府确认水俣病的发病原因，寻找、帮助受害者以外，就是大声地疾呼警惕慢性微量中毒，现在这种患者的发病率在一个个地显现着。不仅在日本，也在全世界。

清华大学 NGO 研究所所长王名在我们对第一天的访问发表自己的感慨时说，日本医生站在为受害者伸张正义的第一线令人可敬可佩。但是，环境问题应是预防，进入到诉讼不仅是滞后，还使问题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我们中国目前的很多环境问题从一开始就有媒体的介入，呼吁信息公开，从整体来讲是进步。

对日本水俣病发生地的采访才是第一天，已经让我们发现一个污染事件的复杂性，这一复杂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是社会的，文化的问题的交织。每个人都是多层的矛盾体，每个人站在不同的位置就会有不同的行为和举止。这对我们中国

目前的发展是不是有借鉴，我们还会在未来几天的访问中去挖掘，去体味，去思索。因为这决定着我们自己的行动和我们国家的命运。

明天我们要访问的有地方官员，我们会听到他们对这一污染事件的解读。

### 1.3 日本的乡村生活博物馆

作为世界十大公害之一的水俣病，有人这样评价：日本的水俣病就是日本高速发展的一个缩影。

日本记者田原真司负责我们此次日本水俣行的日程安排与各方关系的协调。他说：水俣病不仅给日本，给水俣留下了教训，也给水俣留下了人才。近六十年来经历，让水俣人确实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也是在近六十年来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民，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交易与妥协中，不论是哪一方都成长了一批应对这么复杂问题的领头人和参与者。这样的结果今天也被说成日本的发展与环境保护，从水俣病中汲取的教训随处可见。

水俣市的大川地区曾经也是水俣病的影响之地，可是这里并没有水俣病患者的记录。受不了歧视，怕影响了自己平静的生活，都是“隐姓埋名”活着的缘由。也是为此，即便身体上有所不适的人，也不想精神上再有压力。这一点如果不是与这些人近距离接触是无法理解的。

2011年11月22日，带我们一起走进大川地区的熊本学园大学宫北隆志教授是日本研究地元学的专家。他告诉我们当年这个小山村产粮食，也有一个小火车站。那么他们种的粮食作为商品运出去后，海边的鱼也通过火车进到了这里农家的餐桌上。那些被污染了的鱼，也就以这一途径把其经过鱼消化浓缩了的汞带到了这小小的山村。

今天小山村的空空荡荡倒不完全是因为这里曾经是水俣病的发生地，而是和我们中国一些农村差不多的原因，壮劳力都到外面找生活去了。

宫北教授带我们来之之前告诉我们，他在这里每年投资 7000 日元让农民在稻田里养鸭子，稻谷不施化肥农药，而农民每年给他 5 斤大米。而在这种交换的同时，以地元学为理论基础的大川地区全村生活博物馆也在这里办了起来。

在曾经是水俣市久木野小学校大川分校区，现在是全村生活博物馆里，吉井惠理子告诉我们，这个叫中小场的小村庄现在孩子只有两个，三十岁以下的一个，像她一样四十多岁的两个，其于都是五十岁以上的，75 岁以上的有 35 个之多。

建立文化、生态区，从地元上讲，就是要关注乡下，让这种关注有特色地走到每一个角落，宫北教授说这些时，对小山村充满了感情。这大概也是地元学的特色，地与人的神交，这是我一直以来对地元学的理解。

吉井在我们一走进农村生活博物馆后就告诉我们：过去当地人会说我们这种地方啥都没有。可有了博物馆后，我们发现日本特色的还不少呢！当地的厨师、做泡菜的高手都是难得的工匠。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不就是由些组成的吗？

吉井说，现在博物馆里像她这样叫学艺员的有三个，工匠是 13 位。自从留在村子里的人在农村生活博物馆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后，自信心大大地提高了。学艺员和工匠们都有政府发的正式的证书，自信心让他们在有人前来参加观时，会以夸张的介绍让人们对他们生活的地方，对他们的文化和他们慢生活的方式与健康的相互关系有所了解。“我们非常简单的印了 2000 本有当地特色的食谱，500 块一本。报纸上介绍的当天，就来了 500 份订单，一下子让我们手忙脚乱了。这让我们看到招回年轻人的希望。我们这一地区现在有四个这样的博物馆，它给了我们信心”。信心这两个字，在吉井的介绍中是一再地被提及的。

现在，来这里参观农民生活博物馆的人要付导游费 1000 日元，（相当于 80 人民币）在这里吃饭，尝尝厨师这一工匠的手艺，一顿要付 1500 日元。进入 11 月以来，30 人一团的旅游团都来了不少。这一收入，让全村生活博物馆存折里的钱在增加着。我问吉井你们打算用这些钱做什么，会分了吗？她说要干的事很多的，厨房旧了要维修，还想办个加工厂。现在来的人多了，我们在骄傲的同时，也觉得有了更多的责任和压力。现在 35 个 75 岁的老人中，有五个工匠，白

野猪名人、编织名人、竹艺名人，我们怀抱的希望是 我们越办越红火，让年轻人回到家乡来，他们是我们的未来。

听吉井说时，我们一行人就迫不及待地希望尽快享受她这个学艺员的导游，到这个小乡村生活博物馆的实景里去走一走，看一看。一进村，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村子里的垃圾站、学校灾害临时避难所，环境协定。没有看到的，甚至是一丁点也没有的随处乱扔的垃圾。

吉井边走，边讲，还边给听她讲的人出着试题。她的第一个问题就和水有关，她问我们，村里的小溪在下面，田地在上，我们的田完全靠大自然的浇灌。你们说水是怎么流到地里的。我的回答是上面有个蓄水池。我已经有了固定的思维模式，光靠大自然吗，人是要做点什么的。

村里还有那么急的小溪，以至于吉井问我们你们敢去吗？到了水边我们找到了答案，小溪是从山上流下来的，只要把它们“限制”一下，它们就可以流到了需要浇灌的田里。

吉井接下来的两个问题：一是这厚厚的一堵墙是做什么的？我说在山西有这样的墙是防火的。吉井说靠近了。同行的墨竹说是防水的，而曾少军则大声说：防风的。

吉井为少军鼓掌，他说对了。田边的这口大缸我们又是猜了个八九不离十，是养鱼的，我们说。但它不是养活鱼的。而是喜欢吃腌鱼的日本人当年从外面打来或买来鱼后放在这里腌制。一些快失传的工艺，在这样的农村生活博物馆里又悄悄地被拣起来，吉井说。现在村里，会做石墙的只有两个 85 岁的老人，村里也找不到想学的人。来农村博物馆参观的人里，没准就会有对这技术活感兴趣的人呢，吉井说。村里有一个庙，过去有村规约，全村的人轮流做饭上供。随着村里面日渐萧条，这一做法已经停了好久了。可自从有了农村生活博物馆，这一传统又被重拾起来。

有意思的是，我们吃饭时，吉井站在屋子里的黑板前，她说刚才回了趟家，和父亲说起她向我们的介绍。父亲特意让她再来给我们说说她漏掉的。这么重要

的话，吉井写在了黑板上。用日语写出来，我们中国人是能猜出个大概的有些时候，而吉井写的话，我们百分之百能看懂，我写在这里：住民参加，行政参加。

同行的宫北教授告诉我们，吉井的父亲当过水俣市市长，离任后回到家乡还当他的农民，现在村里只有他们一家在做林业保护。而作为市长的女儿吉井，她受过短期的大学教育，而 40 多岁的她一直都是农民。

我们今天吃的这顿饭，在那些厨师中，站在左边的就是市长夫人吉井征子。市长提醒的公民参加，行政参加这二者的结合，这就是今天农村生活博物馆的宗旨，我没有问过前市长，但我从他让女儿特别回来和我们重申，我猜想应该是兴起农村生活博物馆人的追求。再往前想想，是不是也是市长在水俣执政后的经验之谈呢。

离开中小场这个小村庄，宫北教授带我们到了水俣市的山上，他告诉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水俣的全貌。这里至今还留有人们对当年的回忆及今天还在继续着的诉讼证据。

宫北教授从地元学的角度解读水俣病，他关注的是被污染地及利益各方的地域关系，人际关系。听他讲这些时我在想，如果我们关注的怒江也用这种地元学的方式去研究，去分析，去行动，又会是一种什么趋势呢？

离开远望的大山，宫北教授又带我们去了当年窒素氮肥厂的排污口。站在排污口前，宫北教授说，当年有三分之二的污水是从这里排出来的。渔民的船从这里经过时，船边的小贝类统统死掉了。开始他们还挺高兴，这样就省事了，不然清理船边的这些小东西也不是件轻松的事。后来得知是被毒死的，他们开始着急。再后来排污口被移走了，这些被污染的水也随着转移，在扩大。

我们站在这个引起世界震惊，也让一个污染事件官司一打就是 60 个年头的发生地，宫北教授说了这样一番话：灾难总是发生在离大自然这么近的地方，总是发生在最弱势的群体中。水俣病这样的灾难，还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人群中继续。

这个涂着蓝色的屋子里住着最早被发现水俣病的两姐妹。一位已经去世，另一位还活着躺在屋里。这里被称为袋子鱼场。水从山上来，最初村子里的猫全死了，鸟也飞着飞着一头就扎进了大海。开始村里人还以为是猫有了问题。又从别的地方找来猫养，找来的猫也死了后，他们才知道是出了大问题。

当地人的饮食是一天三顿鱼的盖浇饭，用炸虾废油做肥皂。这些都和吃了有含汞的海产品有着密切的关系。站在这里时，宫北教授指着一个“海神台”告诉我们，那个老人的雕塑靠边站了，站在中间的是年轻的海神。

我们知道，这是当地人的希望。

水俣市环保局是今天我们走访的最后一站，也是这两天我们访问的单位中最冷的。我们的翻译神琦龙志说，如果夏天到政府部门去，那会是最热的地方，这都是为了节能。

在环保局，我们听到的除了和这几天听到的水俣病被确定原由的复杂以外，听到的还有这样几个数据，当年水俣市的人口是5万多，现在只有2万多了。我们窗外的学校因没有生源也关了门。当地现在老龄化程度高达30%。在水俣的税收中，窒素氮肥厂的贡献占全市税收的48.3%。在提问的环节我问这位课长：当年的市长站在工厂一边，以你自己的理解，应该吗？

“当时正是水俣经济腾飞的时候，政府和议会站在窒素氮肥厂一边是必然的。不过后来市议会还是向国家提出了禁捕区。国家没有及时采纳，使得事态扩大，正说明了问题的复杂性。复杂的问题，处理起来当然不仅有一个答案。”我听懂了这位环保官员的话中话。

“1992年我们发表了环境宣言；

现在每年的五月一日，也就是发现第一例水俣病患者的那天，我们有慰灵仪式；

2008年水俣被评为环保模范城市；

现在我们的垃圾被分为24类。开始这种分类也让中小学生参加。现在每天不同地区，不同垃圾的分类也成了人们交流的一个场所，其作用已经超越了环境保护。”



我们喜欢这位领导的直率，也对日本今天水俣病所导致的复杂，有了畏惧和要面对的双重心理。

明天，我们要采访一位跟踪这一环境问题二十多年的记者，作为同行，他的报道和对报道的分析让我们已经开始期待。

#### 1.4 记者在水俣病报道中的职责

11月23日，乘新干线到了熊本。走进《熊本日日新闻社》，今天我们要访问的是多年来一直以媒体人身份密切关注这一事件的资深记者高峰武。因为中国在环境保护中，媒体一直是以一支特殊的力量既以手中的纸笔、话筒、镜头给力，也与民间的身份投入到一些具体的保护运动中。所以，在水俣病事件中，日本的媒体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就成了此行我最希望寻找的。

在《水俣病：污染与战后日本的民主斗争》一书中有这样一段：1959年日本《朝日新闻》发表了一则报道，内容是关于他们的实验结论，这则报道是整个水俣事件中最大的一篇新闻材料。《朝日新闻》泄露说，熊本大学的北村等三位教授将要宣布，通过“科学分析，临床试验和病理观察”后，“最终证实”有机汞就是致病因。文章说，教授们认为汞是有窒素工厂排放到海里去的，并且在鱼和贝的体内转化为有机汞。

为了应对《朝日新闻》的报道，窒素公司高层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尽管细川医生为他们解释了医院研究人员的研究，但没有人愿意相信大学科学家们的解释是正确的。

《熊本日日新闻》发表社论，文章中提到“因为水俣工厂用汞做催化剂是一个事实，并排放在废水中，所以我们毫不怀疑工厂的废水就是导致水俣病的原因。”两个月后，同样是这份报纸，在它另一篇社论中写道“在现阶段，还不能确定新氮素公司就是水俣病的致病来源。”

窒素公司又在1959年7月和10月间制作了4本宣传册，试图打击有机汞理论。窒素的两个主要策略，一是以自身科研条件和能力的优越来质疑大学科学家们，二是把每一种可以质疑汞理论的论点都摆出来，即使它们之间有的是互相矛盾的。这些对策使人们想起熊本大学在汞理论之前也曾怀疑过的其他物质。

在高峰武向我们讲述着他们报纸和他本在报道这一事件中的立场和做法时，

做出的这样一个判断对我们一行人有着非常深刻的启发：政府从水俣病发生以来不懂装懂就制定政策并加以执行所带来的结果是最坏的。这一点在 2011 年日本地震后的核泄漏事件中再次体现。

做了 39 年记者的高峰武和我们说：我们天天都有各种苦恼，作为记者我曾和一位政府官员一起在媒体上争论国家与个人间的关系。

官员认为我们这个社会就是应该少数人的利益可以被牺牲而服从于大多数人的利益。以此推论，在水俣病严重影响着一些人的健康时，水俣地区的发展是第一位的。高峰武与之论争的观点是，少数人的利益为什么要服从大多数，每一个人利益都是重要的。为此，在水俣，即使窒素氮肥厂为水俣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不能以少数人的健康为代价。

作为媒体从业者，高峰武在自己的报道中重视事态渐进的变化。他认为水俣病的问题至今并没有结束，问题还在继续发生着。

有意思的是，与高峰武的观点有着激烈碰撞的官员退出政治舞台后成了一个小保健所的所长。他在公开场合承认：“窒素是我本人”。此话的含义为，水俣病的制造及事件的发展是极为复杂的，我本人在面对这一复杂时，也是复杂的。

高峰武说，窒素氮肥厂，当年天皇都来过。那时没有新干线，下了火车后，红地毯是一直从车站铺到工厂的，可见它在日本经济发展中和政治上的作用。东京大学学技术的，最好的毕业生的去向是窒素氮肥厂。日本环保部曾大力反对世界卫生组织把幼儿毛发中汞的含量从 50PPM 降到 20PPm。因为这一改，意味着会有更多的水俣病患者被认定，要对海泥的清理增加更多的预算。

因为与高峰武交流有很多共同的观点，高峰武又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件让他在记者生涯中难忘的事。

作为记者高峰武曾和日本的高层一起访华。在一位国家领导人接见他们时，高峰武提了一个以他的观点不能认同的问题：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先发展沿海地区，而忽视对内地的发展，这不平等。当时这位领导生气了。并说美国的发展不是也从东部开始的吗。

问题是，不管这个问题提给国家领导人是不是应该。问题是日本使馆第二天告诉高峰武：你的问题就当没有提过吧。这一提醒，让高峰武对此的报道推迟了好几年。

在对整个水俣病的报道中，让高峰武看到并值得说一说的是，参与这一环境事件人员的广泛和多样，且每人都在以自己的善长，积极地投入着。这其中演员、摄影家 和作家。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善长上的关注，让高峰武看到了这一事件不同视角的切入点。他认为，记者把这些告诉公众很重要。

通过对水俣事件的报道，高峰武作为记者还有这样一个观点，是因为有了污染才有了水俣的发展，而不是有了发展才有污染。

这一观点我们理解为，是发展在先，还是污染在先？进一步说是什么重要？是因为发展了就可将污染忽略不计。高峰武的观点即使发展了，也在是污染制造中得到的，这样的发展我们不能要。

日本记者和政治家在媒体上争论的：少数人可不可以为多数人牺牲；因污染而得到的发展我们要不要？在今天的中国同样有着现实意义，我们的媒体上要是能有这样 的不同地位，不同立场，不同视角的争论该有多好呀。我想，这可能会成为我们回去的动力，并会为此而努力。正像那位官员和水俣病患者滨元二德说的。“窒素就 是我”人类发展中多样就是复杂。看看我们大自然的复杂，大自然的多样，经过成千上万年的演化与进化的大自然是有序的。比大自然的存在晚了不知多少的人类，为什么在发展中就急着要分出个谁对，谁错呢。一切都在发展中，关键是信息要公开，要对称。

作为媒体人，高峰武通过报道还要告诉人们，在水俣事件中，有些人我们要记住。我想，这也是一名记者的社会责任。

细川一医生，他是在东京大学毕业后分到水俣的窒素医院工作的。在发现奇怪病人后，他一方面为患者查原因，一方面在猫身上做试验。当他已经到了癌症晚期，躺 在病休上还在给法官录证言，详细说明从 400 号猫身上得到的试验数据。在细川一留下的证言中有着这样的忠告：请记住，不能只停留在现状调查；比救济更重要 的是预防。这可用于一切环境问题中。自然界和我们的行政部门无关，鱼不需要我们为它们划界。

细川一医生的这句话让我想起我们中国目前的自然保护区。我们的自然保护区很多时候是被我们划来划去的。今天，我们要煤了，对不起不管你是什么珍惜动物的家，我们高级动物要用的，你就得给我搬家。明天，我们要水电了，不管那儿是不是鱼的“产房”你也得给我挪挪窝。

高峰武告诉我们，日本有一地方叫谷中村非常漂亮。可现在那里的地下已经被挖空。那里是日本发展的基础。那里也是空山、死河、老百姓被强行搬走。田中议员请愿到了天皇那，却因此而被捕。

说到这时，高峰武很有感情的说：中国的发展要汲取日本的教训，发展不应建立在牺牲少数人的利益上。

这是一位日本记者的忠告。我们中国人能听得进去吗？作为记者我的社会责任是什么，在听了日本记者的一席谈后，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在我内心是越来越强烈。

11月23日我们在日本熊本学园大学采访宫北隆志教授和花田昌宜教授所得到的可说是为我们打开了另一窗户。他们是扎根在民间的学者。他们是从地元学，也就是从事物发生地和相关方去分析事件发生的原因和结果。我们可能看看他们的关系图。不过他们研究的关系图和我们中国的关系网不同。

企业一集落一村；食物、风土、历史、文化、地域、社会；个人、地区社会、实业环境。当你对一件事不是独立地去看它的本身，而是从它所处的环境去看时，会发现独立地去看看不到的原由和结果。

两位教授说，他们在水俣边的小村子里调查时，大多数人都不想说身体很差，即使申报水俣病患者也会避开家人去申报。如果不被批准又会愤怒。

不批的原因是县政府对此不重视。这一串的连带关系才会使水俣病发现已经快六十年了，确定是水俣病患者可以得到1600-1800万日元。可6万多的潜在病人，现在被认定的只有2237人。花田教授说，我要是有孩子，他还没有结婚，我不幸得了水俣病，我也不会申报。

地元学是两个教授在研究一个复杂的环境事件中所用的方法。他们要研究的是窒素企业进到水俣来了后，给水俣带来的都是什么，是怎么带来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社会的，健康的。

听教授们讲这些时，我多么希望我们关注了八年的怒江也有地元学方法的介入。我向两位教授提出了我的请求。他们的回答是：研究者要站在受害者一边。花田教授说，他遇到我们这样的考察也很兴奋，以往他在国际会议上碰到的中国学者常常告诉他的是，我们是有很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已经解决了。

从水俣走向未来，这是今天一些日本的记者、学者的着眼点。明天我们要去参观窒素氮肥厂，在那里我们又能听到和看到什么呢。

### 1.5 不管任何时代，不能过信科学常识

2011年11月24日上午，我们的车离开住地，直接开进了水俣窒素氮肥厂。我们想听听作为一个给人类，给日本，给水俣人带来那么大灾难的企业将如何介绍他们自己。

“窒素”——CHISSO, 现在的英文名称是JNC株式会社，中文名称也从“窒息的要素”改成了“智索”——常务执行理事大衡一郎接待了我们，工厂的大门口还挂上了中国国旗。在给我们每人座位上放的袋子里，我看到这样一页用中文写的“造成水俣病的企业之体验与反省”。在给我们放了一部这家企业2006年成立100周年时拍的电视片后，大衡一郎拿出写好的一张纸念起来。他说，企业迄今为止的赔偿金额已经达到3000亿日元。造成水俣病的企业的负面形象，在企业的经营上，不仅成为重大的累赘，而且也成了反体制运动的攻击目标，企业职工遭受暴力、业务上受到各种妨碍、有用人才流失等等，在经济损失以外的方面也蒙受了重大的打击。“造成水俣病的企业之体验与反省”中有这样四条，让人看了甚至有些感动。这是窒素人自认为的教训：

1. 不管任何时代，不能过份相信科学常识；
2. 在已经发生的结果面前，任何辩解是行不通的；
3. 担负的赔偿责任远远超过法庭的判决；
4. 公害绝对不能发生，一旦发生公司不仅陷于死地，而且将蒙受比破产更重的灾难。

在这四条后面还写上了这样一句话：以上几点教训。若能有助于各位进一步加深对环境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将感到十分荣幸。其实这页中文，来自于2005年9月作为日中经济协会访中代表团的成员之一的智索公司社长冈田俊一发表的演讲。冈田俊一在日本国内沉默寡言，但是，面对中国国家发改委等政府官员时，他通过进入智索公司40年间所真实感受到的教训，公司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因水俣病遭受到的莫大打击，却恳切地提出了以上四条总结。

去“窒素”之前，为我们安排此次行程的田原真司先生告诉我们，“窒

素”一般不接待参观，连环境省的染野先生都没有机会进入 JNC 公司呢！不知是不是因为我们是中国人，他们也希望扩大在中国的生意，所以他们答应接待我们。但我们最好不要提太尖锐的问题。

所以常务执行理事和我们讲了一席话后，我们就坐着车由一位叫木户理江的中年女士带着我们在厂里参加。她说虽然保密的东西不多，但还是有一点，所以厂区里不能拍照。我们中有人问可以拍你吗？她笑着说拍的越多越好。

木户理江的介绍中，我们知道了全世界手机、电脑等液晶生产中有一半以上来自他们企业。从化肥到化妆品，从尿不湿到薯片的包装，可以说我们平时吃的，用的可能都有用这个企业原材料制成的商品。这两天我们听人介绍，在水俣大街上有这样一句口号，我们找到了街上写有这句口号的大牌子。

去年诺贝尔化学奖的日本得主曾两次到过“窒素”。木户理江说到这时脸上充满了自豪感。她说，这位诺贝尔得主得奖之前和得奖之后到厂里的待遇大不相同。她还说，每次在她的导游中都会讲到他们厂的沉痛教训，也希望来的人回去后能好好地讲讲发生在他们这里的故事。

木户理江也说到：现在电视里还老是播出他们厂以前的照片，这让她觉得很委屈，因为现在工厂已经不是过去的工厂了。

在就要和木户理江告别时，我忍不住还是向她提了问题。我问她“你在这样的企业工作，是觉得歉疚多，还是委屈多？”她说，“到这个企业来的人，都要继续为企业做过的坏事抱歉，这也是一种继承，所以企业也要不断发展，好偿还没有还完的赔款。”我说随着被认定的水俣病患者的增加，企业的赔偿也会更多。她说，这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

说心里话，以往在中国和这样的企业打交道，他们说的话让我很难相信，可是今天，我有些相信木户了。特别是她说的，污染企业对社会的抱歉，个人在这个企业时“抱歉”也要传承，要努力工作为了早日还完赔偿。

如果如“窒素”人所说“担负的赔偿责任远远超过法庭的判决”，那么抱歉永远也不能挽回所造成的损失。离开“窒素”，我们到了被我们称为“火热

生活”（hot house）的一个组织。在那里看到的，就是永远也无法挽回的人的正常生活的丧失。

加藤竹子女士 23 年前从东京来到水俣，开始为先天水俣病的患者，能生存下去而工作着。加藤说：在这里工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十分密切。我从东京到了这里，越发感到。东京的幸福生活是建立在水俣人付出的代价之上。

加藤说，我在与这些水俣病患者一起生活的 23 年里，看着他们是如何生活下去的。在身体的极度不适中，他们没有消极，他们超越了歧视，他们为自己自豪着。与他们在一起工作，我得到了喜悦，也为自己而自豪。

在这间小小的屋子里，我们感受着水俣病人工作的艰难。不过我们知道他们的工作是有报酬的。我们也看到了加藤女士和她的伙伴们对水俣病患者的尊重与爱。能不能接受采访，要征得他们的同意，加藤对此的解释是：这里他们是主人。连进入他们工作的场所，加藤也是要先敲门的。

加藤说：我常常会想，如果我是一个水俣病患者，我也会让来这里的中小學生这样想一想，假如我是一个水俣病患者。

我们常常说的换位思考，我想或许就是加藤在这里工作的动力。这一动力让她自己一干就是 23 年。这一动力，让生活，工作在这里的水俣病患者，有尊严地活着，有尊严地工作着。

加藤说：污染夺去了这些人的健康，但是夺不走的是他们的希望。55 年了，还没有一个完善的体制，特别是对水俣病患者来说，还没有做的事太多了。他们自己在做，我们也和他们在一起做。

这里是经历了灾难的人，用一种艺术的，夸张的，象征的描绘在警示人们。当时，“窒素”是日本四大财团之一。今天的“窒素”人说：在发生的结果面前，任何辩解是行不通的。历史会告诉我们今天。在水俣，除了有政府办的资料馆，也有民间的吉永利夫们办的考证馆。为的都是让人们记住昨天，并从昨天走向未来。

当时竟然有政治家说：受害者无非是为了钱，是假患者，是冒充患者，历史也不会忘记这些人。弘津敏男是水俣相思社的现任领导。这家成立于1974年的民间组织开始是为慰灵水俣病患者而有的。后来却改为帮助受害者。虽然活动的性质改变了，但当初的宗旨几十年来没有改变。

在向我们介绍着他们都做了些什么时，弘建敏男写了一黑板的数字：收入2800万、物品销售3000万、营业额5000万、国家委托为患者办手续费400-500万、导览3000万。

原来，相思社的生存，相思社帮助受害者的资金是这么来的。

弘津敏男说，他们没有企业捐赠。也没有什么大的捐款，一些捐款是来自老人的退休金。也有老会员每年捐1万块的。曾经有一来自神奈川的匿名捐赠，每月寄来3000日元，寄了30年。可是今年6月捐赠突然停止，弘津敏男说：这让我们很担心他的身体。患者也有捐的。但相思社原则上不收患者的钱。

随着人们开始接受这一现实，事情也过了这么多年，压力慢慢地也在减少，赔款在增加。现在申报自己为水俣病患者的人也增加了。相思社帮助这些人办申请，或叫“代写文书”这是要收取一定费用的。2004-2010年，做一份收取6000元日元。现在收1万日元。这样的事政府虽然做不过来，但也没有正式地交给民间做。政府官员能说的是，你们很便宜嘛。

在相思社看来，患者是上帝。歧视患者的一些人现在也在申报自己是患者了。所以相思社的人说，收1万块代书费，我们的心里可以接受的。当然也有免费帮忙。那就都是真正的弱者。

我们不追求稳定的收入。弘津敏男说。为什么呢，有了稳定就多了依赖，多了懒惰。我们每年都要有新项目，这会鼓励我们创新，也会增强我们的活力。

弘津敏男的这种经营策略，让我们对日本民间组织发展方式有了另一种了解。其实，在我们绿家园这些年的发展，被指责的常常会有：这么多年了都没有稳定的资金来源。在日本水俣的访问，让我们看到了这些年我们能不花



钱也办事，少花钱也办事，一直在找着最适合自己做的事，其实也是我们的特色呢。

吉永利夫不是水俣人。来之前看资料时我们就对他有了拜访的兴趣。他当年是要去鹿儿岛看朋友，到了水俣就留了下来。这位带着怒火的理想主义者，白天在“窒素”门口和川本辉夫等受害者们一起静坐，晚上就到水域站前的酒吧打工。

在相思社当头时经历的一件事让他自己又成立了一个新的非盈利组织。那是一件什么事呢。为了能有活动经费，本来相思社种的柑橘都是无农药的，可是那年由于缺货，有施加过农药的柑橘掺进销售中了。

吉永说，当时他被人骂，在电视上道歉。现在看到电视上有人道歉时，他就会觉得那道歉仿佛就是自己。那件事能让他记一辈子。

如今，吉永做的事是修学旅游。为人们讲解什么是水俣病，并去海边填埋地和资料馆等现场亲身感受；一起参与垃圾分类，与胎儿性患者交流，等等加工废旧瓶子做成能用的工艺品风铃和插花杯。参加这些活动是要收费的：旅游项目轮椅解说，一次收费 15000 日元。导览护岸收费是 12000 日元。

吉永的 NPO 组织现在有七个人。有人这样形容现在还在执着地做着为水俣病患者服务的人有三种人：外地人、傻瓜，年轻人。吉永说他是前两种。

听吉永说他的活动这个收多少钱，那个收多少费是不是挺赚钱的呀，不然他为什么要成立一个新的组织。可是他告诉我们，十年来他已经亏损了 700 万日元。为什么会亏呢，吉永说他的脑子里自己还是个战士，他老想着如何与破坏环境的人斗争。就比如说接待到岛上生态游吧，他要先组织考察，这些花销就要自己垫了，不过这些并没有阻挡他还在继续做出自己想做的事的信心。

吉永还干了一件性情中事。在他的斗争中，结识了一位美丽的姑娘。他果断地和原来的爱人分了手搬出家，等着本来也有家庭的这位志同道合者。我们在做废旧瓶子加工成工艺品的小商社里见到吉永的妻子时，他说，她是当地第

四大美女。可是，他也告诉我们，他妻子的父亲是因水俣病去世的，因水俣病去世的还有妻子的爷爷，奶奶。妻子也是水俣病患者，常常会觉得累和这痛那疼。

我们问吉永，你是为了美而娶她还是为了爱情。吉永笑了。他说在一个这么小的地方，追求爱情不容易，那时会有人骑着摩托车追着他骂。

吉永现在最大的愿望是把目前政府办的水俣病资料馆接过来，自己当馆长。是啊，在水俣历史实物馆，他的解说发自曾经参与者的内心，每一物品，每一事件，每一人物都在他的脑海中，那是别人学不来的。他说，只有真的关心这件事的人，什么都不怕的人，才能做得好这份工作。他希望我们支持他。他说，不然二十年后，就无人照顾水俣病患者了。

我们能怎么支持吉永呢。挑灯夜战，为了每天把当天访问的内容让更多的关注环境，关注发展的人看到，少睡点觉是我能做的。

明天我们要访问的人是熊本县县长。在日本，县相当于我们中国的省。

## 1.6 少数人的不幸福不一定能让大多数人快乐

日本水俣病的发现是对中国的贡献，也是对世界的贡献。这是我们在日本考察水俣病发生时，水俣所在的熊本县知事（省长）蒲岛郁夫说的一句话。

我们一行人是在采访的第五天，在已经采访了水俣病患者、最早为水俣病患者奔走的医生、一直为水俣病受害群体呼吁确认的教授、记者、为水俣病患者提供服务的民间机构，以及水俣病制造者 JNC 公司（原窒素氮肥厂）和水俣环保局之后，接受熊本县知事会见的。

应该说，蒲岛郁夫知事给我们的印象不错。他说从一开始就承认这一事件中，政府应负不可推卸的责任，承认是政府的失职致使水俣病蔓延酿成这么大的灾难。

在与我们的交流中，蒲岛郁夫一再强调他最关注的是在这一灾难中受到伤害的人、是弱者。有些救助水俣病患者的政府决策还是他第一个提出的。

听他说了这些后，同行的中国商联新能源商会秘书长曾少军问这位知事（省长）：当时水俣正在飞速发展中，水俣市内至今大街上还写着“水俣和‘窒素’

是命运共同体”。水俣病被确认的患者只有 2237 个，在这样的背景下，您怎么看少数人要服从大多数人的利益？如果你把关注点放在少数人身上会不会丢失选票？

蒲岛郁夫知事说：少数人的牺牲不一定就能给多数人带来幸福，况且少数人和多数人也是会有变化的。今天大多数的受益者，或许就成了明天受害的大多数，而大多数利益获得者，又成了少数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可能。所以不能简单地判断大多数与少数。

后来我在微博上贴了这位日本官员说的以关注弱者和工作重心、他认为的应如何看待少数与多数人的话后，有人跟贴，关注弱者，这是政治家手中的一把利剑。

在会见中，蒲岛郁夫知事还说到：政府应该做的是尽快救济受害者，行政权力不能禁止老百姓不许吃鱼。政治家能做什么，我就职后叫停了一个很受争议的大坝。因为我认为能源重要，但要对生态有影响就不应该建。

在和这位大官会谈时，他也在拉我们的选票。他希望我们支持的倒不是继续任职，而是他希望我们支持他明年在水俣召开国际水俣大会。他认为水俣的教训对全世界来说太重要了。

对一件事的判断，每个人难免不站在自己的视角下结论。而对事件认知的程度，也会决定着一个的人选择。知事的这番话在我们从熊本政府大楼出来，议论时大多数人认为日本的这位官说得不错。可是，当地的记者和为我们安排此行的田原先生与我们的想法有出入。

有关水俣病的社会问题还有那么多没有解决，还有那么多受到伤害的水俣病患者至今得不到认定，就在水俣开国际会议，真是为了让世界接受教训，还是要标榜自己，为自己脸上贴金？这是《熊本日日新闻》记者在采访清华大学 NGO 研究所所长王名时说的自己的疑惑。

这一番评论和我这几天听到的那些陈述碰撞后，我这样对自己说：一个成熟的记者，对任何事情的判断，都不应在你对这件事的了解还在继续中时。我也再次想起前几天采访对水俣的报道已有三十多年历程的记者高峰武的一句话：不懂装懂就制定政策并加以执行所带来的结果是最坏的。

而这个坏，因其地位和权力的不同，带来的影响也会有着巨大的差别。错误

的判断，普通人会在普通人的范围内产生影响、记者的影响会在公众中传播、而官员的影响，则在他的执政之中，并决定着他所管辖范围内所有人的命运。

与知事的会谈中，我向知事提的问题是：这次在水俣听到两位大学教授给我们讲了利用地元学，把水俣事件放在一个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来研究，非常受启发。你要是觉得水俣病的发生对中国是贡献，希望你能特别支持日本学者用地元学的方法和我们一起分析研究一下我们已八年“抗战”的怒江发展。

知事没有正面说是不是可以，但他对未来熊本县与清华大学的合作抱有兴趣。并说大学间的交流有意义：“上海复旦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是他的学生，有什么问题可找我”。

会见后，我被同行的记者贺信形容为：你是在用中国的思维方式想象日本的管理体制。他们不是这样的，大学的研究项目，政府不能干涉。

蒲岛郁夫知事的这样一句提醒我们大家也记住了：信息转递中，政府在哪些方面做得不够，公众看得最清。日本已经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昨天，很多国家正处于今天的发展中，我希望贵国不要再犯日本已经犯过的大错，那样的灾难不应在中国再发生。

因水俣病而产生的经验及教训，应该是中日交流的重要内容。这成了我们采访到第五天时，特别是听了知事的一席话后，同行开始有了较为清晰的想法。中国能不能接受日本水俣的教训，交流就不会只在政府，也在民间。

2011年11月25日，熊本县环保局审议官内田告诉我们，日本水俣病发生后的环境恢复已有13个年头，花费的经费为485亿。

我们问内田，水俣病发生这么多年了，潜在的患者高达6万，可认定的只有2273位，而受害的人群高达20万。56年了，为什么还没有做过一次全面的普查？

内田的回答是：一，发病后的50年来，我们还在考虑有效的调查法；二，从医学上考虑，这样的调查需要1000位神经科医生、护士，我们没有那么多。

内田说：我们现在全力以赴在做救济。时间在一天天过去，患者在老龄化。此外，我们也希望水俣的昨天，能让周边国家环境政策产生变化。

知事要开国际会，环保局审议官希望教训能影响到其他国家的政策。人家的吃一堑，我们能长一智吗？这些其实也是我们回去后要努力去告诉更多的人，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2011年11月25日下午，拍了大量水俣病患者的摄影家盐田武史，向我们介绍他拍摄水俣病患者的经历。熊本学园大学的会议室里，挂着一幅幅让人伤感，让人感悟的海报。

盐田告诉我们，他拍这些患者费了不少工夫，因此他还收到了一位生活在医院里的姑娘——水俣病患者给他写来了情书。他们的身体有病，并不影响他们对爱情生活的追求。

一般人拍水俣病患者，总想把最惨的一面记录下来。而我发现，盐田先生拍的表现年轻女孩爱美的照片有不少。

在拍摄水俣病患者的摄影记者中，有的记者到了住有水俣病患者的医院。急急忙忙的，他们或许会对工作人员说，让我进去吧，还有两分钟我要乘的车就要走了，进去拍两张就走。盐田先生说，我不会这么做。我拍照片，是要得到水俣病患者的信赖，成为他们的朋友。

这几张照片里包括着多种信息，盐田说。口水流出来没有人帮忙擦，孩子的父母都去世了。脸上的笑容，是孩子在面对她的人生时的一种精神状态。小男孩爱鸽子，见到鸽子他能高兴成这样。盐田说，也有人看到这张照片后问他：这孩子是想吃鸽子吗？

这样的问题盐田说是他对水俣病患者太不了解了，我拍照片的目的也是让人们了解水俣病患者的精神世界。抱鸽子的小男孩养狗，他的手不好使，就用嘴喂狗。他哥哥养鸽子。第一次抱鸽子时，男孩和鸽子双方都紧张，慢慢地就好了。那个孩子要自己拍，这张照片是这个小孩第一次拍我。这些孩子因病视野很窄，但是他们面对生活的坚强与乐观却是我们常人难以想象的。

“我在拍他们时，第一重要的就是要尊重他们。所以我在拍他们时，从来没有受到过拒绝。我们都是朋友，那些孩子们见到我都高兴极了。我拍照时，追求的是与他们的平视，所以好多照片我是趴或跪在地上拍的。有时为了不打扰，也会用长焦拍，为了让他们高兴，也会做一些怪怪的事情，比如从窗户爬进去。患者们发现能做一些他们做不了的事情，特别高兴。”

“拍照时有没有沟通，是不一样的。有沟通的拍下来，和没有沟通的会有不同。很多人拍照时，是过去就拍，我可能会先走过去问他们要撒尿吗，这样的结果是我们就能比较容易的达到一种默契。经常在一起，慢慢地发现你要记录的内容。”盐田这样说到。

我们中有人问盐田，对于那种比较惨的镜头你一般如何处理，看你的照片中患者很多都带有笑容。

盐田的回答是：有些摄影师追求越惨的照片越有冲击力。我不是。我也拍到过一些水俣病患者比较痛苦的画面。发表时我会注意，不刻意地去要刺激，要不美的一面。我想把水俣病患者内心的一些东西拍下来，让公众了解他们，帮助他们度过生活难关。包括动物也一样，我拍了海边全是猫的尸体的画面，始终没有发表。用这样的照片我有度。

盐田说，我拍母亲给女儿智子洗澡的照片时，本来孩子是光着腿的，看到他进来，母亲顺手就拉过一块澡巾把女儿露出来的腿给盖上，尽管女儿有病，母亲就是母亲。

我问盐田，如果碰到很好的题材，但人家不同意拍，您怎么办？

盐田说，拍给孩子洗澡的照片，母亲说很讨厌，那是有的记者闯进来就拍。还问，这是谁，那是谁。人家没办法，只好让他拍。盐田说，他在拍水俣病患者时常常很紧张，会冒汗。在医院拍，最麻烦，一般会经过院长、医生、护士、家属等手续。但是他不走这样的程序，而是去问患者的家属。不过，在医院一般会抓紧时间，不应过多的打扰患者，他们的身体会受不了。

盐田说，他在拍摄中相信运气，也顺其自然。他的追求是把这些照片留给后人。一共拍了多少水俣病患者数字不好数，因为有些是合影，有的是二、三个人，有的是单照。遗憾的是他们中的60%都已经死了。

盐田拍的第一张水俣病患者的照片发表于1968年。

盐田说：水俣病的问题得到解决要有过程，需要各方参与，其中摄影作品的冲击力非常大。

盐田拍了我们在萤之家看到的坂本一家等四个患者的照片。他说，坂本忍与她的母亲都很聪明。都很坚强。我记得坂本忍的妈妈告诉我们，面对不公，面对要个说法，她曾把政府赔的钱扔了回去。

很遗憾，那天我们没有和坂本忍进行语言的交流。1972年6月7日坂本忍在15岁时参加了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盐田武史的照片记录了在这个会场上发放“被污染的日本”英文版宣传单的坂本忍，他们通过水俣病患者，让全世界的人首次意识到了环境污染的恐怖。她写的诗我们也是在采访盐田时才看到的。日本朋友原田和清华大学王名教授把诗句翻译成中文，我又把这些诗句进行了一点润色，然后用我做广播主持人的语气朗读了一遍：

这是我的人生

两年前是水俣病的五十年。

我一个人走着，就我一个人。

我不怪谁，

我原谅，

因为我也有我的错。

我要按自己的想法生活，

请不要歧视，

也不要另眼看待，

我们残障，但不特殊。

水俣病，不应另眼看待，

我不要孤单，我要偕手。

我，好想成为一只鸟，

我，好想跑一跑，

我，好想披上婚纱

去爱我爱的人，还要大胆地说出来。

我是认真的，

我傻，我不懂

可我真想爱，全身心的，尽管没有任何结果。

我和所有的人一样，

要活，长长的活着。

不孤单，

和你一起，

和你们一起。  
我，我，我……  
只是如果，只是如果。  
这就是我的人生，  
今天，永远，  
沿着这条路，这条路，我将走下去。

坂本的这首诗得了 MOYAI 音乐节优秀奖。有人也把这首诗谱成了歌，这是一位水俣病患者的心里话。读了它也难以评说，只想慢慢地琢磨，琢磨。

明天我们会去日本柳川，川，那是一条河一条河汇集的地方。那里没有水俣病，那里的人们和大自然在一起友好地相处，我在想象着。

### 1.7 柳川美，美就美在柳川的水

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的水，是人们当年都会唱的一首歌的歌词。而这歌词也正是来自人们对太湖的赞美。可是，2007 年太湖边的城市无锡曾发生了轰动全国的水污染事件，美就美在太湖的水，成了人们打开水笼头出来就是一股恶臭的水。如今站在太湖边时，很难让人把这美就美在太湖的水唱出来了。2011 年 11 月 26 日周六，我们到柳川，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的水这句歌词，让我一下子就用在了柳川。

日本西南部的福冈县柳川市，位于筑后川河口附近，清空明海农村地区。柳川最初建于 16 世纪中叶，当时是 Kamachi 氏族。在此之前，它已是个传统的农业村，是用于灌溉的运河；田中义正下令要保护的运河，并建一座城堡，这使今天的柳川依然保留着古朴与自然。1952 年 4 月 1 日，柳川正式成立为现代城市。

柳川的著名主要还是她长度为 450 公里的运河系统。

“柳川”一词意味着柳树河。如今的柳川流不运河两旁长着一棵棵高高低低的柳树。称为“Donko”小船顺流而下在水中划行。这里昔日曾是“城下町”繁盛一时。沿着垂柳投影的旧柳川城，小船悠哉闲游地顺流而下。



小船穿过的旧柳川城周围的护城河，川边的老屋和岸边的柳树在水中留下扭着“腰”的倒影。由于船慢慢进入下游，坐在小船上，可尽情享受早在 20 世纪就建造的传统日式仓库“namako”的墙壁，大树，小花在水边绿的绿，红的红的水景。

在船上眺望沿岸这样的享受，在柳川一年四季随时可行。那里有菖蒲和波斯菊盛开的季节，也有秋色的火红在“燃烧”。到了冬季，坐在小船上的被炉（日语加热设备）里，一边取暖一边观光。

乘船，大约 60 分钟。船夫们边使用长竹竿撑船，边解说柳川的过往及街道特色，还会用不太高亢但韵味十足的船歌让你感受柳川的文化。为我们撑船的船夫是每过桥时必唱，他一定是喜欢桥下那歌声的回响。

柳川，也是北原白秋，一个明治时代的诗人、作家和儿童歌曲的诞生地。每年 3 天的电影节，会在柳川举行诗歌朗诵会，焰火，音乐演唱。

每年的 3 月 3 日，是柳川的女童节，在此期间，一些当地居民会打开自家的园子，让人们来看看他们的精心装饰，显示特有的保持至今的柳川文化。

截至 2011 年 4 月 30 日，全市估计人口是 71848 人。

我们在柳川的周末“乐水行”，欣赏那里的美的同时，另一感受就是那里悠悠的河边看到人与自然在那里得到了完美的和谐。

不过，这一切并不是必然和轻易得到的美。在 1960 年代，柳川如同其他地方的日本城镇，乘上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列车，原本靠运河生存的柳川人开始享受现代化生活方式，纵横交错的运河成了倾倒垃圾的填埋场，运河终日弥漫着令人作呕的臭水沟味道，汽车多了，就需要道路，运河天然成为现代交通的敌人。柳川市无法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发展”，因此地方政府向中央申请改造旧城的资金，并获得批准拨款。这一改造旧城方案就是在运河上铺设水泥板，把运河变成下水道。柳川市政府一位地位低下的职员却不这么认为，他说，日本人是与水很亲的民族，我们的祖先那么聪明地修筑了运河，柳川人都按时辰在河中汲水，洗涮，撑船行走，我们应该把这笔中央划拨的资金用于恢复运河的功能，柳川人自己参与重建家园。他把自己的意见写下，刻蜡板印了 500 张传单，很快

传单发完了，再印。一次此求见 市长说明道理。不过，中央财政拨款也是“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要改变方案实在太难了。但是这位职员却横了心，顽强坚韧执着地去宣讲自己的理念和方案。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柳川，它的美景失而复得，为世人留下了如此令人心醉的桃花源。

11月26日一到柳川，在火车站我们还看到一景，就是志愿者在那里发放广告。进到旅馆里，又看到同样的广告贴在柜台前。直到从小船上下来，我们才明白了广告上告之的是做什么。

这里是市民安全教育节。我们几个来自中国的记者和学者也从那个布满了烟的屋子里走了一趟。屋里的雾中什么也看不见，有的只是呛。主办方的目的可能是，没有经历过火灾的人，在这里走一趟的感觉，没准什么时候就能成为不可缺少的经验。

中日两国人民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既有相互间的学习与交流，也有相互间的打仗。我们这次在日本感受最深的是他们的教养。每一个服务岗位上的人脸上的微笑，嘴里感谢和随时都在弯腰的回礼，让人体味着礼仪之邦的仪。

在今天的日本，宣传与教育来得形象而自然。用图解的文明，让你看了不能被感染。在那里环保，是住旅馆时能获取金钱的奖励。

地铁、火车，没有写着老弱病残孕专座，是给你画出来；

公共交通里上电梯时的排队，整整齐齐，让你想加塞儿都不好意思；

日本的打火机手上要是没点劲是打不动的，为什么会做这么难打的打火机呢？在日本工作的中国朋友告诉我，是因为曾经有一个小孩子玩打火机不慎把自己烧死，事故发生后，再生产的打火机，小孩子是打不出火的。这就是如今日本的打火机手劲不够是打不着的原因。这是日本的吃一堑长一智。

从我们到水俣的第一天，就看到旅馆厕所里的节水装置。马桶上的那个水笼头是让你洗手的，而洗完手的水，就可存在马桶的水箱里，下次上完后用。

东京旅馆的桌上放着一页纸，上面写着“绿色环保服务项目-一个考虑环保的选择”怎么回事呢？就是你在这家宾馆住过两天以上，你可选择一天到两天不用打扫卫生。这张纸上还写着，如果你选择了这一天不打扫卫生，你就可在当天下午5点以后去前台领取500日元的“馆内利用券”在旅馆的便利店里买东西。

当人们的环保意识还需要加强的时候，这样的奖励举措和小小的刺激，比宣传教育一定管用，我想。

当我们觉得全球气候在变化，当我们觉得环保是政府的事，当我们觉得就我一个人环保了有什么用，日本的这些小举措在告诉我们怎么做。一位在日本工作的中国朋友告诉我，日本马桶上的水笼头装置在中国就没有市场。其实，很多事要做不难，关键是做起来要方便，做起来要容易。日本的智慧用在这上面了，我们应该借鉴。也是环境保护从我做起，个人能做的。

明天，我们要采访的是法律在水俣事件中的应用。

### 1.8 水俣事件被告是国家，环境是人们生活的容器

2011年11月28日，我们在东京访问日本一桥大学教授，环境经济学者寺西俊一，他给我们算了一笔帐。

寺西俊一教授说，我们不算水俣病给日本环境的破坏带来多大的损失，也不算受害者的损失有多大，我们只算一下施害者的损失。窒素氮肥公司当年如果对排放的污水采取治理措施，花费会是200万日元。而污染事件发生后，他们付出的赔偿金额是多少，2000多亿日元。

这笔钱窒素公司根本付不起，要靠国家与他们一起付。国家的钱哪来的，纳税人的钱。

对一家企业来说，他们节省了小钱，付出的却是这样昂贵的代价。这还只是算的这家污染企业付出的代价。如果再算一算环境付出的，受害者付出的，都折合成钱，又会是多么大的一笔钱呢？

寺西俊一教授说，这就是日本在水俣污染事件中，让我们看到的什么是不划算，什么是太不划算。遗憾的是这笔帐从水俣病被确认，到今天，算了整整56年并没真正算清，而且是永远也算不清的。

寺西俊一教授说，环境是人们生活的容器，我们把容器弄脏了，还要在里面生活，那会是一种什么生活？水俣发生的污染事件，在让人们看到了水俣病给当地人和当地家庭带来的巨大痛苦的同时，也让人们看到了破坏容器带来的社会成本、经济成本。短期的获利波及到的是社会、经济的长期和未来。

绿色经济的重要，要说日本人应该是有了切身体会的。然而，他们的教训不

仅在全世界的很多国家还在重演着，就连他们自己在 2011 年 3 月 11 日发生的福岛核事故中，也还在重演着。这就是今天全世界都在面临的现实。

寺西俊一教授告诉我们，他对此提出的对策是：

一是对水俣受害者全面监测；

二是信息透明，向日本国内，向亚洲，向世界；

三是灾情不要微缩其范围，救济要公平。赔偿不应分等级。

四是进行绿色投资。

寺西俊一说，1983 年，他就参加过上海市政府与日本在经济合作方面的研讨会。1995 年他去过吉林中日联合企业。那次他受到当时国家环保局的热情接待。可是让他遗憾的是，前几年，他再去吉林时，因为那里也发生了与日本化工企业同样问题，吉林政府对他们的监视，使得他们的调查没能进行下去。

现在，寺西俊一教授说他们与中国江苏嘉兴政府的合作是愉快的。今年 12 月，他们还会请嘉兴的专家与官员到日本进行考察与研讨。就地方环境管理与政策进行研究，重点是对长三角、上海、嘉兴三地进行调研与研究。

寺西俊一说，他们也希望把发生水俣病后日本经历的四个阶段与更多的人一起分享：相互交流、相互理解、相互信赖、相互合作。

全国工商联新能源商会秘书长曾少军问寺西俊一教授：福岛核电事故，对全球核电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日本来说，福岛核电事故已被认为是水俣病的重演。不知现在那里的情况如何？

寺西俊一教授说：福岛核电站让日本的两个神话已经崩溃：

一是核电安全神话的崩溃，核电在日本无法继续发展；

二是廉价原则的崩溃。核能不是最廉价的。

这两个神话的崩溃，让日本面临的是今后将如何发展可再生能源（日本叫自然能源）。

11 月 28 日，在东京我们还采访了两位律师。其中的尾崎先生，是鹿儿岛发生水俣病负责诉讼的律师。为此，尾崎先生从东京去了 400 多次鹿儿岛。在尾崎先生 36 年的律师生涯中，三分之一的经历是从事公害与药害方面的案件。主要是为受害者讨回公道，求得救济。

铃木，是一位有着 40 年律师生涯的律师。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三分之二的案子和环境公害有关。

铃木律师认为，水俣事件仅靠熊本县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如果让政府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需要舆论的支持。要让国会与政府改变他们的态度，承担责任，在东京提起诉讼，波及效应能扩散到全国。

在东京提出诉讼，按照日本法律需要找到原告。所以，当铃木和尾崎律师听说驳回认定的部分患者住在东京附近时，就开始寻找住在那里的水俣病患者，请他们提起诉讼，将行政当局作为被告。为此，

1984 年 8 月，创立了全国律师团联络会。

1984 年 12 月，鹿儿岛的 66 名原告正式向行政当局提起诉讼。

1990 年，东京地方法院提出了和解劝告。被告当中，熊本县与氮肥公司同意以和解方式解决。

进入 21 世纪以来，水俣病患者和帮助他们法律工作者们的诉讼还在继续。作为诉讼团的团长，尾崎律师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水俣病患者的年龄在增长，有些患者的症状越加明显，有的还新发现了一些症状。

尾琦律师说，在早期诉讼时，有一位患者由儿子照顾。第二次诉讼时父亲已经不在，儿子又来了。尾琦律师问他你为什么还来参加水俣病申请？

这位当年的年轻人说：当时我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也是水俣病患者，现在在自己身上发现的症状与周围水俣病患者的一样。

2004 年，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日本最高法院做出了判决。这个判决认可了中央政府与熊本县政府的责任。

尾琦律师说：在日本，这一判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与我们的访问中，铃木和尾琦律师告诉我们：他们都认为，国家应该采取措施来解决水俣病的问题。

中央政府的想法是：制定法律，通过法律来解决。患者与原告也应该依据法律行事；

原告们却说：我们的问题应该遵循法律来解决，我们完全不能信任政府部门。

尾琦律师说，最后各方绞尽脑汁，中央政府给自己找了个台阶，创立了第三方委员会。替代法院判决的解决方法。

第三方委员会由患者推荐 2 名，中央推荐 2 名，第三方推荐 1 名，还有两名公众。

这以后，中央政府终于第一次同意了以和解方式解决问题，

铃木律师说：这又是一次划时代。

两位律师都说：通过水俣事件案子的判决，人们学到的是发生问题后第一时间一定要进行彻底排查，整体了解灾难的状况与影响。

面对当今世界在发展中还不时发生的污染事件，两位律师认真地说：凡是从事过水俣病工作的人，对福岛事件要说的话是：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就要进行彻底排查，掌握情况。做出报告。

同行的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黄浩明问两位律师，律师团经费的来源。得到的回答是：律师团收费，按照诉讼标的额的 5%，收第一次预付款。胜诉之后，胜诉额的 10%作为律师费用。不过打这一公害案子时，因原告太穷，11 年律师的预付费，都是由律师自己垫付的。胜诉之后，从团体补贴中提取垫付的费用。尾崎 律师去了 400 趟鹿儿岛，费用全部是自己垫付的。

铃木律师说：一般，公害与环境诉讼，律师很难得到报酬。但是我们当时有强烈的愿望，公害问题应该得到解决。我们就是要通过公害诉讼的方式推动日本灭绝公害问题。

在和两位律师事一起探讨这一官司时我们还得知：在东京附近，在鹿儿岛，他们到每家每户去访问，问是否愿意加入原告诉讼团。很多受害者听说被告是国家，认为这个事情太大了，受害者不敢。而当他们以诉讼的意义是造福后人来说服受害者时，不少患者才加入进来。

11 月 28 日下午的访问中，我们还得知：有关水俣病的诉讼，在律师团签名的律师有几百人，但出庭的只有 30 位。铃木律师说，在患者面前，医生与律师一样，出于使命感。

在我们的访问中，《财新传媒》的记者贺信的关注点是：法官受律师团队的邀请走入患者家中，是法官的法定义务吗？窒素公司是否也可邀请法官。法官们是否会受到相关压力？

得到的回答是：公害诉讼，最好是第一时间去现场。法官查证现场，公害诉讼让他们去看，是我们常规的做法。能不能拒绝，采用不采用，都由法官裁量。

公害诉讼，不看现场，可能不会做出正确的判决。

贺信说：法官也需要勇气。

回答：是，法官撰写判决也需要勇气。窒素氮肥公司是当地最大的公司，为当地做出了很多贡献。一旦提起诉讼，会面临很大压力。包括渔民们捕的鱼卖不出去了。而在熊本的第一次诉讼，律师们成功地获取了证人证言。

2011年11月28日，我们访问的还有日本市民运动全国中心。这家中心现在有亚洲环境信息中心；有中日韩三国环境信息网站。网站使用三国语言。中心现在每两年轮流在其中一国举行市民会议。2008年的主题就是新泻水俣病。会议请了日本新泻的小朋友，他们向中国的孩子们讲述了在日本孩子眼中的环境公害。

日本市民运动全国中心，现在与中国41家NGO组成的绿色选择联盟合作，促进高科技电子企业的整改。绿色选择联盟写给日本驻华企业的书信，中心会协助发送到这家企业在日本的总部。

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浙江台州有一家日本企业，生产过程中会产生一些影响人们健康的垃圾。他们促成了让企业为当地人做健康体检。中心的工作人员说，让他们没有想到，有一次当他们拿起一块废弃的电子垃圾——电路板问一个孩子这是什么的时候，孩子竟然说是挣钱的东西。

在与中国的合作中，亚洲经济研究所的大塚健司先生说，中国越来越严重的不是大海里发生水俣病，而是河流里发生水俣病的可能性比较大。中国水污染的问题，有的就是日本企业造成的，也有韩国企业的问题。所以中日韩三国一起举办市民会议，官方渠道看不到事，可通过民间去发现，去解决。四种力量：政府、职业工作者（学者、医生）、NGO、媒体的合作，才能使复杂的环境有解决的合力。

2011年11月28日，我们采访了大学教授、律师和民间环保组织，这是日本发生水俣病后最为活跃的民间力量。明天我要写的是对日本国环境部官员的访问。

## 1.9 油门和刹车在一个档上怎么走

2011年11月29日，访问日本环境省上席参与〈顾问〉小林光，这是我们此行采访的最大的一个官。这也是我们这次在世界十大公害之一水俣病故乡的最后一天的访问。

小林光曾是日本环境省副部长。他一上来下的论断和接下来的分析让我听着挺新鲜。

小林光说：保护环境是不是给经济造成损失，是不是真的拉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后腿，从水俣事件可以清楚地看到答案。

“窒素”当年如果治理污水，其花费仅是后来赔偿的十分之一。当年要是治理，花费是200万日元。而到目前为止，他们赔偿的钱已经相当于400亿美元。

小林光说：56年前“窒素”水的污染，导致水俣病的发生。从那时起直到今天，他们不但影响着自己企业的发展：生产力降低、投资萎缩、成本，物价上升、为治理环境花更多的钱，还一直要背着付巨额赔偿的重负，这些带来的经济萧条，也直接影响着整个地区的发展。水俣曾在日本的发展中走在前列，现在的水俣，在日本是落后地区了。

小林光说，日本近年来的经验表明，为治理环境花钱，会提高GDP的正增长。越早治理，越能减少受害损失。不为治理污染花钱，会让更多的钱投入到消极影响的消除中。

小林光说，2010年与以往相比，在日本，节能26%，成本降低的同时，利润也有了提高。

听到这时我问小林光，这个事实在我们的发展中是显而易见的，可以举出无数的事例。可是在中国，人们还是在说要先吃饱了再环保，尽快有些破坏并不是为了吃饱。在日本有多少人赞同保护环境不应在发展之后。保护环境不会拖经济发展的后腿呢？



小林光说：很少。他自己的这种观点在日本也是少数。大多数人认为的还是要先发展，是保护环境会影响经济发展。但这并不影响今天的少数人，还在努力让公众和决策者们看到经济学家们算的这笔帐。

小林光说，产业部门要和环境保护分开。油门和刹车在一个档上怎么走。预防原则说来容易做起来难。日本目前产业与环保没有分开的就是福岛，结果出了这样的灾难。

日本环境厅考虑要成立国立环境研究所，要建立独立的学术研究。

我们一行中也有人问：在我们的访问中，听到不仅水俣病受害者也包括学者都在说：千别万相信政府。小林光先生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作为官员，小林光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他说的是，我曾访问水俣病发生地 70 余次，大约在 100 天左右。我认为光补偿不行，现在患者越来越老了，护理是个大问题，福利一定要跟上。如何补偿，范围和金额一次又一次地变已有了三次。这等于是对已经做出的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否定。鸠山首相去了水俣，是去看望，更是去道歉。政府的态度也在转变着。

我坚信环境好了才能赚钱。否则今天不赔，明天也会赔，会大赔。小林光先生说。

小林光还认为：日本很多产品现在在中国生产，所以我希望推动制定生产过程的国际标准和机制。让企业的生产方式与环保标准有国际公约的限制与约束。

在访问小林光时，我发现有一点我竟然也和小林光的观点极为一致。

在中国，人们说到 NGO 总会认为没钱，找钱是最大的事，没有钱怎么做事呢？我走哪儿都在卖我们出版的书为穷孩子们建阅览室。很多人都认为靠这样找钱不行。

其实，我卖书并不完全是为了钱，而也是在找人，在找愿意把钱花在保护环境，保护弱者的人。我认为这样找到的人，就是我们潜在的力量。这些人是真正

关注环境的，是真正不仅关心自己的今天，也关心未来，关心我们后代的人。而小林光说的同样是，环境省不要钱，要人。有了我们要的人才能做我们要做的事。

连日本这样一个经济高度发展，社会民主化程度很高的国家的政府官员，也在为自己要做的事找人，我一下子觉得自己不仅不孤独，而且做的事是极具挑战的，是值得坚守的，并会为之永远的努力去做的。

2011年11月29日晚上，我们走进了早稻田大学淡路刚久的办公室

淡路刚久教授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日立公司当年开发矿山，上游有个村落是松木谷地区。田中正造，在解决矿害问题时，将矿沉在水里，全村淹没，去国会要求赔偿。对公害赔偿的贡献非常大。当时那里的矿山、炼铜厂产生一种亚硫酸的气体。到了明治时代，1890年左右，山上有些树木枯了，石头露出来。村落没法住人。松木村在山谷，早上吹暖风，亚硫酸留在大气中，全村无法居住，只剩下墓地。当时的医生没法证明健康危害，只是可以查明农业危害。做了一些预防措施。在英国留学的技术人员回来后修建高高的烟囱，将有毒气体排到海边，而不是留在山凹里。这被认为是曾经有的教训影响了一些有良知的企业。

听到我们有不同意见，淡路刚久教授笑了，他说那是100年前的事。当时企业也试着建了一个矮烟囱。结果烟倒是没有去污染周围的农田，而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全留在了工厂里。结果是工厂里滚滚的浓烟让工人们别说干活了，眼睛都睁不开，后来人们管那个矮烟囱称为：傻帽烟囱。

在和淡路刚久教授座谈时，清华大学教授王名问到：这么多年来，为什么一直没有对水俣受害地区的人民进行健康体检？

淡路刚久教授说：通产省当时否认致害原因，化工协会也否认窒素公司是致害企业。有人甚至说是二战时留下的炸弹等等。含糊其词的12年期间，当然不会给受害者进行体检。政府不作为，民间很难去做。经过的时间越长，症状体

现越不典型。原因越难查明。甚至被认为是假患者。这些都对给不知火海地区居民进行全 面健康体检形成障碍。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秘书长黄浩明问淡路刚久教授：1973 年判定了污染企业的责任，2004 年确定国家与熊本政府责任。是否能够追究首相、熊本行政长官的刑事责任？死亡的人是否可以获得赔偿？

淡路刚久教授说：窒素公司的社长承担了刑事责任，并判有罪。国家，因为不是指定的，所以要追究刑事责任很难，不存在杀人意识，只能追究业务过失。

黄浩明又问：是否可判间接犯罪或渎职罪？

淡路教授说：不能。要判得符合构成的要素。

对死亡人的赔偿，由继承人继承。

《财新》记者贺信的问题是：2004 年的判决，国家责任是不作为，但我没有看到具体是哪些方面不作为？看到的是政府不承认患者身份，行政不承认司法。

淡路刚久教授说：最高法院，只是对高级法院的事实进行认定，并不是直接认定事实。认定方法最高法院不加评论，只是说国家与县有不作为。之后就属于政治判断了。如乙型肝炎等，最高法院依据症状，从防疫学角度进行综合判断。想从法律上将官司打到底，可以做，但高级法院已经认定了。

为我们此行安排访问行程的田原先生补充到：也就是说判决中也有不清楚的地方。

我们来到日本水俣病 FORUM。那不是个患者支持组织，是一个以市民会议为组织的 NGO 法人。应该说，也是日本现在关注公害的最大一个 NGO。起步在 1997 年，起源于水俣病东京展。发起人石川是从一个编辑的角度去观察患者运动。一边做自由编辑，一边做调查工作，已经坚持了 30 年。

日本水俣病 FORUM 石川的观点是：市民应该抓住机会，汲取教训，不能让污染事件的教训就白白地过去了。

当时听到“白白”这两个字时，我一下子想到了我们在保护江河时也常常听到“白白”这两个字。而说这两个字的人是把“白白”用在江河的水要不开发，要不用来发电就白白地流走了。尽管我们已经呼吁了多年，江河并不只为我们人类而存在，江河养育着的还有大自然中的其他生灵。不能让江河的水白白地流走，仍然是今天的主流认知。

不能让教训白白地付出，不仅国人要从中汲取教训，也要告之世界，告知渴望发展的国家，这几乎是我此次在日本听到的最多的警示。

石川说：在他们的行动中，没有参加过市民运动的人会抱有一种偏见，参加过的人抱有另外一种偏见。参加过的认为不参加的人觉悟比较低，对污染的危害认识不够。没参加过的认为参加的人没事找事，或说是多管闲事。而我们就是要通过市民会议，扭转人们的观点。

水俣病 FORUM 的会员每年交 6000 日元的会费，在日本是一个中等规模的机构。现在有些政府官员和大企业的员工也成为了他们的会员。老家在水俣的人，包括窒素公司的员工及家属，也在加入中，这在以前是没有的。石川告诉我们。

石川现在大部分时间是到各处做收费演讲，讲有关水俣事件。

我在听了石川先生的演讲之后，向他提出了我的困惑：

我的困惑是：来日本，是为了学习日本人在面对水俣病时好的做法与经验。现在听来，这么多年了，问题竟然还没有解决。从省长知事，到民众，都说要汲取水俣病的教训，但日本自己福岛事件都没有接受。特别是访问的几位教授都特别强调福岛在重蹈水俣病的覆辙。为什么，像日本信息比较公开，公众参与较为广泛的 国家还这样，那希望在哪？

在我们的访问中，一批大知识分子，都在做很小的事，开个诊所，办个患者服务中心等。这些事情都是很有意义的，但对政策的影响和改变，是否太小了点？

这是不是他们在各种尝试之后的无奈选择。实践先于理论，理论反过来指导实践。但我觉得听来听去，水俣病后的日本好像没有前进，而是在转圈圈？我每天写一篇在《绿家园江河信息汇总》上刊登的文章，开始的抱很大的期望值，现在开始写日本人在上电梯认认真真的排队、写垃圾分类能分出几十种、写广告中如何关注穷孩子等等，也在关注小事了。

石川说：他本人对政府行政部门讲的教训不感兴趣的。如果说教训的话，我们应该认识到：走了这么远，还是失败。日本从明治时代失败，水俣病失败，福岛又是失败，总是在失败。从欧洲开始的现代化，已经达到了极限，不会再有大的起色。中国是否能够变成如欧洲一样的富饶国家，我也不感兴趣。但是我觉得，欧洲没有总结出的一些哲学方面的认知，我觉得，也许中国能总结出来一些。现代化、工业化的反思与失望，这些或许才是出路。

石川先生的一席话我们在坐的中国人虽然还难以产生共识，却很可以让我们思考。

什么是现代化，什么是出路？日本的水俣事件也好，日本的福岛核事故也好，日本人今天的修养也好，十天的日本之行，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和我们未来要做的关系是什么，又会产生什么影响？除了以记者的身份把这些写下来，我也会以环保“发烧友”的身份，把在日本体验的，感受到的，用在中国环境保护的行动中。

## 二. 受害者之痛——访胎儿性水俣病患者

### 2.1 水俣病资料馆馆长坂本直充

2011年11月21日上午我们参观日本熊本县（相当于中国的省）水俣市福祉环境部环境保护都市推进水俣病资料馆，而向我们介绍水俣病历史和进程的就是馆长坂本直充先生（Sakamoto Naomitsu），他本人也是一名胎儿性水俣病患者，由于他父亲是日本窒素氮肥公司的职工，年高90多岁，遗憾的是最近刚刚去世，由于他父亲的原因，坂本本人一直没有向政府提出申请确认自己是水俣病患者，因此，也没有获得政府方面的任何赔偿，11月25日我们在日本熊本县政府办公

楼大厅一层看到了一个明显的标志，水俣病公害被害者的救济窗口，客观上讲坂本先生是一名受害者，但由于父亲的原因，他没有去申请成为水俣病患者应有的权益，而默默地承受这一切痛苦和灾难，我们参观和交流的一个小时的过程，他不断地变换姿态，非常认真地为我们讲解，水俣病的历史和过程，也告知我们有近 75 万个参观者来到水俣病资料馆。参观之后，我在默默的思考，面对灾难和忍耐痛苦也许是上帝对坂本先生太不公平和公道，但是在言语之中，我们得知，坂本先生已经觉醒，他计划近期向政府申请确认自己是水俣病患者，争取他应有的那份权益，因为他已经没有任何负担阻碍他那对水俣病的愤慨。

## 2.2 萤之家的坂本忍等

坂本 shinobu 是胎儿性患者，1956 年生，与水俣病历史同龄。她是水俣病的象征，是水俣病运动的抗争者代表，她充满智慧和勇气，小时候，每天要艰难



地翻山越岭去上学，在 14 岁时，她就和妈妈一起参加了对施害者窒素公司的抗议控诉活动。她到斯德哥尔摩参加第一届人类环境大会，在街上散发传单，向世界呐喊。她也和土本典昭、原田正纯等水俣病支援者，和川本辉夫水俣病患者一起到过世界其他公害污

染之地，去传播水俣病的教训和经验。她的形象因若干伟大的摄影师、电影导演而闻名于世：尤金史密斯、盐田武史、桑原、和土本典昭！多少人写过她，多少人赞美她，都不如她自己写的诗歌和发表的心声让世人动容。

这是我的人生

两年前是水俣病的五十年。

我一个人走着，就我一个人。

我不怪谁，

我原谅，

因为我也有我的错。

我要按自己的想法生活，

请不要歧视，

也不要另眼看待，

我们残障，但不特殊。  
水俣病，不应另眼看待，  
我不要孤单，我要偕手。  
我，好想成为一只鸟，  
我，好想跑一跑，  
我，好想披上婚纱  
去爱我爱的人，还要大胆地说出来。  
我是认真的，  
我傻，我不懂  
可我真想爱，全身心的，尽管没有任何结果。  
我和所有的人一样，  
要活，长长的活着。  
不孤单，  
和你一起，  
和你们一起。  
我，我，我……  
只是如果，只是如果。  
这就是我的人生，  
今天，永远，  
沿着这条路，这条路，我将走下去。

11月21日下午，我们来到水俣病患者互助组织“萤之家”。我们看到第二位胎儿水俣病患者坂本忍，我们心中感慨已经无法用语言来描述，这时候仔细地观察坂本忍女士的每一个动作，其实她是很坚强地坐在会议桌的最边上，我们个人一直试图比较先前的印象，就是从清华大学翻译的资料的描述坂本忍与原田医生的对话的情景，当我当面见到坂本忍那坚强的又面带微笑的已经56岁的她，似乎早就将水俣病事件忘记了，并不认为她是水俣病患者，作为旁观者感到受害者她在展现她那美好的一面，并不是书中描述的她的无奈和恐怖的心情；坂本忍从无奈到清醒，从清醒到觉醒，她的经历在展现世人无法得知的内心的大哭大泣的悲哀；客观地讲，坂本忍从她出生那一天起，就将水俣病患者的命运伴随着她

的童年、青年、中年以及马上就要接近的老年，因为她已经是 56 岁的人。坂本忍作为受害者的角色，她参加东京起诉团，在东京她与窒素公司总裁的对话，展现出她觉醒的那一面，为那些未能够到东京的水俣病患者发出愤慨的声音，传递受害者痛苦的呐喊，“作为企业家，你们的社会责任何在？你们的良知何在？”。在国际上，觉醒的坂本忍，不顾疲劳和身体的痛苦，她参加了 1972 年的第一届世界环境发展的高峰会，她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向全世界呼唤，“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千万不要忘记环境保护，千万不要再走水俣病事件的老路”；她到越南去讲述水俣病的历史和经历。

当看到她在专心致志的听着她母亲坂本富士二的讲话，她一声不吭，她在坚持着；当她母亲讲述水俣病事件给她家族带来的灾难时，她的面孔在微微颤抖。据田原记者告知我们，她母亲已有 80 多岁高龄，她与女儿同时接待外界的朋友的场面已经很少很少，当他们得知中国代表团来访“萤之家”，她们又克服身体上不适，参加当天的一接待我们的事务。但今天她那一场激动和认真地陈述，让我们在场所有中国人代表团的每一位成员都感到她作为坂本忍母亲的伟大，她鼓励坂本忍像正常的孩子去上小学，去读中学，学习文化知识的力量也是坂本忍觉醒的基础；她鼓励坂本忍去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为了 20 万的水俣病患者，她奋斗，她忍耐，她们真是一批令人敬佩的坚强勇士。

在“萤之家”我们看到了其他水俣病患者，包括江口宏章先生，坂本慧仙（音译），田尚，山内，沙田女士等。

### 2.3 在 HOT HOUSE 工作的患者

11 月 24 日我们第三次正面接触水俣病患者，就是在水俣市 HOT HOUSE，翻译成中文我们两种意见，一是“大家之家”，一是“火热之舍”，大家根据各自喜好混用。在这里我们又看到几位胎儿性水俣病患者，看到他们在利用废旧的报纸，在制作简单的口袋，再销售给来访的客人，他们也在展现他们的存在和生命的力量，我们每位也自费购买了一个报纸口袋，作为纪念。

通过三次正面接触水俣病患者，我们开始收集了解水俣病患者的全体情况，从水俣病资料馆提供了数据，截止到 2011 年 7 月 31 日水俣病认定患者数位 2273 名，其中熊本县为 1782 名。鹿儿岛是 491 名。各市的分布情况如下：水俣市 1013 名，占 44.6%，出水市 388 名，占 17%，津奈木町 354 名，占 15.6%，芦北町 196



名，占 8.6%，田浦町 150 名，占 6.6%，东町 93 名，占 4.1%，御所浦町 54 名，占 2.4%，其他还有高尾野町 10 名，八代市 7 名，阿久根市 4 名，龙岳町 3 名，大矢野町 1 名。而专家估计整个水俣病的患者应在 20 万左右，而这 2273 名被认定水俣病患者也仅仅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

## 2.4 讨论与思考

1. **患者因我们之前有准备而接受访问。**见到这几位受害者，非常难得。而他们敞开心扉跟我们交流，对于我们了解真实的、第一手资料更是难得。他们愿意意见我们，与我们带给他们的印象有关，他们觉得我们真的是事前做了特别多的大量工作。那位患者，在医院呆了八年六个月，依然没有获得水俣病认证，令人惊讶，也是原来我没想到的。可能日本用科学的态度，比我们想象的成分要多一些。当然，我们还要继续寻找。

2. **水俣事件是多重矛盾的交织体，它不仅仅是环境和经济问题，更是社会和政治问题。**第一，整个水俣事件是多重矛盾的交织体，每个人也是矛盾的交织体。水俣病资料馆的馆长，他既是受害者，同时也曾是非起诉阵营的成员之一，年轻时是非起诉阵营的，老了准备写认定申请，每个人都是一个矛盾体。坂本忍的母亲，老太太自己是一个受害者，但可能她的亲戚、周围的人中也有反对她起诉的，其中矛盾很复杂，要从多角度来分析，这是我的一个感觉。第二，水俣病事件不仅仅是一个环境和经济的问题，更是社会和政治的问题。很多人之所以不愿意起诉、不愿意将水俣病说出来，考虑的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原因，还有社会习俗与大家看法，还有家庭成员将来的婚姻和人际交往问题。所以我觉得不仅仅是环境和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

3. **水俣病事件最大的特点是复杂性。**复杂性，可能是水俣病事件最大的特点。我们一开始还没有考虑这个，看过一些资料，认为它是一个环境污染问题，在当地跟经济发展结合在一起。但是我们来到水俣，发现它的复杂性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料，它不仅仅是一个污染和污染赔偿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问题，这里面还有很复杂的社会、心理、政治、文化的各种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所以正如少军所言，每个人都是矛盾体，多重矛盾体。每个人的选择，为什么即使是受害者也分了很多派？有很多的交织点，每个人站的位置不同，

表达不同，行动也不同，也就被归入不同的系统，实际上走不同的路。所以问题很大，我们下一步从政策上面对这类问题，必须要事先考虑到复杂性。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的环境问题，至少从社会、文化、心理、政治上讲，暂还没有那么复杂。但是研究水俣或者介绍水俣必须把多重视角放进去。

**4. 环境决策宜简化。**肖梦老师表达不同看法：如果要介入到水俣，我觉得做比较研究分析，就是一个针对中国现在最需要什么问题，其实就是借别人来说事，用外力来压、促我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不宜把水俣事件往复杂的方向研究，而是要把各方面的决策简化。比如说我想的人物，每一个重要人物在中间扮演什么样的重要角色，就是把这个故事说好。然后，比如说，抗争的板本老太太，她是一个角色。而萤之家的所长——谷先生，那也是一个角色。

**5. 中日的阶段性比较。**实际上中国和日本相比，工业化阶段不太一样，差距约为小半个世纪。现在的中国，尽管 GDP 总量超过日本，但人均只是日本的 1/10。这样，在分析中日比较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把不同的发展阶段来做一个比较清晰的描述。比如说日本在 1956 年，或者那个时候工业化高潮的时候，有点像我们现在经济腾飞的阶段，这种腾飞阶段，无论政府还是企业，一般来说头脑还是比较热，希望快速发展经济、赢得国际市场，因为日本是一个资源极度缺乏的国家。总体来说，中国资源比日本好。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我们现在确实要研究日本，原来我没想到的是日本文化的影响。首先是如王老师介绍的歧视文化，原来我没太注意，不像王老师在日本生活那么长时间。我觉得这个文化的因素，可能在任何公害事件里都起作用。第二个文化的因素，就水俣事件来说，日本还是比较平和的，没有出现很多暴力事件，这也是我原来没想到的。如果在中国，特别容易形成暴力事件，本来就是受害者，可能因之形成两轮受害者。日本还是比较平和，板本忍的母亲讲自己去诉讼，到东京，都是依法进行。依法，通过法律诉讼、由法院来判断，我觉得这点值得中国人思考。因为中国在建设市场经济基本条件下，肯定是走法治的道路，如果不走法治道路，国家总以人治为主，那市场经济就会打折扣，就会产生不公平的竞争。当然，利益相关者的博弈，有赢也有输，这都是很正常的现象，就像打排球一样，冠军只能有一个，不能有三个。

6. **区分学术研究与中国应用。**想多说一句，觉得我们在讨论与关注有些问题时，不能先入为主，谁是好的、谁是坏的，我们更应该以中立的原则立场来研究。至于说在中国怎么运用是另外一回事，学术研究和中国的具体应用区别开来。

7. **政府行政是一种倒逼式的政策组合。**政策组合，也是倒逼式的。首先是法律因素。学法律的人都知道，法律是最低的道德。在水俣病赔偿问题上，也是没办法了才采用的方式，而且是斗争了很多年以后才有。除了法律的因素，补偿也一样，非认证补偿也是过了很多年才出来。在赔偿、补偿之前，政府的不作为存在，为什么在赔偿的时候却没有国家责任？处理公害事件也是一种危机处理，公害发生了你怎样去应对，政府在其中扮演特别重要的角色。水俣的事件提供了教训：事件发生如果你马上采取合适的措施，你可以减少损失或者避免损失扩大，如果采取不当或缺位，就会造成更多无法控制的损失。

8. **环保行政从被动走向主动。**说对政府行政没有影响，我觉得不是。我读了桥本道夫那本环保行政的书，关键是环保行政的观念，行政你不可能去等待，过去日本产经省力量比较大的时候，他们强调消极行政、被动行政，不会去主动干预经济，除非有确凿的证据。因此，当时的水俣病或者环境污染，都说环境上没有证据。这是桥本道夫刚刚进入大藏省时候的观点，到他工作一段时间以后，他发现这个不对，因为如果你总是等待着一个科学的结论，就意味着行政滞后，行政滞后就是不负责任，确认之前很多受害者因为疾病而死亡或者受到更多痛苦，他因之提出主动行政的概念，我认为政府里面应该也是有不同的派别在斗争，像大藏省他可能更多地站在患者一边，即使站在被诉一边，政府的斗争还是有一点点效果的。我的职业是记者，不是学者，不会做学术研究，只是把这个未来可能出现的结果展现给国内的读者或者拥有权力的人。现在因为还是单方面采访，需要一个多视角，所以我还是比较期待后面能够见到另外一帮人。

9. **公民社会的作用尚待观察。**公民社会在其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包括一些 NGO 在当中是什么角色，到底起多大作用，还有待观察。比如说萤之家，针对胎儿性水俣病患者，比较专业，这样的机构在整个水俣一共三家。但水俣有两千多名认证患者和将近六万甚至如藤野所言超过十几万的潜在、疑似患者，那 NGO 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到底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碰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目前我

们还是未知的。

**10. 纪录片的困惑。**如果从专业来讲的话，拍纪录片，这样的时间肯定完全不够，我比较着急。其实我想得更多的是将来做一个什么样的片子，或者课题组有什么需要，这是从完成任务的角度。然后从个人的角度，因为我若干年前就看过日本的许多纪录片，有水俣病的，还有成田机场建机场时当地农民怎么斗争的，都是多方利益在博弈，这种复杂性，我大概心里有数，会非常非常复杂。实际上，我也很想听，比如政府怎么说，现在听到的都是说政府不好，特别不好，但是政府可能有政府的说法或者做法，需要多听。

当课题组成员问起坂本忍的母亲时，您是需要水俣经济发展还是承受水俣病的痛苦？她很坚决的回答：这样的经济发展我们不需要！

### 三. 医生的作用与反思——访原田正纯医生、藤野纠医生

#### 3.1 原田正纯、藤野纠简介

原田正纯 1934 年出生于鹿儿岛县，1960 年毕业于熊本大学医学部研究生院，2012 年逝世。这位水俣病支援者中的“教父”，被日本媒体称为“巨人”，因为是他构筑了水俣病是世界上最大、最恶劣的公害的观点。自水俣病发生以来，他



一直致力于水俣病的研究，持续每年对多数居民进行自主诊断检查。就医学层面来说，原田最大的贡献是证明水俣病可以通过母婴传播，即水俣病人中存在胎儿性患者。他一直牢记前辈白川医生的话“亏欠患者的有很多”。因此，他不仅是

以医生的身份参与水俣病，更是以人类的身份来关注水俣病的。他认为，水俣病不只限于医学领域，法律、社会学、经济学方面，都有研究的必要。“面对无法治愈的疾病时，医生能够做什么呢？”原田正纯想建立“水俣学”研究，创立一种体制以推广水俣公害的教训。他毫不留情地批评行政力量在水俣病发生和认定过程中的种种失误，他在世界上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声望。1994 年，原田正纯获得了“联合国环境全球奖”。此后，在各种努力之下，终于在熊本学园大学设立了“水俣学研究中心”，而原田正纯被任命为中心主任。原田正纯老而弥坚，直

至离世都一直坚持为水俣那些未认定的患者奔走呼号。他这位理想主义“巨人”走的是“到实践中去”的路，他身体力行走进患者的世界，他说，“真正的专家是那种会真挚地听取来自现场的声音，将其作为科学正确的体系来进行实证、思考的人。”正是因为有原田正纯的实际参与，水俣病越出了医学层面，成为一场社会运动。他所著的《水俣病》（岩波新书）和《水俣病没有结束》（岩波新书）一版再版，是了解水俣病和水俣学的重要文献。需要提及的是，《水俣病》中文版由包茂红老师翻译并于2012年出版，《水俣病没有结束》由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组织翻译，已由中信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

藤野纠曾是水俣协力医院院长，现在是名誉院长。他是一个坚定地让政府认定水俣病的身体力行者。他曾参与过我国松花江水污染的治理。他们以医师团的形式支持受害者的诉讼。他说，在他们为此努力的过程中，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孩子睡了不要叫醒。他认为，到现在国家还没有对污染进行全面调查，他们的奋斗就没有结束。50多年来，藤野除了让政府确认水俣病的发病原因，寻找、帮助受害者以外，就是大声疾呼警惕慢性微量中毒。现在这种患者的发病率在逐个显现，不仅在日本，也在全世界。

### 3.2 报告与交流

到达水俣的第二天中午，我们访问原田教授，他给我们做“水俣学展开与展望”的专题报告。下文为报告实录：

我几次访问中国，也曾接受中科院的邀请，前往中国做有关水俣病的演讲。1976年之后，中国呈现的发展是变化的，让我每次都感到惊讶。1977年去北京的时候，北京当时只有三家酒店。我个人感觉和中国的关系还是源远流长，从1976年之后和中国已有几十年的关系了，所以非常感谢贵团各位的来访。我们回顾一下包括水俣病在内的日本环境污染危害的历史，医学、医疗、医生站在最前面，这其实已经很晚很滞后，已经是无可救药了。各位考察团成员，既有新闻媒体人士，也有大学的专家学者，还有NGO领袖，这种来自社会各界的团体结构相当不错。

今年东日本发生大地震，为了表示哀悼，我每次演讲都放一些这样的照片。刚开始听到地震的情况是天灾，情况了解得越来越细，信息越来越多之后却发现有很大的人灾色彩。从人灾这个角度来谈，这次地震没有很好地汲取水俣所积累

的经验。现在核辐射排到水里通过水来淡化，但是核辐射通过食物链会浓缩到动植物当中，这种可能性非常大。现在迎来了充分汲取水俣病教训的时期。刚开始认为大地震是自然灾害，是天灾，我们人类无法抗拒，之后了解情况后就知道事故是人为造成的，换言之，这其中有很多公害的因素。从这样的意义上讲水俣病的事件，能够让我们日本公民重新加以思考，重新审视水俣病。

这张照片是1993年到1995年水俣病刚刚发生时的渔村渔港之图。1957年的水俣还很小，在海岸线有渔村。渔民捕鱼之后，有很多村民会出来在简单的鱼市中卖鱼。大家特别爱吃的这些鱼，天天吃。这是1950年代的水俣景色，海边是晒干的鱼，孩童在这里玩耍，对孩子们来说，正在晾晒的鱼儿，算是一种小吃，像爱吃的甜食一样。现在，这个景色完全改变了，问题在于排放污染水。

发现水俣病是1956年的事情，但在两年以前的1954年，已经有当地的报纸、新闻报道了猫失踪、吃死鱼后猫死这样的消息。通过这些消息，我们也可得知，疾病不是突然影响人体，而是慢慢的开始蔓延，先影响自然界，然后影响猫、狗、鸟，之后再对人体造成影响。写这个报道的记者说，如果再继续去深挖，追究猫生病、猫失踪的消息，再进行研究的话，可能会更早发现水俣病。

**王名：**也就是说，记者可能要先于医生先发现这个真相？

**原田教授：**1956年，一个家庭，三岁和五岁的孩子同时生病，医生见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同时生病，都会认为是传染病，如果是传染病，就要报告相关部门。对两个孩子进行诊断的医生非常惊讶，他赶快报到当地的防诫所。这是1956年5月1日的事情，所以我们将1956年5月1日定为水俣病发现日。这就是刚才提到的两个孩子的家，透过这张照片可以看出他确实住在靠海的地方，一旦环境污染来临，也最容易受影响。

**王名：**环境污染受害者往往是离自然最近的人，这个概念很有意思，离自然最近的往往是环境污染最容易受到伤害的，环境污染的防护能力最弱。

**原田教授：**现在这个环境已经完全变了，过去从他们家里可以直接钓鱼，这个家庭附近的猫都死去了。三岁和五岁的孩子同时生病之后，五岁的孩子现在已经去世了，但是三岁的孩子还活着，父母已经过世了。这个家庭不止两个孩子，还有一个大姐生活在大城市，父母去世之后姐姐又回到渔村来照顾弟弟。他语言还是有障碍，说不了话，做不了任何事，还在穿尿不湿。这是四十年以前的患者

照片，渔民捕鱼之后如没人买肯定会陷入贫困，在这种情况下渔民把患者关在家里不让外人看见。当年，包括政府在内的很多人和我一起一户一户地访问，以发现患者。从右边第三行却渔民写给熊本大学老师的话：熊大老师先生，熊大教授一来，报社记者也会随之来拍摄，来采访，这样的话我们渔民的生活会更加贫困，所以熊大的老师最好不要来。

**汪永晨：** 这跟中国正好是相反的情况。

**原田教授：** 他们都在家里，不出来，我们大学的教授去，他们也不会露面。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些渔民躲藏。这是一位患者家的照片，左边戴帽子的是年轻时候的我，从这些照片中可以看出这些渔民的生活穷得不得了。

这是五十年以前水俣渔村的情况，明天我们要去，现在有很多漂亮的房子。

当时有很多躲藏在家里情况恶劣的患者。这些门、隔扇、拉门都是破破烂烂的。乙烯是塑料的原料，这些塑料在我们日用品中有很多需要，当时很罕见，所以一生产就非常非常畅销，很赚钱。我经常和同学们讲：想象一下，你周边如果不存在塑料产品，你的生活会变得怎么样？污水的排放口，从工厂的角度来讲，是厂外的事，从水俣病角度来讲，却是一个起点。

这是水俣湾的一个渔村，这一带的共同点是几乎没有旱田，也没有水田，靠捕鱼维持生计，一年四季吃鱼。现在左边种橘子的地方，以前是种土豆和马铃薯的，所以他们除了吃土豆以外，就是靠吃鱼来维持生活。不像现在的汽车社会，物流方便，应有尽有。二十年前的渔民宴会，桌上除了啤酒和黄瓜外都是鱼，都是海产品。鱼的种类非常丰富，烹饪方法多样，这样的饮食文化与生活方式基本上没有改变，过着这样的生活，于是很多人都生病了。这是我们归纳的食物链，毒素排到海里，暂时会淡化，但是透过鱼、植物、鸟类进行浓缩，咱们把这些东西吃了以后就会污染人体。我们这次福岛核电站的核辐射应该汲取食物链浓缩的教训，就是说现在核辐射在海中暂时淡化，经过几年的岁月之后是不是还会浓缩，对此要加以关注。

其实当时有多少人受污染，具体的人数到如今都没有准确的数字。当时在这个海域渔村或者海岸沿线人口，大约有20万人，我觉得当时政府应该采取行动，针对这20万人进行调查。但是他们所采取的是什么呢？他们不去主动调查，而是让渔民、村民进行申报。如果渔民怀疑自己有症状而不去申报的话，政府完全不

会有任何举措。等到1959年到1960年没有人去申报了，政府就认为水俣病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其实不然，就像刚才说的那样，大家都躲在家里。一是他们捕捞的鱼卖不出去，另外，他们所担心的是如果家有患者，对就业或者婚姻有负面影响。这样的時候最需要政府伸出援助之手，但是地方政府的思维比较简单，没有申报就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没有患者了。这是1960年到1961年的情况，所以从1960、1961到1970年，我们没有发现新的患者。但是后来窒素公司氮肥工厂发生员工抗议活动。之前，公司有一种气氛，认为陆续发现患者会阻碍企业的发展。劳动者也站出来，开始与资方抗争，这塑造了另外一种气氛，就是说氮肥工厂的员工也开始替水俣病患者着想。

当时走访很多患者家庭，亲眼目睹到患者的情况。当时我们从走访中渐渐确发现先天性患者。水俣病通过吃鱼之后有机汞中毒而发生，以前认为不直接吃鱼就不会生病，但是没有直接吃鱼的孩子出现先天性水俣病征兆，以前的医疗认为女性的胎盘能够保护婴儿，我们查询了很多世界相关的论文，但是不曾发现有病毒透过胎盘进入体内的资料。熊大很多教授也开始怀疑毒素可以透过人体胎盘传染，但是还没有确切的证据。几个研究小组通过动物来研究原因，用怀孕的猫做实验，但没有取得成功，怀孕的猫本身很难找，即便找到之后不知道在什么样的时机、什么样的过程投入有机汞。当时先天性病例案也非常多，这是重症灾区汤堂，现在变化非常大。在这里，我们短期内发现了七名先天性水俣病患者，同时也发现了另外十个小孩有麻痹症状，通过这些病例，我们不得不联想是通过母体吃鱼而传染的。但世界上没有先例，如果确认，我们的发现就是首例。对于首例的病情，学者、医生都非常慎重。这是我拍下来的儿童患者，这些孩子症状都差不多，我首先想证明这些孩子症状都是一致的，同一症状应该是来自同一原因。发生时期、地域和水俣病发生完全一致，家中已经有患者，母亲在怀孕过程中经常吃鱼，且母亲也有轻微的水俣病症状出现，所以我们之后下结论，认为这些先天性患者疾病是在母亲肚子里发生的。因为是世界首例，前所未有的，所以地方政府包括学术界向我们施压，要求我们慎重做出结论。

但是，这些孩子已经五年或七年搁在那没有人管，没做相应治疗。之后发生了一件事情，一个儿童患者去世后，有人对其尸体进行解剖，解剖的结果非常清楚，正如我们的预测。这是熊本大学祖内教授公布的信息。祖内教授发布这个



消息之后我赶快举手对祖内教授述说，这个女童患者一直是我的病人。我告诉他，她有什么样的症状，同时也告知和去世的女孩症状完全一样的孩子还有很多。我们当时的研究，最后得到了肯定，之后公布了16个人，他们都被认定为通过胎盘受到有机汞感染的先天性水俣病患者。今天下午你们将见到这16人当中的一个。当时是小孩，经历了五十多年的岁月后，她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了。很多重症患者早已过世。之后我才发现日本生孩子有一个习惯，父母生下孩子后会留下脐带，当时我早些发现脐带的存在就好了，就能更早确定先天性水俣病患者。我女儿1968年出生，医院将脐带送给我们作为纪念，如果我早些发现这些脐带，就有证据了。

不可思议的是，这边有些岛屿，为什么没有患者呢？同样是吃鱼，为什么这些岛没有发现先天性水俣病患者呢？五十多年前，这些岛没有医生，没有医院，严格说是不知道有没有医生，任何信息都没有。这边陆地有这么多先天性水俣病患者，这些小岛连医生都没有的话，地方政府要到这些小岛去调查啊！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但至今政府都没做这个调查。我认识一些当时住在这些小岛的婴儿，有先天性水俣病症状的，很早就已经死去了。在国际会议上，很多外国人都会提这样的问题：这边都吃鱼，小岛那边的人都不吃鱼？他们也吃鱼，因没有进行调查，所以不知道，没有信息，但没有信息不等于不存在患者。一名教授进行了动物实验，把无机汞注入怀孕的老鼠体内，胎儿不会中毒，但是一旦把有机汞注入，胎盘就无法保护胎儿，这是因为无机汞是自然界存在的东西，胎盘可以保护，而有机汞是人工制造的，胎盘无法保护。不可救药的是，日本人重蹈覆辙又发生了与水俣病完全相同的事件，阿贺野河发生了第二次水俣病。

**汪永晨：**我有一个问题，祖内教授公布发现先天性水俣病患者信息是哪一年？

**原田教授：**1963年，精确的年月可以查论文。在新泻县又发生了水俣病，新泻县采取了强硬措施，因已经知道水俣病会产生先天性水俣病婴儿，所以他们要求怀孕的妇女不要生下腹中的孩子。这涉及很多隐私，到底这些怀孕妇女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还不清楚。据我所知，最后没有生小孩的主要是堕胎，但有一名妇女还是生了，这个孩子是新泻县先天性水俣病患者，当时新泻县不清楚是否是先天性水俣病，专门把我叫过去做诊断。

地方政府对水俣病事件的处理非常缓慢,措施非常滞后。经过几十年的诉讼,其中很多人已经过世。希望中国朋友通过日本水俣病吸取教训,思考公害环境污染我们哪里没有做到,哪些是失败的,是哪些环节造成了失败。患者没有任何错误,但为了解决问题,却要长期进行奋斗与诉讼。

我顺便也想说一下,作为政府,针对水俣病采取了哪些措施,为了救济制定了哪些政策,建立了什么样的系统,但是我觉得,在这样的过程中,有很多人的生命遭受丧失。我们现在正积极参与制订防治汞污染的国际公约,日本将起主导作用,想在条约名称中将水俣病这个词语包括进去,我并不反对建立这样的公约以及将名称定为水俣公约,但我觉得,在条约的制定与签署过程中,我们一定要记住水俣病系列事件中,各个环节发生了什么样的过失、什么样的错误,要把这些历史弄清。

**王名:** 原田先生实际上特别强调政府有过失,政府有失误,因为政府的失误使很多人的生命在这五十年当中死去了。所以他说,政府要参与制订这个公约,日本政府希望命名为《水俣公约》,他并不反对,政府想命名为水俣公约也不是一件坏事,但一定要反思政府这五十年当中做了什么错事,怎么样避免政府的错误再次发生,这个是政府要反思的,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

### 3.3 讨论与思考

#### 1. 政策非主流人士将自己的人生、事业与水俣病结合在一起,政府需要反思

原田正纯、藤野纠、谷洋一等,他们从不同的领域进入到水俣问题,成为一生的追求与事业,他们的人生都和水俣结合在一起。熊本学园大学是私立大学,因国立大学不让做水俣病研究,许多将水俣问题作为一生追求的人士来到熊本学园大学。这个非常有意思,从政策的角度来说,他们属于政策的非主流。这对我们做环境治理,特别是从政策角度来反思具有启发意义。

第一,在日本,水俣病是一个医疗问题。主要是医生最早介入,医生活跃在第一线,这些医生当然很可敬,但反映了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水俣病本身是一个融综合性、政策性、社会性于一体的问题,等到将其作为医学问题提出来的时候,这个问题已经不可救药,已经是一个需要医疗后期处理的问题。此外,水俣

在日本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医疗治疗问题，很大程度上已实际成为一个诉讼问题。这也是水俣问题在日本成为不可救药的一个问题的重要原因，它已经是一个严重滞后的政策后果如何以医疗、法律的方式来处理与消除。这个问题本身所处的这个发展阶段其实对我们很有意义。中国可以再往前，如原田先生强调：一开始就从媒体的角度来关注这个问题，比从医学、诉讼的角度关注要重要得多，我觉得这点对我们很重要。我们现在越早介入，它的问题的后果可能就相对来说要小一些。日本最大的教训是介入太晚了，他介入的时候已经是成了一个医疗问题，甚至已经成了一个诉讼问题，那就很难再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启示。

第二，在过程中，政府也好、企业均采取拖延策略，信息滞后且不对称。尽可能往后推，尽可能隐瞒真实的做法对事情的解决，特别像这样的严重公害问题的解决，整体上起了很坏的作用。这是造成水俣病几十年一直没有很好的解决的又一个主要原因。从整体的政策和对策的角度来考虑，发现问题、及时面对问题、及时解决问题，是比较上策的做法，但日本恰恰相反，因为考虑到各种因素，采取尽可能往后推，虽然医疗与认定有一个过程，法律解决需要一个过程，但整个这个过程拖得太久，拖了整整几代人。这个拖延过程，导致损失越来越大，这是一个重要的教训。

第三，采取申请制，没做广泛的调查与健康诊断。水俣病发生后，日本政府采取的是申请制，其实有充分的时间，完全可以做比较广泛的调查与健康诊断。越早期诊断，越容易找到比较明确的标准，也可以界定水俣病的范围，但日本直至今日一直没有做全面的调查与诊断，使得基本信息不对称，也无法掌握明确的标准，范围也无法明确界定。

从政策角度，实际上有很多可以反思的内容。水俣病在中国的情况我们知之不多，知道得更多的是日本曾经发生过水俣公害，然后认为日本从环境政策、补偿与诉讼应对等方面是比较成功的案例，背后的很多东西我们知道得很少，而恰恰是这些东西，对中国的政策特别是当前和下一阶段的政策来说，具有反思价值。我一个很强烈的印象，肖梦老师提出到水俣来，一开始我很大程度上带着“这是一个好的案例，我们想学习它的经验”这样的想法。但来到现场很震撼，水俣病还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到目前为止没有解决，而且看来是解决不了。这其

实对我们从政策上探寻、总结、吸收它的教训与失误，进而提供借镜，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 2.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绝望中还有希望

肖梦老师说，与王名有特别同样的感受，我真的是觉得好像是来学习的，好像觉得咱们国家现在这么多污染，而日本的这个水俣病，我们之前听到看到的，觉得日本做了这么多的、这么细致、这么有故事的工作，所以这次来一定要好好地把这些故事，通过我的广播语言传递给中国的受众。来了水俣，非常非常震撼的是，日本这样的被认为是民主进程比我们要走得远很多，甚至有时得仰视的一个国家，碰到发展中的环境障碍，才只能做到这样的地步。连日本都这样，咱们还有什么希望？！话是这么说，但是还有希望。我们现在有媒体与 NGO 有提前介入。如在水电事情上我们有提前介入，虽然中国有很多水电已经建了，但在一两条江上的目前行动，确实也是在做一种尝试：像这样的参与有没有可能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一条民主、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应该说，在极度灰心中还是看到，有一线希望，只要有一线希望，我想我们这些人就不会放弃。我希望中国的读者能跟我们同步一起去感受、去思考。

原田教授、藤野教授这些人，我们要把他们每一个人所担当的正面角色写好了，往国内介绍，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为什么这么多的人到水俣，这么多的人来拜访过他们，拜访过原田，拜访过他们这个水俣的资料馆，然后回去以后也都写成文章，在 Google 可以搜出来，非常多的人包括环保局的副局长，可是为什么在国内依然是个问题。我们需要架设桥梁，来促进中国的环保组织、NGO、中国媒体的关注以及法律主体的诉讼。两三年前我开联席会的时候，就跟王晨光老师说：为什么 2008 年三鹿奶粉这个事不能做集体诉讼，能不能用三鹿奶粉做一个突破口？虽然媒体也有倾巢出动说三鹿奶粉事件，但至少在当时，没有将这件事作为公害事件继续下去，除了有管制、压迫、打招呼什么之类的以外，我觉得大家在技术上和说故事上不太熟悉，也没有像原田、藤野与谷洋一这样的人。他们这一帮人都是满怀着理想和热情，1960 年代末 70 年代投身到这个运动。我们可能，就是汪老师他们这一批人，主要关注江河湖水，那么在公害这个问题上，我觉得现在比较缺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那么将来到底能不能，还难说。我最

大的收获之一是，一旦成为公害，政府根本没有办法来解决，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解释，必须要告诉国人听，不是说可以先发展后治理，而是这个后治理是治理不了的。一旦你启动了，除非一辈子不让受害者知道就全死掉，否则你只要救助一个，你就要救助无数人，你救助一次，你就要救助终身，它是没完没了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道理特别特别强烈。我们要把特别特别重要的内容，用像流行歌曲和影视作品一样的形式提供给政府与媒体等人士看。我觉得这个最重要，我们自己要接触大量的资料、大量的人，我们亲身面对面地感受他们，然后我们怎样把水俣这个故事说好了，说给中国人听，而且达到我们的目标。我们希望现在已经污染的，能立刻停下来，环保部门担起责任，否则这个国家，无论是患者还是政府，都无法承受。

### 3.3 是医生支持公民社会，而不是相反

首先，公民社会组织在这里头究竟起什么作用？目前没看到，我也希望从原田老师那得到答案，我问他是不是有公民社会组织帮你或者支持你，他说正好相反。他为患者提供诊断证明，从医学的角度支持公民社会组织。原来我以为怎么也得找一个 NGO 帮助或支持，而他用科学的态度来决定。这也是我原来没想到的。他的这种支持结构，并不是我们从理论上去找一个假设就可以存在。其次，记得 2002 年在约翰内斯堡，当时日本水俣病展览，是我停留时间最长的展馆，当时我很惊讶，想问日本朋友，但他们英语不是特别好，所以有时在表达上很难说清楚。当时我一直在想，日本在工业化进程当中，水俣事件对政府的公共政策的影响究竟多大，今天我听到的答案是没有多大影响，这很意外。然而，事实上是不是应该有影响？1956 年，到 1959 年，到 1968 年，十二年的漫长历史，斗争可想而知。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政府也左右摇摆，有时希望帮助受害者，有时又为了地方经济或者日本人的面子，又不希望把水俣病扩大。日本政府够厉害的，你研究水俣病我不给你经费，你研究水俣病我不让你在国立大学工作，这是我原来确实没想到的。

## 四. 媒体的作用与反思——访高峰武先生

### 4.1 高峰武简介

高峰武 1952 年生于熊本县天水市。1976 年进入《熊本日日新闻社》社会部，在这家以自由主义为宗旨、在熊本县有着压倒性的市场占有率的报纸担任记者的他，十分活跃，一直负责水俣病的采访和相关报道。通过水俣病的采访，他接触到了很多的患者，“在水俣走一走，就会明白的。因得不到水俣病的诊断而饱受



痛苦，最后去世。像这样的事情经常能够听到。”“为了这些人，我们必须充分调动自己的想象力。……不是坐在办公楼里考虑，而应该看着水俣的海洋，听着人们的话语，在这里充分地调动想象力。这才是我的想法。对于媒体，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坚持。我深切感受到了坚持的重要性。”

高峰武批评的是媒体在水俣病中，所做的努力是不充分的。他认为“记录下瞬间发生的事情的确很重要。不过，在持续的时间里持续关注一个问题，也同样重要。”

从做记者的本行出发，他更是水俣病研究者和参与者，这一身份广为人知。高峰在东京分社工作期间，曾做水俣病决策相关的采访，1999 年晋升为社会部部长兼评论员。合著有《报告文学：精神医疗》（日本评论社）等，发表有《决策形成过程》（水俣病研究会编《水俣病研究 1》）等论文。现任《熊本日日新闻社》论说委员长。

### 4.2 交流座谈

2011年11月23日上午，课题组一行在熊本日日新闻社访问了高峰武先生。如下是座谈实录：

大家好，我叫高峰武，各位桌上有一份我的履历，现年59岁，在熊本日日新闻社工作了39年。从早稻田大学毕业之后，就来了报社的社会部，主要关注社会所发生的事件、事故、各种法院的审判，以及水俣病等。2005年任编辑局副局长，2008年任局长。

接下来咱们继续说这些资料（高先生为我们每位来访者准备了一套资料），先看中文的资料。这些是有照片的文章，三份资料是一套。绪方先生毕业于东京

大学医学系，毕业后到厚生劳动省工作，一年后到环境省，然后来熊本县，主要负责水俣病。当年我和他经常处于对立与争论的状态，我站在患者的立场，经常替患者说话，绪方先生站在国家的立场主张国家、中央的看法。但我们双方都认为，我们的持续争论与探讨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们一直开展争论。绪方回东京后，任一个县卫生部的部长。为什么重新将关于他的报纸新闻汇总，是因为他也在报纸上发表关于日本3.11地震后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的文章。他自己有一个深切的体会：通过水俣病，我们知道事故发生后，存在原因不明、情况不清、信息不透明与从科学角度查明原因并及时公布信息两种情况。核辐射的原因应该可以从科学的角度来查明。他批评现在的日本政府，说一些莫名其妙的消息，不懂装懂。

**王名：**绪方说的是日本政府从水俣病到福岛核辐射，事情懂了以后制订政策是对的，而不懂装懂然后制订政策是错误的。日本在水俣病方面的失误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不懂装懂，然后制订对策，这是一个最大的失误。

**高峰武：**谈起这个问题需要较长时间，我会简短地介绍。绪方先生一直关注吃鱼导致水俣病，认为水俣病至今还影响当地居民。现在他开始反思自己关于水俣病的一些失败，他现任一个保健所的所长，也以这样的眼光去关注核辐射。绪方先生的太太是中国人。给各位的资料中，有一份是绪方先生在中国演讲的中文PPT，通过这份PPT，大家对他的想法、思路，以及水俣病的概况能了解得清楚。

**王名：**这个人很重要，他经历了反思的过程。一直以来，他们俩一直对立，他站在政府立场讨论，现在他在反思日本政府错在哪，他对日本政府的错误与失误理解得非常深入。

**高峰武：**绪方人挺好，他自愿到小地方的小保健所当所长，但他自己感觉特有信心，也更活跃。如饮水遭污染，他就不是采取以往水俣病的处理方式，而是站在现场居民与患者的立场来寻找各种解决方案。

再说下一个资料，这个浅蓝色的是最新的资料。日本律师联合会在东京举办了以水俣病为主题的研讨会，我与原田正纯先生一起参加。这本书也提到水俣病问题，主要内容是如何报道水俣病，该书属非卖品，没有销售。

这两张复印的资料，是有关水俣病的两个人——绪方正人与石牟礼道子。这位叫绪方正人，比我小1岁，今年58岁，他是水俣病患者，家中兄弟姐妹等共有十几人患有水俣病，他也是水俣病运动的一个中心人物。在引领着水俣运动工作中，

他提出疑问：如果当时我是窒素公司的职工，我会怎么样？他的回答是：如果当时我是窒素公司的职工，也会毫无感觉地排放。水俣病患者采取申报制度，作为个人，他有申报的权利，但他自己撤回了申报。

**王名：**他申报以后自己又撤回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要钱。

**黄浩明：**主动撤回来？

**高峰武：**主动撤回来。他写了一本书《窒素公司是我本人》，他主要的论点强调包括环境问题之内的很多社会问题，都关在体制之中，好多东西出不来，解决方法不对。虽然斗争条件非常苛刻，环境异常严峻，但我非常敬佩他的做法。小时候他毛发汞含量非常高，现在他手脚的麻痹依然存在。

这是下一张，右侧的这位女性叫石牟礼道子，自1955年开始，她就一直写有关水俣病的作品。水俣病的一个特征，就是在水俣病的各种活动中，出现了各种职业、各种角色的人。有石牟礼道子这样的作家，有土本典昭这样的导演，还有沙田，拍艺术的沙田，还有这样的一个摄影师。各种职业的人都深切关心水俣病，用各自独特的方式进行表现与表达。

这份深蓝色的资料是日日新闻，我们报社的介绍。

最后一份资料，是我们依照年代顺序将日日新闻关于水俣病的报道进行整理的资料，我主要依据新闻内容来介绍。我曾经几次到中国做专访，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曾随同现任日中协会会长野田一起访谈。本人作为记者去过中南海，当时很巧，去中南海是与李鹏先生座谈。李鹏先生说：高峰武先生你有没有问题？中国东部开始开放时，日本国内新闻媒体就中国的内地与沿海地区的差距开始报道，我特别想向李鹏先生提问，作为共产主义的中国应该不允许收入差距与贫富差距的存在，于是非常失礼地说：从日本来看，觉得中国的内地与沿海经济发展的确出现了差距。李鹏先生说美国也不是同时发展，也是从东海岸开始发展的。然后会谈就结束了。一出门，日本大使馆的官员就跑过来就说刚才那个话题，采取没问没听的方式解决，这就是说不让我写这个内容。之后过了几年，我把这个内容提出来，这是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向大家披露这些事没有任何问题吧？

**曾少军：**没问题。

**汪永晨：**我们也可以写。

**高峰武：**熊本日日新闻报社1942年设立，根据第5页，早报发行量340127，



而熊本县184万人，50万家庭，这说明熊本县的居民，基本上订购我们的报纸。

**黄浩明：**所以好报纸根本没必要组织征订，自然会有人订。

**高峰武：**现在更重视网络，大家不爱看报纸。报社职工总数不到500人。

接下来我们继续谈水俣病的报道。当我们考虑窒素公司的存在及其历史，窒素公司自日本明治时代以后，随着国家政策而繁荣。天皇几次访问窒素公司，意味着在日本的国家发展中，窒素公司起到很大的作用。天皇第一次访问水俣工厂是1931年，一年以后的1932年，窒素公司水俣工厂开始引入乙醛生产工艺。另外，窒素公司在朝鲜拥有一个员工多达5万的新南工厂，也曾在上海建厂。因为战争，上海、朝鲜新南等地的海外工厂设施遭受破坏，丧失生产能力，驻扎海外工厂的日本职工回到日本。

战争期间，窒素公司水俣工厂理所当然也受到美军空军的轰炸。日本政府采取倾斜性的生产方式。因物资与材料匮乏，首先最需要食品，于是日本政府向肥料公司、肥料生产行业主动投入资金，窒素公司重点生产肥料。之后，窒素公司投入生产化学产品，生产乙醛（塑料的一种原材料），变成大规模、高产量的化工厂，也促进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当时有一种说法，东京大学专攻应用科学的毕业生，最优秀的入职窒素公司，其次是昭和电工，而昭和电工也导致了水俣病。东大毕业的宇井纯教授也经常提及此事。

再看下一份资料，这是日本的水俣病话题首次刊登在报纸上，比发现水俣病早两年。报道的主要内容是：茂道地区发生猫癫痫，猫相继死掉，之后又造成老鼠急剧增多。当地居民非常困惑，就报告当地政府。其实这则报道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思考。首先，当地的猫都死掉了，猫吃的是什么呢？最多的当然是鱼。很多人喜欢养猫，自己区域的猫死掉了，就从别的地方要猫过来，但这些猫也死掉。从中可以了解，不是猫有问题或患有传染病，而是这个地区存在问题。其次，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当地没有任何水田。现在简单想象都可以肯定是当地的鱼有异常。但是很可惜，这个新闻没有继续报道，而是一次就完了，当年写这个消息的人现在也已经去世了。两年之后，才有水俣病的再次报道。当时如果有一些人对此稍微敏感一点，继续追踪报道的话，水俣病就能更早发现。这很值得今日借鉴，我们要对环境异常要敏感，做出更积极的反应。如果现在登了这样一个消息，之后肯定有跟踪报道。

再看下一篇文章，围绕水俣病的报道有几个重大转折点，我觉得这篇内容是最值得重视的转折点。1959年11月8日，水俣病发现已过去三年，原因已大致查明，即窒素公司排放污水，鱼类受到影响，经常吃鱼类的人患上水俣病，大家也大致了解水俣病的症状。于是渔民和患者要求窒素公司停止污染排放。不过对这小部分人的声音，绝大部分人都说不要停止窒素公司的污染排放。参加的人，有企业代表、市长、市议会主席、工会代表等，共有28个团体的代表参加，而没有参与的团体只有一个，那就是渔民团体。这位是县知事（县长，相当于中国的省长），除渔民团体以外，其他所有团体的所有代表都支持县知事，不要停排废水。我们的报道中有这样的文章：水俣市市税总额达1.8亿余万日元，其中一半以上来自窒素公司水俣工厂。如果工厂停产或者停办，当时水俣市五万市民的生活会受很大打击。我认为，水俣市甚至说日本社会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长期以来，至今依然维持的是少数人的牺牲构成大多数人的生活利益这样一种结构。在日本的昭和40年代，也就是从1965年到1975、1974那一段，这10年，日本称为公害立党，日本各地经常看到公害与环境污染现象。水俣病、新泻水俣病、四日哮喘病、痛痛病成为著名的四大公害事件，受害者非常悲惨。经常听人说，公害是因为高度增长期，这是无可奈何的。我很反对持这种态度的人，我认为顺序应该倒过来，因为有公害才能够实现日本的高速的增长，不是有光才有阴，而是有阴才有光。自明治时代以来，日本历史中，通过少数人的牺牲达到多数人的幸福，现在依然存在，水俣病是其中最明显的例证。二是这个报道没有显现出来的信息问题。这是1959年11月8日的报道，其实在1959年10月以前，窒素公司内部已经实施了猫的实验。这个实验简单说，就是喂猫的时候，在饵料里面放入窒素公司排放的污水，看它发不发病。1959年10月开始确认猫发病，叫做400号实验猫。这些完全没有披露出来，完全是隐蔽的。做实验的医生也想继续实验，但窒素公司完全不想把这个信息公布出去。客观地说，窒素公司已完全明确水俣病是自己造成的。1959年11月，如果窒素公司能够在社会上公开这个实验猫的发病消息，1959年11月份底各种市民团体是不是还会做出同样的行动与结论，这需要重新思考。共享信息是很重要的一个思考。也就是说，窒素方为了保护企业利益，隐蔽实验猫的实验结果之后，使水俣病的影响更进一步扩大。信息必须公开，这就是从水俣事件汲取的教训。

又过了四年，熊本日日新闻1963年2月17日的报道，说国家没有采取任何政策。报道说路山教授查明了室素公司的制造工序，以及哪个环节能够产生有害物质等详情，而日本警察和监察部门在水俣病事件中没做任何事情。警察和监察部门直到1976年才开始采取一些行动。

这是我的个人经历，当时我到熊本县警事厅厅长进行采访，他的记忆不是水俣病患者，而是游行，他说是渔民骚乱。当时日本警方不是将水俣病当成环境污染或疾病看待，而是将其作为居民骚乱事件来看待。行政部门与警察基本上没有采取什么行动，直接导致两个后果：一是水俣病的受害蔓延；二是第二水俣病在新泻县发生，日本重蹈没辙。到了1968年，日本政府确认水俣病原因在于室素公司。问题在于，1968年室素公司的生产工艺已经停产，5月份停止生产，9月份国家才正式确认水俣病的原因在于室素公司。正因为这种同年的先后顺序，国家确认水俣病原因对室素公司没有任何负面影响。

再看下一张，日本还有一个词叫“假患者”，即不是真正的患者。说是因为想要钱而申请水俣病认定。申请需要医生诊断，而且医生要写明有水俣病症状，然后由一个委员会进行认定。政府在申请者增多时抬高门槛，就是诊所出示的医疗证明还不够，还需要去政府指定的医院重新诊断、开具诊断证明。这样就使得很多患者申请不能迅速获得审批认定，审批认定需要很长的时间，等待的申请者越来越多。县议会的议员到环境厅请愿，说为了拿到赔偿金、补助金，假患者越来越多。这是个现在依然没有解决的问题。一方面，县民市民也非常同情患者，另一方面也认为申请者是为了要钱，他们认为，患者越多，室素公司要赔偿的钱就越多，会导致室素公司倒闭，而室素公司倒闭对水俣市市民的生活会有影响。而且患者一直存在，游客不会来，旅游行业也不会兴盛。我个人认为，这种想工厂不要停办，不要停止污染物排放的保护室素公司的心态，并声称有许多假患者，对患者是又一种深深的伤害。很多人日后再回想也觉得十分后悔。以假患者为主题的新闻只有熊本日日新闻的记者写，其他报纸都没有写过这方面的内容。许多患者愤怒不已，以毁损名誉为由提起诉讼。一般报社不会参加诉讼，因为报道是我们的工作，不能够倾向于某一方，我们打破以往一直以来的惯例，站在患者一方参加诉讼，那是1980年3月25日。当时的报道也说明为什么报纸要参加诉讼，也提到熊本日日新闻一直以来在持续进行水俣病的报道。具体介绍一下熊本日日

新闻参加诉讼的理由：一是要证实其新闻报道的真实性。二是作为水俣病公害源点的当地报纸，想履行对社会的责任。如刚才所言，假患者说最终会拖延水俣病的解决。而且民众对政府、行政的不信任会进一步恶化。作为公害源点，就是发生水俣病的熊本县的当地报纸，我们想履行对社会的责任，觉得需要参加诉讼。就是说，发生水俣病的当地，存在这样一家报社，应该怎样去做，是我们进行水俣病报道的核心。水俣病是一面镜子，映照着我们报社本身，我们经常照这面镜子，重新调整自己的姿态。

再讲一下日本的环境行政对水俣病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这里有一个IPPM，就是WHO世界卫生组织制订的一个环境标准。当时IPPM所制订的人体毛发汞含量是50个ppm。之后IPPM有进行部分修订的想法，想将针对乳幼儿以及孕妇的标准降到10个ppm或20个ppm，并将内容提交到成员国听取意见。当时日本环境厅的反应如何呢？环境厅当时认为，如果IPPM降低毛发中含汞量门槛，对日本造成的后果，首先是面对更多的对患者，提供更多的保障，其次是重新调查水俣市的海中污泥，因此对IPPM的做法持反对意见。为此，日本拟以环境厅为中心组建一个委员会（也向大藏省提出成立申请），专门去反驳世界卫生组织的修订提议。这产生两个问题：第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日本主管环境的环境厅，只考虑国内的问题，不考虑国际的问题，也不考虑人体的健康。另外一个问题是成立专门的委员会来进行反驳，沦为笑柄。想反对，以前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为什么这么说？日本只对重度患者的严重症状进行研究，而低浓度污染对人体健康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研究很少，几乎没有。熊本日日新闻为什么做这样的报道？这有一个契机。环境厅刚才为了反对WHO的修订要组建委员会，并向大藏省要求预算。而环境厅向大藏省要求预算的资料，通过某些特殊渠道到我的手上。

再看下一张，1990年4月12日，WHO决定降低门槛，要求在全球实施。

再看下一张，2009年我发表《水俣病现在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一文。

希望大家一定记住的这则报道中细川医生的名字。水俣病有好几个关键人物，细川医生是其中一位，他在水俣病事业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出生于日本四国地区，毕业于东大医学系，是水俣市窒素公司附属医院的院长，是水俣病的发现者。1956年5月1日，接诊了一个原因完全不明的患者，这就是正式的首例水俣病。他一方面要面对患者，进行治疗，同时他自己也想调查这个原因。他让

猫喝工厂排放的污水，自己进行实验。室素公司附属医院非常现代化的医院，他进行猫实验，清楚地查明水俣病的原因在于室素工厂。他做了两件大事，最为重要的一件是他要去法院叙述当时的情况，当时他已身患癌症，卧床不起，最后法官专门访问医院，在他的病床边进行询问。他说，当时很快就觉得水俣病的原因在于室素公司排放的污水，而且非常详细地说明了他曾经做过的猫实验。因为他做出这样的证言，最后法院判决患者一方胜诉。他还写了非常详细、内容很多的细川证言，留下来一大本，其中有篇文章这样写道：大家要记住，不能够仅仅停留在调查现象、现状或关注症状方面，这对事后处理有一定的益处，但不能从根本上遏制公害的发生。比起救济，预防是最为重要的工作。我非常赞同他的思想，预防比救济要重要得多。他观察、诊断患者，积累了很多经验，他的这个手写本子留下这样的言辞，我觉得太重要了。所以，我认为，我们从水俣病汲取的最大教训，就是事先预防比事后救济更重要。

围绕水俣病教训的汲取，刚才我介绍了细川。我们记者从水俣病当中学到最多的还是来自水俣病受害者的斗争，特点是集体诉讼。当初患者们组建了患者家庭互助会这样一个小组织，他们在工厂大门前静坐。刚开始静坐的时候，工会觉得看不下去，于是借给他们帐篷让，但是最后工会觉得他们太顽固，就把帐篷收走了。工会是室素公司企业内的工会，最后工会还是拥护企业，因为工会会员是企业员工。之后，室素公司工会打出耻辱宣言，公开表明自己支援患者。审判过程中，工会也告发室素公司的劳动环境苛刻，条件不好。

**汪永晨：**这是多长时间以后？耻辱宣言是在哪年？

**高峰武：**1970年前后，准确说，是1968年。

**高峰武：**那么大家可能也看到了有关的水非常清澈，景色也非常的美，这里有25个ppm以上的汞污染的土壤在那儿填埋，花费了500亿日元，但是还是有问题，那是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含汞的泥土。在里约热内卢环境会议上，日本及来自其他国家的研究者讨论到，只是把这些东西就集中填埋而已，没经任何处理，这个护岸法，护岸的本身耐用年数是50年，初期已经经过耐碱试验。现在护岸工程将会成为问题，也是很需要重视的一个事情，仅仅是看似已经复原了。就患者而言，重症的患者都去世了，剩下的是先天性的，还有庞大的症状轻度的患者。现在上诉讼还在持续，导致这样的后果是当初没有做严格细致的调查。这是盐田教授，

大家见过，当时有关居民达20万人，但面向这20万人的综合性调查，一次也没有实施过。做过部分水俣病患者的调查，但“不知火海”周围的全面性调查没有做过。这也是一种教训，正如刚才细川医生所说的那样，这样的问题是预防比事后的这个救济更加重要，最关键的是预防，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事情发生了之后，要做全面性的面源的广泛的调查。

**问：**他在这里面提到1981年熊本县全体市民37000人参与了这份调查。

**高峰武：**这是不充分的调查而已，最后没有进行真正含义的流行病学调查。就是说行政部门也采取了对症下药似的这种措施，就是熊本县和鹿儿岛两个地方政府，他们两个政府对策各不同，但是跟县的意见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在鹿儿岛之后，很久很久之后，水俣病问题才成当地问题。鹿儿岛的反映非常慢，也就是说，受到水俣病的影响，是他们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水俣病——

**问：**被水俣病？

**高峰武：**是。所以自然环境和行政毫无关系，福岛核电站也是一样的，影响也是一样的。

**问：**实际上不同的政府，做过一些专题性的调研，不是没做过。但是这些调研的标准不一样，结果肯定不一样。它不是完全没做过调研，但是从来没有做过全面的受害对象调查。

**高峰武：**大家听说过谷中村（音）吗？

**问：**谷中村？

**高峰武：**距离东京比较近，足尾矿山，日本最大的铜山矿山，生产铜，打下了日本现代化的基础。但是过度生产铜，山都枯竭了，意思说“度濑川”变成了死河。那么居民去请愿政府，但是警察对这样的居民活动进行镇压。最后日本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呢？谷中村就是要让他们强制性迁居，那么在那里建造了巨大的游水池，所以说把这个污水也集中到谷中村的地方。有一个田中正造（音）一个国会议员，他直接到天皇那儿去，最后被逮捕了，是很激烈的。

**高峰武：**所以我觉得从水俣病谷中村的这个经验，还有其他各种经验来讲的话，日本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总是有一部分人在牺牲，在牺牲的基础上搭建了政府，发展了生产。20世纪日本经济蓬勃发展，进入21世纪之后，这种情况还依然没有改变。所以非常希望中国政府把日本的作为一个教训，不要重蹈覆辙。

能够继承刚才细川先生在他的日记所说的那种精神。

那我们现在开始告一段落，现在进入午饭时间，我们边吃饭边聊天。

**课题组：**高峰先生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非常重要，他说什么呢？他说一个是阴暗面，一个是成功面，一方面认为成功必然要有阴暗，有发展必然要有牺牲，一般的观点是这样。他觉得实际日本是这样，他说因为牺牲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就是因为牺牲了少数人的利益，所以才发展。所以一定要认识到发展不应该牺牲少数人为代价，而不是应该倒过来，要发展必然要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所以牺牲少数人的利益发展是必然的，那么牺牲少数人也必然。但是他不认为这样，他认为其实最重要的是发展不应该牺牲少数人。

**课题组：**他的理念主要是平等。他主要就是认为应该平等，所以就是说多数派的利益建立在少数派的牺牲上，这个是不能，他是不能认同的。所以他就说这种事情是不是应该存在。

**课题组：**谷中村是什么时候？

**高峰武：**可能是1900年前后吧，我查一下。

**课题组：**是在水俣之前很多年？

**高峰武：**对，很多年，这是战前的事，很早。发生是1877年，事件报告是1900年。

**课题组：**1900年，1877年，20多年以后？

**高峰武：**现在山里还是荒山，每年的公共事业都有预算，每年种树等。

**课题组：**我们中国的情况怎么样？高峰武先生刚才讲的最大的问题实际上是信息不公开，我觉得中国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但是后来很多信息，无论是学者还是记者，上网获得一些信息，这可能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我是一个记者，这行里的问题说是我们经常比如说采访的一些事情回来写报道，但是我们就被头儿给枪毙了那稿子，就是不让报道，而且是从很高层的，就是中国的媒体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高峰武：**头儿是哪个头儿？

**课题组：**就是比如我们电台的台长，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部门的头儿，因为他觉得这件事情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广告收入等各种理由。比如说有的企业就会到我们媒体来威胁，像中央电视台那个《焦点访谈》，就一边是受害者在那

儿上告，一边是那个企业的人就说：其实我们也是财政的纳税大户呀，我们一定会改。

**高峰武：**会说？

**课题组：**对，会说。你是记者，采访来的肯定要报道，但是这时候媒体的领导，可能出于各种平衡就会不报道。

**高峰武：**通篇都不报道还是？

**课题组：**坏的不报道，你写的新闻报上去不报道，您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

**高峰武：**这个事情在日本很少。

**课题组：**没有？

**高峰武：**没有。

**课题组：**就想写都可以写吗？

**高峰武：**也有很多敏感问题，如日本社会的天皇制问题等。

**课题组：**大企业收买媒体的事没有吗？

**高峰武：**直接收买的肯定没有，但还是有比较敏感的问题，广告主当然不喜欢有负面报道，他们对媒体的压力现在还是经常有。但这种压力，每个媒体都不一样，比较强的媒体或者比较独立的媒体不会受影响。

**课题组：**就假患者那个我没太听明白，是一个圈套吗？因为我们这两天听到大多数人都不想暴露自己的水俣病身份。

**高峰武：**我认为都是真患者，是有人说他是假患者。

**课题组：**那就是一个圈套？

**高峰武：**不是。有人去起诉，有人说是假患者，是站在驳斥的立场去说的。

**课题组：**就是室素人说，这些人都是假患者，并不都是真患者，是为了要钱的一种借口。

**高峰武：**是这样，有些市民希望这个公司能够存活下来，但他不好意思去批评这个公司，所以他们转移到患者身上，各种方式都有，说患者是假的。

**课题组：**那就是说，假患者不是真实的。

**高峰武：**水俣病，刚开始有很多重症患者。在门外卖甜点的一个商店，有些患者去买甜品，甜品店的店员，就假患者报道出来后，他找钱不直接递给你的手



上，用纸推给你。本来是歧视患者的这些歧视方，很多人之后也发现患有水俣病。

**课题组：**是非常复杂的一个社会问题。我想问一个问题，刚才说到福岛问题，也是重蹈水俣覆辙？

**高峰武：**你们去窒素工厂里边，窒素工厂（现在窒素公司）的根本是好的，本来公司的宗旨是按照国家方针生产很多产品，为战后的复兴也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但是自己不知道方向，不知不觉地排放废水造成了这个水俣病。公司也是尽己所能，就是在能力范围之内为患者进行保障，而且能够留在水俣市内，不是坏事，这是窒素公司内及很多市民的想法。我觉得其中也包括很多假的，虚伪的东西。但是日本有这种国民思维的土壤，也就是说，他们不同意，但是能够理解这种说法，这种氛围造成了假患者之说。或者以很冷漠的态度去面对水俣病患者，现在依然进行着诉讼，没完没了。

**课题组：**这还有一个伦理上的问题。就是说，就窒素公司而言，它受日本社会认可，老百姓也是用这样的观点来看水俣病患者，包括伪患者，包括现在大多数人还是把这些受害者看作异端。这也是人类学的一个问题，这些人的牺牲，包括现在起诉的这些人都是少数人，他在这整个文化中间，把你看作是异端，看作是边缘的。多数文化认同的恰恰不是这个东西，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少数，但多数文化认同的是另外一个东西。社会跟文化都有着一定的关系，高峰武老师谈得很深刻。他不完全是谈这个事情本身，他对这个事情如何理解。

**课题组：**几十年了，他思考这些问题。他一直思考这些问题。

**课题组：**他说这些，让我想起我遇到的一些事情，就是去饭馆吃饭，说你这儿有没有老鼠，这个服务员说，我们老板不杀生。

**课题组：**这个很形象。

**课题组：**你可以选择，选择不吃。

**课题组：**那地方就一家店！

**课题组：**我觉得现在很危险的一个问题就是刚才高峰说了，是牺牲小部分人的利益换取大部分人的幸福，那这种情况，它其实更严重的在于对日本来说，这只是他们的一种经验教训的总结，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已经有了这样的经验教训了，你还要重复这样的悲剧吗？那就是故意在杀害少数人。

**课题组：**这在中国是一种传统，就是要牺牲小部分人……

**课题组：**对，这个问题其实很严肃。

**课题组：**要服从大局，这是中国的传统。

**课题组：**所以他直接反对的就是所谓的正义，日本也是，所谓的正义就是牺牲少数人。

**课题组：**牺牲少数人，满足多数人这是一种独裁思想，高层考虑的是一种民主思想，是人人都平等的，人有生存的权利。

**课题组：**西方有人说“我就是室素”，“我就是室素”这句话，说老实话，今天要不这样批，我是没看懂，死活没看懂。今天高峰讲了以后，再回过头看，觉得上升到更高的哲学意义上。因为这个室素公司生产的東西都是我们现代社会使用的东西，我们一天都离不开它。为了要这样所谓现代文明生活，我们牺牲了自然，牺牲我们和自然的关系。所以，当你在使用这些的时候，你自己本人就是杀害别人的凶手。哎呀，我觉得这个真是深刻。

**课题组：**请问一下，高峰武先生有这方面的专著吗？高峰武先生有对这问题思考的专著吗？

**高峰武：**有一本书叫《水俣病50年》。

**课题组：**我觉得您的这种思考很重要。以后应该多邀请高峰武先生到中国来讲讲，您的思考对中国现在的发展非常重要。您在二三十年前警告李鹏的事情现在在中国还在发生，而且更加严重。

**课题组：**1959年派到水俣支局的，大家最好能够看一下这个内容，非常悲惨，20多个患者，其中一个45岁的女性，卧床不起，瘦瘦的木偶一样，吐着泡沫，然后发作一直持续两三个小时。我们在资料馆也看到——她那个指甲疼的不得了，抠着那个墙，墙壁上留着她那指甲抠出来的凹痕。

**高峰武：**松下记者直接目睹到这个场景。最终他们下结论：如果日本企业体制不改变的话，水俣病一直不会终止，不会结束。在昭和30年代，记者直接去探访患者，最后到了我们的时代，患者诉讼或者到室素公司直接抗议。我们那个的年代记者，当我们碰到苦恼的时候，我们可以到水俣市直接访问这些患者，可以重新思考。但现在呢，这种症状严重的患者已不在人世，先天性患者很难见到。现在依然存在一些家庭，家里有先天性水俣病患者。作为记者，我经常用想象力这个词来表达，我们看到的风景里面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历史？要分析，能够

读取这样的历史，要有这样的能力，要敏感。为什么这么说？以前是，现在也是，绝大部分人对水俣病没有什么感觉，不关心。很多人都有关心的话，就一定不会造成这样的后果。那么为什么现在已经有所改变了，这不是国民关心，而是患者们自己争取的。

**高峰武：**这些患者都年老了。现在我们也站在一个转折点说今后你们要报道一些什么样的内容，我是再也说不了我们未来能怎么样。但是新闻报纸的记者，受害者在附近，而且你的题材，作为题材的发生问题的地方也在你附近，虽然你答案不清楚，但你不要逃避，自己要面对这些问题。我们经常争论，现在依然提：在“不知火海”周边要进行全面性的调研与调查，有这个必要。国家方面说：钱谁掏呀？过了55年，这个调查有效吗？他们做出这样的回答，婉转地否定我们的提案。但是作为地方报纸，我觉得现在还是非常需要做这样的全面性调查，如能，我们要不断地报道。

**课题组：**第二个问题我觉得刚才高峰武先生提到，其中说到世界卫生组织WHO和日本环境厅的观点不一样，结果最后政策采取的是谁的观点？

**高峰武：**最后还是接受，日本环境省接受了WHO的标准，但是还遗留着一些很微妙的问题。日本人很爱吃大马哈鱼，金枪鱼。金枪鱼本来含锰的比例比较高，我觉得对寿司文化的冲击很大。从医学的角度，鱼里含汞等很多恶性物质，同时也有很多良好物质，所以，有些医师提议说金枪鱼不能单纯地从汞的含量来看，它也有很良好的成分。但是大鱼、金枪鱼当中汞含量比较高，寿司师傅也经常吃金枪鱼，他们毛发当中汞含量很高。

**课题组：**刚才1959年11月8日的那个报道里面，他提到有18个团体参加，但是恰恰没有渔民团体参加，我们觉得渔民团体是特别重要的团体，为什么恰恰没有参加呢？

**高峰武：**在此之前，渔民们闯入工厂，以市长为主的一方，让工厂不要停产，所以渔民团体不敢参加，也是对渔民的一种抗议。

**课题组：**这个报社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持续地报道这件事，是因为主编关心这件事，认为有意义，还是说日本整个新闻界都有这种传统，会对一件事情持续地报道？

**高峰武：**有双面性。我们冲绳有《冲绳时报》和《琉球新报》两个媒体，在

日本国内一贯地在持续性地报道。我们的统治和被统治，支配和被支配有冲绳的历史作为它的挡箭牌，这样我们日日新闻当然信息上有些差距，但是也是一种共同性质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有这个水俣病，也挺好的，说这样的话，我觉得大家可能也产生误会。有个水俣病患者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有水俣病挺好的。我问他为什么，他回答：我不得水俣病，自己是一个单纯的普普通通的人，新闻记者也不会到我这儿来采访，也不会到东京去诉说自己的生活情况。因为发病，也能够开阔自己的眼界，能够知道很多事情。患者以这样一个方式去理解，去接受自己的病，提高自己。作为记者，我也是这样，水俣病的存在是提高自己的一个过程。我们日日新闻对水俣病的另一种看法，就是这样的。今后更重要的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水俣病的报道。

**高峰武：**我个人对水俣病感兴趣是16岁，那时候因为有很多原因，对水俣病报道关心。十六七岁的时候，担心自己未来走向，考虑怎么去择业的时候，我就碰到了这个，赶快大学毕业之后当记者。我人生的选择当中，水俣病起了很大作用，可以作为我人生的一个衡量坐标。

**课题组：**我过去常被人质疑说你是记者还是NGO这样的时候，现在有很多就是我在参加一些国际会上的时候，一些大的像CNN，像BBC这样的记者他们也跑过来跟我会说，说一个世界媒体的报道是在这个对事件发生过程中引起大家公众的注意，但是这件事情的解决记者一定要和NGO一起才可以解决，才是解决这件事情最有力的方法，特别是环境事件，它不是说像一个车祸，你解决了可能很快，就几个人就可以解决，但是环境一定是长期的，所以媒体一定要跟NGO合作，才有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跟NGO有合作？

**高峰武：**我们的前辈，过去和现在都这样做，记者他本身除了做自己的记者的工作之外，也在志愿领域里做一些介绍水俣病的小册子，小报纸，而且有很多记者，就是我们的老前辈都到患者那里去帮助他们生活，给他们做一些护理，都做了这样的工作。

**课题组：**会成立一个民间组织或NGO？

**高峰武：**当时没有NGO这个名称，但是都是有这样的，还是有这个民间组织。付出了多种行动。

**课题组：**没有被别人认为不务正业？

**高峰武：**很多人好几次曾经说已经解决或者歧视我们，但其实没有歧视我们。围绕水俣病，现在最多的消息就是没有钱，就是保障问题，一旦钱的问题出现，报道数量也随之增多。刚开始昭和30年代，也就是1955年，是慰问金的形式，就是死亡者30万日元，和患者签合同。它这个慰问金并不是说是窒素的责任，只是因为窒素公司是当地当时最大的企业，只是慰问一下，给你30万日元，那时候原因也不明。那合同有几个条目，它说将来即便发现这个水俣病的原因是窒素，也不再要求赔偿。这是第一次的水俣病的结束。第二次水俣病在新泻发生，30万日元太少了，患者人数也增多了，同时要求上诉，说这是违反原则的。法院提出了有关30万日元的这个慰问金协议违反公共秩序和良好风俗。审判完毕之后，赔偿1600万到1800万，之后又说这个标准太狭隘，很多人又反抗说会出现很多新的患者。

**高峰武：**社会上也提出，1995年提出260万日元，之后260万日元的这个赔偿拓展到1万多人，1万多人得到了赔偿。最高法院下了判决之后，2004年国家和熊本县都有责任，4万至5万人要求赔偿，这件事情还在处理中。在日本报道有关水俣病时，全国性的报道没有，就是围绕钱或者赔偿金这方面话题的报道最多。

**课题组：**日本媒体跟着钱跑，有钱他就来，没有钱他就不来。

**高峰武：**最后一个和时间关系，我采访了熊本县不可思议的一个杀伤事件，父母被杀，两个孩子留下来，最后一个24岁的年轻人被逮捕并被判死刑。审判中他就一直说没杀人，一共做了六次审判，其结果是34年之后无罪释放。这个事件的报道是我负责。当年的年轻人现在84、85岁，仍然健在。我为什么要介绍这个？刚才介绍到作为少数派的渔民和多数派的市民，而杀人事件第三次再审，开始重新审判，但是被驳回，高等法院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如果继续做这样的事情，日本的法律稳定会遭到损害。这里出现了这样一个结构，就是说井田这一个人和社会全部，它为社会全部的利益要被谋杀。那么水俣病的患者面对的是多数派，但是井田他一个人面对的是日本社会的全体。他这30年对死刑一直有恐怖心理，最终他还一直活下去，我跟他现在还有往来。我为什么要和他打交道呢？因为他所面临的東西对我们日本社会非常重要。但是让我稍微困惑的一点就是他很能喝，他特别喜欢喝酒，他又很能喝。这个事件作为一个插曲。

### 4.3 讨论与思考

#### 1. 有必要翻译《从水俣走向未来》，水俣事件的缩小与放大是一个过程

目前觉得高峰先生那本书是《从水俣走向未来》很有必要翻译，主题非常好，是一种超越，它不仅仅是看历史，我们以前翻译的大多数是谈历史，这本书实际上包含着一种超越。《从水俣走向未来》这个视点，当然我光看它的题目，没有看它的内容，我觉得按他的这个思路能写出非常好的内容。另外这本书为什么有价值，后来他也一直在说，说这本书里边实际上是一个政策讨论会，11次的座谈，都是一些水俣问题的一流专家，大家坐在一起讨论，然后把这个讨论的内容、观点整理出来，汇编起来，没有出版，有英文、有日文。这个他一再强调，说我们可以引用。今天明白了水俣事件为什么缩小为什么放大。缩小，是因为它已经被政府给挤压得没有发言权与话语权了，现在慢慢又放大了，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

#### 2. 日本记者很幸福，稿子一般不被枪毙

颠覆得有点夸张，也是很大的触动。一是关于日本媒体，这么大的记者从来没有被枪毙过稿子，真是太幸福了。但是我在美国，在欧洲，他们记者都有被枪毙稿子的。二是挺高兴听到日本记者其实一直在做民间志愿服务的事情。很多大牌记者觉得中国比较业余，觉得中国记者有点不入流，还干志愿服务这些事情。通过水俣病来看日本媒体，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提议，就是媒体在参与环境保护上，除了关注，还得有行动。

#### 3. 出乎意料的精心准备

高峰武准备得那么充分，出乎我的意料。一是事先了解我们，不是应付我们而是认真地对待我们，二是准备资料，材料无可挑剔。无论是中文资料，还是日文资料，都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水俣病的变迁。一个记者，从历史性角度进行梳理，非常有意义，也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 4. 重新思考以人为本

他讲到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求得大部分人的幸福。国际上现在流行幸福指数研究，其实，我们中国主要以GDP为中心，没有考虑到以人为本，以全体人民为本，对以人为本的看法，这次通过来日本，听高峰武今天上午的介绍，我们重新来定位什么叫以人为本，高峰武的以人为本是以全体人民为本，并不是说我牺牲

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另外的大部分人就能得到好处。另外，他与蒙冤入狱者持续交往，显然是探讨他的心理变迁，34年的持续，相当了不起。他思考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虽然日文居多，我们现在不一定能够全部消化得了。

### **5. 媒体与政治的对话**

不知道是否可以学习他与行政官员的对话。民间与政府，似乎容易是对立的双方，但如果媒体与政府对话，尽管观点可以不一样，但双方之间的交锋与对话，有价值。高峰武先生与政府官员的对话，促进了双方的反思。这种对话过程，其实是双方共同成长的过程。

### **6. 媒体推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信息公开，任重道远**

从全球环境治理的角度来分析，很值得我们中国人重新思考如何看待联合国提出可持续发展框架问题。京都议定书，来自京都，这么多年过去了，但美国依然没有接受，而日本有一些推动。中国里约会议后，搞“21世纪议程”，及现在的行动纲领，值得中国思考的是如何落实。信息公开很重要，至今我们的信息公开大约达到50-60%？信息不公开你怎么能知道社会发生的问题呢？如何推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信息公开，媒体及媒体人的任务依然很艰巨。

### **7. 不懂装懂制订政策，贻害无穷**

高峰武与原田先生一样，一开始就谈到福岛，认为福岛在重蹈水俣的覆辙。他认为情况和水俣一样，先是原因不明，然后再来要不要把事情说清楚，信息披露等等，和水俣当时情况一样。他认为，要是明确知道，采取这个对策没关系，问题出再在明明不清楚，却装着清楚，然后采取相应对策，这是最可恶的事。水俣事件的教训，福岛在重犯。装着知道情况，制订了政策，这样的政策贻害无穷。

高峰武远远超出了记者这样一个身份，我们觉得他也是一位哲学家，他的思想深度远远超越了一般的媒体人。特别感动的是，他选择记者这个职业，已经坚持了39年，39年前的一年，对水俣病的关注影响了他一生的职业选择，之后不离不弃。

## **五. 摄影家的作用与反思——访盐田武史先生**

### **5.1 盐田武史简介**

盐田武史 1945 年出生于香川县高松市。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社会学部，在

学时隶属摄影部。他在 1967 年夏天到长崎参加原子弹爆炸后展览而路过水俣，当时还没有人专程为支援水俣病而在水俣定居。1968 年，进入水俣，他见到了病症最严重的患者，“从户外一进入昏暗的室内，我看到了他，所受到的冲击无



法用一两句话来表达，仿佛魔咒驱使，只要是看到了就一定要负起责任来。我想知道事实真相，我想帮助他们，最终我决定了在水俣生活。”盐田在他的《镜头下可爱的水俣》前言中这样说。作为摄影师，把水俣病患者看成是自己的事情，与水俣结下不解之缘，在水俣度过了十六年。这 16 年间，盐田拍摄了 5 万多张照片。1970 年以“朝日图片”为中心开始发表照片。1971 年在东京银座尼康沙龙上首次举办个人展览。1973 年出版了“盐田武史写真报告 水俣‘68-72’深渊”（西日本新闻社）。1985 年以后在熊本市经营写真企划相关的公司。

## 5.2 报告与交流

11月25日下午，我们一行访问盐田武史先生，如下为访谈实录：

**盐田武史：**本人是盐田，请大家多多关照！非常感谢大家从中国远道而来。我讲的不一定精彩，请大家多多谅解。我看到贵团在水俣以及熊本的日程，想必也见到了很多患者，也到了水俣的各个现场，所以我本人能介绍的部分可能很少。我本人稍微做一下自我介绍，1945年的4月15号出生于香川县的高松市，8月15日是日本战败日，也就是说，我在战败当日四个月之前出生。接下来，我用约30分钟左右的时间将我66年的经历与大家分享后，请大家向我提问题，只要能够回答，我一定回答。

香川是日本四国地区的一个县，出生时正处于日本提倡多生的那个年代，有八个兄弟姐妹，包括爷爷奶奶和父母在内，我们家平时就是十二三人的大家庭。吃的东西也不多，有限的食品大家会抢着吃。当年我只想赶快走出这个家，尽早就业。后来我到大阪就业，每天挤坐满是乘客的电车、地铁，又想：这样度过我的人生，感觉非常无奈、没有意思，于是就业十个月后，我辞职了。

辞职后，我到东京，上东京市区的补习学校，为准备高考，努力学习了一年，在那儿学了英文、古汉语等等。这一年，我拼命学习，汲取了很多知识。最终考



上法政大学，当时正是大学纠纷斗争非常激烈的时代。大一时，在课外活动的照相部，首次看到专门拍摄广岛原子弹轰炸受害者写真集，很厚的一本，都是彩色照片，有很多被原子弹轰炸造成的伤疤疖子等受害者的照片，非常真实，我受到极大的冲击。也知道当年有17个尚在母亲腹中的胎儿，遭受体内辐射的影响，出生后成为17个受害者，我们也经常参加原子弹轰炸受害者学习会。原子弹轰炸受害者一起举办的学习会，让我那时知道了胎儿的受害症状，也曾在报纸上看到很小的消息，报道这些儿童病危、病逝的消息。

当年首次听到水俣病患者的情况时，我马上就有要到水俣去了解水俣病的冲动，我先到冲绳，与冲绳的受害者见面之后到水俣，见到先天性水俣病患者。这是我访问的第一个家庭（他指着墙上的照片），那个男孩回家的时候，他的奶奶说：“像我孙子这样状态的孩子，在我们这有很多很多，并不稀奇。”当时我非常震惊，痰堵在孩子喉咙的时候，他吐不出来，脖子这快会因为这口痰而鼓起来，会肿。

然后我访问第二个家，碰到这个女孩。这个女孩站不起来，也几乎动不了，像木偶一样。第一次见到她时我还没有相机，这是第二年夏天我重新去访问时拍的。我买的第一个相机，首先拍的就是这两张照片，用慢速拍的。我认为这两个照片应该说拍得比较好，这两张照片决定了我作为摄影师的人生。第二年这个男孩就死去了，年仅13岁。

大家知道石牟礼道子，一名作家，写水俣病时用了这样的文字：患水俣病的人一个一个都会死去……。那段话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从看到那段文字开始，我感觉自己已经离不开水俣，我一定要留在水俣，继续拍下去。我就在这儿租了一个房间，算是水俣与东京两地，暂时都有住处。之后《朝日新闻》的《朝日画报》与我签订合同，《朝日画报》的第1页到16页的篇幅主要以登照片为主，我可以随便拍，随便使用这16页篇幅，同时《朝日新闻》支付约30万日元的报酬。这是昭和45年，即1970年的事情，这些日元现在值30万日元，但是当时多少钱也没有说，就是现在的币值约30万日元。没有就业，突然得到那么多钱，我觉得当摄影师很赚钱，这也是影响我摄影人生的一个因素。

之后我在日本东京银座举办人生第一次个人摄影展，以后也到斯德哥尔摩举办个展。这是我的第一本照片集，首先弄得不怎么样，后来装订得很漂亮，看到

这新装订的照片集，我有一种死而无憾的感觉。当地受害者有两派，一是支持诉讼的；一是等待政府补偿、赔偿的。我这本书是为了募集诉讼资金而出版的，因为诉讼需要资金。我在肯尼亚内罗毕获得国际摄影奖，然后到东非访问，还在印度呆了两个月。以后到过加拿大去拍当时的印第安族，现在叫土著居民。美国也有人加拿大拍这些土著居民。之后一段时间，包括《Life》等非常著名的杂志销量越来越小，我经济方面也碰到一些问题，再加上其他原因，我决定迁居熊本县。

现在我自己开个小旅馆，自己搞摄影广告册子等。这是日本元旦时，拍摄我自己吃的盒饭，这边是设计师，文章我自己考量，印刷别人负责。虽然是几行字，就是十几个文字自己可以去创造，我很喜欢写这样的文章。这个获得出版文化奖，也对我写的文字给予了高度评价，我非常高兴。

因为水俣病，我到世界各国去访问，到非洲、印度、瑞典，以及其他很多国家。没有什么理由的话，一般不可能经常去国外玩或者出差，当有计划出国时，我常会通过募捐的方法，将我的目的说清楚之后访问其他各国，所以我也非常感谢给予过我帮助的人与机构等，感谢人们，我觉得我的人生非常幸福。

差不多我讲了半个小时，现在请各位提问，我会尽己所能回答。

### 5.3 讨论与思考

**课题组：**这些照片中的每个人，您都认识吗？都能叫出名字？至今一共拍了多少病人，现在活着的还有多少呢？

**盐田武史：**当然记得所有人的名字。数量，我没有数过，因为有的是很多人的合影，有的是两三人的合影，有的是单人照，没有数过。我拍摄的受害者中，约60%都已经去世了。补充说明，我也曾参加过《朝日新闻》报社的招募考试，招录7人，报考约2000人，我觉自己肯定不可能是那七分之一，结果也是没被录用。

**课题组：**非常佩服您，家里八个兄弟，家里一分钱也没拿，您大学毕业根本就没有找工作，直接去了水俣吗？

**盐田武史：**大学时我打工，送牛奶，最初以为赚不了多少钱，其实蛮赚钱的。早上四点起床，挨家挨户送牛奶，利用这个钱可以自己交学费，同时也去了台湾、冲绳等地旅游。有一次忘了交学费，学校通知我父母说：你的孩子没有交学费，当时父母就付了这笔学费。

**课题组：**除了这笔，全是自己挣的钱？

**盐田武史：**对，其他的都是自己挣的。

**课题组：**我想问一个问题，盐田先生，我们从其他摄影记者那里了解到，作为一个摄影记者的客观、中立，以及因为看到这种场景使自己的情绪受到影响以后，进行信息主动干预，您是否遇到过中立性和主动干预之间的矛盾？您是怎么做的？

**翻译：**中立和主动干预之间的关系有点不太明白？

**课题组：**作为一个记者他应该是中立的，应该自然拍下来整个过程，但是作为一个个人，他可能觉得那个人挺可怜，我应该去干预一下。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

**盐田武史：**这些人是这样的，走路不能走，说话也口齿不清，还带着尿布，然后就是卧床不起。对这些人，我不会抱有什么中立、客观，不是用这样的视角去看待他们，我本人住在水俣，以后住在熊本，当年我借的这个宿舍，与一名患者住在同一个楼里，她住在我隔壁，我经常和他们来往，对我来说，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这个大阪展拿鸽子的男孩，一直住在医院，我去看他们拍他们的时候，比如说住在病房楼的一层，我就从窗户那儿进去，因为他们身体基本上都是卧床不起，身体不好使，也不可能做那样的动作，一看我从窗户进来，他们就“啊”，很高兴地看着我。为了让他们高兴，为了他们能笑，我也经常做些怪怪的事情，比如从窗户进房间，等等。

**课题组：**您第一次发现您做哪个动作他们特别高兴？

**盐田武史：**记不得第一次的事情，但通过经常性的反复接触，发现只要是他们做不了的动作，他们就很高兴。有鸽子的这个窝棚，从窝棚拿来鸽子，给孩子鸽子，鸽子与孩子两方面都非常紧张，但是相互之间最后习惯了，鸽子也不动了。还分享一个小秘密，这张黑白照片中的女孩，某一天她给我写情书。这是最秘密的，不能公开的小秘密的。以前有很多电影导演及其他摄影师想拍她，她都拒绝了，她一直默默无言，而且她还有因水俣病产生的视野狭窄，我就用长焦距拍她。她明知我在拍她，但她没有拒绝。一般她会拒绝的，她还默默地给了我情书。

**课题组：**我们看到了您发表的第一篇摄影作品是1968年，正好是政府认定了

水俣病公害的那年。而事实是在此之前的12年，水俣病和水俣病原因已经得到确认，但是直到过了12年之后，政府认定了公害以后才关了窒素工厂，为什么不早些关闭这个厂？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呢？

**盐田武史：**这涵盖很多复杂的问题和因素。刚开始也就是八幡池，刚开始你看这张照片就是八幡池，这是已经晒干了的一个土，这里是填埋地，它这个排放口，排放的地方改了之后患者又蔓延了，患者又增多了。而无机变成有机汞，窒素公司一直装不知道，对外面一直透露的信息是：我们不知道原因，其实不然，大家知道细川医生他已经早就查明原因了，包括对猫进行的400号实验。另外一方面，一直隐瞒导致最后通过诉讼慢慢公开信息，最近的奥林巴斯也是同样的事，想隐瞒但有人在进行曝光。提起诉讼诉讼后，就不得不在这个过程中慢慢透露事实和消息。第三，窒素公司为什么不想承认，主要是要进行补偿、赔偿的问题。不想赔偿，可能赔偿是最重要的原因。与第二次水俣病的相比，昭和电工采取措施非常迅速，但是窒素公司与昭和电工相比，非常慢，而且很不到位。也就是说新潟县的水俣和水俣市的水俣病有很多差异，如受害者的规模、运动时间的长短、各种诉讼的频次，及各派参与人，等等。有一次法国媒体到水俣来采访是，也采访了我，当时他反复问我“在这个运动当中，你受没受到窒素公司的干扰？”，在他们的眼里，这是很危险的运动，我拍的照片有威胁性，甚至会有暗杀等等。其实，我没有受到任何来自窒素的干扰、限制，一点都没有。

**课题组：**我们特别想访谈您的原因是，我们觉得在公害过程中，各种勇士都很重要，但是媒体，特别是摄影的冲击力量特别大，我们就特别想要访问您。我第一次看到的影像，是尤金史密斯的那张照片，其实他到水俣比您还要晚两年，他是1971年到水俣的，可是他那张照片似乎成了水俣病的代表性照片。我觉得水俣能够走向世界，到瑞典到加拿大等，跟尤金史密斯的照片及其影视冲击力也是分不开的。还有一位是土本典昭（音），我们看您的书才知道您曾和土本典昭一起工作。您的这张照片用在土本典昭的纪录片封面，可是我们又看不清那个封面，直到我们这次买了这个书，我们才看到了这些，有好几张都是我们以前看到过的但是不知道是谁。所以，我们觉得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正好是一个工业化的开始阶段，水俣的情况也许已经在中国某些地方发生，也许可以尽量阻挡它的发生，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少不了摄影师的作用。

**盐田武史：**刚才提到尤金史密斯拍的洗澡，就是拍的这个孩子。

**课题组：**后来不是说不让他们使用吗？

**盐田武史：**对，本来说的是不让使用，是尤金史密斯的太太艾琳和孩子的父母说好，这个照片不会被公开，会封印。史密斯是外国人，艾琳是混血，艾琳父母是日本人，再就是真诚感。我与很多孩子是朋友，但我真诚对待每一个小孩，我认为艾琳和史密斯两个人不够我那么认真地跟他们来往。

**课题组：**您与他们的交往很深，您已经住在那儿，和他们成为朋友了，但是外国人很难做到。

**盐田武史：**有诚意的话就不会造成照片不要公开等事情。

**课题组：**我看他拍了很多张坂本忍的照片，就是今天我们在萤之家见到的，四个患者的一个。**您与分坂本忍**还有没有联系？

**盐田武史：**有联系，她非常聪明，他母亲也非常聪明。这儿有留影，2001年5月。赠送照片的时候有肖像权，要为了得到家属的盖章、签名我就转遍了27个家庭要得到他们的允许。

**课题组：**您的国际差旅费都是谁筹集的？

**盐田武史：**1970年时非常赚钱，有时超过1000万日元。10年后工作慢慢减少，之后我就开始打工，现在因特网时代的来临，工作事业都减半了，比如你到拉面馆拍摄，做一些菜谱设计、菜谱照片等，但现在店长自己拍，自己在电脑可以利用软件可以做很好的一个菜谱，也就不再需要这些专业摄影师的帮助。

**课题组：**看您的简历，听您分享，很敬佩！您一直在做水俣病的事，刚才讲到去与患者交朋友，成为朋友以后找到一些切入点摄影。好多患者的家属或者自己不太愿意去公开水俣病的问题，因为这样会影响到他们家庭的声誉、就业，包括结婚什么的。您在这个过程中是怎么去跟他们交朋友的？怎么让他们信任您？

**盐田武史：**这张孩子能够沟通，但是左边的孩子就是莫名其妙，我是拍了他，但是没能够和他进行沟通。有的一开始并不高兴，我去就给他洗厕所，逐渐就很信赖我。人多的场所我去他身边，问他是否要去撒尿，他说“哦”，我就知道，我和他之间能够这样沟通，他很信赖我。

**课题组：**您有没有住在他们家里的经历？

**盐田武史：**有时候时间晚了，但没有住过他们家里，因为这样会给他们造成麻烦。汽车的话，也就30分钟左右就能回到自己的宿舍。

**课题组：**这次日本“3·11”海啸地震后包括核辐射，我们从媒体上就看到好多日本的新闻的照片，有一些很多比较血腥比较特别惨的镜头不让在媒体上公布，不知道您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中国媒体比如说到非洲去拍的孩子都特别悲惨，但是在国际上，新闻界、摄影界大家好像也有这样一种习惯，就是不愿意拍这些太惨的。

**盐田武史：**史密斯的那张洗澡的照片也一样。我本人也看了那个照片觉得不舒服、不愉快，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我知道他们，这个女孩就是两腿换尿布的照片，我也拍过这样换尿布的过程，但是我不想使用、不想公开。而且我也拍了不少猫的死尸在海滩上都腐烂的，很惨的猫的那种死尸，这些照片我也不想公开，很惨。还算好，不是特别的惨，这边的鼓起来更惨，就是痰堵在这儿了。这个孩子是肺炎，呼吸困难。我有一些比这个更悲惨的一些照片，但是我不会公开。

“3·11”有很多溺死、淹死的这些人，溺死之后肚子里都是水，喝满了水，这些照片肯定有人拍过，但是这种照片我觉得不能公开、不应该公开。

**课题组：**您愿意公开什么样的，想展示给别人，想表达什么？

**盐田武史：**没有什么具体的标准，但是呢，当我出版这个写真集，我们拍后面的几张照片，这是父母已经去世，流口水的一个照片。我觉得左边的照片很好，这样的照片我是很想公开。这张是为什么呢？这张照片我公开了之后，他们的兄弟姐妹看了之后都非常的高兴，就是很受他们兄弟欢迎的一张照片。这个答案我没有自己的具体的标准，我公开了的这些照片就是标准吧。

**课题组：**谈一下我对您照片的感受。您这个照片，尽管水俣事件应该是很悲惨的，包括很多现场我看了以后很压抑的，但是我发觉你拍照的时候也想尽可能的展示一种美和对生活的向往和热爱，但是这样实际上也可以更强烈地引起人们对这种悲惨世界的那种的心理冲击。

**盐田武史：**我觉得您这样说的话，对我来说是最好的评价。大家看到这个照片，有些人看了这照片之后说“哦，这个男孩要吃鸽子啊”，有这样的感想的人，有这样的理解。所以像您这样的感受，让我感觉常年以来我一直进行的拍摄很有价值。

课题组：如果您去培养年轻一代的摄影师，您希望怎么去培养，您觉得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养？

**盐田武史：**现在没有具体的想当摄影师的年轻人在我的面前，所以也不好说。但是，如果要说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照片，当年我是大学生时去拍的，很多人周边的人评论说“你像职业的摄影师，拍得很不错”，夸奖我。我是自然而然拍的，很多人是从说话角度拍的，但是我把视线放下面，我是跪着的，跪在榻榻米上，盘着腿，把后面的娃娃都拍进去。还有一个是有运气，知道的就是这个照片拍得很好，其实拍了几张，也有失败的，不是说一定是这么一张。

**课题组：**提一个很技术性的问题，就是您在拍照片的时候，你是不是一定要经得人家同意？假如人家不同意，非常好的一个画面您是放弃还是说服拍摄对象？

**盐田武史：**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问。还是要问的，还要问他们父母能不能拍。但我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不是说我专门去拍照，去了直接问“我要拍一张照片行不行”，而是一般带着礼物去，已经很融洽的时候，自然而然地询问是否可以。史密斯拍这个孩子洗澡的时候，孩子母亲跟我说其实很讨厌，但是他闯进来了，她没办法，不好拒绝，只好让史密斯拍。如果人家不愿意，我是放弃还是说服，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被拒绝过，水俣病的患者没有拒绝我。到肯尼亚的一些贫民窟，有人向我投石头，这个有，他们会很坚决地说NO。其实拍这些患者，我也非常紧张，拍的时候会冒汗。十年、二十年以后，我辛苦拍摄的这些照片能够作为记忆留下来的话，对作为摄影师的我是有意义的。医院里的拍摄是最头疼的，跟院长说一下，跟医生说、跟护士说、跟谁说？没有这样的手续，我把他们看做家属，既是朋友又是家属，这样他们就ok，他们允许，我就没事，不管到医院还哪儿，我都可以拍。不过到医院我还是会抓紧时间拍，不要长时间呆在那儿。很多媒体都采访，包括一些报纸的记者、摄影师没有经得同意就进到病房，“啪啪啪”就把这个患者给拍了，记者还问我“那个是谁？”患者就会和我说“那人没有跟我们商量就随便拍”。

## 六. 律师的作用与反思——访受害者东京诉讼团两位律师

### 6.1 铃木尧博、尾崎俊之简介

尾崎先生，是鹿儿岛发生水俣病负责诉讼的律师。为此，尾崎先生从东京去了 400 多次鹿儿岛。在尾崎先生 36 年的律师生涯中，三分之一的经历是从事公害与药害方面的案件。主要是为受害者讨回公道，求得救济。

铃木，是一位有着 40 年律师生涯的律师。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三分之二的案子和环境公害有关。铃木律师认为，水俣事件仅靠熊本县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如果让政府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需要舆论的支持。要让国会与政府改变他们的态度，承担责任，在东京提起诉讼，波及效应能扩散到全国。

### 6.2 报告与交流

在东京提出诉讼，按照日本法律需要找到原告。当铃木和尾崎律师听说驳回认定的部分患者住在东京附近时，就开始寻找住在那里的水俣病患者，请他们提起诉讼，将行政当局作为被告。为此，1984 年 8 月，创立了全国律师团联络会。在东京附近，在鹿儿岛，他们到每家每户去访问，问是否愿意加入原告诉讼团。很多受害者听说被告是国家，认为这个事情太大了，受害者不敢。而当他们以诉讼的意义是造福后人来说服受害者时，不少患者才加入进来。

1984 年 12 月，鹿儿岛的 66 名原告正式向行政当局提起诉讼。

1990 年，东京地方法院提出了和解劝告。被告当中，熊本县与氮肥公司同意以和解方式解决。

进入 21 世纪以来，水俣病患者和帮助他们法律工作者们的诉讼还在继续。作为诉讼团的团长，尾崎律师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水俣病患者的年龄在增长，有些患者的症状越加明显，有的还新发现了一些症状。尾崎律师说，在早期诉讼时，有一位患者由儿子照顾。第二次诉讼时父亲已经不在，儿子又来了。尾崎律师问他你为什么还来参加水俣病申请？这位当年的年轻人说：当时我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也是水俣病患者，现在在自己身上发现的症状与周围水俣病患者的一样。

2004 年，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日本最高法院做出了判决。这个判决认可了中央政府和熊本县政府的责任。尾崎律师说：在日本，这一判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与我们的交流中，铃木和尾崎律师告诉我们：他们都认为，国家应该采取措施来解决水俣病的问题。

中央政府的想法是：制定法律，通过法律来解决。

患者与原告也应该依据法律行事；原告们却说：我们的问题应该遵循法律来解决，我们完全不能信任政府部门。

尾崎律师说，最后各方绞尽脑汁，中央政府给自己找了个台阶，创立了第三方委员会。替代法院判决的解决方法。第三方委员会由患者推荐 2 名，中央推荐 2 名，第三方推荐 1 名，还有两名公众。这以后，中央政府终于第一次同意了以和解方式解决问题，铃木律师说：这又是一次划时代。

### 6.3 讨论与思考

**课题组：**请问两位律师，律师团经费来源是怎样的？

**回答：**律师团收费，按照诉讼标的额的 5%，收第一次预付款。胜诉之后，胜诉额的 10%作为律师费用。不过打这一公害案子时，因原告太穷，11 年律师的预付费，都是由律师自己垫付的。胜诉之后，从团体补贴中提取垫付的费用。尾崎律师去了 400 趟鹿儿岛，费用全部是自己垫付的。铃木律师说：一般，公害与环境诉讼，律师很难得到报酬。但是我们当时有强烈的愿望，公害问题应该得到解决。我们就是要通过公害诉讼的方式推动日本灭绝公害问题。

**课题组：**法官受律师团队的邀请走入患者家中，是法官的法定义务吗？窒素公司是否也可邀请法官？法官们是否会受到相关压力？

**回答：**公害诉讼，最好是第一时间去现场。法官查证现场，公害诉讼让他们去看，是我们常规的做法。能不能拒绝，采用不采用，都由法官裁量。公害诉讼，不看现场，可能不会做出正确的判决。

**课题组：**法官也需要勇气。

**回答：**是，法官撰写判决也需要勇气。窒素氮肥公司是当地最大的公司，为当地做出了很多贡献。一旦提起诉讼，会面临很大压力，包括渔民们捕的鱼卖不出去了。而在熊本的第一次诉讼，律师们成功地获取了证人证言。

有关水俣病的诉讼，在律师团签名的律师有几百人，但出庭的只有 30 位。铃木律师说，在患者面前，医生与律师一样，出于使命感。律师离开的原因多种多样，在整个事件中，律师间不同观点的博弈也一直没有停息。

两位律师都说：通过水俣事件案子的判决，人们学到的是发生问题后第一时间一定要进行彻底排查，整体了解灾难的状况与影响。面对当今世界在发展中还不时发生的污染事件，两位律师认真地说：凡是从事过水俣病工作的人，对福岛事件要说的话是：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就要进行彻底排查，掌握情况，做出报告。

## 七. NGO 的作用与反思：访支援型、支持性组织

### 7.1 谷洋一与萤之家



萤之家由谷洋一先生 1996 年创立。谷先生出生于福冈县，大学时代的他为了支援水俣病患者，来到水俣，自 1970 年代开始研究水俣病并投入水俣病的抗争运动。谷先生认为，水俣病是一种慢性长期病，需要长期护理，患者即使得到认定也同样好不了，维持生活异常困难，他由此成立萤之家来照料胎儿性患者的生活。他也担任水俣病互助会事务局的会长。几十年来，他参与了水俣抗争的许多活动，包括 1970 年 11 月 28 日大阪的“股东总会”交涉。谷洋一先生除了全力支援患者，并不认同那些水俣病已经结束的纪念活动，他在继续为患者在争取权利的同时，认为应将水俣病的教训传递到亚洲——那些经济发展中的国家，因之组织了亚洲和水俣网络会，对中国、越南和印度等地进行访问和交流。

### 7.2 加藤竹子与“大家之家”（Hot House）

加藤竹子女士出生于东京，她支援了数次到东京与日本窒素公司交涉的患者们。并参加过患者们静坐示威活动。她通过这些活动，感受到自己享受了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富裕生活，而这正是建立在伤害了水俣患者一生的基础上的。因此，她 23 年前从东京来到水俣，开始为先天水俣病的患者，能自立生存下去而工作着。这就促成了她成立“hot house”，这是为水俣病患者建立的工作场所，在这个不大的场所里，水俣病患者们努力工作着，他们制作干花标本，色彩鲜艳的小花可以黏贴在名片上，那是水俣特产的名片！不仅加藤女士、原田正纯女儿原田利惠的名片上贴着，就连 JNC——当年的窒素公司的董事、水俣本部长大衡一郎的名片上也贴着呢！他们用旧报纸糊的纸袋，他们花两个小时才能盖 10 个签

章，水俣病患者通过自己的工作自立，获得了尊严。这就是加藤女士奉献的爱心。她把“大家之家”建在水俣市的中心地带，让人们来参观学习，同时加藤女士自己还经常到学校进行水俣病的宣传工作。

### 7.3 弘津敏男与相思社

弘津敏男是水俣相思社的现任领导。1974 年成立的民间组织相思社，是为没有被认定为水俣病的患者提供支援的团体。与国家和熊本县有过激烈交锋的相思社一度是市民和行政人士畏惧的对象。相思社开设了以生活学校为名的共同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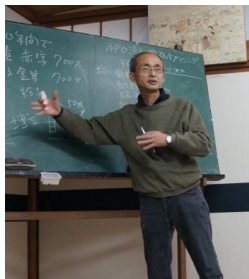


活实验场，以帮助受害者。虽然活动的方式随时代而改变，但当初的宗旨几十年来没有改变。弘建敏男从一个大阪的中学老师，进入水俣的相思社，一干就是四分之一一个世纪，他说虽然一直处于政治解决水俣病的漩涡中，却感受到了在处理理念与现实矛盾中的学习乐趣。他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当柏林墙倒塌，1990

年德国统一，1991 年苏联解体，因追求社会主义理念而奋斗的社会运动遭受重创，但是，弘建敏男认为“关于和平、自由、平等和社会公正”的基本思想并不会改变，新的运动模式要解放思想去探索。

### 7.4 吉永利夫与环不知火海计划

吉永利夫 1951 年出生于静冈，家境贫寒的他在八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七，一边打工一边读夜校。在他读高三时，东京大学安田讲堂事件爆发，“只要齐心协力就能改变这个时代”，成为吉永怀揣的小小梦想，因此多次参加了在静冈的游行，也曾与同学商量，到南方的小岛上建立一个公社。在 1972 年 1 月，时年



20 岁的吉永高中毕业，准备去鹿儿岛探访朋友，途经水俣，在水俣站口，他看到了室素公司正门前静坐示威的水俣病患者——川本辉夫等“自主交涉派”，他们希望通过与室素公司直接交涉争取赔偿。那时的吉永虽然完全不知道什么是水俣病，却参加了一周的静坐集会，他白天参加静坐示威，晚上就在水俣车站前的酒吧打工，他在水俣的日子也从 1 周变成了 10 天，从 10 天延长到了 1 个月，这个怀揣着理想的愤怒青年，最后成为水俣病患者的支援者

之一，与土本典昭、原田正纯、川本辉夫们并肩战斗，参与相思社工作，组建水俣教育旅游 NPO——环不知火海计划，专门负责水俣负资产教训旅游学习项目的开展，是今天与水俣相连的重要人物之一。

## 7.5 实川悠太与水俣 FORUM

水俣 FORUM 不是一个患者支持组织，而是一个以市民会议为组织的 NGO 法人。应该说，也是日本现在关注公害的最大的一个 NGO。起步在于 1997 年水俣病东京展，此后在日本各地举办“水俣展”，包括用影响和实务资料等来展示水俣病事件的发展过程。发起人石川是从一个编辑的角度去观察患者运动，一边做自由编辑，一边做调查工作，已经坚持了 30 年。

## 7.6 讨论与思考

对日本从事水俣病事件相关联的民间组织的观察，是我们访问日本的主要目的之一，而日程安排中共有 8 家日本民间组织，其中 5 家在熊本县的水俣市，即萤之家（患者互助组织），全村博物馆（地元学校的实践基地），环不知火计划（环保教育旅游 NGO），火热之舍（HOT. HOUSE，支援胎儿性患者 NGO），相思社（支援患者 NGO），三家机构在东京即东京财团，东亚环保信息发传所（中日韩跨国环保 NGO），水俣论坛（MINAMATA Forum）在世界各地承办水俣展（传播水俣教训的 NGO）。

从民间组织宗旨的视角分析与水俣病事件的关联度。事实上，我们拜访了八家日本民间组织中直接为水俣病提供支援和服务的组织为四家即萤之家，火热之舍，相思社和水俣论坛，其他四家可称之为间接与水俣病事件相关的组织，其重要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从民间组织成立的时间分析水俣病事件在不同的阶段其特点也是不一致的。下面是四个民间组织的基本情况比较：

编号	组织名称	成立时间	机构负责人	组织登记城市
1	萤之家	1996	谷洋一	水俣市
2	相思社	1974	吉永利夫 弘津敏男	水俣市
3	大家之家（火热之舍）	1998	加藤	水俣市

4	水俣论坛	1997	实川悠太	东京市
---	------	------	------	-----

从我们拜访的水俣病事件相关的日本民间组织发展历程看，水俣病事件的发生过程中受害者的关注度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20年之后，相思社才得以成立，据相思社负责人弘津敏男介绍，刚开始成立的主要目标是帮助水俣病遇难者设立灵碑，向患者提供更多的帮助，刚开始确认的水俣病患者仅为140-150人，到后来已经达到了5万人，因此活动的范围发生了较大变化，并且活动的方式和内容也有所调整，弘津敏男指出：从机构成立37年过程中，水俣病患者数量逐年增多，社会歧视也随之减少。这些调研中我们发现一个非常奇特的社会现象，日本文化中的歧视现象出乎我们的预料，在水俣病发生的最初十年中，不少人特别歧视水俣病患者，水俣病患者的家属。他们还常认为贫困阶层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件，他们一定是贪图便宜，吃了腐烂的鱼，当一些歧视人群中也发现了患有水俣病时，他们发现自己的歧视观是有问题。

而对于标榜民主社会国家的日本，在发生公害之后的公民社会觉醒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简单，从拜访的水俣病相关的日本民间组织，其发起人和负责人并不来自本地的民众和受害者，而大部分都来自日本水俣市以外的城市的社会活动家，理想主义者和志愿者，从这一点的观察我从水俣-东京展，1996年9月28日至10月13日的宣传宗旨中文版介绍内容中得到验证。具体内容在第三自然段是这样描述的：

“明知公害的起因但仍一直在隐瞒的不只是窒素。（应该还有）我国（日本）行政当局：一个标榜民主现代化的国家，由于害怕这个问题波及以同样的生产方式的其他企业，因对化工业打击度乃至拖延国家工业化政策，故对这些制造公害的企业加以包庇。从这个角度看，水俣病的发生实属必然。另一方面，对于受害者民众要求停止排放废水，并承认错误，行政当局以警力镇压作为回应；市民则以白眼来对待他们。至于那些改革努力和宗教家们更不屑伸出救援的手”。

上面陈述的内容。不难看出日本政府、企业、公众和民间组织在对待公害事件的处理都没有一个超越的战略心态，而仍然在考虑他们自身的利益，尤其是企业和政府组织往往忽略受害者的基本权益。

对于日本民间组织运作的困难，也是我们这次赴日本访问之前预料之中的，但是更多的问题主要出现在民间组织的专业运作之上。毋庸置疑，日本民间组织在整个水俣病事件的作用依然是明显的和突出的，也被水俣病患者和家属所认可。众所周知，日本公民社会的发展程度并不是与日本高度工业化相适应和相一致，日本民间组织面临着专业管理，筹资管理，资金管理，专业人员管理和透明度等方面的问题，也在拜访中表现其鲜明的特点，例如机构没有像样的简介，财务报告，年度报告，这些与日本民间组织发展程度密切相关。

## 八. 企业的作为与反思——访窒素公司水俣工厂

### 8.1 窒素公司

水俣病的制造者也就是日本窒素氮肥公司，“窒素”——CHISSO, 现在的英文名称是 JNC 株式会社，中文名称也从“窒（息的要）素”改成了“智索股份有限公司”。窒素公司 1906 年设立水俣工厂，目前注册资金 78 亿日元<sup>18</sup>（相当于人民币 6.42 亿元），现有员工 2500 名，年营业额为 1800 亿日元，即 148 亿元人民币。

### 8.2 企业的反省

2011 年 11 月 24 日对日本窒素氮肥公司的参观和交流，应该是最沉重的一次。接待我们的是智索株式会社的常务执行理事兼水俣本部长大卫一郎先生，在智索工作已达 35 年时间。赴工厂参观之前，我们全体成员被要求在工厂厂区不能够照相和摄像，虽然我们都不是技术情报人员，人文学科的研究类别人员。然而，我们抵达窒素工厂厂区时，并不感到这就是 56 年前的水俣病的加害者所在地，那时的水俣是工业化的一个重要标志，而这个 1906 年成立的工厂，依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情况。智慧的大卫先生给我们提供的正反面复印件的“造成水俣的企业之体验与反省”一文，让我们代表团所有成员感到与这几天与水俣病患者接触之后的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反省书的结构令人折服，除了介绍智索公司过去的辉煌，例如 1949 年日本天皇陛下访问以外，还同时受到了农业大臣和工商大臣的表彰，反省书中这样介绍：水俣病是通过长期过量吸取含有有机水银的鱼

---

<sup>18</sup> 2012 年 01 月 15 日中国银行，100 日元等于 8.23 元人民币

类和贝类而引起的中毒性病患，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后发生，到目前为止有 2000 多人被认定为水俣病。

在反省书中这样描述：水俣病发生之后，我们所承受的物质上和精神上打击是甚大的。我们迄今为止，为了水俣病而付出的赔偿金额，包括赔偿金等的借款利息，已经达到了约 3000 亿日元（相当于人民币 246.9 亿元），不仅如此，还造成了水俣病的企业负面形象，在企业的经营上，不仅成为重大的累赘，而且也成了反体制运动的攻击目标，公司职工遭受暴力，业务上受到种种妨碍，有用人人才流失等。

反省书谈到的几点重要教训令人深思，现摘要如下：不管任何时代，不能过信科学常识；在已经发生的结果面前，任何辩解是行不通的；担负的赔偿责任远远超过法庭的判决；公害绝对不能发生，一旦发生公司不仅陷于死地，而且将蒙受比破产更重的苦难。

在这四条后面还写上了这样一句话：以上几点教训。若能有助于各位进一步加深对环境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将感到十分荣幸。其实这页中文，来自于 2005 年 9 月 作为日中经济协会访中代表团的成员之一的智索公司社长冈田俊一发表的演讲。冈田俊一在日本国内沉默寡言，但是，面对中国国家发改委等政府官员时，他通过进入智索公司 40 年间所真实感受到的教训，公司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因水俣病遭受到的莫大打击，却恳切地提出了以上四条总结。

去“窒素”之前，为我们安排此次行程的田原真司先生告诉我们，“窒素”一般不接待参观，连环境省的染野先生都没有机会进入 JNC 公司呢！不知是不是因为我们是中国人，他们也希望扩大在中国的生意，所以他们答应接待我们。

### 8.3 参观与思考

与大卫先生交流后，我们坐着车，由一位叫木户理江的中年女士带着我们在厂里参加。木户她是水俣市土生土长的一名 JNC 工作人员，她用亲身的经历介绍了水俣病不仅给患者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同时也对水俣市民，水俣经济发展都带来了重大损失，水俣市与水俣病的标签紧紧相连。她介绍了与诺贝尔化学奖的获得者是如何支持现在的 JNC 企业发展，同时全世界 50%-60%液晶荧光屏的产品

也出自 JNC，还谈论与德国企业将如何合作，她还介绍自己当志愿者帮助水俣病患者如何度过困难等。

她说虽然保密的东西不多，但还是有一点，所以厂区里不能拍照。我们中有人问可以拍你吗？她笑着说拍的越多越好。

从木户理江的介绍中，我们知道了全世界手机、电脑等液晶生产材料中有一半以上来自他们企业。从化肥到化妆品，从尿不湿到薯片的包装，可以说我们平时吃的，用的可能都有用这个企业原材料制成的商品。

去年诺贝尔化学奖的日本得主曾两次到过“窒素”。木户理江说到这时脸上充满了自豪感。她说，这位诺贝尔得主得奖之前和得奖之后到厂里的待遇大不相同。她还说，每次在她的导游中都会讲到他们厂的沉痛教训，也希望来的人回去后能好好地讲讲发生在他们这里的故事。

木户理江也说到：现在电视里还老是播出他们厂以前的照片，这让她觉得很委屈，因为现在工厂已经不是过去的工厂了。

在就要和木户理江告别时，我们忍不住还是向她提了问题。我问她“你在这样的企业工作，是觉得歉疚多，还是委屈多？”她说，“到这个企业来的人，都要继续为这个企业做过的坏事道歉，这也是一种继承，所以企业也要不断发展，好偿还没有还完的赔款。”

我说随着被认定的水俣病患者的增加，企业的赔偿也会更多。她说，这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

说心里话，以往在中国和这样的企业打交道，他们说的话让我们很难相信，可是今天，我们有些相信木户了。特别是她说的，污染企业对社会的抱歉，个人在这个企业时“抱歉”也要传承，要努力工作为了早日还完赔偿。

木户告诉我们：我来窒素公司工作是由于水俣病原因。我个人也有很多患者朋友，从小土生土长的朋友，我们在一同个城市工作、生活，我们有一个共同为水俣发展做贡献的目标。也希望大家回到贵国之后，将水俣病的最新情况



与身边人详细分享。她问我们是否去过 hothouse，她和 hothouse 的患者们也是好朋友。她会日本传统舞蹈，每年都去 hothouse 做志愿者，给患者们跳舞。下周将和 hothouse 一起举办活动，为当地孩子讲有关水俣与水俣病的事情，和 hothouse 的患者一起用纸叠纸包，晚上也举办演唱会等活动。她告诉我们：室素和患者并不是一直是对立的。

企业的反省和员工的诉说，以及我们观察当今的智索公司深感作为企业家的责任是何等的重大，发明创造和工业现代化，如果建立在没有责任和道德的基础上，将是给人类带来无数的受害者和社会问题。

## 九. 政府的作为与反思——访水俣市政府、熊本县政府和日本政府环境省

### 9.1 访水俣市福祉环境部环境保护都市推进课课长田畑纯一

2011 年 11 月 22 日下午，我们来到水俣市福祉环境部，田畑先生的名片上印有一副漂亮年轻的少女，作者为出身于水俣市的江口寿史，我们上百度搜索得知，江口寿史是日本漫画家，插画家；他的作品包括故事漫画和搞笑漫画。1977 年 2 月发表出道作。因为过度追求作品质量而数次发生连续中断的情况，但人气依然经久不衰。从名片上足以证明水俣人特别需要世人的认可，太需要世人的理解和支持。

我们听到的除了和这几天听到的水俣病被确定原由的复杂以外，还有这样几个数据，当年水俣市的人口是 5 万多，现在只有 2 万多了。我们窗外的学校因没有生源也关了门。当地现在老龄化程度高达 30%。在水俣的税收中，室素氮肥厂的贡献占全市税收的 48.3%。

在提问的环节我们问这位课长：当年的市长站在工厂一边，以你自己的理解，应该吗？

“当时正是水俣经济腾飞的时候，政府和议会站在室素氮肥厂一边是必然的。不过后来市议会还是向国家提出了禁捕区。国家没有及时采纳，使得事态扩大，正说明了问题的复杂性。复杂的问题，处理起来当然不仅有一个答案。”我听懂了这位环保官员的话中话。

“1992 年我们发表了环境宣言；

现在每年的五月一日，也就是发现第一例水俣病患者的那天，我们有慰灵仪式；

2008 年水俣被评为环保模范城市；

现在我们的垃圾被分为 24 类。开始这种分类也让中小學生参加。现在每天不同地区，不同垃圾的分类也成了人们交流的一个场所，其作用已经超越了环境保护。”

我喜欢这位领导的直率，也对日本今天水俣病所导致的复杂，有了畏惧和要面对的双重心理。

田畑课长的介绍有三点是我们预料之外的。

首先，他谈到了日本的政府治理机构和运行体制。即议会和政党体制，而政党又代表着不同利益群体，例如：水俣市议会在决策时大部分议员都来自窒素公司或与窒素相关的人士，因此，在议会决策时，议会多数成员更偏向于企业，没有更多的考虑患者或受害者的利益。

其次，地方政府自治又与中央政府之间的行政关系。从市到县再到中央，复杂的层级管理也阻碍了中央政府的决策。由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当时信息化程度低，没有将在 1956 年正式确定的水俣病及时反映到中央政府。在 1956 年当时的水俣市政府，熊本县政府，县立医院，窒素公司附属医院联合组成了“奇病”对策委员会，而这样的对策委员会成员并没有中央政府的代表参与，这就造成了信息不对称，中央政府了解情况的渠道并不畅通。

最后，企业地位注定了他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作为水俣市税收大户的窒素公司在水俣市的地位显赫，水俣市政府和市议会更偏向于窒素公司，尽管市政府也对受害者拨出专款支付给水俣病患者和家属，即在 1957 年当时日本经济比较困难时期，市政府就支付价值 4000 美元给水俣病人并照顾家属，但上报日本中央政府并不十分及时，从而影响了日本中央政府系统的后期的政策研究、对公害影响判断和政府的决定。

## 9.2 访熊本县知事蒲岛郁夫

“日本水俣病的发现是对中国的贡献，也是对世界的贡献”。这是我们熊本县知事（省长）蒲岛郁夫时，他说的一句话。应该说，蒲岛郁夫知事给我们的印象不错。他说从一开始就承认这一事件中，政府应负不可推卸的责任，承认是政府的失职致使水俣病蔓延酿成这么大的灾难。

在与我们的交流中，蒲岛郁夫一再强调他最关注的是在这一灾难中受到伤害的人、是弱者。有些救助水俣病患者的政府决策还是他第一个提出的。听他说了这些后，同行的中国商联新能源商会秘书长曾少军问这位知事：当时水俣正在飞速发展，水俣市内至今大街上还写着“水俣和‘窒素’是命运共同体”。水俣病被确认的患者只有 2237 个，在这样的背景下，您怎么看少数人要服从大多数人的利益？如果你把关注点放在少数人身上会不会丢失选票？

蒲岛郁夫知事说：少数人的牺牲不一定就能给多数人带来幸福，况且少数人和多数人也是会有变化的。今天大多数的受益者，或许就成了明天受害的大多数，而大多数利益获得者，又成了少数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可能。所以不能简单地判断大多数与少数。

交流中，蒲岛郁夫知事还说到：政府应该做的是尽快救济受害者，行政权力不能禁止老百姓不许吃鱼。政治家能做什么，我就职后叫停了一个很受争议的大坝。因为我认为能源重要，但要对生态有影响就不应该建。

在和我们交流时，他也在拉我们的选票。他希望我们支持的倒不是继续任职，而是他希望我们支持他明年在水俣召开国际水俣大会。他认为水俣的教训对全世界来说太重要了。

对一件事的判断，每个人难免不站在自己的视角下结论。而对事件认知的程度，也会决定着一个的人选择。知事的这番话在我们从熊本政府大楼出来，议论时大多数人认为日本的这位官说得不错。可是，当地的记者和为我们安排此行的田原先生与我们的想法有出入。有关水俣病的社会问题还有那么多没有解决，还有那么多受到伤害的水俣病患者至今得不到认定，就在水俣开国际会议，真是为了让世界接受教训，还是要标榜自己，为自己脸上贴金？这是《熊本日日新闻》记者在采访清华大学 NGO 研究所所长王名时说的自己的疑惑。

这一番评论和我们这几天听到的那些陈述碰撞后，我们这样对自己说：一个

成熟的记者，一个成熟的研究者，一个成熟的公民，对任何事情的判断，都不应在你对这件事的了解还在继续中时。我们也再次想起前几天采访对水俣的报道已有三十多年历程的记者高峰武的一句话：不懂装懂就制定政策并加以执行所带来的结果是最坏的。而这个坏，因其地位和权力的不同，带来的影响也会有着巨大的差别。错误的判断，普通人会在普通人的范围内产生影响、记者的影响会在公众中传播、而官员的影响，则在他的执政之中，并决定着他所管辖范围内所有人的命运。

蒲岛郁夫知事的这样一句提醒我们大家也记住了：信息转递中，政府在哪些方面做得不够，公众看得最清。日本已经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昨天，很多国家正处于今天的发展中，我希望贵国不要再犯日本已经犯过的大错，那样的灾难不应在中国再发生。

因水俣病而产生的经验及教训，应该是中日交流的重要内容，同行开始有了较为清晰的想法。中国能不能接受日本水俣的教训，交流不能仅限于政府，也需要扩展至民间。

2011年11月25日，熊本县环保局审议官内田告诉我们，日本水俣病发生后的环境恢复已有13个年头，花费的经费为485亿。

我们问内田，水俣病发生这么多年了，潜在的患者高达6万，可认定的只有2273位，而受害的人群高达20万。56年了，为什么还没有做过一次全面的普查？

内田的回答是：一，发病后的50年来，我们还在考虑有效的调查法；二，从医学上考虑，这样的调查需要1000位神经科医生、护士，我们没有那么多。我们现在全力以赴在做救济。时间在一天天过去，患者在老龄化。此外，我们也希望水俣的昨天，能让周边国家环境政策产生变化。

知事要开“水俣公约”国际会议，环保局审议官希望教训能影响到其他国家的政策。人家吃一堑，我们能长一智吗？

### 9.3 访日本环境省上席参与顾问原副部长小林光

2011年11月29日下午，我们来到日本环境省，见到了刚刚于2011年初卸任的环境省副省长（相当于中国的副部长），现任环境省上席参与（类似顾问），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小林光先生，这位长期在环境省工作的技术型、专家型的政府官员，他曾70次100余天在水俣市了解和研究水俣病事件，访问水俣病患

者，他的观点就是解决现有水俣病的护理和福利问题，同时应将水俣市经济搞上去，提出日本应建立环境保护型企业，全民节约电力，提高经济效益。

小林光说：保护环境是不是给经济造成损失，是不是真的拉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后腿，从水俣事件可以清楚地看到答案。

“窒素”当年如果治理污水，其花费仅是后来赔偿的十分之一。当年要是治理，花费是 200 万日元。而到目前为止，他们赔偿的钱已经相当于 400 亿美元。

小林光说：56 年前“窒素”水的污染，导致水俣病的发生。从那时起直到今天，他们不但影响着企业的发展：生产力降低、投资萎缩、成本，物价上升、为治理环境花更多的钱，还一直要背着付巨额赔偿的重负，这些带来的经济萧条，也直接影响着整个地区的发展。水俣曾在日本的发展中走在前列，现在的水俣，在日本是落后地区了。

小林光说，日本近年来的经验表明，为治理环境花钱，会提高 GDP 的正增长。越早治理，越能减少受害损失。不为治理污染花钱，会让更多的钱投入到消极影响的消除中。2010 年与以往相比，在日本，节能 26%，成本降低的同时，利润也有了提高。

听到这时，我们问小林光，这个事实在我们的发展中是显而易见的，可以举出无数的事例。可是在中国，人们还是在说要先吃饱了再环保，尽快有些破坏并不是为了吃饱。在日本有多少人赞同保护环境不应在发展之后。保护环境不会拖经济发展的后腿呢？

小林光说：很少。他自己的这种观点在日本也是少数。大多数人认为的还是要先发展，是保护环境会影响经济发展。但这并不影响今天的少数人，还在努力让公众和决策者们看到经济学家们算的这笔帐。

小林光说，产业部门要和环境保护分开。油门和刹车在一个档上怎么走？预防原则说来容易做起来难。日本目前产业与环保没有分开的就是福岛，结果出了这样的灾难。日本环境厅考虑要成立国立环境研究所，要建立独立的学术研究。

我们一行中也有人问：在我们的访问中，听到不仅水俣病受害者也包括学者都在说：千别万相信政府。小林光先生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作为官员，小林光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他说的是，我曾访问水俣病发生地 70 余次，大约在 100 天左右。我认为光补偿不行，现在患者越来越老了，护理是个大问题，福利一定要跟上。如何补偿，范围和金额一次又一次地变已有了三次。这等于是对已经做出的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否定。鸠山首相去了水俣，是去看望，更是去道歉。政府的态度也在转变，我坚信环境好了才能赚钱。否则今天不赔，明天也会赔，会大赔。小林光先生说。

小林光认为：日本很多产品现在在中国生产，所以我希望推动制定生产过程的国际标准和机制。让企业的生产方式与环保标准有国际公约的限制与约束。环境省不要钱，要人。有了我们要的人才能做我们要做的事。

## 9.4 讨论与思考

拜访几位行政长官们之后，我们又接触了一些日本民众，从事水俣病研究的大学教授，和水俣病相关的环保组织等，以上人士对行政长官的回应是：日本政府做得很不够，反应滞后，法律和政策、应对措施滞后等。

日本这样一个经济高度发展，社会民主化程度很高的国家的政府官员，也在愁着为自己要做的事找人，我们呢？

## 十. 水俣学的探索——访水俣学研究中心花田昌宣教授、宫北隆志教授

### 10.1 熊本学园大学水俣学研究中心

熊本学园大学水俣学研究中心位于熊本市大江，成立于 2005 年 4 月。水俣市当地的研究基地“水俣学当地研究中心”是在同年 8 月开设的。

所谓“水俣学”，是一门超越了专业结构，跨学科性的学问。它是超越“外行”和“专家”的结构，面向所有的生活者的学问。同时，它还是丰富的、真实的、扎根于现场的学问，它也是探究每个人生活方式的学问。它将所有的成果都返还给当地，并且还会向世界传递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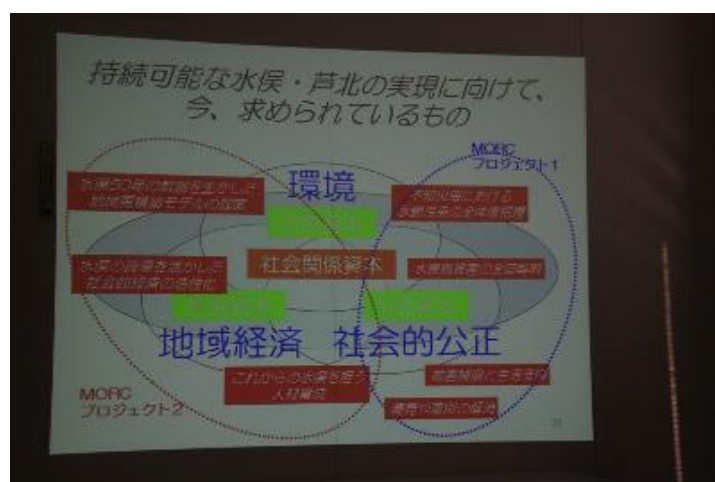
如今，以全面解明水俣污染的健康伤害、生活伤害，相关资料的整理、数据化与宣传，地区再生模式的提案这三点为支柱的工程正一点点开始行动了。

该机构以面向地区的中心为目标，并计划、进行着以“思考地区和福祉”、“考虑生命与环境”等方面为题目的“公开讲座”。另外，“健康·福祉谈话”也

会定期实施。是熊本学园大学水俣学研究工程的研究员和研究生的研究基地。另外，这个设施也广泛地面向国内外的研究者开放。

## 10.2 与花田教授、宫北教授交流

11月23日，我们在日本熊本学园大学与花田昌宜教授、宫北隆志教授交流，他们为我们打开了另一窗户。他们是扎根在民间的学者。他们是从地元学，也就是从事物发生地和相关方去分析事件发生的原因和结果。我们可以看看他们的关系图，不过他们研究的关系图和我们中国的关系网不同。



企业—集落一村；食物、风土、历史、文化、地域、社会；个人、地区社会、实业环境。当你对一件事不是独立地去看它的本身，而是从它所处的环境去看时，会发现独立地去看看不到的原由和结果。

两位教授说，他们在水俣边的小村子里调查时，大多数人都不想说身体很差，即使申报水俣病患者也会避开家人去申报。如果不被批准又会愤怒。不批的原因是县政府对此不重视。这一串的连带关系才会使水俣病发现已经快六十年了，确

定是水俣病患者可以得到 1600-1800 万日元。可 6 万多的潜在病人，现在被认定的只有 2237 人。花田教授说，我要是有孩子，他还没有结婚，我不幸得了水俣病，我也不会申报。



地元学是两位教授在研究一个复杂的环境事件中所用的方法。他们要研究的是窒素企业进入到水俣来了后，给水俣带来的都是什么？是怎么带来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社会的，健康的？

听教授们讲这些时，多么希望我们关注了八年的怒江也有地元学方法的引入。

他们的回答是：研究者要站在受害者一边。花田教授说，他遇到我们这样的考察也很兴奋，以往他在国际会议上碰到的中国学者常常告诉的是：我们是有很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已经解决了。

### 10.3 讨论与思考

#### 1. 日本学者的科学发展观

宫北教授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环境和社会公正，涉及代际公平与全社会公平等内容，这很象我们的科学发展观，可以说是一种和谐社会模式。其实水俣病真的是一个特别跨学科领域的问题，宫北教授是学工程的，但他不仅多次用发展、环境公平等来解释，而且用资本来解释的时候，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外来资本这些概念他也都在用。他说做工程的用图来表达思维，工程科学及其对社会学、管理学方法和知识的运用，特别值得学习。

#### 2. 水俣学研究方法论

与两位教授交流，明白了水俣学研究正在逐渐形成自己的方法论：

一是以史为鉴。学习失败的历史，将它活用于未来。在两位教授眼里，致害企业窒素公司及各级政府与官员，他们并不认为水俣病是失败的历史，他们基本站在这样的立场：水俣病好不容易得到了解决。



二是到现场学习。水俣学研究，主要与水俣病相关，需要向居民学习，与受害者、患者及其家属保持经常性接触，跟他们聊天，和他们喝酒，诉讼的时候也和他们站在一起，帮助他们诉讼。

三是跨学科研究。水俣学必须融合各专业领域的力量，如原田先生是医学，花田教授是经济学，宫北先生是公共卫生学，其他还有社会学、法学、文学等。水俣学需要各个学科领域的专家。

四是开放性合作。水俣学倡导专家和一般民众进行开放性合作。一般民众指生活于某一地区的普通市民。有关海洋的事，渔民最了解；工厂内的事情，厂里的员工最了解。专家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和他们合作。

五是国际性传播。两位教授认为，水俣学说研究成果不能仅在国内发展，而是一定要努力往国际传播。

这是日本水俣事件这个负遗产对学术带来的影响，逐渐形成一个学科领域，逐渐有自己的方法论。我们中国，负遗产知多少？这些负遗产对我们的学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 十一. 关于水俣公害的经济学与法学思考——访寺西俊一教授、淡路刚久教授

### 11.1 寺西俊一教授简介

寺西俊一曾先后担任环境经济·政策学会常务理事·副会长、环境法政策学会理事、亚洲经济研究所外部研究委员、日本学术会议环境委员会委员、日本环



境会议事务局长、季刊《环境与公害》（原称《公害研究》）编辑委员会干事(Editor-in-Chief)。

1975年：京都大学经济学系毕业

1980年：一桥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博士课程完成

1980年：经济学系专任讲师（《环境经济论》负责人）

1985年：副教授（同经济研究科《环境经济研究》负责人）

1992年：教授，1998年：同经济学研究科教授

2008年：一桥大学亚洲环境项目代表（至2009年度）

2009年：一桥大学自然资源经济论项目代表

## 11.2 淡路刚久教授简介

淡路刚久是日本著名环境法学家淡路刚久是环境权利的理论、环境法学的先驱者之一。



淡路刚久

1964年3月：东京大学法学部毕业

1964年（昭和39年）4月：东京大学法学部助手

1967年（昭和42年）4月：立教大学法学部讲师

1969年（昭和44年）4月：立教大学法学部助教授

1977年（昭和52年）4月：立教大学法学部教授

1993年（平成5年）4月：立教大学法学部长（至1994年3月）

2000年（平成12年）4月：立教大学法学部长（至2002年3月）

2004年（平成16年）4月：立教大学大学院法务研究科教授

2004年（平成16年）4月：立教大学大学院法务研究科长（至2006年10月）

2007年（平成19年）：立教大学退休、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法务研究科客座教授

### 著作

『公害的法律商谈』（有斐阁、1971年）

『公害判例的研究—生成与展开』（都市开凳研究会、1971年）

『公害赔偿的理论（增补版）』（有斐阁、1978年、初版1975年）

『環境権の法理と裁判』（有斐阁）

『连带债权的研究』（弘文堂、1975年）

『企业的损害赔偿与法律』（日本经济新闻社、日经文库、1983年）

『侵权法中权利侵害与损害的评价』（有斐阁、1984年）

『民法II—物权（第3版）』（有斐阁Sシリーズ、2005年、初版1987年）

『环境法（第3版）』（有斐阁ブックス、2006年、初版1995年）

### 社会活动

日本交通法学会理事（1972年 - ）

日本私法学会理事（1991年 - 1999年）

日法法学会理事（1986年 - 1991年）

日本环境会议理事（1991年 - ）、理事长

日本法社会学会理事（1991年 - ）  
国際人権法学会理事（1991年-2003年）/環境経済・政策学会理事（1995年-）  
/環境法政策学会理事・事務局長（1997年-）/東京都消費生活対策審議会委員  
・部会長（1987年-）/法務省司法試験第二次考查委員（1991年-2000年）/文  
部省大学設置・学校法人審議会専門委員（1994年-1999年）/東京都消費生活  
対策審議会委員・会長（1994年-1998年）/文部省（文部科学省）日本ユネス  
コ国内委員会自然科学小委員会調査委員（1994年-）/神奈川県環境審議会特  
別委員（1996年-1997年）/東京都消費者被害救済委員会委員（1998年-）、会  
長（2001年-）/世田谷区消費生活審議会会長（1999年-）/世田谷区環境審議  
会委員・専門部会長（2000年 - 2004年）/埼玉県戦略的環境評価技術委員会  
小委員会委員（2002年-）/人事院国家公務員採用I種試験委員（2003年-）/  
日本学術会議第20期会員・法学委員会委員長（2005年-）/

### 11.3 与寺西俊一教授交流

2011年11月28日，我们在东京访问日本一桥大学教授，环境经济学者寺西俊一时，他给我们算了一笔帐。

寺西俊一教授说，我们不算水俣病给日本环境的破坏带来多大的损失，也不算受害者的损失有多大，我们只算一下施害者的损失。窒素氮肥公司当年如果对排放的污水采取治理措施，花费会是200万日元。而污染事件发生后，他们付出的赔偿金额是多少，2000多亿日元。

这笔钱窒素公司根本付不起，要靠国家与他们一起付。国家的钱哪来的，纳税人的钱。

对一家企业来说，他们节省了小钱，付出的却是这样昂贵的代价。

这还只是算的这家污染企业付出的代价。如果再算一算环境付出的，受害者付出的，都折合成钱，又会是多么大的一笔钱呢？

寺西俊一教授说，这就是日本在水俣污染事件中，让我们看到的什么是不划算，什么是太不划算。遗憾的是这笔帐从水俣病被确认，到今天，算了整整56

年并没真正算清，而且是永远也算不清的。

寺西俊一教授说，环境是人们生活的容器，我们把容器弄脏了，还要在里面生活，那会是一种什么生活？水俣发生的污染事件，在让人们看到了水俣病给当地人和当地家庭带来的巨大痛苦的同时，也让人们看到了破坏容器带来的社会成本、经济成本。短期的获利波及到的是社会、经济的长期和未来。

绿色经济的重要，要说日本人应该是有了切身体会的。然而，他们的教训不仅在全世界的很多国家还在重演着，就连他们自己在 2011 年 3 月 11 日发生的福岛核事故中，也还在重演着。

这就是今天全世界都在面临着的现实。

寺西俊一教授告诉我们，他对此提出的对策是：

- 一，对水俣受害者全面监测；
- 二，信息透明，向日本国内，向亚洲，向世界；
- 三，灾情不要微缩其范围，救济要公平。赔偿不应分等级。
- 四，进行绿色投资。

寺西俊一说，1983 年，他就参加过上海市政府与日本在经济合作方面的研讨会。1995 年他去过吉林中日联合企业。那次他受到当时国家环保局的热情接待。可是让他遗憾的是，前几年，他再去吉林时，因为那里也发生了与日本化工企业同样问题，吉林政府对他们的监视，使得他们的调查没能进行下去。

现在，寺西俊一教授说他们与中国江苏嘉兴政府的合作是愉快的。2011 年年 12 月，他们还会请嘉兴的专家与官员到日本进行考察与研讨。就地方环境管理与政策进行研究，重点是对长三角、上海、嘉兴三地进行调研与研究。

寺西俊一说，他们也希望把发生水俣病后日本经历的四个阶段与更多的人一起分享：相互交流、相互理解、相互信赖、相互合作。

全国工商联新能源商会秘书长曾少军问寺西俊一教授：福岛核电事故，对全球核电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日本来说，福岛核电事故已被认为是水俣病的重演。不知现在那里的情况如何？

寺西俊一教授说：福岛核电站让日本的两个神话已经崩溃：

- 一是，核电安全神话的崩溃，核电在日本无法继续发展；
- 二是，廉价原则的崩溃。核能不是最廉价的。

这两个神话的崩溃，让日本面临的是今后将如何发展可再生能源（日本叫自然能源）。

#### 11.4 与淡路刚久教授交流

2011年11月29日晚上，我们走进了早稻田大学淡路刚久的办公室。

淡路刚久教授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日立公司当年开发矿山，上游有个村落是松木谷地区。田中正造，在解决矿害问题时，将矿沉在水里，全村淹没，去国会要求赔偿。对公害赔偿的贡献非常大。当时那里的矿山、炼铜厂产生一种亚硫酸的气体。到了明治时代，1890年左右，山上有些树木枯了，石头露出来。村落没法住人。松木村在山谷，早上吹暖风，亚硫酸留在大气中，全村无法居住，只剩下墓地。当时的医生没法证明健康危害，只是可以查明农业危害。做了一些预防措施。在英国留学的技术人员回来后修建高高的烟囱，将有毒气体排到海边，而不是留在山凹里。这被认为是曾经有的教训影响了一些有良知的企业。

我们对只是没有直接排在山凹的村庄里就算有良知表示疑问。淡路刚久教授笑着说，那是100年前的事。当时企业也试着建了一个矮烟囱。结果烟倒是没有去污染周围的农田，而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全留在了工厂里。结果是工厂里滚滚的浓烟让工人们别说干活了，眼睛都睁不开，后来人们管那个矮烟囱称为：傻帽烟囱。

在和淡路刚久教授座谈时，清华大学王名教授问到：这么多年来，为什么一直没有对水俣受害地区的人民进行健康体检？

淡路刚久教授说：通产省当时否认致害原因，化工协会也否认窒素公司是致害企业。有人甚至说是二战时留下的炸弹等等。含糊其词的12年期间，当然不会给受害者进行体检。政府不作为，民间很难去做。经过的时间越长，症状体现越不典型。原因越难查明。甚至被认为是假患者。这些都对给不知火海地区居民进行全面健康体检形成障碍。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秘书长黄浩明问淡路刚久教授：1973年判定了污染企业的责任，2004年确定国家与熊本政府责任。是否能够追究首相、熊本行政长官的刑事责任？死亡的人是否可以获得赔偿？

淡路刚久教授说：窒素公司的社长承担了刑事责任，并判有罪。国家，因为

不是指定的，所以要追究刑事责任很难，不存在杀人意识，只能追究业务过失。

黄浩明又问：是否可判间接犯罪或渎职罪？

淡路教授说：不能。要判得符合构成的要素。

对死亡人的赔偿，由继承人继承。

《财新》记者贺信的问题是：2004 年的判决，国家责任是不作为，但我没有看到具体是哪些方面不作为？看到的是政府不承认患者身份，行政不承认司法。

淡路刚久教授说：最高法院，只是对高级法院的事实进行认定，并不是直接认定事实。认定方法最高法院不加评论，只是说国家与县有不作为。之后就属于政治判断了。如乙型肝炎等，最高法院依据症状，从防疫学角度进行综合判断。想从法律上将官司打到底，可以做，但高级法院已经认定了。

## 11.5 讨论与思考

日本司法系统在处理水俣病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让我们联想中国司法系统在近些年处理类似案件中的表现。

仅以结石宝宝系列案为例。这些案件中，有两个人物特别需要注意。第一位是赵连海。赵连海的儿子是毒奶粉受害者，求告无门之时，他自己组织了维权组织。组织成员举行过聚会，三鹿奶粉案开庭时还到法院门口拉过横幅、喊过口号。于是这些行为都成了他的罪行，罪名是寻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

我们访问过吉永利夫。他以自己的经历回忆说，受害者团体和窒素工厂对峙时，“白天我们在工厂门口静坐，晚上就和白天相互对峙的保安一起喝酒”。在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出版的一些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直到对峙后期，渔民团体将怒火转向警方，警方在“收拾”了一些抗议者。赵连海的行为远远不能和这些人相提并论，但是他收获了两年半的有期徒刑。

另一位父亲叫郭利。郭利曾经和广东一家奶粉生产企业达成过私了协议。这是他在当时环境下最好、甚至是唯一的选择。事后他希望得到更多赔偿，结果被企业“钓鱼”，以敲诈勒索罪举报到检察院。

在日本，我们接触到与此相关的案件，是日本法院对窒素公司和受害者团体私了协议的判断。法院说，该协议是在双方不对等，并且剥夺受害者合理诉求的条件下达成的，判断其“违背公序良俗”应属无效。日本受害者在司法判决中

获得更多赔偿，而中国的郭利被处有期徒刑5年。

于是我们做出一系列假设：

如果我们能够保证赵连海的诉讼权利，他会不会走上一条带有对抗色彩的道路？如果我们给郭利和企业对簿公堂的机会，他又会不会在公司利诱之下，萌生所谓的“贪婪”？

这也是中国律师界热烈讨论过的问题。这个群体希望介入结石宝宝诉讼，但是只有为数不多的人真正进入。一方面是因为立案本身极其困难，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得不到律师协会和司法局的支持。

在日本，律师尾歧俊之律师说，他们拿着起诉状，走村串户动员受害者家庭参与诉讼。我倒不认为这是因为出于对受害者完全的同情，毕竟律师和受害者签署的是风险代理协议，但是这又有什么不好？遗憾的是，中国律师是不能这么做的。那样意味着在未来的工作中，可能受到各种刁难，比如，案件只要是他带来的就赢不了。

更让人触动的，是日本法官的所作所为。律师铃木尧博介绍说，在律师申请之下法官造访了受害者家庭。他们事后接受采访时说，“今天水俣在下雨，我们心里也在下雨”。在中国，这是难以想象的。

## 十二. 走出水俣病——全村生活博物馆、地元学

### 12.1 水俣市首位谢罪市长吉井正澄

在历代市长之中，吉井正澄是第一个向受害者谢罪的。为解决患者和市民的对立，他提出了“共同改正”的理念。

吉井正澄出生在水俣市山间部分的久木野地区。吉井是农民家的长男，为了让弟弟们能上大学，他从农业高中毕业后就放弃读书，继承家业林木经营，由于经营有成，还获得了农林水产大臣奖。1975年，他当选水俣市议员，1994年当选为市长。就任市长后仅仅两个月，吉井正澄市长在5月1日主办的水俣病牺牲者慰灵仪式上，向水俣病患者道歉。媒体的标题新闻都是《水俣市长初次道歉》，当时遭致各种威胁和批评，但吉井市长始终十分坦然地处理日常工作，会见受害者团体的相关人士。吉井就像交涉专家一样不停活动，在国家与受害者团体之间

重建了信赖关系。吉井自己认为：“总之，在水俣病问题中，这次的道歉是一个巨大的转机，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如今的水俣，作为屈指可数的生态城市，已经世人皆知。吉井市长开启了垃圾的分类运动的先河。吉井想的是如何将公害起点的水俣市建设成模范的环境都市，“这是水俣市生存的唯一道路。”吉井退休后回归故里，在水俣病 50 周年之际，环境省设立了水俣病问题的“有识者会议”，吉井当选为委员。

## 12.2 吉井正澄之女吉井惠理子导览全村博物馆

水俣市的大川地区曾经也是水俣病的影响之地，可是这里并没有水俣病患者的记录。受不了歧视，怕影响了自己平静的生活，都是“隐姓埋名”活着的缘由。也是为此，即便身体上有所不适的人，也不想精神上再有压力。这一点如果不是与这些人近距离接触是无法理解的。

2011 年 11 月 22 日，带我们一起走进大川地区的熊本学园大学宫北隆志教授是日本研究地元学的专家。他告诉我们当年这个小山村产粮食，也有一个小火车站。那么他们种的粮食作为商品运出去后，海边的鱼也通过火车进了这里农家的餐桌上。那些被污染了的鱼，也就以这一途径把其经过鱼消化浓缩了的汞带到了这小小的山村。

今天小山村的空空荡荡倒不完全是因为这里曾经是水俣病的发生地，而是和我们中国一些农村差不多的原因，壮劳力都到外面找生活去了。

宫北教授带我们来之前告诉我们，他在这里每年投资 7000 日元让农民在稻田里养鸭子，稻谷不施化肥农药，而农民每年给他 5 斤大米。而在这种交换的同时，以地元学为理论基础的大川地区全村生活博物馆也在这里办了起来。

在曾经是水俣市久木野小学校大川分校区，现在是全村生活博物馆里，吉井惠理子告诉我们，这个叫中小场的小村庄现在孩子只有两个，三十岁以下的有一个，像她一样四十多岁的两个，其于都是五十岁以上的，75 岁以上的有 35 个之多。

建立文化、生态区，从地元上讲，就是要关注乡下，让这种关注有特色地走到每一个角落，宫北教授说这些时，对小山村充满了感情。这大概也是地元学的特色，地与人的神交，这是我一直以来对地元学的理解。

吉井在我们一走进农村生活博物馆后就告诉我们：过去当地人会说我们这种地方啥都没有。可有了博物馆后，我们发现日本特色的还不少呢！当地的厨师、



做泡菜的高手都是难得的工匠。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不就是由些组成的吗？

吉井说，现在博物馆里像她这样叫学艺员的有三个，工匠是 13 位。自从留在村子里的人在农村生活博物馆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后，自信心大大地提高了。学艺员和工匠们都有政府发的正式的证书，自信心让他们在有人前来参加观时，会以夸张的介绍让人们对他们生活的地方，对他们的文化和他们慢生活的方式与健康的相互关系有所了解。

“我们非常简单的印了 2000 本有当地特色的食谱，500 块一本。报纸上介绍的当天，就来了 500 份订单，一下子让我们手忙脚乱了。这让我们看到招回年轻人的希望。我们这一地区现在有四个这样的博物馆，它给了我们信心”。信心这两个字，在吉井的介绍中是一再地被提及的。

现在，来这里参观农民生活博物馆的人要付导游费 1000 日元，（相当于 80 人民币）在这里吃饭，尝尝厨师这一工匠的手艺，一顿要付 1500 日元。进入 11 月以来，30 人一团的旅游团都来了不少。

这一收入，让全村生活博物馆存折里的钱在增加着。我问吉井你们打算用这些钱做什么，会分了吗？她说要干的事很多的，厨房旧了要维修，还想办个加工厂。现在来的人多了，我们在骄傲的同时，也觉得有了更多的责任和压力。现在 35 个 75 岁的老人中，有五个工匠，白野猪名人、编织名人、竹艺名人，我们怀抱的希望是 我们越办越红火，让年轻人回到家乡来，他们是我们的未来。

听吉井说时，我们一行人就迫不及待地希望尽快享受她这个学艺员的导游，到这个小乡村生活博物馆的实景里去走一走，看一看。

一进村，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村子里的垃圾站、学校灾害临时避难所，环境协定。没有看到的，甚至是一丁点也没有的随处乱扔的垃圾。

吉井边走，边讲，还边给听她讲的人出着试题。她的第一个问题就和水有关，她问我们，村里的小溪在下面，田地在上面，我们的田完全靠大自然的浇灌。你们说水是怎么流到地里的。我的回答是上面有个蓄水池。我已经有了固定的思维模式，光靠大自然吗，人是要做点什么的。

村里还有那么急的小溪，以至于吉井问我们你们敢去吗？到了水边我们找到了答案，小溪是从山上流下来的，只要把它们“限制”一下，它们就可以流到了需要浇灌的田里。

吉井接下来的两个问题：一是这厚厚的一堵墙是做什么的？我说在山西有这样的墙是防火的。吉井说靠近了。同行的墨竹说是防水的，而曾少军则大声说：防风的。吉井为少军鼓掌，他说对了。

田边的这口大缸我们又是猜了个八九不离十，是养鱼的，我们说。但它不是养活鱼的。而是喜欢吃腌鱼的日本人当年从外面打来或买来鱼后放在这里腌制。

一些快失传的工艺，在这样的农村生活博物馆里又悄悄地被拣起来，吉井说。现在村里，会做石墙的只有两个 85 岁的老人，村里也找不到想学的人。来农村博物馆参观的人里，没准就会有对这技术活感兴趣的人呢，吉井说。

村里有一个庙，过去有村规约，全村的人轮流做饭上供。随着村里面日渐萧条，这一做法已经停了好久了。可自从有了农村生活博物馆，这一传统又被重拾起来。

有意思的是，我们吃饭时，吉井站在屋子里的黑板前，她说刚才回了趟家，和父亲说起她向我们的介绍。父亲特意让她再来给我们说说她漏掉的。

这么重要的话，吉井写在了黑板上。用日语写出来，我们中国人是能猜出个大概的有些时候，而吉井写的话，我们百分之百能看懂，我写在这里：

住民参加，行政参加。

同行的宫北教授告诉我们，吉井的父亲当过水俣市市长，离任后回到家乡还当他的农民，现在村里只有他们一家在做林业保护。而作为市长的女儿吉井，她受过短期的大学教育，而 40 多岁的她一直就是农民。

我们今天吃的这顿饭，在那些厨师中，站在左边的就是市长夫人吉井征子。

市长提醒的公民参加，行政参加这二者的结合，这就是今天农村生活博物馆的宗旨，我没有问过前市长，但我从他让女儿特别回来和我们重申，我猜想应该是兴起农村生活博物馆人的追求。再往前想想，是不是也是市长在水俣执政后的经验之谈呢？

### 12.3 地元学的思考

离开中小场这个小村庄，宫北教授带我们到了水俣市的山上，他告诉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水俣的全貌。这里至今还留有人们对当年的回忆及今天还在继续着的诉讼证据。

宫北教授从地元学的角度解读水俣病，他关注的是被污染地及利益各方的地

域关系，人际关系。听他讲这些时我在想，如果我们关注的怒江也用这种地元学的方式去研究，去分析，去行动，又会是一种什么趋势呢？

离开远望的大山，宫北教授又带我们去了当年室素氮肥厂的排污口。站在排污口前，宫北教授说，当年有三分之二的污水是从这里排出来的。渔民的船从这里经过时，船边的小贝类统统死掉了。开始他们还挺高兴，这样就省事了，不然清理船边的这些小东西也不是件轻松的事。后来得知是被毒死的，他们开始着急。再后来排污口被移走了，这些被污染的水也随着转移，在扩大。

我们站在这个引起世界震惊，也让一个污染事件官司一打就是 60 个年头的发生地，宫北教授说了这样一番话：灾难总是发生在离大自然这么近的地方，总是发生在最弱勢的群体中。水俣病这样的灾难，还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人群中继续……。

### 十三. 不止的行动：国际交流

#### 13.1 第二届水俣学国际论坛：环境污染及社会影响（日本熊本学园大学）

2013 年 9 月 5 日至 8 日，由日本熊本学园大学水俣学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届水俣学国际论坛：环境污染及其社会影响在日本熊本召开，来自中国大陆、台湾、泰国、韩国、加拿大以及日本国内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同时受邀的还有多名日本污染事件的受害者。各国专家、学者就以下内容做了深入的讨论和交流。

##### 1. 实证报告：污染事件对社区的影响

加拿大 Grassy Narrows 环境委员会的主席 Judy Da SYLVA 女士介绍了加拿大汞污染中毒事件中民众的抗争之路；泰国 EARTH(Ecological Alert and Recovery--Thailand)的代表 Penchom SAETANG 女士分享了泰国的生态修复案例；韩国职业与环境健康研究所副所长 LEE Yun-Keun 先生则讲述了韩国氢氟酸泄露事件的始末；台湾中华医事科技大学副教授 HWANG Huann-Jang 先生就台湾工厂污染事件的过去与未来发表了演讲；中国淮河卫士的负责人霍岱珊先生在分享淮河卫士参与淮河治理的行動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可以借鉴水俣的经验，“解毒”淮河。来自日本熊本学园大学和水俣学研究中心的多位教授也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水俣病事件进行了深刻剖析和解读，如起因研究、患者抗争、补偿体系、水俣事

件的现状与挑战、水俣事件的教训等。

## 2. 环境事件的危害：补偿及民众的抗争

首先，来自日本的水俣病研究专家们分享了日本水俣病事件中民众面临的挑战与困境；来自日本福岛的受害者讲述了其家乡受到核电站泄漏污染的惨痛经历；来自泰国、加拿大、韩国和台湾的行动者和专家也分别介绍了各国环境污染事件中民众的参与及其产生的影响；来自中国清华大学 NGO 研究所的王名教授也受邀发表了题为“保护水资源：中国 NGO 在行动”的演讲，介绍了中国水污染危机的现状、中国 NGO 行动的逻辑、中国 NGO 保护水资源的活动及其行动效果等。具体来说，王名教授将中国水污染的现状概括为三点：水污染、水短缺和水抗争，他认为中国 NGO 保护水资源的逻辑是从水到人，再到政，他们参与治污和救人，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倡导行动，以期影响政府的决策。王名教授还指出，中国 NGO 主要通过九大活动参与水资源的保护活动（发布信息、现场调研、组织抗争、举办会议、救助弱者、行动教育、建构网络、政策提案以及跨域合作），并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主要体现在唤醒民众、探索行动、警示企业和施压政府。总体来看，王名认为，中国 NGO 保护水资源的行动处在艰难的起步阶段，中国水危机的局面并未因 NGO 的保护行动而缓解，但中国 NGO 已经开始行动，可以期待并相信这行动能够发展壮大，成为中国公民社会中越来越活跃的一部分。

## 3. 污染治理：从现实到未来

来自台湾的学者 WANG Yu-Cheng 先生分析了台碱安顺厂污染事件中的法律诉讼过程；来自加拿大的社工代表 Pam MANDAMIN 女士讲述了加拿大原住民及妇女面对环境污染的抗争过程；曾经参与过水俣病医治的医生代表回顾了半个世纪以来水俣病患者的救治之路，来自日本的医生代表也呼吁完善环境污染事件中对受害者的救助体系，因为在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中的受害者仍然面临着救助不足的困境。来自韩国的学者 KIM Yangho 先生在介绍韩国氟化氢气体泄漏事故的基础上，认为政府亟需完善基本的污染事件防治办法。来自泰国的学者 Surichai WUN' GAEO 先生总结了泰国和水俣的教训，提出未来应该加强对民众以及官员的教育和知识普及。最后熊本学园大学水俣学研究中心的主任花田昌宣教授发表了总结性发言。

### 13.2 “水俣教训及其对中国水污染治理的启示”研讨会（中国 清华大学）

2013年11月1日下午,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非政府管理(NGO)研究所主办,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支持的“水俣教训及其对中国水污染治理的启示”研讨会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召开。会议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非政府管理(NGO)研究所所长王名教授主持,国内及日本的专家学者共计20余人参加了会议,大家围绕着中日环境污染治理的相关问题展开了热烈的研讨,现将研讨与交流内容综述如下。

#### 1. 王名教授介绍研讨会背景

作为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资助的“社区环境治理的教训与经验研究——以日本水俣市的工业污染及其社区再生为例”的延续,此次研讨会得到了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水俣病是人类产业发展史上很大的悲剧,是发生在日本水俣的重大环境公害。而这样一种环境问题,在今天的中国仍在继续。围绕着水俣病的研究,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水俣病发生以后,有许多的学者、志愿者、NGO参与对患者的诊断、救援、治疗,以及围绕水俣的公害与企业 and 政府进行抗争。而在中国,目前也有很多学者、NGO、普通民众等也在和环境污染进行着抗争。尽管目前中日关系仍然处在低谷,但是,中日之间在环境污染治理上是有很大的合作空间的。日本曾经在环境治理上出现的问题、积累的经验,对于中国的环境治理是非常有益的。我觉得我们需要在环境治理方面向日本学习很多东西,日本也可以给中国提供很多经验、教训和可能的技术支持。中日环境治理对中日两国都是非常有益的事情。这是本次会议的宗旨。

#### 2. 王名教授讲述考察淮河卫士的情况

此次淮河考察组由清华大学 NGO 研究所王名教授、所长助理李勇博士,淮河卫士霍岱珊先生、淮河卫士霍敏浩先生、日本熊本学园大学水俣学研究中心主任花田昌宣教授以及日本独立撰稿人原田真司先生6人组成,他们对淮河沿岸的水污染情况进行了初步的考察,查看了淮河部分流域的污染情况,沿途探访了多个癌症村,了解了河水污染给周围村民带来的困境以及淮河卫士的治理救助行动带来的曙光。王名教授坦言,考察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官员对于环保的态度还没有完全转变,也深感淮河卫士保护淮河行动的可贵。此次考察的具体安排如下:

### (1) 10月29日——考察淮河卫士净水装置安装情况

考察组一行先后考察了东孙楼村、大吴庄村和马塘村，了解淮河卫士建造的生物净水装置为村庄带来的改变。东孙楼村、大吴庄村和马塘村周边河流由于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癌症、结石等生态环境疾病高发，近几年来，为了改善村民饮用水质量，淮河卫士开展了清洁饮水救助，为村民建造生物净水装置。考察团走访了相关村民，访谈了负责清洁用水装置的负责人，了解了净水装置的效果，并实地察看了净水装置的净水情况，据悉，自安装净水装置之后，村庄水质明显变好，村民身体状况得到有效改善，癌症患者显著减少。

### (2) 10月30日——考察淮河卫士开展的“一项监督、两项救助”运行情况以及“莲花模式”

30日上午考察组先在淮河卫士办公室召开座谈会，详细了解淮河卫士开展的“一项监督、两项救助”的运行情况。淮河卫士负责人霍太山先生详尽介绍了淮河卫士针对淮河水污染开展的长期的跟踪调查与监督活动，重点介绍了其对癌症高发村实施清洁饮水救助和医疗卫生救助的相关情况。接着，考察组一行赴河南省项城市考察莲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与淮河卫士共同对话创建的“莲花模式”。莲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淮河卫士驻地上游25公里，就莲花味精公司对淮河造成污染的事件，双方从最初的对立对抗最终走向对话，创建了莲花模式，最终实现了环境保护与经济的双赢局面。然后，考察组还考察了淮河沙颍河段的水质状况，见证了淮河污染经过人为治理，正在逐步恢复清澈，在此过程中，淮河卫士等公众的参与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30日下午，考察组到访媒体多次报道的癌症高发村，了解了淮河卫士开展的清洁用水救助以及医疗救助项目为其带来的改变，同时，花田教授对村委主任借鉴日本经验，在本地尝试运用日本的经验管理其创建的敬老院一事做了重点访谈。

### 3. 花田昌宣教授介绍日本水俣的历史、现状及其教训

日本熊本学园大学水俣学研究中心主任**花田昌宣教授**首先强调了公众和患者的声音和交流在水俣病研究中的重要性。在其之后的主题报告“水俣病的经验与教训”中，花田教授则重点阐述了水俣病的起因、教训及其现状。花田教授认为水俣病产生的直接原因是窒素的工厂排放了没有处理过的含汞废水，这也是基

基础性的原因；而更高层次的原因则是政府对此采取的错误的措施与政策；而本质上，水俣病产生的最根本原因则是企业、国家以及地方政府对人的尊严的不重视。接着，花田教授对水俣病的教训归纳了四点：第一，无论是排放废水的企业还是负有监督和治理责任的国家，都忽略了预防的原则；第二，事情发生之后，窒素工厂和政府不但没有及时将信息公开公布，还积极掩盖真相；第三，从水俣病发生的初期直到现在，相关的调查研究都非常不充分，即使这样，这些调查的结果还会被故意隐瞒。第四，直到现在，对患者和被害者的补偿和救济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花田教授认为，其中最需要引起注意的负面教训有两点，即永远都不要试图隐瞒任何信息以及调查记录。对于现状，花田教授坦言，国家对于水俣病患者的补偿认定标准的错误还在重复，水俣病患者的抗争远没有结束。基于这样的现状，花田教授领导的水俣学研究团队认为有必要将项目的研究领域扩展到公害病的国际比较，即基于国际视角对水俣病等公害病进行研究。该项目拟对包括加拿大、泰国以及中国等多个国家进行考察，比较研究政府对公害问题的应对措施，公众参与程度，以及研究人员开展调查工作的情况等，并将社会背景、政治背景、政策视角等引入项目的研究，以期对公害病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 4. 霍太山先生分享中国水污染治理的经验与教训

淮河卫士发起人霍岱珊先生在“淮河治污：环境利益博弈的见证”的主题演讲中认为治理污染就是一场博弈，是企业、官员以及当地村民之间的一场博弈，而淮河卫士倡导的让公众参与和合作协商的对话模式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他指出，行动带来改变。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癌症高发，给当地百姓带来的伤害是巨大的。只有积极应对、正视问题，才能最终解决问题。2001年，淮河流域第一家民间环保组织——淮河卫士创办成立，它通过公众参与——这一种行动，把种种的不可能变为一个又一个的实际改变，十几年的经验表明，要完整地实现环境保护的目标，公众参与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霍先生接着介绍了淮河卫士的三项基本措施，通过这些措施，他们实现了依靠当地人解决当地环境问题的目的。首先是对淮河水污染及其排污口进行长期的跟踪、调查和监督；其次是对水污染危害严重的区域实施清洁饮水救助；第三是对污染造成的癌症高发村实施医疗卫生救助。霍先生提出，淮河卫士引导的治理淮河的路径最关键的一点便是坚持公众参与和对话机制，以此来敦促企业的深度

治理，促进政府决策，提高环保效率，其创造的“莲花模式”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具体来说，淮河卫士从 2004 年开始对水污染危害严重的区域进行清洁饮水救助，首先为黄孟营、东孙楼两个癌症村免费安装 350 台小型净水器。同时在旅日华侨金胜哲先生的指导下开展生物净水的实验性研究并获得成功，2008 年在癌症高发的洼子庄建造“生物净水装置”，把污染村庄的浅层地下水经过这个装置进行生物净化处理，获得了净化、软化、活化的净水效果，其水质经淮河水资源保护局检测，完全达到饮用水标准。经过几年的努力，淮河卫士已经在沿河的 27 个村庄建造 28 座生物净水装置，使 18000 名村民吃到干净的水。更加令人欣慰的是，第一批建造生物净水装置的洼子庄、黄冢、夏庄、小李寨东孙楼等村庄，已经连续 5 年没有新发现癌症患者。中国政府从 2006 年开始启动“农村安全饮水工程”，以打深水井的方式向村民提供清洁饮水。现在，癌症高发的沈丘县已经有 62 万人吃到了干净的水，占需求人数的 52%。

最后，霍先生认为，通过无数向淮河卫士这样的环保 NGO 的行动，使改变相继发生，他相信淮河大有希望！

#### **5. 汪永晨女士介绍绿家园参与环境治理的模式**

北京绿家园环境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汪永晨女士在演讲中提出中国目前不仅需要大的决策转变，还需要学者、大家们与行动者真正联手，从小事做起，用小事改变决策过程。她表示，绿家园主要通过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曝光污染事件，迫使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污染治理。绿家园也会通过组织一系列活动，如江河十年行、中国江河观察行动等，将更多的组织和民众团结起来，关注家乡的河流，将获得的污染信息公示给公众，公布给决策者，以期通过小事件来推动大的改变。

#### **6. 与会者探讨中日之间环境污染治理的比较**

与会者还就中日之间环境污染治理的异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比较》执行主编肖梦女士认为在面临环境问题时，中国和日本的做法都发人深省。在中国，当民众的抗争仍处于弱势的情况下，才出现了淮河卫士那种寻求对话机制的模式，这种不寻常的做法凸显了对官员进行教育的必要性。除了对官员的教育之外，肖梦女士还提出，同时要引导各方，让媒体、NGO、企业、政府部门都应该担当起自己的角色，起到各自的作用，希望此项课题研究可以起到



引线的作用。

日本独立撰稿人田原真司先生首先认为中国和日本在环境问题上有很多共同点，比如在偏远地区的污染情况中，受害者均是弱者；在环境问题发生之后，政府的应对都比较薄弱，以及民间组织均是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等。其次，他提出，此次的水俣病研究实现了三点突破。其一是此次项目实现了学术领域的综合性研究，将公共政策、公共管理、NGO、媒体等方面的内容加入了研究，是中国公害研究的一次重大的突破；其二是此次研究不仅从成功的案例中获取经验，也从失败的案例中获取经验。通过中国等其他国家陆续开启对水俣病的研究，使得日本认识到自己对水俣病的政策是失败的历史，给了日本一个再次正视历史的机会。其三，此次研究开启了国际合作的可能性。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CDM 研发中心执行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高级研究员、全联新能源商会秘书长曾少军博士认为中日环境治理在现阶段是存在差异的，日本的环境治理是具有抗争性的，而以淮河卫士为代表的中国的治理是一种以导为顺，以顺求进的方式。但是，曾博士也提出，如果在现代化以及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中思考环保问题，那么中日环境治理也是具有共性的，因此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学习日本的社会管制以及社会运动引导的能力，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黄浩明先生就中日之间环境治理提出三点意见，首先是在环境压力越来越大的今天，中日之间应该加强民间的合作，交流环境治理的经验；其次是在环境治理过程中还应该考虑本国的国情，中国目前还没有达到法治国家的标准，无法完全像日本那样采取法治的措施，探讨出一套本土化的适合人治社会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第三，相比于政府，中国民间力量非常弱小，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凸显了从小事做起的必要性。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副教授杨丽博士指出，中国环境治理的路径可以概括成个人——组织——广泛参与，具体来说，就是从个人到家庭，到组织以及组织之间的合作，然后到社会组织与企业之间、社会组织和政府之间以及社社之间的合作，这其中就包括媒体、公众的参与以及当地民众的参与，最后走向国际合作。

在被问到如何看待中国摸索出的这一套协商式的对话机制时，花田昌宣教授

指出，在日本，政府和民众之间具有更多的交流渠道，因此，利用这些渠道开展工作是具有可行性的。但是即使这样，仍有很多问题是无法通过对话的方式解决的。日本如此，中国也是如此。因此花田教授认为，更重要的是将事实传达给民众，站在民众的角度开展工作，维护人类最基本的尊严和生命是不可逾越的红线。

会议的最后，王名教授做总结性发言时表示，在中国，面对环境事件，我们需要从小事做起，也需要博弈，必要的时候还需要来自政府的支持和策略，可以做的事情很多，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 十四. 对中国的启示与相关政策建议

### 14.1 水俣公害及其治理对中国的启示

今日中国，恰似 1950 年代的日本。日本水俣公害病的发生、处理和各方主体之间的博弈与合作，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第一，汲取水俣公害及其治理的教训。水俣病自 1956 年得到公认以来，已经历半个多世纪，而其受害者赔偿却至今尚未结束。不可思议的是水俣病发病者的人数至今尚不明确，水俣病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也无从知晓。但可以明确肯定的是：引发水俣病的原因在于窒素公司水俣工厂肆意排放的甲基汞污染了大海的鱼贝类，而人们食用这些水产后患上了水俣病；尽管病因得到确认，对化学工厂负有监督责任的国家和县政府却并没有采取任何对策；在受害者的积极行动下，加害企业窒素公司终于开始支付正当的赔偿金；国家和县政府在水俣病问题上直至 2004 年最高法院判决，才认识到自身的责任。日本向世界传递的水俣病信息多数来自政府（环境省），而只要政府本身也是致害者，受害实情及政府的过失就容易被化小。水俣病的教训很多，其中尤为重要的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必须立即采取措施消除病因；必须优先重视公共性，而不是利害关系；公开信息；消除偏见与歧视等。

第二，权衡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日本政府，民间社会，大学研究机构，媒体等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一，赞同投资环境保护不会影响经济发展的人在今天的日本竟然也属少数派。对于中国作为后工业化发展的国家，又是最大发展中国家，目前经济依然处于高速发展的时代，因此，处理好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是一个很大的难题，需要战略的思考、勇气与行动，否则我们也会重蹈日

本工业化进程中的覆辙——先污染后治理。这种代价有难以承受之重，也无法真正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协调公民社会发展与社区文化、本国文化冲突之间的矛盾。历时 11 天的调研，我们发现，日本民间组织发展，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简单，实际上公民社会的运作与日本本土文化之间的冲突明显而长期。水俣市从一个小渔村变成工业化城市，表面上，人口增多，大厦林立，市场繁荣，而工业化和现代化也带来了水俣病，工业化与现代化并没有给水俣人带来真正的幸福。然而，工业化与城镇化迅速的中国，却正在经历昨日水俣的发展。民间组织如何结合本土文化的特点谋发展，如是否以社区服务为基础，取得实践的经验，总结有效可行的办法，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等等，只有循着这种方向，民间组织的倡导与行动才可能具有说服力，达到预期效果。

第四，将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博弈与合作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日本水俣公害及其治理过程中，政府与律师的作用和地位不容忽视，一方面法律制度日趋完善，有法可依，另一方面基本依法行事，执法较严违法有究。中国正朝着法治国家努力和发展，因此，如何建立相关机制，保障多方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促进其作用发挥，尤其是保障和促进司法机构、法律人与法律职业共同体等的权益及其作用发挥。否则，环境污染及其治理仅仅留下行政化的烙印，不利于法制建设服务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第五，发挥媒体作用，促进社会公平。在日本水俣公害及其治理的五十多年中，媒体的作用十分明显。媒体的长期关注，无论文字，摄影，还是影像，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媒体常常是灾难的第一发现者，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如何发挥媒体的作用，依然有很多挑战，例如，媒体人士的人身安全保障，媒体的相对独立性以及报道的客观性、真实性和专业性等。

第六，利用国内外合作交流平台，共同分享工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水俣公害及其治理的 55 年来，国际组织，国际知名人士，国际会议等与国内 NPO、国内有识之士、国内会议一起，将水俣教训传播到世界，引发世界与日本对环境问题的更多关注，促进日本政府不断改进，从一定意义上推动了水俣公害的处理和解决。面对不少跨国企业和本土企业在中国污染环境的案例，如何与国际社会国际人士合作，预防和减少污染，促进污染处理技术的研发和引进，规范企业真

正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不仅是体制问题，也是能力问题。中国的政府、企业、民间组织、科研机构、职业工作者、媒体等多方主体均需修炼。

#### 14.2 关于创新社会管理，加强工业污染治理的建议（全国政协王名委员 2012 年提案）

处于经济增长期的中国，环境污染频发。2012 年的广西柳州镉污染、江苏镇江苯酚污染，以及 2009 年以来的湖南浏阳、陕西凤翔、山东临沂、福建上杭、云南曲靖、上海康桥等重金属污染事件，令国人震惊。据环保部统计，2009 年环保部接报的 12 起重金属、类金属污染事件，致使 4350 人血铅超标、182 人镉超标，引发 32 起群体性事件。据环保部环境规划院的《2009 年中国环境经济核算报告》，自 2004 年以来基于退化成本的环境污染代价从 5118.2 亿元提高到 9701.1 亿元，我国每年因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代价逐年持续上升。据 2012 年 1 月环保部发布的《2010 年环境统计年报》，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为 6654.2 亿元，比上年增加 47.0%，占当年 GDP 的 1.67%。环境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与投资尚可计算，但环境污染带来的健康、精神、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损失却很难推算。因此，解决工业污染，尤其是重金属污染问题必要而迫切。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 20 世纪也经历了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1945 年战败不久，日本经济开始复苏，从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进入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经济高速增长期。当时的日本企业与政府缺乏环境意识，没有采取必要的环境保护与监管措施，很快发生了各种公害灾难。1956 年，以熊本县水俣市为中心发生了甲基汞污染，被称为“水俣病公害”，成为战后日本四大公害之首，也是震惊世界的重大公害事件。水俣病是因化肥公司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并直接向大海排放含有甲基汞的工业废水，污染鱼贝类海产品，人类捕食后引发中毒性神经系统的疾病。水俣病不仅引发人体的知觉障碍、运动失调、视野缩小等症状，而且因生育导致胎儿性先天水俣病。水俣病等公害的大面积发生触发了日本在上世纪 60 年代到 70 年代轰轰烈烈的环保社会运动，大规模的抗议、诉讼、赔偿等各种活动此起彼伏，使得日本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治理公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政府和企业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公害污染更使大批患者付出了健康和生命，被污染的环境尽管花费巨额投资也难以恢复其自然生态。而围绕公害的法律诉讼和

赔偿尽管历经半个多世纪，却依然没能解决，带来难于弥合的社会创伤。

日本的经验教训表明：环境保护必须预防为主、尽早动手；环境公害的代价极为巨大，“先发展、后治理”并非良策；治理公害要靠刚性的公共政策和法律法规，一方面要对污染企业加大处罚力度，另一方面要通过公益诉讼确保受害者的基本权益；要动员广泛的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充分发挥社会力量齐抓共治，打一场全社会保护环境、治理公害的人民战争。

针对近年国内发生的多起重金属污染事件，相关政府部门和环保社会组织正在开展调查并采取积极措施。2008年初，环保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历时两年多的我国第一次污染源普查，于2010年2月发布了普查公报，初步摸清了部分行业包括重金属污染在内的排放情况。著名环保社会组织公众环境中心建立了第三方全国污染数据库，与多家社会组织共同发起绿色选择倡议，开展了对IT行业重金属污染的联合调查并发布了调研报告。相关部门制订了污染防治政策与措施，如在环保部编制的《重点流域、近岸海域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中，将重金属污染排放的整治列为重点工作。然而，从近期发生的典型事件中可知，工业污染的治理错综复杂，必须综合施策。在一些重金属污染事件中，环保部门的监测数据明明表明污染企业是达标排放的，但结果还是发生了严重的污染。例如在2010年先后发生的四川隆昌和陕西凤翔血铅超标事件中，企业都是达标排放的。重金属污染具有隐蔽而持久的特点，不像大多数有机污染物可分解，特别是对周围土壤环境的污染是累积型的，一旦超过土壤环境容量，就会通过食物链或含重金属灰尘经消化系统摄入体内而危害人类健康。因此，并不是污染企业达标排放就对环境没有影响。且环境一旦受到重金属污染，治理难度很大。

面对我国日益频繁与严重的环境污染，尤其是重金属污染，应尽早采取综合的应对之策，加强预防，及早施策，及时治理，并动员社会力量，通过推动社会管理创新，真正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环境保护社会管理创新格局。

为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加强宣传教育，从正反两个方面提高认识，形成全社会对于环境破坏与公害的危机意识，增强环境保护的自觉性。环境污染，尤其是工业污染的公害

一旦形成，往往触目惊心、万劫不复，国内外有很多这方面的反面教材，应加强对其这些典型事例的宣传介绍和教育解说，提高人们对环境污染，特别是工业污染的持久性、危害性、严重性、灾难性的认识，这是治理工业污染的关键。

第二，进一步完善与环境保护、污染治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法律的刚性约束和惩罚力度，切实保障污染受害者的权益。近年来我国陆续颁布了多项重要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环保部门也出台了许多政策措施，这些法律政策对于环境治理正在发挥积极作用。应在现有基础上借鉴国外的经验，进一步细化法律约束的内容和边界，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增强不同法律法规之间的协调对接，进一步明确污染赔偿责任，加大赔偿力度，切实保障污染受害者的权益。

第三，引入责任追究与公众监督机制，建立多方参与的环境信息公开与监管体系。在美国和我国的台湾地区，为督促环境保护行政当局有效履行职责设有“环境公民诉讼制度”，公民对于环境保护行政当局在提供信息、执法监督等履责过程中的行为不满并认为已造成损失的，可通过行政诉讼进行责任追究。建议在研究借鉴国外相关制度的基础上，探索形成中国特色的对于环境保护的公民责任追究机制，切实加强对于环境保护、污染公害的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

第四，建立对污染受害者的救济赔偿、健康诊疗及公害社区的环境修复机制。工业污染一旦发生，无论是对受害者还是公害所污染的社区，都会带来巨大的伤害，亟需政府尽快采取有效措施，在制止污染的同时及时采取各种救助、赔偿和环境修复措施。从日本和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看，一旦发生污染，必须尽快启动应急机制，隐瞒、掩饰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只能使公害越来越严重；要尽快阻断污染排放源，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要及时进行必要的健康诊疗，以受害者生命健康为中心而不是以企业或政府为中心设计并实施救济赔偿方案；要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推动污染环境的修复与社区再生，包括居民搬迁、种植结构调整、换土、加强超富集植物筛选等。对企业实行关停并转是我国各级政府常采用的最后惩罚措施，从日本的经验看这并非上策，在不对企业进行最终关停并转的条件下，让企业在经营运作的同时有计划并合法合规地实现赔偿，也不失为建设性解决污染治理问题的一种方式。

第五，发挥媒体、社会组织的作用，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环境治理与受害者救助。国外实践表明，媒体在污染追踪和报道、事件真相曝光、信息传播及政策倡

导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在网络、视频、微博等新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发挥媒体和新媒体的优势，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信息传播成本，减少因误传误信带来的社会不安，及早针对污染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各类活跃在环境保护领域的社会组织，是环境治理与受害者救助的中坚力量，要在改革创新实践中改革创新和不断完善社会组织的政策环境，为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创造有利条件。

### 14.3 关于呼吁停止怒江水电开发，建立生态系统示范区的建议（全国政协王名委员 2014 年提案）

关于怒江水电开发的争议由来已久，上届政府在温家宝总理的干预下搁置了怒江水电开发。但目前怒江水电开发前期工作又重新启动。本提案根据相关专家的实地调研和研究论证，呼吁立即停止怒江水电开发，转而在云南怒江建立中国完整生态系统示范区（以下简称“怒江示范区”），加强流域内独特生态系统和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同时改变怒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滞后的局面，使怒江成为一个生态资源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内地与少数民族地区同步发展的先行区和示范区。

#### 一、怒江建坝易诱发地震和地质灾害

云南“三江并流”区是新生代第三纪中新世至上新世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时形成的地层，怒江峡谷所处的地质构造为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挤压及俯冲而形成的板块缝合带伴生的褶皱带，大断裂带之上，是“三江并流”纵向岭谷区著名的“怒江大断裂”的中心地带，所处地层变质岩带内断裂极为发育，动力变质和挤压十分强烈。地层活动十分活跃，是亚洲著名的地震高发区。一旦建坝后水位上升，地层水压加大，使原本动力变质和挤压就十分强烈的断裂带又增加巨大的额外水动压力，其后果可诱发这一地区的地震。近年四川地震频发，极有可能与当地的大型水库有关。

同时怒江峡谷不同于河谷，其两岸山体十分陡峻，平均坡度大于 45 度，是世界峡谷中切割最深，“V”型谷发育最典型的峡谷之一，同时还发育有“障

谷”、“隘型谷”等多种峡谷形态，是峡谷景观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梯级水坝的建设将不仅彻底破坏怒江峡谷多样性景观，而且水位的上升，河谷与山体之间过渡带的消失，水体对山体陡坡压力将骤增，是诱发峡谷两侧山滑坡的主要因素。怒江流域温差大、降水量高、土层瘠薄，两岸山体地层岩石的物理风化强烈，沿谷地两岸布满了众多的滑坡体，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山体滑坡。1972年原怒江州府所在地的碧江县就位于怒江东岸怒山山脉两坡的巨大滑坡体上，由于滑坡频发，不得不搬迁州政府至现在的六库镇，原碧江县也因此而撤消。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因地质灾害而搬迁州府并撤消县级设置的唯一事例。原怒江州府变为怒山滑坡体上的“都”。可见地质灾害对怒江流域的影响是巨大的。

## 二. 怒江梯级水坝将对怒江生物多样性造成严重危害

怒江水电开发最大最直接的影响是对生物多样性的全面破坏。

首先，从景观层次上，在世界著名的汹涌澎湃、纵贯南北、奔腾而下的怒江峡谷上建起数座大型水坝，进而蓄水成一连串人工水库，将彻底改变怒江峡谷的自然生态景观，是对“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奇特的景观多样性的根本性破坏。在组成“三江并流”中下切最深、“U”型谷发育最典型、坡降和年径流量最大、最为壮观、最神秘的峡谷还没有被充分认识之前就将不复存在。同时，构成景观三大要素中最重要“廊道”，即河谷形成的“生物走廊带”或“南北生物相互渗透的通道”，也将随大坝建设将被彻底阻断。

其二，大坝建设对怒江峡谷生物地理景观的根本改变，带来的是对怒江江河生态系统不可逆转的破坏。蓄水位沿江上升，急流水变缓流水或静水，河床两侧的河漫滩、阶地及台地生态系统将沉入水底，河谷与山地之间的过渡带将完全消失，支流也将改变或消失，整个河谷生态系统多样性将遭受到最严重的破坏，必然会导致区域性生态系统环境的不稳定或劣变。生物地理上最著名的“南北生物的走廊”将被分割，从南到北的水汽通道将被阻隔，不少起源于第四纪以前的动植物最后的栖息地将消失。在434个高黎贡山特有植物物种中，一些珍稀物种将消失。



其三，怒江峡谷建坝将造成栖息于怒江流域的水生生物物种及其种群的消亡。怒江繁衍生息着无数的水生生物，仅云南境内的鱼类约 50 余种，并有近 20 个怒江特有种。2001 年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与美国加州科学院鱼类联合考察组在怒江中上游捕到了世界上最大的鳗鱼——云南鳗鲡，是印度洋怒江水系典型的大型洄游性鱼类，洄游距离超过了 1,500km。沿江干流及支流水溪栖息着大量的两栖类、爬行类和水栖兽类（如水獭等），这些水生和两栖动物在与峡谷江河的演变过程中，形成了彼此相互作用、协同进化的紧密关系，它们储存着喜马拉雅隆起、第四纪造山运动以来整个东喜马拉雅地区地质历史演变和自然地理环境发生变化的所有信息和证据。怒江干流多级大坝的建成将使整个怒江流域的水环境发生根本改变，印度洋与青藏高原之间的水系网络将被彻底切断，急流型和底栖型的水生生物将失去生存环境，印度洋的洄游性鱼类也将无法再进入怒江峡谷。环境和栖息地的改变必然导致大部分怒江原生水生物种的消亡。

### 三. 怒江建坝将对怒江峡谷民族多元性产生重大冲击

怒江峡谷地处边远，地势封闭，交通不便。峡谷从南到北、从谷底到山峰环境变化多样。地理隔离和自然环境的多样孕育了峡谷内部从谷地到大山丰富和多元的民族传统文化。在怒江峡谷居住着景颇族、栗粟族、怒族、独龙族和普米族等多种原住少数民族，他们依山伴水，与峡谷相互依存、生息相关、协同发展，形成了多民族、多文化、多种经济结构并存的格局，是怒江峡谷特有的“自然——文化景观”和丰富的多元生物文化。梯级大坝建设将迫使世居峡谷的多民族原住居民迁出谷地，他们失去的不仅是家园，还有在其生存环境中创造和发展出的多元峡谷文化。文化多元性的丧失与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常常相伴发生，而后果也同样严重和不可逆转。怒江是世界“生物——文化”多元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是“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怒江峡谷的宝贵财富，其多样的物种和多元的民族文 化都不应该因为建设大坝而在地球上永远消失。

### 四. 怒江建坝对旅游发展的不利影响

怒江是一条纵贯南北、落差巨大、水流湍急、两岸景色奇异、变化多样的河流。峡谷形态多样，以典型的“V”型谷为主，同时还有嶂谷、隘型谷等大型峡谷，是世界峡谷形态种类最多的峡谷之一，而且两岸山体千姿百态，大理岩、

白云岩广泛出露，大小瀑布、溪流以及从谷地到山峰植被垂直带景观发育完整，景观相变化十分明显。生态系统多样性、生物地理区系的复杂性，植被类型和物种的丰富性使得这里自 18 世纪以来就是中外探险、科考、标本采集者神往之地，如今则是生态旅游发展中最具潜力、最具前景的理想地之一，尤其是漂流和峡谷探险是怒江目前切实可见、潜力巨大的生态旅游资源，然而一旦建坝，这些旅游资源都将彻底消失。

## 五. 怒江建坝将对中国国际形象产生严重负面影响

怒江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怒江水坝的选址就在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区的范围内。生态系统的山水一体性使得水体的变化将对植被、水生生物、景观和文化产生直接冲击，怒江建坝不可避免地会破坏世界自然遗产及其生态系统。一旦怒江建坝成为事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认为中国对保护世界自然遗产缺乏诚意，有可能据此取消“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的称号，这将对我国的国际形象产生负面影响。另外，怒江水坝将对下游缅甸的农业和渔业产生不利影响，如果不顾邻国的反对，一味强调自己的利益，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将难以建立。

鉴于以上五方面的理由，我们认为：怒江流域不适合水电开发，应立即停止怒江水电开发。

## 六. 关于建立完整生态系统“怒江示范区”的设想与建议

停止怒江水电开发的同时，可研究探讨在怒江地区建立中国完整生态系统示范区，加强流域内独特生态系统和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同时改变怒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长期落后的局面，使怒江成为一个资源保护与经济发展协调、内地与少数民族地区同步发展的先行区和示范区。

由于怒江是目前仅存的两条没有被水电大坝截断的河流，其生态系统相对完整，文化多元性未遭到破坏。但怒江地区地理封闭、交通不便，与外界的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受到很大限制，当前怒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滞后，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十分突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人地矛盾突出，有限的耕地承载过量的人口，全州耕地仅占土地总面积的 12.5%，林地则占到 62.7%，但农业产值达

63.9%, 林业产值仅占 8.1%; 二是保护和发展的矛盾突出, 全州 58.3% 的区域面积纳入了国家的自然保护区范围, 因未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保护义务远超当地承受能力, 因此环境生态保护压力大; 三是旅游资源多样, 但开发程度偏低, 怒江州普查的 400 个景点景观中, 未开发的景点多达 320 个, 开发利用率仅为 20%; 四是教育、科技发展滞后, 科技推广应用迟缓, 据人口普查资料, 怒江州 12 岁以上的文盲和半文盲占同一年龄段人口的 46.3%, 流域科技推广力量薄弱, 部分地区生产经营方式粗放, 良种良法和一些与之配套的实用耕作技术难以推广。

鉴于怒江流域生态系统的重要性、地域和文化的独特性, 以及目前怒江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建立“怒江示范区”有多重意义: 一是有助于解决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与生态环境的保护治理的矛盾, 有效保护怒江流域完整的生态系统, 同时加强流域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大幅度提升当地社会生产发展水平, 使当地居民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 二是有助于为国内类似流域的发展和保护起示范作用。在“怒江示范区”流域内将进行生态恢复, 选择合适的发展产业, 实行国家生态补偿政策, 提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怒江流域取得的经验能够为类似地区提供借鉴和示范, 通过国家生态补偿体系, 帮助和促进这些地区的保护与发展; 三是有助于彰显中国政府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决心和行动, 同时对改善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提升怒江地区的国际知名度有很大的帮助。

关于建立“怒江示范区”的主要工作, 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 编制怒江流域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整体规划。**首先需要全面了解怒江生物资源特征和经济发展状况的情况下, 制定怒江流域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整体规划。确定生态系统和文化多元性保护的重点, 提出流域发展与保护的总体战略、流域产业结构构建、发展优先顺序和资金投入机制等, 提出近期、中期和长期目标, 以及具体项目和活动。规划形成后, 将报国家发改委和云南省政府批准并实施。

**第二, 项目实施。**整体规划得到批准后, 将开始实施规划中的项目和活动。可能的项目和活动包括: 在国家生态补偿的支持下, 加大退耕还林还草的规模, 实现生态经济系统良性循环; 开发旅游资源, 建立配套系统, 发展旅游产业; 加

大生物资源的开发力度，培养新型生态产业；引进高素质的科技和商务人员，同时对当地居民进行技术培训等。

**第三，总结经验并推广。**在示范区取得初步成果后，及时总结和宣传，并将经验推广到国内类似地区。“怒江示范区”的建立将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五年的主要工作包括制定整体发展规划，实施近期发展项目，阶段性总结和经验的推广，后五年将实施规划中的中期项目。“怒江示范区”建成后，怒江地区将成为生态系统完整和独特、区域经济发展、民族和睦团结的样板，同时该地区国际知名度将大大增加，怒江将成为国际生态旅游的热点、美丽中国的明珠。

总之，怒江峡谷是地球精心呵护的一个宝藏，历经数次沧海桑田的变化，大陆漂移，板块碰撞和无数次造山运动以及火山冰川，仿佛都是为了造就这里神奇的自然景观——四组山脉夹着三条大江，群山高耸，峡谷深切，在地球表面塑造了横断山脉最深峡谷的主体——“三江并流”。“三江并流”是中华自然文化的瑰宝，是地球上最美的自然公园。“三江并流”保留着许多地球漫长变化的重要信息，是“美丽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没有权利也没有理由让她消失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但通过在怒江地区建立中国完整生态系统示范区，加强流域内独特生态系统和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同时改变怒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滞后的局面，将会使怒江成为一个资源保护与经济发展协调、内地与少数民族地区同步发展的先行区和示范区，也是我们为后代所留下的一个完整、可持续发展的美丽怒江。

## 结语

日本水俣汞污染事件，是发达国家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二战以来“先污染后治理”模式的一个缩影。水俣的教训和经验，为世界和中国的绿色发展与环境治理提供了前车之鉴。整个事件中，致害企业窒素公司因水俣招商引资而入驻，它使水俣从小渔村变成工业化城市的同时，也带来令人心悸的汞污染，带来至今依然无法根治的水俣病。水俣汞污染治理，经历了查究原因、确定企业责任、认定赔偿、确定国家责任等四个阶段。致害企业、政府、受害居民以及社会第三方个人或组织，构成污染治理过程中的多元主体。其中，鉴于地缘、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水俣病患者与渔民的行为经历了“沉默-爆发-平和”的过程；水俣居民部分支持患者与渔民的行动，部分坚信“窒素与水俣共命运”而歧视水俣病患者，到自己也成了水俣病患者，才以令人心酸的“对不起”表达歉意；致害者窒素公司水俣工厂的行为则沿着“制造污染-隐瞒真相、收买科学家、推卸责任、游说政府-分化患者与居民-承担责任-反省、传播教训”的路线演进；日本中央政府与熊本县政府的行为路线为“查究水俣病病因-隐瞒与阻挠

病因查明-公布病因-调停、协调-制定实施法律与政策-金融援助-应诉、法律责任被确定”；第三方涉及媒体、NPO、职业工作者、公众等，有的支持患者，有的歧视患者或“中立”或随真相公布与了解患者而转为支持患者。但现实是，历经 50 多年的涅槃，遭到破坏的环境终究无法恢复原状，水俣汞污染带来的灾难远未结束。

环境污染治理，旨在保持或修复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涉及战略、主体、路径以及负遗产转化等内容，是法律框架下政府、企业、社会的合作共治过程。环境污染治理，在战略上，要以预防为主，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陷阱；在主体上，需要共治前提下政府、企业、社会的责任担当；在损害救济上，需要法律框架下的路径选择；在负遗产转化上，需要进行多学科的探讨和反思。水俣汞污染治理，是一座“负面遗产金矿”，从不同的角度挖掘，有不同的收获。正如原田医生所言：水俣病是一面镜子，不同的人看这面镜子，可以看到不同的东西，或深刻或浅薄，或平面简单或立体综合；从社会结构、政治体制、企业责任，到社会生活方式等问题，都可以通过这面镜子如实清晰地映照出来，有时非常残酷，有时又闪耀希望的曙光。探讨水俣汞污染治理的教训和经验，对世界和中国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遗憾的是，因为时间、资金等条件的限制，不曾走入松花江流域的扶余县等进行实证调研。而且，因不懂日文，只能使用二次甚至三次文献资料，即使是现场调研，也经过了口译人员的传递，这造成了资料的阅读与使用比较有限，而且也可能存在不准确之处。这是本文的局限。希望不久的将来，能尽快寻找与创造条件，去扶余肇源等县寻找幸存患者及其家属、已逝患者及其家属、患者支持组织、各级政府官员、参与水俣病诊疗的医生、关注松花江汞污染的学者等，对他们进行调研，进行中国水俣病历史的抢救性挖掘，反思我国关于污染治理的理念、政策与制度。也许，只有这样，才是对水俣病患者最大的尊重，才是对 2012 年 6 月 11 日去世的原田正纯医生——终生投身水俣病，始终与患者站在一起，碰到医学难题回到患者中间，身患白血病、身体虚弱、眼睛已经有些看不清，却在我们抵达水俣的第二天专程从熊本到水俣为我们做报告，然后整整一个下午陪同我们访问莹之家……的这位水俣病医学巨擘与水俣学创始人最好的追思。

## 主要参考文献

### ● 访谈

1. 原田正纯，2011年11月21日。
2. 藤野纠，2011年11月21日。
3. 谷洋一、坂本忍、佐藤夫人等，2011年11月21日。
4. 田畑纯一，2011年11月22日。
5. 高峰武，2011年11月23日。
6. 花田昌宣，2011年11月23日。
7. 宫北隆志，2011年11月23日。
8. 大衡一郎，2011年11月24日。
9. 加藤夕子，2011年11月24日。
10. 吉永利夫，2011年11月24日。
11. 弘津敏男，2011年11月24日。
12. 蒲岛郁夫，2011年11月25日。
13. 盐田武史，2011年11月25日。

14. 相川泰、广濑稔也，2011年11月28日。
15. 铃木尧博、尾崎俊一，2011年11月28日。
16. 寺西俊一，2011年11月28日。
17. 实川悠太，2011年11月29日。
18. 小林光，2011年11月29日。
19. 淡路刚久，2011年11月29日。

● 著作

1. Timothy S.George (2001).Minamata Pollution and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Postwar Japa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 [日]水俣病历史考证馆：图解水俣病，财团法人水俣病中心，2010年。
3. [日]东岛大：为什么水俣病无法解决，弘书房，2010年。
4. [日]后藤孝典：沉默与爆发，集英社，1995年。
5. [日]环境省：水俣病的教训与日本的汞对策，2010年。
6. [日]吉本哲郎：地元学，岩波书店，2008年。
7. [日]栗原彬：证言 水俣病，岩波书店，2000年。
8. [日]桥本道夫著（冯叶译）：《日本环保行政亲历记》，中信出版社，2007年。
9. [日]色川大吉：水俣的启示（上、下），筑摩书房，1983年。
10. [日]水俣市：水俣病 历史与教训，2007年。
11. [日]水俣市“水俣病对我来说”编辑委员会：水俣市民要如何面对水俣病，苇书房，2000年。
12. [日]熊本学园大学水俣学研究中心：水俣病手册（入门手册）——走在水俣、学习水俣，熊本日日新闻社，2006年。
13. [日]盐田武史：镜头下可爱的水俣，岩波书店，2008年。
14. [日]原田正纯：富裕与弃民们——水俣学的起源，岩波书店，2007年。
15. [日]原田正纯：水俣病，岩波书店，1972年。
16. [日]原田正纯：水俣病没有结束，岩波书店，1985年。
17. [日]原田正纯：水俣学手册 2：从“负遗产”中学习，熊本日日新闻社，2006年。

● 论文

1. 岩田和雄：神经研究进步，1974年第18期，第920页。
2. 潘云舟、姜熙罗、王书海：中国松花江畔甲基汞中毒问题，什么刊物，第24-32页。



3. 张心余: 松花江汞与甲基汞的污染变迁, 黑龙江水利科技, 2004 年第 2 期, 第 102、05 页。
4. 瞿平阳: 中国松花江甲基汞的生态污染防治二十年, 北方环境, 第 29 卷第 2 期, 2004 年 4 月。
5. 丛选功; 丛者禹: 新泻水俣病案件的判决, 环境科学动态, 1994-12-30。
6. 程鹏立: 日本水俣病的社会学研究,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年第 10 卷第 4 期。
7. 李成剑: 汞污染危害分析与防范措施探讨, 长江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0 年 6 月第 7 卷第 2 期。
8. 梁玉: 金属汞的污染危害与处理, 科技向导, 2010 年第 30 期。
9. 刘北辰: 从水俣病谈汞中毒的防治, 劳动保护, 2006 年第 5 期。
10. 全面建立汞污染防治体系, 中国环境报, 2011 年 1 月 11 日。
11. 全惟幸: 从日本的经验看中国工业污染治理的投资, 上海经济研究, 2008 年第 12 期。
12. 日本律师协会主编、王灿发监修、皇甫景山翻译: 日本环境诉讼典型案例与评析, 72 页,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13. 宋德玲: 日本水俣病事件的历史反思——以熊本水俣病事件为中心,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 2001 年第 20 卷第 1 期。
14. 汪永晨: 水俣纪行, 比较, 2012 年第 1 期。
15. 杨定清: 环境重金属污染及其应对措施, 四川农业科技, 2011 年第 6 期。
16. 于建国: 我国汞污染防治现状和发展趋势, 化学工业, 2010 年第 28 卷第 2-3 期。
17. 张明星: 污染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内蒙古环境科学, 2009 年 8 月第 21 卷第 4 期。
18. 张延: 日本水俣病和水俣湾的环境恢复与保护, 调查研究, 2006 年第 5 期。
19. 李静, 叶琳, 高婷, 胡梦林, 金明华, 李娟. 松花江汞污染综合治理后环境现状调查, 中国公共卫生. 2005 年第 12 期。

## 附件 1 本项目主要研究成果清单

1. **译著**：翻译共 154 余万字的相关资料，由中信出版社正式出版译著 2 本，内部出版 1 本。

[美]蒂莫西·乔治 (Timothy S. George) 著，清华公管学院水俣课题组译：《水俣病 污染与战后日本的民主斗争》，中信出版社，2013 年 6 月。

[日]原田正纯著，清华大学公管学院水俣课题组编译，《水俣病没有结束》，2013 年 7 月。

2. **论文**：3 篇。

汪永晨：水俣纪行，《比较》杂志 2012 年第 1 期（总第 58 期），CIDEG 专栏，第 75-139 页。

黄浩明：环境公害处理机制之研究——日本水俣病事件之观察，《学会》，2012 年第 5 期（总第 282 期），第 3-7 页。

曾少军等：中国汞污染治理的现状与策略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 23 卷，第 5 期，第 296-300 页。

3. **媒体文章**：3 篇。

清华大学调查团到水俣视察（《熊本日日新闻》），2011。

专访清华大学调查团团长王名（《熊本日日新闻》，2011。

少数人的牺牲能带来大多数人的幸福吗？（《新京报》，2011。

**4. 政协提案：**2 项。

关于创新社会管理，加强工业污染治理的建议（全国政协王名委员 2012 年提案）

关于呼吁停止怒江水电开发，建立生态系统示范区的建议（全国政协王名委员 2014 年提案）

**5. 视频短片：**1 项。

《水祸警示》（约 5.5 分钟）



映像を見ながら原田正純医師(右)の説明に耳を傾ける中国・清華大の調査団メンバー＝水俣市

# ミナマタの教訓 中国に

## 清華大調査団が水俣視察

水俣病の教訓を自国の公害対策に生かそうと中国・清華大の調査団が来日、21日から水俣市で本格的な調査を始めた。この日は、水俣病患者を長年診察している医師や患者らに話を聞いた。

調査団は、清華大の王名教授（公共管理）を団長とする11人。30日までの滞在期間中、患者や研究者のほか、原因企業チソンや環境省も訪ねる。

調査団は水俣市立水俣病資料館を見学した後、熊本学園大水俣学現地研究センターで熊本市の原田正純医師と面会。原田医師は、政府が条約名を「水俣条約」とすることを提案している国際的な水銀規制条約について「政府はまず、自分たちが犯してきた過ちをほっきりさせるべきだ」と述べ、「日本が何を失敗したのかを学びとってほしい」と呼びかけた。患者らの共同作業所だ。

「水俣ほたるの家」では、家族4人が患者認定されている水俣市の坂本フジエさん(86)が「患者が生きている限り、水俣病事件は終わらない」と訴えた。原田医師らとの面会を通じ、調査団からは「50年前に日本で起きたことが今、中国で起きている」という声も相次いだ。（石貫謙也）

**水俣病の教訓、中国に役立てようと来日**



○王名氏 1960年、新疆ウイグル自治区ウルムチ市生まれ。名古屋大大学院国際開発研究科博士課程修了。国政への政策助言機関・全国政治協商会議委員も務める。北京在住。

清華大調査団・団長

## 王名さん

地方では、複数の工場の排水が同じ川に流れ込み、地下水まで汚染された。因果関係の解明は難しい。後で対応すればいい」だが、近くには「がんの村」と呼ばれる村もある。北京も、自動車の排ガスによる大気汚染や生活排水による水質汚染などがある。

「水俣病は命や健康、地域の絆などから取り返しがつかないことを痛感した」

「行政も原因企業も努力しているのは分かるが、しよせん企業側の償い。被害者は水俣病によって人生を大きく左右されておられ、金銭だけでは、すべてを償いきれないはずだと感じた」

「水俣病の失敗は初代つたと考へるようになったか」

「日本で学んだ水俣病の教訓を踏まえ、当面は政策提言や本の出版をしていって、熊本の復興も引き、清華大主催のフォーラムも開くつもりだ」

命、絆…破壊されたら取り返しつかない

「中国では「公害は経済発展のために仕方ない」後で対応すればいい」だが今回の来日で、人の命や健康、地域の絆などが、いったん破壊されたら取り返しがつかないことを痛感した」

「行政も原因企業も努力しているのは分かるとも、しよせん企業側の償い。被害者は水俣病によって人生を大きく左右されておられ、金銭だけでは、すべてを償いきれないはずだと感じた」

「水俣病の失敗は初代つたと考へるようになったか」

「日本で学んだ水俣病の教訓を踏まえ、当面は政策提言や本の出版をしていって、熊本の復興も引き、清華大主催のフォーラムも開くつもりだ」



## 附件4 感恩水俣——全体调查团员的感悟和思考

### 1. 走近那些水俣的勇士（肖梦）

关注日本的水俣，起初只是源于土本典昭的纪录片，我喜欢电影，更是纪录片迷，小川绅介和土本典昭是我崇拜的偶像：战斗的勇士和不屈的纪录。

2004年，丰田公司希望增进对中国的公益事业，成立一个研究中心是考虑的选项之一。著名的经济学家青木昌彦和吴敬琏教授，以及时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的陈清泰几度商议（我也是当时的参与者之一），设计了好几个研究

中心的名称：中国政府治理研究中心，中国制度转轨研究中心，中国产业政策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环境保护研究中心等等，丰田公司秉着一贯的谨慎态度，选择了范围最窄的“中国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的名称，这与公司提出“环境、经济发展和人”三者交融的理念契合。由此 2005 年 CIDEG 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成立。次年 CIDEG 学术年会的主题就是环保，学术委员神户大学法学教授季卫东给出的演讲题目即《日本公害与治理》，水俣病、四日市病等都在论文所及范围内。第一次，我们可以在 GOOGLE 上查阅，什么是水俣病！从当时的查阅中，尤金史密斯的《出浴的智子》跃然眼前，扭曲的身体，黑暗的光线，令人震撼动容。接着是土本典昭的《水俣病：患者的世界》等影片的资料，以及水俣成为将负资产变为环境旅游修学的介绍，也看到中国不少单位到日本进行访问，带回来拍摄的影片片段和文章。但这些都无法令人满意，水俣依然是隔绝的，对中国没有什么影响。

2007 年，正值中国的太湖水华污染铺天盖地，松花江流域被吉林化工厂污染，每一事件的处理，除了当时胡舒立领导的《财经》杂志，鲜有深入的报道，后续的追踪和治理更是遁入无形。我觉得为中国这个正处于快速工业化的国家，从经济学比较分析的视野，能做些什么呢？我们把世界银行的报告翻译出版，摘要部分请《财经》杂志发表，但依然没有什么影响力。于是我从土本典昭的电影萌想：做一部关于中国人视角看水俣病的纪录片，采访土本典昭、桥本道夫和水俣病患者和场景，这一定具有借鉴意义。丰田公司的海外涉外部的岛村小姐有心，她为我买了土本的纪录片英文版 DVD。看片和看资讯完全两个概念，水俣和水俣病患者们的影像深深刻在我的心中。然而，我的想法并没有实现，2008 年，我没能到日本去，而土本典昭在 6 月因肺癌去世，他的死让我悲痛了好长时间，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他的亲人，却被档在厚厚的泥土之下，再无可能相见，“不知火海”也许永远只是脑海中他拍摄下的画面。

2008 年三鹿奶粉事件爆发，几万婴幼儿得了肾结石，这是一起极为明显的公害事件，综观国内的报章媒体，多有说不到点儿上之处。公害事件有受害者、施害者，有政府行政作为，有法律诉讼，有媒体揭露，有医疗认定，这些在三鹿事件中似乎都是缺失的。CIDEG 文库出版了好多本环境治理的书，有关知识不断积累着。而前日本环境官员桥本道夫的《环保行政亲历记》让我第一次了解到公

害认定制度中存在那么多难点和伤害，也深刻体会了行政部门之间博弈的激烈。2009年在东京一个小酒店偶然看到电视上黑白访谈节目，讲述的是日文中取消了若干汉字，其中包括“怨”，记者采访水俣患者，患者当年游行打出的竖着的幡就是黑底白字的“怨”。当然，我完全凭自己认得的汉字猜测，也许不准确。于是，我回过头想要继续从日本水俣病公害中找出一些可供比较借鉴的东西，查阅更多关于水俣的内容，但是此时，GOOGLE已经多数内容都无法搜索到了。

2010年9月，我到东京参加丰田高层沙龙会议期间，与原《日经商务》记者田原真司和渡边真理子夫妇见面，期间谈到为什么我觉得水俣病对中国那么重要的话题。在我的想法中，中国的“发展是硬道理”是针对“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来的，当时的时空背景下是没有错的。十年文革，一直在搞运动，周恩来总理提出“抓革命促生产”都会被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的年代，必须埋葬。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一切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中国才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幕，并且国家开始走向快速发展的正道。而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非常类似日本半个世纪前，战败的日本百废待兴，人民饥寒交迫，高速发展经济是不二法门。正是这个时候发生了好几起集中的著名的公害事件。中国比起日本，有更大的危险，媒体相对不自由，法律界相对不自由，政府行政部门相对不受约束，公民社会尚未形成。可是因环境污染、失去家园等群体冲突却愈演愈烈，这些社会问题都需要有恰当的方式去解决。日本的经验总是可以使我们开启智慧之窗，比较借镜的吧。于是我们约定，在11月，我到九州的水俣等地方旅游，他这位鹿儿岛人会到九州接我，我们共同考察一下熊本和水俣，亲身体会水俣病，感受我的偶像土本典昭当年的激情。此后，竟然因为中日撞船事件，旅行团取消了九州行。但是田原先生没有放弃被我感染的水俣情，他传来了他的后辈在2007年写的50年水俣重生的文章，让我进一步了解水俣。这时，三鹿奶粉中的赵连海案发生了，我当时的心情用悲痛来形容一点不为过，但是田原先生告诉我，要抱有希望，因为“这让我想起水俣病历史上的川本辉夫案，他曾经是水俣病患者团体的领导人，本人也是个水俣病人。1972年他因在东京的公害企业（新日本窒素）总部门前抗议活动时，与公司员工发生冲突，警方以伤害罪嫌疑向法院起诉了川本。1975年东京地方法院宣判川本有罪。川本立即上诉。1977年东京高等法院宣布了一项突破性判决“驳回公诉”，意思就是警方起诉川本的行为是错的，这是日本官司

历史上的第一例“驳回公诉”，判决书也明确承认了水俣病问题上的政府责任，这也是第一例。”这更增强了我要做水俣课题的想法。

2010年底 CIDEG 联席会上，我提出我们已经出版了《环保行政亲历记》和若干环境和日本公害问题的文章，在中国，也有不少关于水俣病考察的文章和视频，可是始终有些隔靴搔痒，怎么才能针对中国——这个崛起中的发展大国——它是否会牺牲社会公平——它能否自觉地保护环境——一旦污染发生，又应该运用什么办法治理环境，避免公害引发的冲突？这是眼下最重要的课题，CIDEG 能不能做？

清华公管学院 NGO 研究所的王名教授接受了挑战，他同意牵头组成“社区环境治理的教训与经验研究——以日本水俣市的工业污染及其社区再生为例”课题。跨学科的课题组成立，第一步选择相关资料，田原真司担当选材采购邮寄的工作；第二步翻译了百多万字的文献资料；第三步召开课题会议，讨论访问日本水俣之行每位课题成员的工作和角色。因 311 地震海啸从 4 月推迟到 11 月访问日本，时间充裕，功课做足，田原真司豪情万丈地去联络与水俣病相关的人，为课题访问日程绞尽脑汁，确实做到最优。用他的话来说：用了五个频道联系到了应该访问到的人。11 月 20 日，我们终于踏上了水俣旅程。

水俣病不是狭义上的公害问题，我们访问的与水俣病相关的经济学家、法学家、律师、社会学家、医生、NGO 和 NPO、政府官员、媒体记者、摄影家等等，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的角色，他们从青年时代投入对弱者的支持，对强者的反抗，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水俣，追求的是社会公正和正义、进步和民主的理想。现在，他们还在不懈努力地为了把水俣病的教训传播给这个世界更多的地方、更多的人而奋斗着。因此，水俣之行令我非常感动，即便做了再多功课也没有想到自己足够幸运，会在世界这么一个独特的角落，一气儿见到近十位当年参与水俣病运动的勇士们。虽然我再也无法见到土本典昭本身，但是，终于在这个世界上，我见到了一群曾经和他一起并肩战斗过的、为了理想迄今仍在战斗的勇士。

十天的访问，从没有耽搁，汪永晨从之一写到了之九，纪录每天的行程和访谈内容，我在此基础上做了编辑修订。比起那些以水俣为调查研究的日本前辈，我们只能算是匆匆过客；十天的访问日程极为密集，却依然感觉是浮光掠影；虽然我们事前阅读了相关文献，但面对书上的“人”还是会有失之交臂的痛悔。日



本归来，我魂牵梦绕，脑海中都是他们的身影、表情和声音，这是一次珍贵的心灵涤荡之旅，绝不能让他们的经验白白地流逝。以此，把能找到的文献结合我的感受，做了几个人物专栏，希望能更加聚焦水俣病运动中的那些勇士。不过，专栏还是无法体现我心中的感佩和崇敬。随着课题的深入，也许我会做得更好。

### 土本典昭

土本典昭 (Tuchimoto Noriaki, 1928~2008 年) 被称为“日本的良心”。“电影应该是为人们思考提供的一个工具，通过看电影促进思考，在思考中进一步体会电影的内容。”



从 1971 年来到九州的水俣，他拍摄的《水俣病：受害者的世界》，以日本 29 个家庭控告日本窒素公司的事件为主轴，受害者家属控诉公司排放的污染，让他们遭受失去亲人的痛苦。片中拍摄的水俣病患者的悲惨生活和政府保护窒素公司的恶行，强烈地表现了土本典昭伸张社会正义，对弱势者始终如一的关怀，都对日本甚至是全世界的纪录片工作者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成为许多纪录片拍摄者的启蒙。他拿起摄像机，和人们站在一起，凭着批判力与勇气，一生持续拍摄了 17 部水俣系列纪录片：《水俣病—患者的世界》(1971)、《水俣报告系列》(1973)、《水俣病起义——寻找生命意义的人们》(1973)、《医学意义上的水俣病》(1974)、《不知火海》(1975)、《水俣日记》(1995) 等。这奠定了他在日本纪录片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也使水俣的不知火海成为全世界巨大的公害象征。“如今，全世界都面临着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无人能够置身事外！”土本典昭这样说。2008 年 6 月 24 日土本典昭，在即将迎来 80 岁生日的时候，因肺癌在日本南房总，一个靠海小镇的临终关怀医院去世。根据土本生前遗愿，骨灰撒入其魂牵半生的水俣的不知火海。

水俣资料馆旁边的高处是水俣纪念广场

水俣资料馆旁边的高处是水俣纪念广场，于 1996 年水俣病被正式发现 40 周年之际建造而成。设计师是意大利



的朱塞佩·巴罗内（Giuseppe Barone）。这一占地面积约 3000 平方米的大型雕塑组合，伫立在可以看见不知火海的地方，来访者在此回想过去，向着明天祈祷。被我们称为生命

之门的“祈祷的喷水池（玻璃的喷水池）”高 5m，宽 3m；而那直径 40cm 的 108 粒不锈钢球被我们看成是“水银”球，也是“子弹”，从 1997 年在吉井正澄市长主持道歉的祈福会以来，每年的 5 月 1 日都会在此举行水俣病牺牲者祭奠仪式。这里是经历了灾难的人，用一种艺术的、夸张的、象征的描绘在警示人们，也是今天水俣环境教育学习的必游之地。

#### 原田正纯

原田正纯 1934 年出生于鹿儿岛县，1960 年毕业于熊本大学医学部研究生院毕业。这位水俣病支援者中的“教父”，被日本媒体称为“巨人”，因为是他构



筑了水俣病是世界上最大、最恶劣的公害的观点。自水俣病发生以来，他一直致力于水俣病的研究，持续每年对多数居民进行自主诊断检查。就医学层面来说，原田最大的贡献是证明水俣病可以通过母婴传播，即水俣病人中存在胎儿性患者。他一直牢记前辈白川医生的话“亏欠患者的有很多”。因此，他不仅是

他以医生的身份参与水俣病，更是以人类的身份来关注水俣病的。他认为，水俣病不只限于医学领域，法律、社会学、经济学方面，都有研究的必要。

“面对无法治愈的疾病时，医生能够做什么呢？”原田正纯想建立“水俣学”研究，创立一种体制以推广水俣公害的教训。他毫不留情地批评行政力量在水俣病发生和认定过程中的种种失误，他在世界上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声望。1994 年，原田正纯获得了“联合国环境全球奖”。此后，在各种努力之下，终于在熊本学园大学设立了“水俣学研究中心”，而原田正纯被任命为中心主任。现在的原田正纯老而弥坚，依然坚持为水俣那些未认定的患者奔走呼号。他这位理想主义“巨

人”走的是“到实践中去”的路，他身体力行走进患者的世界，他说，“真正的专家是那种会真挚地听取来自现场的声音，将其作为科学正确的体系来进行实证、思考的人。”正是因为有原田正纯的实际参与，水俣病越出了医学层面，成为一场社会运动。他所著的《水俣病》（岩波新书）和《水俣病没有结束》（岩波新书）一版再版，是了解水俣病和水俣学的重要文献。

### 谷洋 一

谷洋一出生于福冈县，大学时代的他为了支援水俣病患者，来到水俣。现任水俣病互助会事务局的会长，也是莹之家的创办人，专门负责患者的交流和生活支援工作。几十年来，他参与了水俣抗争中许多活动，包括1970年11月28日大阪的“股东总会”交涉。谷洋一先生除了全力支援患者，不认同水俣病已经结束的那些纪念活动，继续为患者在争取权利的同时，他认为应将水俣病的教训传递到亚洲——那些经济发展中的国家，他组织了亚洲和水俣网络会，对中国、越南和印度等地进行访问和交流。



### 吉井正澄

在历代市长之中，吉井正澄是第一个向受害者谢罪的。患者和市民对立的水俣市他提出了“共同改正”的理念。

吉井正澄出生在水俣市山间部分的久木野地区。吉井是农民家的长男，为了让弟弟们能上大学，他从农业高中毕业后就放弃读书，继承家业林木经营，由于经营有成，还获得了农林水产大臣奖。1975年，他当选水俣市议员，1994年当选为市长。就任市长后仅仅两个月，吉井正澄市长在5月1日主办的水俣病牺牲者慰灵仪式上，向水俣病患者道歉。媒体的标题新闻都是《水俣市长初次道歉》，当时遭致各种威胁和批评，但吉井市长始终十分坦然地处理日常工作，会见受害者团体的相关人士。吉井就像交涉专家一样不停活动，在国家与受害者团体之间重建了信赖关系。吉井自己认为：“总之，在水俣病问题中，这次的道歉是一个巨大的转机，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如今的水俣，作为屈指可数的生态城市，已经世人皆知。吉井市长开启了垃

圾的分类运动的先河。吉井想的是如何将公害起点的水俣市建设成模范的环境都市，“这是水俣市生存的唯一道路。”吉井退休后回归故里，在水俣病 50 周年之际，环境省设立了水俣病问题的“有识者会议”，吉井当选为委员。

### 川本辉夫

水俣病患者“自主交涉派”代表人物。1931 年出生于水俣市月浦。1948 年，从町立农工学校中途退学。1955 年左右发病。1956 年结婚。1965 年，看到



重症在身的父亲，1968 年进行认定申请。1970 年，对于认定申请被再次拒绝而开始请求行政不服审查。1971 年川本辉夫和佐藤武春二人带头向窒素公司要求赔偿，川本辉夫带领“自主交涉派”患者们在公司门口静坐抗议，时间长达一年零九个月。

1971 年，带领自主交涉派在窒素东京本社门前静坐示威一年零八个月，1973 年与日本氮肥公司签订赔偿协定书。此后还进行了多次的诉讼，为未认定患者不断活动，从未屈服。1983 年当选为水俣病患者联盟委员长。1999 年因肝癌去世。水俣病最激进的斗士川本辉夫在水俣病事件中的事发地写下了“镇魂之圣地，遗恨净土之地，恸哭永远之地。”的警句，不需要翻译就能感同身受。

### 坂本忍

坂本 shinobu 是胎儿性患者，1956 年生，与水俣病历史同龄。她是水俣病的象徵，是水



俣病运动的抗争者代表，她充满智慧和勇气，小时候，每天要艰难地翻山越岭去上学，在 14 岁时，她就和妈妈一起参加了对施害者窒素公司的抗议控诉活动。她到斯德哥尔摩参加第一届人类环境大会，在街上散发传单，向世界呐喊。她也和土本典昭、原田正纯等水俣病支援者，和川本辉夫水俣病患者一起

到过世界其他公害污染之地，去传播水俣病的教训和经验。她的形象因若干伟大的摄影师、电影导演而闻名于世：尤金史密斯、盐田武史、桑原、和土本典昭！

多少人写过她，多少人赞美她，都不如她自己写的诗歌和发表的心声让世人动容。

### 熊本学园大学水俣学研究中心

中心位于熊本市大江，成立于 2005 年 4 月。水俣市当地的研究基地“水俣学当地研究中心”是在同年 8 月开设的。

所谓“水俣学”，是一门超越了专业结构，跨学科性的学问。它是超越“外行”和“专家”的结构，面向所有的生活者的学问。同时，它还是丰富的、真实的、扎根于现场的学问，它也是探究每个人生活方式的学问。它将所有的成果都返还给当地，并且还会向世界传递信息。

如今，以全面解明水俣污染的健康伤害、生活伤害，相关资料的整理、数据化与宣传，地区再生模式的提案这三点为支柱的工程正一点点开始行动了。

该机构以面向地区的中心为目标，并计划、进行着以“思考地区和福祉”、“考虑生命与环境”等方面为题目的“公开讲座”。另外，“健康·福祉谈话”也会定期实施。是熊本学园大学水俣学研究工程的研究员和研究生的研究基地。另外，这个设施也广泛地面向国内外的研究者开放。

### 高峰武

高峰武 1952 年生于熊本县天水市。1976 年进入《熊本日日新闻社》社会部，在这家以自由主义为宗旨、在熊本县有着压倒性的市场占有率的报纸担任记者的他，十分活跃，一直负责水俣病的采访和相关报道。通过水俣病的采访，他接触到了很多的患者，“在水俣走一走，就会明白的。因得不到水俣病的诊断而饱受痛苦，最后去世。像这样的事情经常能够听到。”“为了这些人，我们必须充分调动自己的想象力。……不是坐在办公楼里考虑，而应该看着水俣的海洋，听着人们的话语，在这里充分地调动想象力。这才是我的想法。对于媒体，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坚持。我深切感受到了坚持的重要性。”高峰武批评的是媒体在水俣病中，所做的努力是不充分的。他认为“记录下瞬间发生的事情的确很重要。不过，在持续的时间里坚持关注一个问题，也同样重要。”



从做记者的本行出发，他更是水俣病研究者和参与者，这一身份广为人知。高峰在东京分社工作期间，曾做水俣病决策相关的采访，1999 年晋升为社会部部长兼评论员。合著有《报告文学：精神医疗》（日本评论社）等，发表有《决策形成过程》（水俣病研究会编《水俣病研究 1》）等论文。现任《熊本日日新闻社》论说委员长。

加藤女士和她的“大家之家”（hot house）

加藤竹子女士出生于东京，她支援了数次到东京与日本窒素公司交涉的患者们。并参加过患者们静坐示威活动。她通过这些活动，感受到自己享受了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富裕生活，而这正是建立在伤害了水俣患者一生的基础上的。因此，她 23 年前从东京来到水俣，开始为先天水俣病的患者，能自立生存下去而工作着。这就促成了她成立“hot house”，这是为水俣病患者建立的工作场所，在这个不大的场所里，水俣病患者们努力工作着，他们制作干花标本，色彩鲜艳的小花可以黏贴在名片上，那是水俣特产的名片！不仅加藤女士、原田正纯女儿原田利惠的名片上贴着，就连 JNC——当年的窒素公司的董事、水俣本部长大衡一郎的名片上也贴着呢！他们用旧报纸糊的纸袋，他们花两个小时才能盖 10 个签章，水俣病患者通过自己的工作自立，获得了尊严。这就是加藤女士奉献的爱心。她把“大家之家”建在水俣市的中心地带，让人们来参观学习，同时加藤女士自己还经常到学校进行水俣病的宣传工作。

弘津敏男

弘津敏男是水俣相思社的现任领导。1974 年成立的民间组织相思社，是为没有被认定为水俣病的患者提供支援的团体。与国家和熊本县有过激烈交锋的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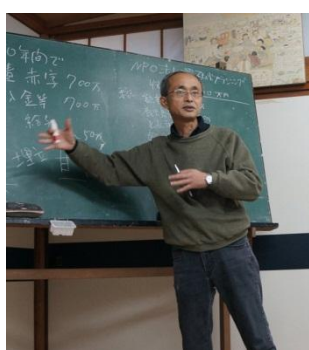


思社一度是市民和行政人士畏惧的对象。相思社开设了以生活学校为名的共同生活实验场，以帮助受害者。虽然活动的方式随时代而改变，但当初的宗旨几十年来没有改变。弘建敏男从一个大阪的中学老师，进入水俣的相思社，一干就是四分之一一个世纪，他说虽然一直处于政治解决水俣病的漩涡中，却感受到了在处理理念与现

实矛盾中的学习乐趣。他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当柏林墙倒塌，1990年德国统一，1991年苏联解体，因追求社会主义理念而奋斗的社会运动遭受重创，但是，弘建敏男认为“关于和平、自由、平等和社会公正”的基本思想并不会改变，新的运动模式要解放思想去探索。

### 吉永利夫

吉永利夫 1951 年出生于静冈，家境贫寒的他在八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七，一边打工一边读夜校。在他读高三时，东京大学安田讲堂事件爆发，“只要齐心



合力就能改变这个时代”，成为吉永怀揣的小小梦想，因此多次参加了在静冈的游行，也曾与同学商量，到南方的小岛上建立一个公社。在 1972 年 1 月，时年 20 岁的吉永高中毕业，准备去鹿儿岛探访朋友，途经水俣，在水俣站口，他看到了窒素公司正门前静坐示威的水俣病患者——川本辉夫等“自主交涉派”，他们希望通过

与窒素公司直接交涉争取赔偿。那时的吉永虽然完全不知道什么是水俣病，却参加了一周的静坐集会，他白天参加静坐示威，晚上就在水俣车站前的酒吧打工，他在水俣的日子也从 1 周变成了 10 天，从 10 天延长到了 1 个月，这个怀揣着理想的愤怒青年，最后成为水俣病患者的支援者之一，与土本典昭、原田正纯、川本辉夫们并肩战斗，参与相思社工作，组建自己的社团专门负责水俣病资产教训旅游学习项目的开展，是今天与水俣相连的重要人物。

### 盐田武史

盐田武史 1945 年出生于香川县高松市。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社会学部，在学时隶属摄影部。他在 1967 年夏天到长崎参加原子弹爆炸后展览而路过水俣，



当时还没有人专程为支援水俣病而在水俣定居。1968 年，进入水俣，他见到了病症最严重的患者，“从户外一进入昏暗的室内，我看到了他，所受到的冲击无法用一两句话来表达，仿佛魔咒驱使，只要是看到了就一定要

负起责任来。我想要知道事实真相，我想帮助他们，最终我决定了在水俣生活。”盐田在他的《镜头下可爱的水俣》前言中这样说。作为摄影师，把水俣病患者看成是自己的事情，与水俣结下不解之缘，在水俣度过了十六年。这 16 年间，盐田拍摄了 5 万多张照片。1970 年以“朝日图片”为中心开始发表照片。1971 年在东京银座尼康沙龙上首次举办个人展览。1973 年出版了“盐田武史写真报告水俣‘68-72’深渊”（西日本新闻社）。1985 年以后在熊本市经营写真企划相关的公司。

### 寺西俊一

寺西俊一曾先后担任环境经济·政策学会常务理事·副会长、环境法政策学会理事、亚洲经济研究所外部研究委员、日本学术会议环境委员会委员、日本环境



寺西俊一

境会议事务局长、季刊《环境与公害》（原称《公害研究》）编辑委员会干事(Editor-in-Chief)。

1975 年：京都大学经济学系毕业

1980 年：一桥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博士课程完成

1980 年：经济学系专任讲师（《环境经济论》负责人）

1985 年：副教授（同经济研究科《环境经济研究》负责人）

1992 年：教授，1998 年：同经济研究科教授

2008 年：一桥大学亚洲环境项目代表（至 2009 年度）

2009 年：一桥大学自然资源经济论项目代表

### 淡路刚久

淡路刚久是日本著名环境法学家淡路刚久是环境权利的理论、环境法学的先驱者之一。



淡路刚久

1964 年 3 月：东京大学法学部毕业

1964 年（昭和 39 年）4 月：东京大学法学部助手

1967 年（昭和 42 年）4 月：立教大学法学部讲师

1969 年（昭和 44 年）4 月：立教大学法学部副教授

1977 年（昭和 52 年）4 月：立教大学法学部教授



1993年（平成5年）4月：立教大学法学部长（至1994年3月）  
2000年（平成12年）4月：立教大学法学部长（至2002年3月）  
2004年（平成16年）4月：立教大学大学院法务研究科教授  
2004年（平成16年）4月：立教大学大学院法务研究科长（至2006年10月）  
2007年（平成19年）：立教大学退休、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法务研究科客座教授

### 著书

『公害的法律商谈』（有斐阁、1971年）  
『公害判例的研究—生成与展开』（都市开発研究会、1971年）  
『公害赔偿的理论（増补版）』（有斐阁、1978年、初版1975年）  
『環境権の法理と裁判』（有斐阁）  
『连带债权的研究』（弘文堂、1975年）  
『企业的损害赔偿与法律』（日本経済新闻社、日経文库、1983年）  
『侵权法中权利侵害与损害的评价』（有斐阁、1984年）  
『民法II—物权（第3版）』（有斐阁Sシリーズ、2005年、初版1987年）  
『环境法（第3版）』（有斐阁ブックス、2006年、初版1995年）

### 社会活动

日本交通法学会理事（1972年 - ）  
日本私法学会理事（1991年 - 1999年）  
日法法学会理事（1986年 - 1991年）  
日本环境会议理事（1991年 - ）、理事长  
日本法社会学会理事（1991年 - ）  
国際人権法学会理事（1991年-2003年）/環境経済・政策学会理事（1995年-）/環境法政策学会理事・事務局長（1997年-）/東京都消費生活対策審議会委員・部会長（1987年-）/法務省司法試験第二次考查委員（1991年-2000年）/文部省大学設置・学校法人審議会専門委員（1994年-1999年）/東京都消費生活対策審議会委員・会長（1994年-1998年）/文部省（文部科学省）日本

ユネスコ国内委員会自然科学小委員会調査委員（1994年-）/神奈川県環境審議会特別委員（1996年-1997年）/東京都消費者被害救済委員会委員（1998年-）、会長（2001年-）/世田谷区消費生活審議会会長（1999年-）/世田谷区環境審議会委員・専門部会長（2000年-2004年）/埼玉県戦略的環境評価技術委員会小委員会委員（2002年-）/人事院国家公務員採用I種試験委員（2003年-）/日本学術会議第20期会員・法学委員会委員長（2005年-）/

## 2. 水俣感思（王名）

来到水俣的那天傍晚，没看清这座小城是什么样子天就黑了。那感觉很像我20年前留学日本最初的印象：想看，但什么也没看清。我们在街边的一个小店里吃了夜宵，回到宾馆倒头便睡了。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我沿着人行道跑步，在晨曦中感受这座城市。虽是第一次来到水俣，但这个名字对我一点儿也不陌生。MINAMATA，恰当地说是一种公害病的名字。我们这个访日调查团，就是冲着这个公害治理来的。此刻，我的脚步踏在这座叫做MINAMATA的城市街道上，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图 1-1: 窒素株式会社水俣本部

没跑多远，发现一座大门，在微明的晨曦中，我看清那是一座工厂的正门，上面清楚地映出两行夹杂着片假名的繁体汉字：窒素株式会社水俣本部。我不大相信自己的眼睛，在调研尚未开始的这个清晨，我信步来到的这座小城的这个角落，居然是水俣病的源头！我用手机拍下了这个清晨的影像（图 1-1）。

那是一座工厂的正门，上面清楚地映出两行夹杂着片假名的繁体汉字：窒素株式会社水俣本部。我不大相信自己的眼睛，在调研尚未开始的这个清晨，我信步来到的这座小城的这个角落，居然是水俣病的源头！我用手机拍下了这个清晨的影像（图 1-1）。

从踏上日本的第一天开始的调查，每一天，我们一直沉浸在关于水俣病的怪异荒诞的故事中。我们都在面对水俣病。

我用一个学者的理性和良知，见证着水俣病的痛思与哀伤，见证着那个时代不可磨灭的印迹。水俣，不仅是日本的，更是世界的、人类的永远之痛。

### 一. 水俣之痛

56年前发生在水俣湾的那场灾难，经过漫长的诉讼、确认和裁判的过程，到目前为止官方认可的受害者人数是2273人。据认为，这个人数只是实际受害者的近百分之一，当年沿不知火海水俣湾海岸及临近岛屿的所有居民都成为受害

者，日本政府至今未能对当时受害范围内的所有居民进行普遍的健康诊断，这使得逾半个世纪之久实际受害者人数一直是一个谜。我们在水俣市、熊本县和日本环境省（部）三级政府得到的答案，尽管有所不同，但似乎都在推诿个



中原因。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日富国日本，对尚活着的几万居民开展一次像样的健康普查并非难事。难在何处？当我们看到水俣病患者发病时因痛苦难耐用指甲抠出的墙面，当我们在“萤之家”见到从一出生就带着水俣病、用整个生命与之抗争

图 1-2：水俣病患者发病时用手抠出的墙面的坂本忍，当我们矗立在水俣病纪念公园与“石人形”一起凝望大海。



图 1-3 15 岁的坂本忍出席  
熊本县立麻生高等学校



图 1-4 务工的坂本忍



图 1-5 凝望大海的水俣病患者“石人形”

这部分主要描写：水俣病给个人、家庭带来的痛苦；给环境带来的痛苦，给社会带来的痛苦，给人类带来的痛苦。

要描述痛苦之深，之震撼，之不可逆转。

## 二．谁之过？

这部分主要说明：水俣病是谁带来的？

企业的过失，政府的过失，环境的过失，社会的过失，时代的过失。

要说明这样的过失中有的可以避免，有的不可避免；有的可以理解，有的不可理喻。

## 三．走出梦魇？

这部分主要展示：当地社区如何为走出水俣病而抗争？

主要展示和说明水俣学与地元学的探索及其意义。

#### 四. 走向未来？

这部分主要说明：对于所有的利害相关者来说，对于人类来说，水俣病是否能够超越？

当地社区的未来？

当地居民的未来？

当地政府和各级政府的未来？

相关企业的未来？

日本及世界从中吸取的教训

但对于受害者来说，有未来么？

#### 五. 日本的水俣，人类的水俣

这部分主要说明：水俣不仅是日本的，也是世界的、人类的。

我们如何面对这沉重的历史遗产？

### 3. 牺牲少数人的利益能获取大多数人的幸福吗？（汪永晨）

这篇纪事写完后，我就带着“她”和我一起走进我们一年一次的“江河十年行”。我想把“她放在心里再沉淀一下。因为，我要走的中国西南三条大江正在进行着水电开发。当地朴实的山民，特别是怒江的老百姓认为，在自己家乡的水电开发，是为了国家，是在顾全大局中。我要是告诉他们，牺牲少数人的利益，不一定能获取大多数人的幸福，这些朴实的少数民族兄弟姐妹，听了会是什么反映呢？

**牺牲少数人的利益并不一定就能获取大多数人的幸福！**

200万和2000个亿

“我们把容器弄脏了，还要在里面生活，那会是一种什么生活？”

油门和刹车在一个档上怎么走？

大家做小事

这面这些，是采访日本水俣后，我会记住的观念与行动。

**牺牲少数人的利益并不一定就能获取大多数人的幸福！**

这是我此次去日本水俣采访听到的，对我可能是最有触动的一个说法。

我们从小受的教育都是少数服从多数，是顾全大局。日本熊本县知事（省长）

蒲岛郁夫在和我们一行关注水俣病的中国人交流时说的这句话，不管是不是政治家的口号，我都会在今后的文章中，演讲中，广为传播。

在日本熊本县蒲岛郁夫知事的会议室里，当他一再强调自己在关注水俣病患者老龄化的问题时，同行的曾少军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把关注点放在少数人身上会不会丢失选票？”知事当时对此问题的回答，让我们几个对政治缺乏兴趣的人十分欣赏：

蒲岛郁夫还说：“少数人和多数人也是会有变化的。今天大多数的受益者，明天或许就成了受害的大多数，而今天的大多数，又成了明天的少数也不是没有可能。所以不能简单地判断何为大多数、多少人算是少数，也是不能轻易就下判断的。

蒲岛郁夫知事的这句话，让我联想到 2011 年入冬以来北京的几次阴霾天。空气污染，开始可能只是污染企业周围的人牺牲着自己的健康和居家生活。要说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在中国受益的当然是大多数。可当空气污染形成了阴霾天以后，受害的还是少数人吗？

当然，对我这个心思都在环保，对政治人物的言行缺乏关注的人来说，知事的这番话是打动了我的。可当我把这句话写在微博上时，有人提醒：政治家拿弱势群体说事，是他们手中的一把利剑。

清华大学 NGO 研究所所长王名，在接受日本记者访问时，也听到了与我们的感受不一样的说法。这位日本记者说：有关水俣病的社会问题还有那么多没有解决，还有那么多受到伤害的水俣病患者至今得不到认证，知事就在大肆鼓动要在水俣开国际会议，这真是为了让全世界都接受我们的教训，还是要标榜自己，为自己脸上贴金？

在这点上，为我们安排此次行程的田原先生也有相同的质疑。

从那位记者和田原先生的角度思考知事的话后，我开始反省自己：一个成熟的记者，对任何事情判断，都不应在你对这件事的了解还在继续之中时。我也想起在采访报道水俣已有三十多年经历的日本记者高峰武时他说的一句话：不懂装懂就制定政策并加以执行所带来的结果，是最坏的。执政者装懂带来的影响，我们已经深有体会。作为媒体人，客观的报道和主观的报道在公众中产生的影响当然也不可小视。所以，修炼自身的素养，对记者来说真是一辈子都要面临的考

验。水俣，随着时间的推移给我的可能还会更多。

### **200万和2000个亿**

在对世界十大公害之一日本水俣病的采访中，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这样一笔帐：窒素氮肥公司当年如果对排放的污水加以治理，花费会是 200 万日元。而污染事件发生后，他们付出的赔偿金额是多少，2000 亿。

这笔钱窒素公司付不起，要靠国家与他们一起付。国家的钱哪来的，纳税人的钱。给我们算这笔帐的日本环境经济学者寺西俊一教授说：这还没有算水俣病给日本环境带来破坏及损失，也没有算受害者这一群体中个人和家庭的痛苦与代价。

在日本访问的最后一天，我问曾在日本环保厅任要职的小林光：在中国，尽管污染已经给人们的健康和生活带来了很多问题。可先吃饱了再环保还是极为普遍的看法与做法。在日本有多少人赞同保护环境不应在发展之后。保护环境不会拖经济发展的后腿呢？

经济发达的日本，民主化程度很高的日本，世界十大公害，占了其中二大的日本，水俣病至今还在影响着很多人健康的日本，这位曾经环保厅的高官员竟然告诉我：他的观点在日本也是少数派。大多数人认为的还是要先发展，还是保护环境就会影响经济发展。所以，今天水俣的大街上还有“水俣和窒素是同一个命运共同体”这样的广告。

当然，在日本作为少数派的这一观点的持有者们，并没有放弃努力让公众和决策者们看到经济学家们算的这笔帐：200 万和 2000 个亿。

### **我们把容器弄脏了，还要在里面生活，那会是一种什么生活？”**

寺西俊一教授非常形象地把环境比喻成人们生活的容器。“我们把容器弄脏了，还要在里面生活，那会是一种什么生活？”

寺西俊一说的：在日本水俣发生的汞中毒事件，给当地人和当地家庭带来巨大痛苦的同时，也让人们看到了“容器”破坏了带来的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

钱能买到干净的“容器”吗？这是“水俣”后，我要问问中国的决策者、企业家、也要问问普通的老百姓，特别是今天还觉得要口袋先要“鼓”起来再谈环境的那些人。

认为自己的观点在日本是少数的小林光还告诉我们另一现状，也是我会永远

记住，并要讲给人听的：56年前“窒素”水污染，导致水俣病，从那时起直到今天，他们不但影响着自己企业的发展：生产力降低、投资萎缩、成本，物价上升、为治理环境花更多的钱，而且还一直背着付巨额赔偿的重负。这些带来的经济萧条，也直接影响着整个地区的发展。水俣在日本的经济发展中，曾走在前列。现在的水俣，在日本是落后地区。

小林光认为：“日本近年来的经验表明，为治理环境花钱，会提高GDP的正增长。越早治理，越能减少受害损失。不为治理污染花钱，会让更多的钱投入到消极影响的消除中”。

小林光说的这番话，在今天的日本能被正视的，按他说还是少数。

在水俣病那么严重地影响了人体健康的日本，不为治理污染花钱，会让更多的钱投入到消极影响的消除中的理念，还是少数持有的观点，那么在中国，人们能接受这一事实并因而制定相应决策，又要到什么时候呢？那一天的到来，靠什么，等吗？

这也是我在“水俣”的采访中，越来越多的问自己的问题。

为什么这一事实大多数人视而不见，其原因是吃的苦头还不够呢，还是人本性的急功近利的影响。

当人们还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时候，就很难注意到身边的环境？人只有在提高道德水准后，才有可能关注到环境？把自己当成高级动物的人，要摆正自己在自然的位置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没有看到容器坏了还要在里面生活之可怕的人群之众，是日本出现今天被正式认证的水俣病患者只有2237位，而潜在的水俣病患者却高达6万人之多的根源这一认知，随着对不敢正视自己有水俣病的患者了解越多，他们说的怕受到歧视，怕找不到爱人，怕找不到工作，怕活得失去尊严，所以哪怕不要赔偿也在自己默默地忍受着病症的痛苦，越有了理解。

然而，越理解，我却越觉得正是人们还没有认为“容器脏”了还在里面生活有多么糟糕，钱带来的不全是幸福。才让不去证实自己的病症，不去与与污染环境，损害自己健康的做法抗争，成为了另类的“顺其自然”。

这些都是在水俣，边采访，我边试图找着的我认为造成小林光说的多数与少数的缘由。

## 油门和刹车在一个档上怎么走

现在日本政府已经把产业部门和环境保部门护分开。小林光对此的说法是：油门和刹车在一个档上怎么走。

预防原则说来容易做起来难。日本目前产业与环保没有分开的就是福岛，结果出了这样的灾难。

油门和刹车在一个档上的“车”在中国有吗，有的话何时能扭转？

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的水，是人们当年都会唱的一首歌的歌词。而这歌词也正是来自人们对太湖的赞美。可是，2007年太湖边的城市无锡曾发生了轰动全国的水污染事件，美就美在太湖的水，成了人们打开水笼头出来就是一股恶臭的水。如今站在太湖边时，很难让人把这美就美在太湖的水唱出来了。2011年11月26日周六，我们一行人一到柳川，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的水这句歌词，就让我一定要用在柳川了。

如果用GDP来衡量，太湖周边的经济发展是走在中国前列的。但是人们喝水都出了问题。柳川的经济发展水平，GDP在日本会占在什么地位我不知道。但是在那里的两天里，舒服和真享受呀，却是我在那儿时，时时刻刻都要感叹的。

这种感受是怎么获得的，保护环境，保护文化传统会给今天的生活带来什么，去过柳川后我坚信，和油门与刹车不在一个档上一定有关。我拍的那么多，水中的涟漪，船上的暖脚被，花丛与绿树的交相辉映的照片，是见证，也会是未来我说也说不完的谈资。

作为女性，在这次日本水俣行中我还有另一伤感，就是母亲的胎盘都无法保护自己孩子时的悲哀有多么的悲哀。

坂本的三个孩子都是在她的肚子里就染上水俣病的。她要有多么大的勇气才能面对自己对孩子们的“伤害”。

见到坂本，听了她自己讲自己的故事后，我总是在想，她把对自己孩子赔偿给的钱又扔回给了污染者那一刹那，她的内心所包括的都是些什么。而当我们这些外人听到她女儿坂本忍写的内心独白时，都难以抑制心中的巨大的哀恸，这位母亲的内心又要有多么强大，才能整天面对内心和躯体都受到极大摧残的下一代呢。写到此时，我在心里真想做的事或许是不应该的，但我还是想做，就是为她的鼓掌，为她的坚强和忍耐鼓掌。希望朋们不要为此责怪我。



## 大家做小事

水俣病发生已经 56 年了，日本在处理“后事”上还有很多问题，这和我去之前想的是去取经的想法有些偏差。

不过在日本访问中我发现，一批大在水俣中毒事件发生时，冲在第一线的官员、医生、律师等大知识分子们，现在都在做很小的“小事”：开个诊所，办个患者服务中心、建个乡村生活博物馆。一位叫尾崎的律师为了给患者打官司去了 400 趟鹿儿岛，费用全部是自己垫付的，等等。相比之下我关注怒江即将了 11 次还一天挂在嘴上，真是太在不好意思。

大家们做这些事情的意义无用置疑。但对政策的影响及改变是否太小了点？这是日本知识分子在各种尝试之后的无奈选择，还是大家们认为做事就应该从小事做起。

我想，这其实也是我们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的多种选择。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在我以记者的身份关注环境，以环保志愿者的身份关注江河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正在感悟着大家们以做小事的方式投身于社会变革的意义。

结束这篇纪事的写作后，如文前所说，我没有“交差”，而是带着“她”走进了我们要花十年行时间走中国西南六条大江的路上。我们想为中国西部的江河写一部断代史。这部史中有江河的故事，也有人与自然共命运中酸甜苦辣。

走在江河，窗外静静流淌着金沙江、长江第一湾、怒江时，都挡不住我脑子里像演电影一样的“放”着花田教授在讲地元学时说的我们是他少见的中国学者；宫北教授带我们去的他的乡村生活博物馆时，浑身充满着活力；挡不住思念的还有柳川小木船上盖腿的花被子和日本环保署外那片林子金灿灿的秋色。这一切，都会在我们未来的生活中细细地回味，从中汲取营养和力量。

遗憾的时，当我和已经因要修水坝而为被移民了的怒江边的农民说：少数人的牺牲不一室就能带来大多数的人的幸福时，他们却对我说的不以为然，坚信的还是要顾全大局。还是相信政府。

我们要走的路还有多远，有一天我也会在心里为自己鼓掌的，这一信念会让我继续走下去。何况与过去比，我心里又装上了在水俣看到的宫北们，听到的柳川河中哗哗的水声呢。

#### 4. 日本水俣病事件之观察(黄浩明)

##### 一、序言

对于日本的水俣病事件，中国新闻媒体的报道并不是很多。我个人了解水俣病事件，最早还是从北京师范大学环境科学研究所的环保教科书上看过，在1983年10月份在河南省郑州市，有机会参加了由北京师范大学环科所主办的全国环境教育教学工作会议，我代表当时的煤炭工业部教育司，准备探讨和研究在煤炭系统的院校开设环境保护专业事宜，应该是28年前的事，真正近距离看到水俣病的图片展是2002年8月份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参加地球峰会（WSSD），峰会设有一个非政府组织展览区，当时的印象，这是一个很是遥远的故事，从而得知水俣病事件是震惊日本的四大公害之一，其根本原因是有机汞即水银污染的案例。在过去20年里，本人有机会去日本17次，但是每次都是开会和拜访，大部分时间都在会场，会议室，机场和农村现场度过的。个人也曾想看看水俣病现场，遗憾的是没有一次机会能够到日本熊本县水俣市学习和调研。

2011年11月20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王名老师当团长，带领9位来自国内各方面的代表组成的考察组，为期11天时间，前往水俣市和东京市，也实现了我个人多年去水俣市考察的梦想。20日早上7:00，北京T3航站楼，我们全体团员整装待发，大家都有同样一个梦想，看看水俣市的真实面貌。我们途经大连停留和出关，下午抵达了日本福冈机场，感到福冈天气晴朗，心情舒畅。在从福冈到水俣市的新干线上，我们偶遇了日本福冈县议会议员阿部弘树先生，他们对这一个特殊的中国代表团去水俣市访问感到很兴奋，似乎在日本人心目中，水俣病是否存在，或者已经早有答案了。阿部先生与我们主动交名片，也谈起他与江苏省之间交流活动。

说话间我们所乘的新干线抵达了新水俣车站，这也是我近距离走向了水俣城，王名老师又希望我们每位团员考察结束写一篇感想，作为一名中国人来观察和评价日本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所发生的水俣病事件。客观上讲，很难写出什么感想，经过三周时间的思考之后，我将这次访问日本方面的各界人士的名片做了一下分类，其中涉及到政府、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医院、民间组织、律师、新闻记者和受害者等八方面的人士，通过与上述日本各界人士的面对面的交流和对话，以及出发之前预习的功课和所看的资料。这样的公害在日本发生之后，呈现

出一个以水俣病为主题的博弈平台，我称之为利益相关者的博弈过程，作为一名旁观的第三者，来观察这八方面人士之间的关系和冲突，以及他们之间如何斗争？如何谈判？如何反思？如何交流？如何依法行事？最后达成的不同的结果。

我重点陈述受害者、加害者、政府系统和民间组织等四方面的观察，最后谈谈水俣病事件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五点启示。

## 二、日本水俣病受害者之灾难和觉醒——对受害者之观察

2011年11月21日上午我们参观日本熊本县（相当于中国的省）水俣市福祉环境部环境保护都市推进水俣病资料馆，而向我们介绍水俣病历史和进程的就是馆长坂本直充先生（Sakamoto Naomitsu），他本人也是一名胎儿水俣病患者，由于他父亲是日本窒素氮肥公司的职工，年高90多岁，遗憾的是最近刚刚去世，由于他父亲的原因，坂本本人一直没有向政府提出申请确认自己是水俣病患者，因此，也没有获得政府方面的任何赔偿，11月25日我们在日本熊本县政府办公楼大厅一层看到了一个明显的标志，水俣病公害被害者的救济窗口，客观上讲坂本先生是一名受害者，但由于父亲的原因，他没有去申请成为水俣病患者应有的权益，而默默地承受这一切痛苦和灾难，我们参观和交流的一个小时的过程，他不断地变换姿态，非常认真地为我们讲解，水俣病的历史和过程，也告知我们有近75万个参观者来到水俣病资料馆。参观之后，我在默默的思考，面对灾难和忍耐痛苦也许是上帝对坂本先生太不公平和公道，但是在言语之中，我们得知，坂本先生已经觉醒，他计划近期向政府申请确认自己是水俣病患者，争取他应有的那份权益，因为他已经没有任何负担阻碍他那对水俣病的愤慨。

11月21日下午，我们听完后熊本学园大学原田正纯医生的讲解之后，来到了一个水俣病患者互助组织“萤之家”。当我看到第二位胎儿水俣病患者坂本忍，我心中感慨已经无法用语言来描述，这时候仔细地观察坂本忍女士的每一个动作，其实她是很坚强地坐在会议桌的最边上，我个人一直试图比较先前的印象，就是从清华大学翻译的资料描述坂本忍与原田医生的对话的情景，当我当面见到坂本忍那坚强的又面带微笑的已经56岁的她，似乎早就将水俣病事件忘记了，并不认为她是水俣病患者，作为旁观者感到受害者她在展现她那美好的一面，并不是书中描述的她的无奈和恐怖的心情；坂本忍从无奈到清醒，从清醒到觉醒，她的经历在展现世人无法得知的内心的大哭大泣的悲哀；客观地讲，坂本忍从她

出生那一天起，就将水俣病患者的命运伴随着她的童年、青年、中年以及马上就要接近的老年，因为她已经是 56 岁的人。坂本忍作为受害者的角色，她参加东京起诉团，在东京她与窒素公司总裁的对话，展现出她觉醒的那一面，为那些未能够到东京的水俣病患者发出愤慨的声音，传递受害者痛苦的呐喊，“作为企业家，你们的社会责任何在？你们的良知何在？”。在国际上，觉醒的坂本忍，不顾疲劳和身体的痛苦，她参加了 1972 年的第一届世界环境发展的高峰会，她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向全世界呼唤，“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千万不要忘记环境保护，千万不要再走水俣病事件的老路”；她到越南去讲述水俣病的历史和经历。

当看到她在专心致志的听着她母亲坂本富士二的讲话，她一声不吭，她在坚持着；当她母亲讲述水俣病事件给她家族带来的灾难时，她的面孔在微微颤抖。据田原记者告知我们，她母亲已有 80 多岁高龄，她与女儿同时接待外界的朋友的场面已经很少很少，当他们得知中国代表团来访“萤之家”，她们又克服身体上不适，参加当天的一接待我们的事务。但今天她那一场激动和认真地陈述，让我们在场所有中国人代表团的每一位成员都感到她作为坂本忍母亲的伟大，她鼓励坂本忍像正常的孩子去上小学，去读中学，学习文化知识的力量也是坂本忍觉醒的基础；她鼓励坂本忍去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为了 20 万的水俣病患者，她奋斗，她忍耐，她们真是一批令人敬佩的坚强勇士。

在“萤之家”我们看到了其他水俣病患者，包括江口宏章先生，坂本慧仙（音译姓名），田尚，山内，沙田女士，以及工作人员伊藤女士，谷洋一先生，谷洋一先生实际上是 NPO 法人水俣病协会，水俣病受害者互助会事務局实际负责人。

11 月 24 日我们第三次正面接触水俣病患者，就是在水俣市 HOT HOUSE，翻译成中文就是“火热之舍”，在这里我们又看到几位胎儿性水俣病患者，看到他们在利用废旧的报纸，在制作简单的口袋，再销售给来访的客人，他们也在展现他们的存在和生命的力量，我们每位也自费购买了一个报纸口袋，作为纪念。

通过三次正面接触水俣病患者，我开始收集了解水俣病患者的全体情况，从水俣病资料馆提供了数据，截止到 2011 年 7 月 31 日水俣病认定患者数位 2273 名，其中熊本县为 1782 名。鹿儿岛是 491 名。各市的分布情况如下：水俣市 1013 名，占 44.6%，出水市 388 名，占 17%，津奈木町 354 名，占 15.6%，芦北町 196

名，占 8.6%，田浦町 150 名，占 6.6%，东町 93 名，占 4.1%，御所浦町 54 名，占 2.4%，其他还有高尾野町 10 名，八代市 7 名，阿久根市 4 名，龙岳町 3 名，大矢野町 1 名。而专家估计整个水俣病的患者应在 20 万左右，而这 2273 名被认定水俣病患者也仅仅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

当代表团成员问起坂本忍的母亲时，您是需要水俣经济发展还是承受水俣病的痛苦？她很坚决的回答：这样的经济发展我们不需要！

### 三、企业之反省和认识——对日本窒素氮肥公司的观察

2011 年 11 月 24 日对日本窒素氮肥公司的参观和交流，应该是最沉重的一次，而作为水俣病的制造者也就是日本窒素氮肥公司，现在改名称叫日本 JNC 株式会社，而赴工厂参观之前，要求代表团全体成员在工厂厂区不能够照相和摄像，我们都不是技术情报人员，人文学科的研究类别人员，但是我们抵达窒素工厂厂区时，并不感到这就是 56 年前的水俣病的加害者所在地，那时的水俣是工业化的一个重要标志，而这个 1906 年成立的工厂，依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情况，现在智索股份有限公司有注册资金 78 亿日元<sup>19</sup>（相当于人民币 6.42 亿元），现有员工 2500 名，年营业额为 1800 亿日元，即 148 亿元人民币，而接待我们的是智索株式会社的社长兼水俣本部长大卫一郎先生，在智索工作已达 35 年时间，而这个智慧的社长先生给我们提供的正反面复印件的“造成水俣的企业之体验与反省”一文，让我们代表团所有成员感到与这几天与水俣病患者接触之后的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反省书的结构令人折服，除了介绍智索公司过去的辉煌，例如 1949 年日本天皇陛下访问以外，还同时受到了农业大臣和工商大臣的表彰，反省书中这样介绍：水俣病是通过长期过量吸取含有有机水银的鱼类和贝类而引起的中毒性病患，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后发生，到目前为止有 2000 多人被认定为水俣病。

在反省书中这样描述：水俣病发生之后，我们所承受的物质上和精神上打击是甚大的。我们迄今为止，为了水俣病而付出的赔偿金额，包括赔偿金等的借款利息，已经达到了约 3000 亿日元（相当于人民币 246.9 亿元），不仅如此，还造成了水俣病的企业负面形象，在企业的经营上，不仅成为重大的累赘，而且也

---

<sup>19</sup> 2012 年 01 月 15 日中国银行，100 日元等于 8.23 元人民币

成了反体制运动的攻击目标，公司职工遭受暴力，业务上受到种种妨碍，有用人才流失等。

反省书谈到的几点重要教训令人深思，现摘要如下：不管任何时代，不能过信科学常识；在已经发生的结果面前，任何辩解是行不通的；担负的赔偿责任远远超过法庭的判决；公害绝对不能发生，一旦发生公司不仅陷于死地，而且将蒙受比破产更重的苦难；

在这次访问过程中，安排给我讲解的 JNC 工场案内担当的木户理江女士，她是水俣市土生土长的一名 JNC 工作人员，她用亲身的经历介绍了水俣病不仅给患者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同时也对水俣市民，水俣经济发展都带来了重大损失，水俣市与水俣病的标签紧紧相连，她介绍了与诺贝尔化学奖的获得者是如何支持现在的 JNC 企业发展，同时全世界 50%-60%液晶荧光屏的产品也出自 JNC，还谈论与德国企业将如何合作，她还介绍自己当志愿者帮助水俣病患者如何度过困难等。

企业的反省和员工的诉说，以及我们观察当今的智索公司深感作为企业家的责任是何等的重大，发明创造和工业现代化，如果建立没有责任和道德的基础上，将是给人类带来了无数的受害者和社会问题。

#### 四、日本政府体制关于水俣病事件处理的变迁和变化——对日本政府系统的观察

这次访问政府系统的部分官员，田原先生的设计是比较科学，从水俣市环境部，到熊本县环境部，再到熊本县知事，最后到东京的日本中央政府的环境省。是一条自下而上的线路，作为一名邻国的环境保护事业的从业者，有机会在较短时间内接触这样多的日本环境系统的政府官员，也是受益匪浅。

与水俣市福祉环境部环境保护都市推进课课长田畑纯一先生的交流和体会。2011 年 11 月 22 日下午，我们来到水俣市环境部，田畑先生的名片上印有一副漂亮年轻的少女，作者为出身于水俣市的江口寿史，我上百度搜索得知，江口寿史是日本漫画家，插画家；他的作品包括故事漫画和搞笑漫画。1977 年 2 月发表出道作。因为过度追求作品质量而数次发生连续中断的情况，但人气依然经久不衰。从名片上足以证明水俣人特别需要世人的认可，太需要世人的理解和支持。田畑课长的介绍有三点是我们预料之外的。

首先，他谈到了日本的政府治理机构和运行体制。即议会和政党体制，而政党又代表着不同利益群体，例如：水俣市议会在决策时大部分议员都来自窒素公司或与窒素相关的人士，因此，在议会决策时，议会多数成员更偏向于企业，没有更多的考虑患者或受害者的利益。

其次，地方政府自治又与中央政府之间的行政关系。从市到县再到中央，复杂的层级管理也阻碍了中央政府的决策。由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当时信息化程度低，没有将在 1956 年正式确定的水俣病及时反映到中央政府。在 1956 年当时的水俣市政府，熊本县政府，县立医院，窒素公司附属医院联合组成了“奇病”对策委员会，而这样的对策委员会成员并没有中央政府的代表参与，这就造成了信息不对称，中央政府了解情况的渠道并不畅通。

最后，企业地位注定了他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作为水俣市税收大户的窒素公司在水俣市的地位显赫，水俣市政府和市议会更偏向于窒素公司，尽管市政府也对受害者拨出专款支付给水俣病患者和家属，即在 1957 年当时日本经济比较困难时期，市政府就支付价值 4000 美元给水俣病人并照顾家属，但上报日本中央政府并不十分及时，从而影响了日本中央政府系统的后期的政策研究、对公害影响判断和政府的决定。

2011 年 11 月 25 日我们拜访了熊本县环境生活部，特别重要的标志是在熊本县环境部下专设水俣病保健课，这也是日本政府机构仅此一家的设置。而在 1965 年时归属于卫生部负责，当时称之为公害课，后改为对策课，归属环境部门管理之后到 2007 年 4 月 1 日正式成立水俣病保健课，由此变革路线图可以看出，从 1965 年公害课到对策课，到保健课，可以看到政府对水俣病事件应对态度的变化。

熊本县环境生活部政策审议监内田安弘（YASUHIRO UCHIDA）先生告诉我们：水俣病是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发生的事件，目前依然没有结束，通过司法认定，熊本县行政负有责任，同时，水俣病发生之后，政府在恢复环境，公害问题的解决，对公害病的补偿确实经历了很长的时间，也希望中国能够借鉴日本的教训，起到一个参考作用。

在与熊本县环境生活部水俣病保健课交流之后，我们有机会直接与熊本县知事（相当于中国的省长）蒲岛郁夫教授就水俣病事件进行了交流。蒲岛知事的态

度是积极的，他告诉我们作为政治家对处理水俣病事件作出了三点承诺。第一，随着受害者的老龄化，全力以赴地救助受害者迫在眉睫。第二，胎儿患者水俣病的人数也不断增多，因此，解除患者生活中的日常不安。第三，努力开发复兴水俣再发展。同时蒲岛还提出一个控制水银的国际公约，此公约在讨论之中，他希望两年后能够将公约签署地安排在熊本的水俣市召开。应将水俣病的负遗产成为人类的一个教训，昭示全世界，也包括中国目前处于高速经济发展阶段，如何控制环境污染。

2011年11月29日下午在东京我们来到日本环境省，见到了刚刚于2011年初卸任的环境省副省长，现任环境省顾问，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小林光先生，这位长期在环境省工作的技术型、专家型的政府官员，他曾70次100余天在水俣市了解和研究水俣病事件，访问水俣病患者，他的观点就是解决现有水俣病的护理和福利问题，同时应将水俣市经济搞上去，提出日本应建立环境保护型企业，全民节约电力，提高经济效益。

当我们拜访四位行政长官们之后，我们又接触了一些日本民众，从事水俣病研究的大学教授，和水俣病相关的环保组织，以上人士对他们的回应是：日本政府做的很不够，反应滞后，法律和政策实施、应对措施滞后等。

### 五、民间组织的支援和影响——对日本水俣病事件相关民间组织的观察

对日本从事水俣病事件相关联的民间组织的观察，应该是我访问日本的主要目的之一，而日程安排中共有8家日本民间组织，其中5家在熊本县的水俣市，即萤之家（患者互助组织），全村博物馆（地元学校的实践基地），环不知火计划（环保教育旅游NGO），火热之舍（HOT.HOUSE，支援胎儿性患者NGO），相思社（支援患者NGO），三家机构在东京即东京财团，东亚环保信息发传所（中日韩跨国环保NGO），水俣论坛（MINAMATA Forum）在世界各地承办水俣展（传播水俣教训的NGO）。

从民间组织宗旨的视角分析与水俣病事件的关联度。事实上，我们拜访了八家日本民间组织中直接为水俣病提供支援和服务的组织为四家即萤之家，火热之舍，相思社和水俣论坛，其他四家可称之为间接与水俣病事件相关的组织，其重要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从民间组织成立的时间分析水俣病事件在不同的阶段其特点也是不一致的。



下面是四个民间组织的基本情况比较：

编号	组织名称	成立时间	机构负责人	组织登记城市
1	萤之家	1996	谷洋一	水俣市
2	相思社	1974	吉永利 夫，弘津敏男	水俣市
3	火热之舍	1998	加藤	水俣市
4	水俣论坛	1997	实川悠太	东京市

从我们拜访的水俣病事件相关的日本民间组织发展历程看，水俣病事件的发生过程中受害者的关注度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20年之后，相思社才得以成立，据相思社负责人弘津敏男介绍，刚开始成立的主要目标是帮助水俣病遇难者设立灵碑，向患者提供更多的帮助，刚开始确认的水俣病患者仅为140-150人，到后来已经达到了5万人，因此活动的范围发生了较大变化，并且活动的方式和内容也有所调整，弘津敏男指出：从机构成立37年过程中，水俣病患者数量逐年增多，社会歧视也随之减少。这些调研中我们发现一个非常奇特的社会现象，日本文化中的歧视现象出乎我们的预料，在水俣病发生的最初十年中，不少人特别歧视水俣病患者，水俣病患者的家属。他们还常认为贫困阶层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件，他们一定是贪图便宜，吃了腐烂的鱼，当一些歧视人群中也发现了患有水俣病时，他们发现自己的歧视观是有问题。

而对于标榜民主社会国家的日本，在发生公害之后的公民社会觉醒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简单，从拜访的水俣病相关的日本民间组织，其发起人和负责人并不来自本地的民众和受害者，而大部分都来自日本水俣市以外的城市的社会活动家，理想主义者和志愿者，从这一点的观察我从水俣-东京展，1996年9月28日至10月13日的宣传宗旨中文版介绍内容中得到验证。具体内容在第三自然段是这样描述的：

“明知公害的起因但仍一直在隐瞒的不只是窒素。（应该还有）我国（日本）行政当局：一个标榜民主现代化的国家，由于害怕这个问题波及以同样的生产方式的其他企业，因而对化工业打击度乃至拖延国家工业化政策，故对这些制造公

害的企业加以包庇。从这个角度看，水俣病的发生实属必然。另一方面，对于受害者民众要求停止排放废水，并承认错误，行政当局以警力镇压作为回应；市民则以白眼来对待他们。至于那些改革努力和宗教家们更不屑伸出救援的手”。

上面陈述的内容。不难看出日本政府、企业、公众和民间组织在对待公害事件的处理都没有一个超越的战略心态，而仍然在考虑他们自身的利益，尤其是企业和政府组织往往忽略受害者的基本权益。

对于日本民间组织运作的困难，也是我这次赴日本访问之前预料之中的，但是更多的问题主要出现在民间组织的专业运作之上。毋庸置疑，日本民间组织在整个水俣病事件的作用依然是明显的和突出的，也被水俣病患者和家属所认可。众所周知，日本公民社会的发展程度并不是与日本高度工业化相适应和相一致，日本民间组织面临着专业管理，筹资管理，资金管理，专业人员管理和透明度等方面的问题，也在拜访中表现其鲜明的特点，例如机构没有像样的简介，财务报告，年度报告，这样与日本民间组织发展程度密切相关。

## 六、日本水俣病事件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启示

从日本水俣病事件发生的时代，与中国目前经济高速发展有不少相类似之处，因此，日本水俣病事件的发生、处理和各利益相关者的斗争和博弈，对中国未来发展有以下五点启示。

第一．如何处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启示在日本政府，民间社会，大学研究机构，媒体等并不完全一致，因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和斗争是长期的。对于中国作为后工业化发展的国家，目前经济依然处于高速发展的时代，因此，处理好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是一个很大的难题，需要从战略思考的层面在战略规划层面下功夫，否则我们也会重走日本工业化进程中的不少老路，即先污染后治理。这样的代价并不符合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普遍规律。

第二．如何处理好公民社会发展与本国文化冲突之间的矛盾。这次 11 天日本的工作访问中，我们原先考虑的日本民间组织发展，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简单，实际上公民社会的运作与日本本土文化之间的冲突是明显的，而且也是长期的；水俣市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了工业化的都市，表面上，人口增多，大厦林立，市场繁荣，而工业化和现代化给水俣人民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幸福，这样的案例在中国也不乏其相类似的案例。而民间组织发展需要考虑本土文化的特点，例如民

间组织应建立在社区服务基础上，取得实践的经验，结合本土文化的特点，总结出一套可行有效的办法，再逐步进入倡导领域，这样的倡导才可能有说服力和达到实际的效果。

第三．利益相关者的博弈应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之上。从日本水俣病事件的过程中，律师的作用和地位不容忽视，一方面法制完善，另一方面依法行事。目前中国正朝着法制化国家方面努力和发展。因此，如何发挥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作用，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是最大可能的发挥法律体系中的主体机构例如：检察院，法院和律师协会等的作用。否则事件的处理永远留下了行政化的烙印，不利于法制建设服务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第四．进一步发挥媒体作用，促进社会公平。从日本水俣病事件处理前后十五年的经验和教训中可以发现，媒体的作用十分明显，而且日本媒体一直在长期关注，无论文字记者，还是摄影记者，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如何发挥媒体的作用，依然有很多挑战，例如，记者的人身安全保障，媒体的相对独立性和媒体客观、真实和专业的报道等。

第五．利用国际合作和交流的平台，共同分享工业发展经验和教训，水俣病事件发生 55 年过程中，国际组织，国际知名人士，国际会议等介入促进了日本政府的不断改革和改进，推动了事件有序的处理和解决。这一方面中国民间社会还缺乏经验，当然也有不少跨国企业和本土企业在中国污染环境的案例，如何利用国际社会的力量，减少本土的污染，促进污染处理技术的引进，保证企业能够真正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

总之，这些启示对我国政府制定国家发展规划，公害事件处理与社会稳定，民间组织如何健康发展，公害事件的法律责任，以及公害事件中如何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等，都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课题。由于时间有限，不少体会和个人的观察和肤浅的认识，不足之处也请其他代表团员指正。

2012 年元月 15 日 于北京海淀区天秀路

### **5. 访日随想—现代化与知识分子的责任(曾少军)**

本来规划好春天成行，访问我一直认为可以从中学习发展经验的日本。不幸一场突如其来的特大地震和海啸，以及随后引发的福岛核事故巨大灾难，打乱了大家的行程。但我坚定地认为，即便是教训，也足资镜鉴。因此，日本是一定要

去的。

从九州的水俣病考察，到白柳庄的徜徉，以及随后新干线北上福岗，最后飞抵东京。一路行来，我们见到了各色人等。既有因工场排放汞污染导致水俣病祸害仍在痛苦挣扎的患者，也有人去村空、苦等年轻人归来的乡镇；既有为患者几十年如一日呼吁、争取权利的 NGO、记者、摄影师、医生、学者，也有为此痛悔不已的排放企业，甚至还有反思自省的市、县（相当于我们的省）政府、中央政府的相关机构和管理人员。当我在东京地铁面对巨大的人流，行色匆匆、奔忙于各个方向、各个角落，去谋求自己的生活、拼命自己的事业的时候，我不禁问自己：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发达现代化国家吗？

但林毅夫说，现在的中国，正像 1951 年的日本！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建设自己的现代化国家。记得小时候提的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即建设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国家；但现在现代化更多指的是工业化和城镇化。那么，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日本走过了一条怎样的现代化之路呢？

首先看工业化。日本的工业化先学德国、后赶超美国，不可谓“化”得不彻底。但随之而来的大量环境污染事件，弄得日本至今仍在为此还债。一个占全球 70% 液晶显示市场份额的窒素公司，建设了一个新城水俣市，也留下了几万个残疾的汞污染患者。1956 年就已经明白致病原因就是该公司的污染排放，可是却等了漫漫 12 年才决定关掉排放车间。更不用说随后在新瀉重演的汞污染事件，和其他地方各种各样的环境灾难。日本学者告诉我们，现在日本的大城市里有一种叫做“光化学”的污染，可以导致小孩行走在大街上就晕倒，因此，经常有“光化学”警报响起，此时学生可以不用上学，待在家里躲避污染。日本政府官员告诉我们，一个环境污染带来的治理、补偿、修复成本，是其企业排放生产所获利的百倍！日本的福岛核事故，可以说是一次工业化与环境治理冲突的总暴发，连前环境省副省长小林光也说：在日本，反思环境监督治理与行政管理关系已经体现在大部分领域，但福岛电站是个例外，环境治理仍服从于行政管理，这可能也是悲剧发展的原因之一。可是我们现在却正在拼命追求 GDP、搞大工业、上大项目，还在重复先污染后治理、甚至污染不治理而要 GDP。日本的福岛核辐射污染，在海水的反复涤荡下，正在逐渐减弱、消散，那些正在中国内陆兴建的核电站，一旦发展核污染灾难，将靠什么去消散、涤除呢？

再看城镇化。我们到了水俣市的北部山区小镇，第一个引发的好奇的，是一个老农，在方圆不到 5 平方米的屋旁小地里开着一部农用翻土机整地，一问年龄，已经 75 了。深入田地我们才发现，日本的农村城镇化可谓“化”得也非常彻底：连田间水埂、小道，都已经全部铺上了柏油、石渣，现代化的农耕机械可以到达田间、地头的任何地方。更不用说其精巧的灌溉系统，让每一寸土地都可以得到及时的水分补给。但更多的，我们看到的是如那个 75 岁仍在田间劳作的“年轻人”，看到的是空空如也、用来做旅游接待点的小学校，看到的是赤脚倚靠在马路水泥桥边晒太阳的 94 岁老婆婆。孩子们呢，一问，才知生育率本来就低、仅剩的几个年轻人去了福岗、东京。我不禁想到，这种空心化的农村情景，不正如我们现在广大的乡村吗？所差的只是我们没有发达的水利灌溉系统，没有先进的农耕机械深入田间地头。当然，更大的区别还在于，日本的年轻人到了城里，不像我们叫做“农民工”！

日本的学者早在五、六十年代就开始了反思，开始了行动。在全球左派运动风起云涌、在中国知识青年发起红卫兵运动、上山下乡的时候，日本的一批年轻人，也不顾一切地投身到了环境保护的各种运动之中。我们见到的原田正纯、谷洋一、吉永利夫、弘津敏男、高峰武等人，从各个层面、各个角度，参与了对工业化环境外部性的治理和修复，他们发表文章、参加游行、走访患者、约谈政府，许多人为此奋斗了大半辈子，甚至整个家庭；我们来了解到了寺西俊一、淡路刚久、吉井正澄、土本典昭、盐田武史、川本辉夫等学者对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关系的深邃思考和学术耕耘；我们也还看到了水俣前市长的女儿和夫人，在“地元学”的倡导下，致力于农村优势和荣耀的挖掘，试图以此唤回大城市里的年轻人，来治理和修复农村城镇化的外部性和空心化。

我们中国呢？中国的知识分子呢？我们好象习惯了自家小窝的营造，好象习惯了“说了也没用”的推诿，好象忘掉了我们身上的责任已经太久了。现代化与知识分子的责任，这已经成为我们此行访日归来应严肃思考的命题了。现代化的道路，日本已经走过；环境治理与修复，日本已经在改进。作为近邻的我们，殷鉴不远，胡不反思？

2011-12-24 于北京右安门半步桥

## 6. 水俣に学ぶための「想像力」(田原真司 フリージャーナリスト)

2011年11月20日から30日まで11日間にわたった水俣、熊本、東京での調査を通じて、私の心中に最も深い印象を残したのは熊本日日新聞論説委員長の高峰武氏の「想像力」という言葉であった。高峰氏は水俣病問題の歴史におけるジャーナリズムの役割について語る中で、過去と未来の2つの事例を挙げて「想像力」の重要性を強調した。

過去の事例とは、水俣病の早期発見に関する想像力である。水俣病の公式発見は1956年5月だが、実際には1932年にチッソがアセトアルデヒドの生産を開始した時から有機水銀を含んだ工業廃水による魚介類の汚染が始まっていた。異変が表面化したのは、第二次世界大戦後の日本の経済復興とともにチッソがアセトアルデヒドの生産を急増させた1950年代であった。

水俣湾沿岸の漁村で猫が次々に狂い死にする現象が起こると、1954年8月1日付の熊本日日新聞は「ネコてんかんで全滅、ねずみの激増に悲鳴」と題した記事を掲載した。後から振り返れば、これは有機水銀汚染が生態系にもたらした異変をメディアが初めて報道したものであった。

「この記事には多くのヒントが含まれていた」と高峰氏は指摘する。当時取材にあたった記者は、「猫が死んでねずみが増えた」という事実を報じただけで終わってしまった。しかし、仮に記者が「猫はなぜ全滅したのか」、「漁村の猫は魚を食べているから、魚に問題があるのではないか」、「漁民も魚を食べているが、人間に異変は起きていないのか」などと想像力を働かせ、検証するための追加取材をしていたら、水俣病の発生をもっと早く発見できた可能性があったという。

環境保護に関する社会の意識が希薄だった当時の実態を考慮すれば、記者がそのような想像力を働かせることは難しかっただろう。とはいえ、この失敗を教訓に全てのジャーナリストが環境保護への意識と知識を高め、最大限の想像力を発揮して取材に取り組むならば、今日も世界各地で起きている環境汚染の拡大を食い止める大きな力になるはずである。

次に未来の事例とは、水俣病の教訓を次世代に引き継ぐための想像力である。高峰氏は1976年に熊本日日新聞に入社して以来、35年間にわたって水

俣病問題取材し続けてきた。高峰氏の新人記者時代には多数の患者や支援者がチッソと行政を相手に訴訟を起こしており、水俣病は正に“生きた事件”であった。

しかし、今日の新人記者が水俣病発生当時の状況や、患者支援運動が最も盛んだった1970年代の熱気を“実感を伴って”理解することは至難と言える。患者の多くは高齢化して鬼籍に入り、1995年の“政治決着”と2009年の特別措置法成立を経て、ほとんどの訴訟が取り下げられてしまったからだ。そんななか、水俣病の教訓を次世代に語り継ぎ、同じ過ちを繰り返さないために、今日の記者には「過去の状況を思い描き、深く理解するための想像力が必要だ」と、高峰氏は指摘した。

高峰氏が語った「想像力」とは、直接的には公害問題を報道するジャーナリストが取るべき姿勢、持つべき心構えを意味する。だが、この言葉が私の心に深く残ったのは、私の職業がジャーナリストだからだけではない。公害問題に係わる全ての関係者――被害者、加害者、行政、支援者、研究者などが意識的に「想像力」を働かせることで、公害の予防、環境汚染の拡大防止、被害者の苦痛の軽減、公害の社会的コストの抑制、地域社会の再生などに極めて重要な役割を果たすことができるはずだと感じたからである。

今回の訪日調査の準備にあたり、水俣視察の提唱者である肖夢女史と団長を務めた王名教授は、調査対象の選定や訪問受入先との交渉を私に一任してくれた。それは私にとって光栄であると同時に大きな挑戦でもあった。正直に告白すれば、2011年初めに準備をスタートして以降、私は自分自身の知識と想像力の欠如に何度もため息をつく羽目に陥った。

1967年生まれの私にとって、水俣病は学校の教科書で学んだ公害事件の1つに過ぎなかった。被害者と加害者・行政の紛争が続いていることは、新聞やテレビの報道を通じて知ってはいた。しかし、残っている争いは一部に過ぎず、全体として見れば事件はおおむね終結していると思い込んでいた。

私は1990年に記者になり、一貫して経済・経営の分野取材してきた。環境問題や公害問題を本格的に取材した経験はない。それでも長年の経験から、被害者側と加害者側および行政の主張が大きく食い違うであろうことは予

想できた。そこで調査の準備にあたり、まず被害者の立場と行政の立場から書かれた基礎的な文献を探すことから始めた。

ところが、私はいきなり壁に突き当たった。水俣病に関する文献はあまりにも多く、筆者によって着眼点や主張が異なり、時代による変化も大きかった。いわゆる「定説」が存在しないのである。水俣病問題の素人である私が調査をアレンジするためには、専門家の協力と助言が欠かせない。だが、文献を読めば読むほど、一体どの専門家に協力を求めるべきなのか見当がつかなくなった。私は自分の認識不足に頭を抱え、最初のため息をついた。

そこで私は作戦を変えた。かつて水俣を取材した経験のある後輩のつてを頼り、環不知火プランニングの吉永利夫理事長を水俣に訪ねてアドバイスを求めたのである。吉永氏は40年前に水俣病患者の支援運動に身を投じ、支援団体の役員を長年務めた。その後、水俣病の教訓を次世代に語り継ぐ「教育NPO」を設立し、行政とも連携して活動している。患者側と行政側の双方に人脈を持つ吉永氏に相談すれば、調査プログラムを組むためのヒントが得られると考えたのだ。

ところが、吉永氏が語った水俣の現実は、私が文献から想像していたよりもさらに複雑だった。患者たちは現在も複数のグループに分かれ、それぞれが違う支援団体や専門家と結びついている。思想や信条の違いだけでなく、感情的なしこりも存在し、患者グループ間の横のつながりは弱い。行政サイドにも、問題の解決に積極的な人々と消極的な人々がいる。患者グループと一般市民の間にある深い溝も埋まっていない。公式確認から55年もの歳月が過ぎたにもかかわらず、水俣病をめぐる地域コミュニティはばらばらに分裂していた。

私は再びため息をつかざるを得なかった。と同時に、吉永氏の話聞いて腹をくくった。特定の専門家に頼って調査プログラムを組むことは諦め、調査すべきテーマや会うべき人物を本位に、個別にアプローチすることに決めたのだ。最終的には5つのルートを使い分けて調査プログラムを組んだ。このように複雑な作業は、準備を始める前にはまったく想像していなかった。

高峰氏の「想像力」という言葉が深く心に残ったのは、私が事前にこう



した経験をしていたからだろう。私は水俣病問題を“生きた事件”として経験していない今日の記者の1人である。もし誰か特定の専門家に調査のアレンジを任せ、深い予備知識もないまま水俣を訪れていたら、「55年も過ぎたのになぜ問題が解決しないのか」「患者グループはなぜ協力しないのか」「行政は今まで何をしていたのか」など、安直な疑問と批判を思い浮かべるだけで終わっていたかもしれない。

実際には、今日の水俣の姿は55年間におよぶ紆余曲折の歴史の集成物である。今回の調査で我々が実際に話を聞いたすべての人々は、水俣病問題と真剣に向き合い、解決をはかろうと努力していた。社会的地位や経済的利益を捨て、半生を捧げて戦い続けてきた闘士も少なくない。にもかかわらず問題が解決できない背景には、表面からは見えない何らかの必然的理由があるはずである。その姿は「想像力」を働かせなければ見えてこないのだ。

必然的理由とは何だろうか。私にヒントを与えてくれたのは、調査団メンバーの汪永晨女史と水俣フォーラムの実川悠太事務局長の次のようなやりとりだった。汪女史は、「我々は公害問題の解決方法を学ぶことを期待して水俣を訪れた。しかし水俣の現実を知れば知るほど、解決方法がわからなくなった」と困惑の表情で問いかけた。これに対して実川氏は、「それが環境汚染の恐ろしさだ」と応じ、「近代的価値観の限界を象徴している」と付け加えた。

実川氏の回答は抽象的に過ぎたが、私は自分なりに次のように解釈した。自然環境はいったん汚染してしまうと、元の姿に完全に戻すことはできない。それは大自然の“一部”である人間社会も同じである。水俣病の犠牲者は決して生き返らないし、患者たちの傷ついた神経細胞は元に戻らない。患者とその家族の苦痛は金銭で取り除くことはできないし、分裂し対立したコミュニティを政府の補助金で再生することは不可能だ。

要するに、既に起きてしまった環境汚染に対する根本的な解決策はあり得ないのである。これは、多少なりとも「想像力」を働かせれば当たり前の話だ。ところが、現実には公害の被害者も、加害者も、行政も、支援団体や市民たちも、「解決」という言葉を当たり前のように使っている。解決策のない問題に対し、立場の異なるグループがそれぞれ“完全解決”を求めても、認識の

ギャップや軋轢が埋まることはないだろう。

もちろん、完全な解決策はなくても状況を改善することは可能である。だが、解決策がないことを自ら認めるのは、被害者にとっては希望の喪失を、加害者や行政にとっては無限の補償を意味しかねず、受け入れることが難しい。そうやって半世紀以上も堂々巡りを続けてきたのが、水俣病問題の歴史の一面と言える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

ここから学ぶべき教訓の1つは、逆説的な言い回しになるが、「公害問題に性急な解決策を求めるべきではない」ということだろう。本来解決策がない問題を無理に解決しようとすれば、むしろ軋轢を増幅させる。水俣病問題の初期段階で、チッソは少額の見舞金で患者の口を封じようとした結果、後に「反人道的企業」とのレッテルを貼られた。日本政府は1968年の公害認定、95年の“政治決着”、2009年の特別措置法など少なくとも3度にわたり「完全解決」をはかったが、所期の成果を上げられたとはとても言い難い。

「水俣病問題の歴史は常に少数の弱者が切り拓いてきた」。今回の調査で、支援団体のリーダーや研究者たちは口々にそう指摘した。その理由を「想像力」という切り口で解釈すれば、被害者にとって水俣病は一生背負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苦痛であり、強者（加害企業や行政）の言いなりにならないために想像力を最大限に働かせて闘う必要があったと推察できる。

一方、加害企業や行政の当事者（企業の経営者、政府の首長や議員、公害対策部門の担当者など）は、通常は数年おきに交代する。個々の当事者がいくらか職務に忠実でも、水俣病が自分の一生の問題という認識は持ちにくいのが実態だろう。困難な問題への対応は「任期が終わるまで先送りにする」か、「中途半端を承知で任期中に処理する」のどちらか極端に振れやすい。水俣病問題に限らず、企業や行政などの大組織に共通の弊害と言える。

このことは、特に行政の当事者が「想像力」を十分に働かせて問題に向き合うための障害になっている可能性がある。1995年の“政治決着”と2009年の特別措置法が、いずれも国政レベルの政権交代（95年は自民党、社会党、新党さきがけの連立政権、09年は民主党政権が誕生）が起きたタイミングに重なったことは偶然ではない。政権交代という外部環境の変化がなければ、過

去の政策を大きく修正する決断はできなかったのだ。

水俣の教訓から中国は何を学ぶべきか。これは中国の人々が自ら考えるべきテーマである。外国人である私が余計な口を差し挟むのは控えたい。ただ、1つだけ個人的な希望を述べさせてもらうならば、水俣の教訓に学ぼうとする全ての中国の同志たちに、持ちうる最大限の「想像力」を発揮してもらいたい。高峰氏が今日の新人記者に望むように、自分が経験していない水俣病の歴史や、その中を生きてきた当事者たち——被害者、加害者、行政官、支援者、研究者、ジャーナリストの気持ちに思いを馳せ、なぜ問題が解決できないのかを深く思索していただきたい。

反対に私が最も恐れるのは、水俣の教訓の表面だけを見て「同じ失敗をしなければいい」、「自分をもっとうまくやれる」と思い込んでしまうことだ。繰り返しになるが、既に起きてしまった環境汚染に対する根本的な解決策はあり得ない。そういう冷酷な現実の下で、水俣とは異なるどんな道筋があるのか。中国の同志たちの「想像力」で模索してもらいたいと、心から願っている。

## 7. 从对比中看差距（贺信）

如果你看过最近出版的《我们最幸福》，就会明白为什么在境内使用google是一件让人心烦意乱的事。前者通过逃离朝鲜的人描述了他们如何在号称“最幸福的国家”生活，而书中相当多的讲述者，是因为通过某一个渠道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才下决心离开自己的国家。

如果我们放开google中对公害病的搜索，后果与此类似。事情会朝着与信息控制者意图相反的方向发展。我把每一次出国机会，看作突破互联网封锁的机会。西方发达国家的今天或许就是我们的明天。很多问题没有比较无法得到清楚的结论。

这是我第二次到日本。第一次是福岛地震期间。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回的报道，除了告诉读者，“新闻发生了，记者在现场”之外，并无更多价值。回国后与同事讨论，我们得出的一致结论是，就国际新闻而言，如果记者没有持续的观察，无法完成有见地的报道。

这一次再访日本，当地受访人物差不多都对日本处理福岛核危机的态度和

措施持批评态度。紧紧追问、细细琢磨，才多少弥补了一些地震之行的遗憾。然而就像装修房子一样，当你总算明白装修的窍门时，已经没有第二套屋子让你施展，当我总算对核危机有了稍微清晰一些的判断时，新闻最受关注的时期已经过去。

不过这样没有关系。既然日本各界在评论当下事件时，拿出水俣病作为参照。理解水俣病，即是进入这一领域的起点。更让人有所宽慰的是，即便是高峰武这样最早对水俣病进行报道的日本同行，身处当时当地，亦没有完成事后让他满意地报道。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他对我们说：“怪病发生的时候，最早接触的记者应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个人认为，感想背后，带着他本人的遗憾。

作为长期从事法制报道的记者，我最关心的还是日本司法系统在处理水俣病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这并不是因为我崇洋媚外，而是中国司法系统在近些年处理类似案件中的表现实在是太令人失望。

仅以结石宝宝系列案为例。这些案件中，有两个人物特别需要注意。第一位是赵连海。赵连海的儿子是毒奶粉受害者，求告无门之时，他自己组织了维权组织。组织成员举行过聚会，三鹿奶粉案开庭时还到法院门口拉过横幅、喊过口号。于是这些行为都成了他的罪行，罪名是寻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

我们访问过吉永利夫。他以自己的经历回忆说，受害者团体和窒素工厂对峙时，“白天我们在工厂门口静坐，晚上就和白天相互对峙的保安一起喝酒”。在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出版的一些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直到对峙后期，渔民团体将怒火转向警方，警方在“收拾”了一些抗议者。赵连海的行为远远不能和这些人相提并论，但是他收获了两年半的有期徒刑。

另一位父亲叫郭利。郭利曾经和广东一家奶粉生产企业达成过私了协议。这是他在当时环境下最好、甚至是唯一的选择。事后他希望得到更多赔偿，结果被企业“钓鱼”，以敲诈勒索罪举报到检察院。

在日本，我们接触到与此相关的案件，是日本法院对窒素公司和受害者团体私了协议的判断。法院说，该协议是在双方不对等，并且剥夺受害者合理诉求的条件下达成的，判断其“违背公序良俗”应属无效。日本受害者在司法判决中获得更多赔偿，而中国的郭利被处有期徒刑5年。

于是我做出了一系列假设：

如果我们能够保证赵连海的诉讼权利，他会不会走上一条带有对抗色彩的道路？如果我们给郭利和企业对簿公堂的机会，他又会不会在公司利诱之下，萌生所谓的“贪婪”？

这也是中国律师界热烈讨论过的问题。这个群体希望介入结石宝宝诉讼，但是只有为数不多的人真正进入。一方面是因为立案本身极其困难，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得不到律师协会和司法局的支持。

在日本，律师尾歧俊之律师说，他们拿着起诉状，走村串户动员受害者家庭参与诉讼。我倒不认为这是因为出于对受害者完全的同情，毕竟律师和受害者签署的是风险代理协议，但是这又有什么不好？遗憾的是，中国律师是不能这么做的。那样意味着在未来的工作中，可能受到各种刁难，比如，案件只要是他带来的就赢不了。

更让人触动的，是日本法官的所作所为。律师铃木尧博介绍说，在律师申请之下法官造访了受害者家庭。他们事后接受采访时说，“今天水俣在下雨，我们心里也在下雨”。在中国，这是难以想象的。

除此之外，我心里的假设还包括：如果原田正纯医生在中国，他会面临什么样的局面？我有一种感觉，在各种受害人支持团体内，他是一个精神领袖。原田正纯首先是专业人士，医学方面的成就已无须赘述。他还是受害者坚定的支持者，正如他所说，专业人士所谓的公正是没有的，当他们站在受害者一方，加害人和受害人之间的天平才能平衡。

关于这个假设，我有一个答案：如果原田医生不够小心谨慎，他的罪名恐怕就和组织领导黑社会有关了。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前几天，有中国的法学家提出，政府不应该介入利益型罢工。其实在中国，介入利益之争的何止是政府。然而又是哪一种力量把包括法院在内的司法机关推向了利益之争当中的某一方？

日本记者高峰武说，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他都会思考一个问题，关于水俣的报道，还会向哪些方面衍生。我深深理解引发他思考的原因，那是记者的困境。你无法去制造一个事件，也不应该去鼓励某种行为。事件要有进展我们才有报道的空间，而只有当接力棒在各种社会群体中传递的时候，事件才能发展。因此诸如环保、食品安全等公共领域发生的问题，最终可能演变成一场社会运动，

这就是日本水俣病在过去几十年展现的图景，也是当权者忧虑所在。

水俣病考察给了我一个背景。今后遇到类似的报道题材，记者可以有所预判。而我们的土壤就在中国。

## 8.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水俣（陆海空）

俣，YU，三声，同“语”的音。查新华字典，解释为“大”，只有这一个意思，也没有列出任何的例词，看来平时都用不到，这是在中文里。“俣”在日文里是个象形字，分岔口的意思。

水俣，是日本南部的一个地名，那里有大片的水，蓝色，尽量的想象平静美丽都不会太过分，这片水是个鱼类丰富的内陆海——不知火海。水俣位置偏僻，在日本，像这样从小村发展起来的可爱小城非常多，绝不起眼。

水俣其实在世界上是有些知名度的，那是在一定的领域内，比如医学领域、环境污染研究领域，比如纪录片领域。

水俣的知名来自水俣病，水俣病是中毒性神经系统病症，1956年在水俣湾周边地区首次出现并得以确认，并且用这里的地名来命名。

1932年，设在水俣的窒素化工厂开始向大海中排放未经处理的、含有甲基汞的污水，汞在鱼、贝等海洋生物体内聚集，人们长期大量食用后中毒，反映在神经系统中，最先出现症状的是渔民，他们手脚的感觉麻木、运动失调、视野变狭窄、听力下降、身体无法保持平衡、说话发音含糊不清、手脚不停颤抖等等。怀孕的妇女通过胎盘导致胎儿甲基汞中毒，生下患有类似于神经性小儿麻痹的胎儿，这个被称为胎儿性水俣病。不是通过空气和食物传播的传染病，也不是遗传性疾病。

水俣病的特殊性在于环境污染引起，这个污染以及伤害，随着海水扩散，一直从水俣湾影响到对岸的各个岛屿，不知火海的全体都受到了波及。从中产生的各种问题，如何治疗，如何界定责任，怎样赔偿，被污染的环境怎么进行治理，怎样把由此产生的灾难性影响降到最低，都混杂着多方的利益以及人性中的善与恶。呈现出的复杂程度，都超出了人们的经验。提到水俣病，已经不是一个疾病的概念，更多的是提到水俣病事件，这被认为是目前为止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公害事件。

今天能够这样清晰地表述，是因为已经有了长达五十多年的斗争，最开始的时候连水俣病的由来都搞不清楚，看到患者跌跌撞撞，身体扭曲，甚至口眼歪斜，以为是一种怪病，流行病。水俣人被当成瘟疫一样受人歧视。

在正式确定水俣病之后一年，1957年，窒素化工厂的内部医疗机构就通过给猫喂食水俣湾的鱼，猫出现了症状，从而确认了水俣病是由汞污染造成，但是为了利益企业没有公布，继续生产和排污，政府也为了利益不肯宣布禁渔，因为宣布了就等于承认了化工厂的污染。

企业采取的唯一措施，就是把排污口秘密挪到了更开阔的水域，以为这样可以稀释汞的浓度，让水俣湾的人不受污染，没有想到的是，这扩大了污染的面积，导致了更多的人生病、死亡，最终引发了抗议斗争。受害者及家属走上街头，走到政府和企业的门口，静坐示威。

当时窒素属于日本的支柱型企业，所以，任由抗议活动多么激烈，死亡和患病的人数怎样增加，仍然继续生产和排污，直到企业本身不需要那种工艺制造产品了，政府才正式发表声明，认定熊本县水俣病为公害。这时候已经是1968年，也就是水俣病正式确认12年后。

我知道水俣病是1997年，在首届北京国际纪录片学术会议上，由《东方时空——生活空间》的制片人陈虻发起组织的，在那次会议上，我记住了小川绅介、土本典昭的名字，他们做纪录片的方式，坚持的纪录片精神，是所有纪录片工作者的榜样。虽然当时并没有看到关于“水俣病”的影片，但是，有时候里程碑似的作品就会有这种力量，在传说中深入人心。

2011年的调研因为日本地震以及核辐射而延误，直到11月才成行，我也没有想到第一次去日本就能到水俣。

在水俣，访谈的第一个对象是原田正纯医生，他证明了汞可以通过胎盘由母体传给胎儿，过去的医学知识认为，母体的胎盘可以过滤掉毒素，保护胎儿，但是，在水俣，有些婴儿一生下来就有类似神经性小儿麻痹的症状，原田医生的研究打破了这个固有的观念，由此水俣病的胎儿性患者就有可能得到应有的治疗和赔偿。

在原田医生的工作室，当我向他摊开两手表示没有带名片的时候，他笑了，他笑着把手中他的名片递给了我，没有一点停顿，我知道他看出来了我非常想留

下他的信息，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更多的表示。后来我经常想起这个细节，这样的医生一定是体谅患者的医生，更何况他又是那么的和蔼，样貌和气质符合所有的关于一个好医生的想象。

房间的窗帘拉上，光线暗下来，原田医生打开他的 PPT，他的开场居然说的不是水俣，是福岛，是刚刚发生的核辐射。在他看来，地震后的核辐射会产生公害，当年窒素化工厂的排污口就是水俣病的起点，海水受到了污染，浓缩在了海洋生物的体内，因为食物链，反映在了人的身体上；福岛的核辐射也污染了海水，虽然暂时会稀释，将来是否也会浓缩在海洋生物的体内，最终影响人类呢？在福岛事件中，政府并没有吸取水俣病事件的教训，这些都是需要深思的。

原田医生在他的介绍中，除了疾病本身，他还提到了企业的立场，提到了患者的立场，新闻界的报道，医学界的研究方向，政府的措施等等，他更像是在分析整个社会的疾病，希望社会各界通过自我反省，自我治疗，让公害病不再发生。

交流中，我问了自己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他和别人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尤其和之前的医学结论相悖的时候，是否受到了压制，或者打击。他又笑了，他说，这些不是那么明显，但是，他从没有被日本医学界研究汞中毒的学术机构邀请和承认过。

实际上，原田医生是在汞中毒研究方面做出巨大学术贡献的人，当有结论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局面，那么在研究的过程中，不知道都有怎样的具体的困难阻挠着，但是，他坚持下来了。

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有那些可爱的患者吗？

坂本忍，胎儿性水俣病患者，今年 56 岁。她非常聪明，尽量控制着四肢的抽搐，读完了中学，她会写诗，向往爱情，但是真的很难控制住面部的神经，很难像普通人一样表达感情。她和妈妈一起参与为水俣病患者争取权利的各种活动，到过世界上很多地方，身上披挂着标语，手中拿着传单。坂本忍的母亲，86 岁，现在要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女儿，她淡淡地叙述，没有什么表情，几分钟讲了几十年的经历，全是水俣病，生活里没有其它的事情了。这样绝望的生活，她们也一直坚持着。

因为什么呢？是什么给她们希望呢？



是因为生活中有原田医生，有盐田武史这样的人吗？

盐田武史是个摄影师，是那种要和拍摄对象真正生活在一起的摄影师，这样的人出所谓的成果会慢，所以他在水俣待了16年，从23岁到39岁，他拍下了4、5岁的，穿着花裙子的坂本忍，拍下了挎着书包走在上学路上的坂本忍，拍下了穿着和服进行成人礼的坂本忍，还拍下了在斯德哥尔摩参加第一届人类环境大会的坂本忍。

他会逗那些生病的小孩笑，患有严重水俣病的小孩路都走不了，喜欢看他们做那些他们永远做不了的动作，而他翻越窗户的目的就是逗他们笑，不是为了拍他们的笑脸。

盐田武史也尝试形式，比如带着患者专门坐车到海边，到被污染的地方拍照，照片的效果很好，烈日下，患者被亲人抱在怀中，背景是大片的土地，很讨人目光，被做成海报，他也贴在墙上，但是他会告诉我们，他不喜欢那种。

我试着问他，希望他能够用语言总结他喜欢的又是怎样的画面，但是他不肯，他坚持用画面说话，让人们自己去看自己去总结。他指指那些水俣病患者生活中自然状态的画面，又翻开了一本图片集，他说，我喜欢这样的，这是患者和患者的家里人都很喜欢的。那是一张少有的彩色的照片，女孩穿着蓝底红花的衣服，袖子是红色的，有白色花边做的领子，袖口上也有花边，整个色彩是暖暖的，不能正常合拢的两只手巧妙地叠放在一起，好像是特意做的手势，脸红扑扑的，嘴边也没有因为控制不了留下的口水，完全不是水俣病人的样子。这样的图片很难有所谓的视觉冲击力，不能作为控诉的武器，也不能取得什么大奖，但是，对于水俣病患者和家人来说，那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瞬间，也是最难得的瞬间。

这样的具有真正的纪录片精神的人怎样生存呢？好在他当年拍下的水俣图片有很高的报酬，现在也拍一些商业图片，比如饭馆的宣传单，上面是精美的日本料理。从水俣病到日本料理，中间没有过度么？他也去过世界上一些地方拍公害病，比如印度，但是都不如水俣病这么有反响。

盐田武史对目前纯粹的商业拍摄工作似乎很坦然，也许这也是一种坚持，如果做不到像在水俣那样的拍摄，就不如拍些商业图片。

在水俣，我们还见到了坚持几十年报道水俣病的媒体人——高峰武，见到了坚持留在水俣支援水俣病患者的谷洋一，吉永利夫等等。

有意思的是政府官员们，他们也在坚持，坚持说当年的情况复杂，政府已经尽力了；坚持着符合世界潮流的声音，强调环保的重要，强调弱者的利益，但是水俣病的普查始终没有开展，水俣的环境治理也没有真正的解决。他们坚持的还是利益的水俣。

斗争还在继续着，随着患者的远去，水俣病事件也慢慢远去，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水俣，都在为此坚持，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我们要坚持什么呢？

我经常想起坂本忍和她的妈妈，想起她们合影时才略有笑意的脸；想起水俣的那些学者们关心地询问中国的公害；想起我们离开日本之前，田原举起酒杯对课题组《财新》的记者贺信说，“祝你在松花江找到中国的水俣病”！想起吉永利夫，他把我们当成知己，讲述自己的爱情故事；想起高峰武，怎样能够做到持续报道“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心里的水俣就是这些人，这些为了公害事件不再发生的人。

回国的时候，在 T3 航站楼，我下意识地没有花掉手里的日元，也许，也许哪天就又要去那里了吧？！

## 9. 水俣：美得揪心，却令人敬畏（杨丽）

### ——基于日本水俣公害及其治理的调研

水俣，当我第一次听王名老师说起时，不曾知道“俣”念“yǔ”，也不曾知道水俣公害水俣公害位居日本四大公害之首、在全球公害中也是名列第一，足见我有多么孤陋寡闻。从王老师办公室出来，回到几步之遥的办公室，马上通过网络搜索相关资料，得知昔日这个因有机汞而受污染的公害小镇，今日已成环境友好与生态模范城市，我很好奇，是什么方法这么神奇，让一个工业污染如此之重的小镇竟然凤凰涅槃为环境友好与生态模范城市？今日中国，恰似日本 20 世纪 50 年代的翻版，工业污染严重，各级政府却唯 GDP 是举，遵循着先污染后治理的思路，经济的发展肆无忌惮地以无辜者的健康甚至生命做代价。难道真的可以先污染后治理？

随着课题的策划与实施，对水俣的了解越来越多。尤其是肖梦老师与田原真司先生陆续提供一些经典的或比较有价值的日文、英文与中文的影像、图片与文字资料，我们对其中 13 本日文、1 本英文书籍进行了中文翻译。这时发现，公

害治理是一个艰难而复杂的博弈过程，公害远远超出了公害本身。虽然原田正纯医生写的《水俣病远未终结》一书也译成了中文，但没有仔细阅读。去水俣之前，我的大脑中已存成见：尽管曾经惨不忍睹、步履维艰，但水俣公害是水俣的昨天，而水俣生态是水俣的今天。因此，我是怀着了一颗虔诚地学习水俣成功的公害治理经验之心踏上水俣之旅的。

### 走近水俣，恬美却令人揪心

水俣市在熊本县的最南端，西朝不知火海，其余东、南、北三个方向都被山包围，其东面和南面的山与鹿儿岛县的北端直接相连。不知火海，没有“海”这个词所表达的奔腾与粗暴，而是保留着自古以来的原始样子——安静。在不知火海对岸隐约可以看到天草诸岛，诸多岛屿相连环抱着不知火海，将它与外面的大洋隔开。不知火海可以说是一片封闭的水域。水俣市面积不大，仅 162.89 平方公里，且约 74% 是山林地带。这种位置和地形造就了水俣这片土地的特征：进入近代之前的水俣人，与日本随处可见的一样，他们穿着朴素的衣服过着平稳的半农半渔的生活。正因为如此，水俣人从内心深处很高兴地迎来集近代化精髓于一身的化学工厂——氮肥厂（后改为窒素株式会社，现称 JNC 株式会社，下文使用窒素公司）。但也是这家工厂，在乙醛生产中，使用无机水银作为催化剂，而无机水银的部分有机化为有机汞，未经任何处理随污水排入大海，鱼贝类体内的有机汞含量因之大大提高，水俣市民因长期大量摄取这些高有机汞含量的鱼贝类而导致中毒性疾患，这种疾患起源于水俣，后来便以这所城市为其命名为水俣病。

我们站在水俣生态公园的草地上，望着清澈的大海，还有不远处零星点缀的海岛，秋日阳光下的水俣很美，宁静而恬淡，像世外桃源，令人沉醉。然而，高浓度有机汞的海底淤泥就掩埋在脚下的土层里，而这些填埋材料的保质期是 50 年。20 多年过去了，有专家已经发现不少掩埋地线附近均出现渗出的白色带，有点像石灰但不是石灰，若隐若现，时明时暗，尽管还没有探明确切缘由，但与掩埋有关却很难推翻，民众自然有忧虑情绪。望着满眼的秋色，水俣人踏着秋天依然翠绿的草地，草地之下，却埋着一颗不定时炸弹，什么时候会吞噬自己，无人知晓。

在《水俣患者的世界》、《回忆川本辉夫》、《水俣病 20 年》这些纪录片中，我们看到令人震惊的患者画面：他们突然跌倒，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步伐，他们

抑制不住地颤抖，无法将水和食物送到自己的嘴边，他们口齿不清，他们不能说话，他们不能走路，他们无助地躺在那里，他们被拒绝，他们抗争…… 这些动态的影像记录与静态的书籍文字，都是黑白的，冲击力很大，只觉得水俣病患者异常悲惨。来到患者身边，我们却发现，他们似乎已经走过川本辉夫时代，过着看似平静的生活。

水俣病资料馆馆长坂本直充自信友好地站在那里，哪怕是闭馆日也要特意为我们开馆，亲自为我们讲解。坂本馆长 1954 年出生，现年 57 岁，他的父亲是窒素公司的员工，父亲有生之年不让自己的孩子申请水俣病认证，去年父亲去世，坂本馆长开始研究相关资料，准备申请认证。

谷洋一经营的萤之家是支持胎儿性水俣病患者的 NGO，他为我们邀请到家有 4 个患者的藤江夫人。今年 86 岁的藤江夫人优雅地坐在椅子上，向我们淡淡地描述她亲历的水俣病：“1975 年，发现孩子异常，迅速送到水俣当地医院，大夫让孩子步行，未见异常，便说没事。回家 3 天后，孩子在家吃饭时颤抖，步行走不了直线，口齿不清。一月后说不出话，没法走路，也没法自己吃饭，赶紧送到熊本的医院。入院时端不住饭碗握不住筷子，但递过去还能用牙咬，住院 18 天后，已经完全不能咬嚼食物，眼睛也看不见了，更走不了路。当时说是畸变，原因没有查明。我们熬着日子，等待着有可治之药那天的到来。几成木偶的孩子吃着流食，熬了一年半后，离开了人世……另外一个孩子，是坂本忍，当时觉得体重正常，认为没事。不想 3 个月后发现脖子不稳定，去好几所医院，被诊断为脑性的小儿麻痹症。但我一直怀疑，我们住在海边，是否也患上了水俣病。孩子 5 岁才开始走路，6 岁时开始从医院上学，在残障特殊班，以后病一直没好，从家到学校很费劲，坚持上到初中毕业……我觉得自己的力量非常有限，需要团体、志愿者、市民会议的帮助。受害者不发声，侵害企业就不认为自己是侵害者。我 86 岁了，55 年的岁月都是与水俣病进行艰苦的奋斗，现在我的女儿坂本忍也在艰苦努力，我只要身体健康，就会一直照顾孩子。”

加藤经营的 HOT HOUSE 是一个工作场所，同时也进行生活照料。尽管目前 HOT HOUSE 也接收不是水俣病的残障人士来此工作，但这里却有好几位可以自己挣薪水甚至可以自食其力的水俣病患者。热爱下棋并曾多次获奖的松本幸之助两年前突然不能站立，至今只能坐在轮椅上工作。那位盖章的中年人，在我们看

来举手之劳的盖章，他需要分解，慢慢完成。2 个小时盖 10 个章，平均而言，盖一个印章需要 12 分钟，但他凝神屏气，非常专心。那位主动跟我们打招呼，吸引我们蹲下来的小伙子，他让我们在他的日文字表中拼写自己的名字，他边比划边乐。中午用餐之前，我们与小伙子一起开心击掌，用餐时他们各自用自己的方式静静地用餐。

患者们似乎走过了川本辉夫时代，当年的成年患者相继离逝，留下小部分老年人，以及老中青小均有的胎儿性水俣病患者。母亲的胎盘是胎儿的天堂与保护伞，却无法保护胎儿不受有机汞的侵害。其实，与逝者相比，幸存者更加艰难，他们受到的关注减少，获得的补贴减少，未来的保障很艰难，虽然水俣市倡导社区重建，熊本县号称关注弱者补偿患者，加害企业以科技促发展，履行赔偿责任并主动总结水俣教训予以传播。然而，患者也是人，人有人的尊严，人都有追求快乐、美好、幸福的权利。我们看到的水俣很美，我们接触的患者很平静，很阳光，但我们无法不揪心。

### **离开水俣，难忘却令人敬畏**

我们想触摸水俣，但终究是水俣的过客，一周之后，我们离开水俣。离开已两月有余，但我们无法忘记水俣，除了那里的灾难，更因为那里的人，那些令人敬畏的勇士。田原先生在水俣调研的第二次讨论会中总结过一句话：“水俣病带来灾难，但也留下了人才”。之后的调研也证实了这一点，可以说，这位生于鹿儿岛的年轻的自由撰稿人，他也是人才当中的一位，他动用多个频道的资源，为我们安排了近乎完美的访日行程。

为水俣奋斗的人很多，依据是否出生或成长于水俣，可粗略地分为两类，一类是土生土长的水俣人，一类是因水俣病而来的其他勇士。他们有的以组织的形式，有的依然以个人的形式。下文仅从我自己的个人角度写我眼中的水俣勇士。

水俣病患者都是土生土长的水俣人，他们最英勇无畏。水俣病因经常食用含汞超标的鱼贝类而生，而鱼贝体内的汞严重超标是因为饮用了窒素公司未经处理直接排放海水中的有机汞含量极高的污染水。水俣病患者要面对三种斗争：一是生理层面的，要与病魔做斗争，要面对神经受损、抽搐、颤抖、口齿不清甚至不能说话、走路变形甚至不能行走等症状。二是心理层面的，要与无处不在的歧视做斗争，要忍受亲人、邻居、朋友与社会对其避之唯恐不及、猜测病是因个人触

犯神灵而遭报应、甚至赶出家门等各种言行，以及因水俣病而在求学、职业、婚姻等领域处处碰壁。三是制度层面的，要与直接造成损害的企业、本可避免损害扩大的政府等斗争，维护患者自身以及因种种原因没有站出来的其他患者的权益。生理层面的挣扎，其实从潜伏期就已开始，不管是显性症状还是隐性症状，不管是急性水俣病还是慢性水俣病，不管是公开诊断还是悄悄治疗，不管是否被认定是否获赔偿，这种挣扎都相伴终生，直到离世。心理层面的痛苦，始于亲人、邻居、朋友、社会知晓你患有水俣病之后的鄙夷、疏远与冷漠，有的患者无法忍受，搬离水俣，客死他乡，有的多年后回到水俣，因为日本其他地方对于来自水俣的人都有歧视与偏见，哪怕你没有水俣病。心理痛苦比生理痛苦剧烈得多，当原来嘲讽患者的邻居与朋友自己也成了患者，他们说着一句令人心酸的“对不起”……制度的纠结增加了患者的生理与心理痛苦。水俣从小渔村变为城市，是因为窒素公司，水俣也因之被称为城下城，也恰恰因为“窒素与水俣共命运”、“没有窒素就没有水俣”的观念深入人心，仅仅是水俣人，对于水俣病的赔偿态度也各不相同。除了冷漠，还有两种态度，一种担心水俣的发展因窒素公司进行赔偿而停滞，因而不支持甚至坚决反对找窒素公司赔偿，一种坚决要求窒素公司赔偿并道歉。持两种针锋相对态度的水俣人中，既有不是患者的水俣人，也有水俣病患者。持第一种态度的患者接受了窒素公司的和解，获得了有限的补偿，签订了之后不再提起诉讼的协议，但之后也有幡然醒悟者或多年后病情加重者转而加入第二种行列。持第二种态度的人不接受“招安”，成为自由交涉派与诉讼派，他们以川本辉夫为代表，在窒素公司的水俣本部与东京总部、水俣市政府、熊本县政府、厚生省、交通省门前静坐、抗议、交涉，法律诉讼从地方法院走入最高法院。水俣病患者的斗争，也许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一是以川本辉夫为代表的斗士型，经历双重背叛的他组织患者及其家属，成立患者市民会议，坦然坐在窒素公司东京总部第四会议室会议桌上直接质问当时的岛田社长，让致害企业意识到支付所有赔偿的不可抗拒；二是以坂本忍（藤江夫人的女儿）为代表的胎儿性患者等平和型，受父母、专业人士与支持团体的帮助，甚至在15岁就走入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现场，发放“被污染的日本”英文宣传单，让全世界首次意识到环境污染的恐怖；三是悄无声息散居日本各地的隐居型，他们不说自己来自水俣，不申请认定，不主张赔偿，以自己的方式艰难度过

余生。不论是哪种类型，不论是个人默默承受，家庭一起支撑，还是同病相怜者组成患者团体或支持组织，他们都是用生命，共同与水俣病及其带来的社会问题抗争。

虽然水俣与日本其他各地的许多人给了水俣人与水俣病患者无尽的歧视，但也有不少勇士，或因水俣病而来到水俣甚至在水俣定居，或因多年如一日地研究水俣问题而创立相关学科，坚定地与患者们站在一起。这些人我无法穷尽，仅以访谈过的几个领域的代表为例。

首先是医学领域的原田正纯与藤野纠医生。原田医生不顾各方多次警告，坚定不移地为患者出具医学诊断证明（没有诊断证明，患者无法申请认定），并在胎儿性水俣病研究方面独有开创性建树，尽管他因支援患者，超越医生层面为水俣病斗争，而被剥夺在日本公立大学晋升教授的机会多年。然而，不能阻挡的是，原田医生的行动为他赢得公共知识分子“巨人”的称谓，他推行的水俣学研究，为他赢得越来越多的国际声誉，目前终于晋升为教授，并在熊本学园大学建立了水俣学研究中心。原田医生说：“当我觉得困惑时，我就去找患者，与他们在一起……”藤野医生 1942 年出生于中国大连，1947 年回到日本，在下关长大。为查明水俣病真相、救出那些被迫躲藏的患者，他在患者的资助下，于 1974 年建立水俣诊疗所，1978 年发展为水俣协力病院，专为水俣病患者提供诊疗与医学证明服务，近四十年的积累，仅日文与英文研究成果已是厚厚的几大本。

其次是公民社会领域的患者支持组织与水俣教训传播组织。患者支持组织我们调研了胎儿性患者照料组织萤之家、兼具生活照料功能的患者工作场所 HOT HOUSE、协助患者进行认定的相思社。萤之家由谷洋一先生 1996 年创立，谷先生是北九州人，自 70 年代开始研究水俣病，自己不是患者。他认为，水俣病是一种慢性长期病，需要长期护理，即使得到认定也同样好不了，生活维持很困难，由此成立萤之家来照料胎儿性患者的生活，目前一共为 20 名患者服务，其中收容患者 10 名，上门提供服务的患者 10 名。萤之家现有 7 名工作人员，以前完全是志愿者，2004 年最高法院判决确定国家责任后，环境省与县政府提供一部分补贴。HOT HOUSE 由来自东京的加藤女士创立，有 23 年的历史。加藤女士“如果我是水俣病患者……”的换位思维，让她放弃东京的富足生活，来到水俣建立患者工作场所，现在 HOT HOUSE 既是社会福祉法人也是小规模多机能事业所。目

前为约 26-27 名患者服务，其中每天来的患者 16 名，每周来 1-2 次的患者 10-11 人，其中一半是水俣病患者，他们的工作主要是用废旧报纸叠手提袋、盖印章、为名片贴干花等，水俣病患者用自己的劳动获取报酬。有近 38 年历史的相思社，因协助患者进行认定、为患者营造继续生活下去的环境而成立，源于水俣病诉讼 1973 年第二次判决后的补偿协定。相思社收集各种实物与照片，建立了水俣病历史考证馆。基于生存，相思社为患者办理认证手续从无偿走向有偿，但一直不曾有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拨款，也没有收到任何企业捐赠。相思社的收入以会费为主，捐赠者 100% 是个人，会员与捐赠者中水俣人约占 10%，来自东京的捐赠者最多。有人连续 30 年每月匿名捐赠 3000 日元。除了患者支持组织，我们也调研了以水俣教育旅行为主要项目的环不知火计划、以水俣展览为主的水俣 FORUM、倡导中日韩环境信息共享的东亚环境情报发传所等水俣传播组织。环不知火计划由吉永利夫先生创办，上个世纪 70 年代，刚刚高中毕业的吉永路过水俣，对水俣病一无所知，却加入窒素公司门前的静坐行列，自此与水俣结缘并定居。环不知火作为 NPO 法人，在水俣与山水各有一个事务所，开展水俣教育旅行，接待国内外游客。水俣 FORUM 是在东京成立的 NPO 法人，主要以展览与演讲的方式在国内外传播水俣的教训，该组织尽己所能收集与水俣有关的各种图书、图片与视频资料。要找与水俣病有关的研究资料，大概这里最为齐全。东亚环境情报发传所，以中、日、韩三种语言在中、日、韩三个国家进行环境信息分享，每年召开环境论坛，而水俣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

第三是传媒领域的摄影家、新闻工作者与纪录片导演，他们以图片、文字与影片的方式记录、支持与帮助患者。摄影家以日本的盐田武史为代表。盐田武史是四国人，因大学到过一次水俣，他想知道事实真相，想帮助患者，大学毕业后他最终决定在水俣生活，他也许是为支援水俣病而在水俣定居的第一人，那是 20 世纪 60 年代。《镜头下可爱的水俣》是盐田重新审视近五万个镜头底片后编辑的写真集，每张照片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只是镜头下的大多数已经离开人世。高峰武先生是《熊本日日新闻》社的记者，因为水俣而选择记者这个职业，跟踪水俣报道 20 多年，是一位持之以恒、富有哲学素养的新闻工作者。他特别强调，新闻人需要培养想象力。他不仅在我们调研的第一天就派出记者，还在休假时间专程赶到办公室与我们交流。最令我们感动的是，他早已根据我们的调研需求，



悉心梳理了《熊本日日新闻》20 多年来与水俣有关的比较重要的新闻记录，为我们每人打印一份，为我们讲述新闻中与新闻背后的人和事。如果说图片与文字是静态的记录，那纪录影片则是动态的记录。走入水俣病历史考证馆，摆在桌上可以销售的不仅有与水俣病有关的各类书籍，更有几十种以水俣病为主题的影碟。仅仅土本典昭先生，就拍摄过 17 部纪录片，是当之无愧的水俣病纪录片之父，可惜他已驾鹤西归，无法面见。

第四是法律领域的律师与法官。当病因确定，赔偿问题随之而来，律师是最先出现在患者面前的法律职业工作者。千场茂盛、后藤孝典等是熊本水俣病诉讼的代理人或辩护律师，尾崎俊之是新潟水俣病诉讼的代理人，尾崎也是铃木尧博之后东京诉讼律师团的骨干成员。尽管律师留给人的印象与营利相关联，但获得赔偿之后按一定比例支付费用、想尽办法让法官走到患者身边、自己垫付费用往返鹿儿岛 400 次，不是仅仅一个“利”字能够担当。公害审判始自对受害的了解，千场律师等想办法让法官尽早亲眼目睹患者家庭的惨状。如听说某患者身患感冒，病情危急时，律师团强烈要求法官为保全证据进行证人询问，为此，1971 年 1 月，3 名法官来到水俣。望着卧床不起的患者，法官脸色骤变，身体僵直、一动不动，一直站到离开。也是自那以后，法官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

第五是各个学术领域的专家、学者及其联盟。根据一桥大学寺西俊一教授的梳理，致力于水俣病问题的日本先驱研究者至少有七位，他们是：倡导环境医学、致力于水俣病研究的原田正纯，撰写《公害原论》的宇井纯，创立公害政治经济学的都留重人，拓展环境经济学的宫本宪一（寺西教授自己也是环境经济学的继承者），撰写《社会共通资本论》的宇沢弘文，创立环境社会学的饭岛伸子，撰写《公害法原论》的戒能通孝，延伸环境权利理论与环境法学的淡路刚久。除了这些先驱开辟或拓展的研究领域或学科，正在形成的水俣学则将这些学科与领域融合在一起，甚至还有付诸实践的地元学及其项目，陪同我们进行水俣调研的花田昌宣与宫北隆志教授就是其中年轻一代的代表。这些与水俣病相关的学科与勇士，他们是一个联合体，他们从水俣事件中汲取营养，以学术的力量回馈水俣与水俣病患者。学术建构与思想提炼，将水俣的经验与教训保存得更久，传播得更远。

其实，除了上文提及的这些领域的这些人，我们还有政府与企业视角的调研，

一是水俣市、熊本县、环境省的官员，一是窒素公司水俣本部。政府层面，水俣市环境福祉部的课长田畑纯一与我们讲述水俣的历史与现在，熊本县知事(省长)蒲岛郁夫声称要“关注弱者”，环境省顾问原副部长小林光从环境经济学角度比较预防性投资与先污染后处理二者之间的成本差异。企业层面，窒素公司水俣本部现任本部长大衡一郎与我们分享窒素百年，强调水俣带给企业的教训。土生土长于水俣的窒素女工木户理江导览我们参观窒素公司，她也是萤之家的个人志愿者，每年为患者表演日本传统舞蹈。虽然政府信任是个问题，企业是曾经的加害方，但他们当中，一直也存在关心患者、以自己的方式支持患者的人。我无法穷尽访谈、接触过的每一个人，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与言行举止却烙在我的脑海里，“知易行难”，他们的作为与不作为，都令人敬畏。

### 回到北京，我们能做什么？

水俣归来，去时大脑中的成见已飘然而逝，新的想法也悄然而至：环境灾难，一旦酿成，万劫不复，治理只是一个神话。经济成本是一个不断累加的无底洞，人力成本与制度成本无以计算，社会资本轰然倒塌，而伤害的除了身体还有心灵，环境公害是一条单行线，一旦发生，无法逆转。

面对经济总量“被”超过日本、一跃而为全球第二的中国；面对康菲石油(中国)渤海湾石油泄漏，受害居民拿起法律武器维护权益，多处起诉至今却无一起立案；面对松花江边发现汞污染，原田正纯医生等受邀来中国，但在正要进入污染发生地面见患者的前一日，却“被”好吃好喝好招待地中止，至今不曾进入污染一线；面对受邀前往水俣参加学术会议的环保斗士霍岱珊，走在去往水俣的路上，却“被生病”而被迫离开首都机场，水俣成为一个差点实现却很无奈苦涩的梦；面对癌症村，面对镉米污染，面对龙年发生于广西龙江的镉污染……，我们中国人真的“百毒不侵”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那我们能做什么？

想想土本、川本、原田，他们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水俣。想想加藤“假如我是水俣病患者……”，她舍弃东京的富足生活，来到水俣，23年如一日，为水俣病患者的尊严付出自己的全部。作为普通公民，我们没有企业的心安理得，没有政府的层级推诿，没有受害者的感同身受，但我们有愿望，希望水俣悲剧不要重演，尤其不要在中国重演。作为访问过水俣的中国公民，我们必须有行动，将看到、感受到的水俣用自己的方式描述出来，将水俣的悲惨、揪心与教训以各

种方式传播给我国各级政府、各地企业、各界媒体、各方名士、日益觉醒的民众与正在形成的中国公民社会，尤其是传播给那些正在掩饰或漠视污染发生的政府、企业、媒体、组织与个人。

水俣调研团队因水俣课题而成立，也因水俣之行而发展。我们的团队由学者、记者、编辑、NGO 领袖、纪录片制片人、自由撰稿人等组成，团队的灵魂人物是《比较》杂志退休的执行编辑肖梦老师，与其说她是土本典昭的狂热信徒、川本辉夫的忠实崇拜者，不如说她是水俣教训的中国使者，她有一种如土本、川本、原田、盐田、高峰武、谷洋一、加藤、吉永、弘津、花田、宫北等这些日本勇士一样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不同的是她身上流淌的是中国血液，努力的是中国一定不要重蹈水俣覆辙。团队中还有田原真司这样的日本朋友，这个由中日朋友组成的团队不仅来自不同的行业，年龄梯队也从 40 后到 80 后不等。这也是一个开放的团队，2011 年 11 月 30 日返京，30NGO 也因之成立。水俣课题组成员为创始会员，每月 30 日定期召开交流会议，第一、二次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30 日、2012 年 1 月 30 日如期召开，日本环境省、东京财团的染野先生与联合国计划发展署小额贷款部的刘女士受邀参加第一次会议，前者曾陪同我们的水俣调研，协助安排我们的东京调研，后者曾驻扎水俣 1 月有余，一直关注水俣。我们除了整理大家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摄，还会踏着水俣的足迹，挖掘本次调研的收获，补缺本次调研的不足，深入可能沦为中国水俣的地方进行实地调研，为不重蹈水俣覆辙而尽绵薄之力。

我们之于时空、之于中国环境，是渺小的。路漫漫其修远兮，30NGO 将上下而求索。

## 附件 5 对原田正纯先生的悼念与追思

2012 年 6 月 11 日，原田正纯医生因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在家中去世。获知原田正纯先生仙逝，清华大学水俣病调查团成员悲痛不已，各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哀思。王名老师用日文撰写了悼词，肖梦老师与贺信记者撰写来纪念文章……，6 月 14 日上午北京时间 11:00，我们相约一起“合掌”向原田先生告别。

除了文字，课题组成员及日本同仁还通过国际交流等方式，用行动继承原田

先生毕生从事的水俣事业。2013年9月，第二届水俣学国际论坛在熊本学园大学召开，王名教授一行应邀出席并发表演讲。2013年11月，花田教授应邀访问中国，调研淮河，出席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召开的“水俣教训及其对中国水污染治理的启示”研讨会并发表演讲。

## 1. 致原田正纯先生追悼词（清华大学调研团）

### 故 原田正純先生追悼の辞

本日は、原田正純先生の告別式が執り行われるにあたり、清華大学水俣病調査団を代表いたしまして、遠方より謹んで弔辞を捧げ、深く哀悼の意を表します。

生者必滅は世の定めとは申せ、先生の突然の訃報に接し私どもは、ただぼう然とするばかりでございます。いま、ご家族をはじめご親戚の皆様の中をお察し申し上げますとき、誠に痛恨の極みでございます。

原田先生の畏敬すべきご一生は、医師として公害の原点と言われる「水俣病」と向き合い、患者への愛と保護、そして社会への正義と誠実を貫いたご一生であったと存じております。私どもは、先生から直接の指導を受けるとともに、先生の数多くの著作を拝読して、その一部を中国語に翻訳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大変勉強になりました。昨年11月、私ども調査団一同は、水俣を訪問する際、先生は病身にもかかわらず、手厚くもてなして下さり、講義もしてくださいました。中国での水俣病のことも心配され、「今年ぜひ清華大学を訪問したい」とおっしゃってくださいました。最近、先生が入院されておられることを耳にしました。いつか、先生とのお別れの日が来るであろうことは覚悟しておりましたが、いざその日を迎えますと、やはり信じられず、悲しみが胸にこみ上げて参ります。

水俣病との闘いも、患者さんの救援も、まだ終わっていません。急成長の中国では、新たな水俣病も発生しつつあります。このような公害問題と戦い続けることこそが、水俣病研究の第一人者である原田先生へのご恩に報いることだと思われまます。

本日の告別式に際し、在りし日の先生の面影を偲び、心よりご冥福をお祈り

申し上げ、お別れの言葉といたします。

原田先生、やすらかにお休みくださ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与水俣病继续战斗，才是对水俣病研究第一人的原田先生最好的纪念和报答。

清华大学水俣病調査団

## 2. 致原田利惠女士的信（肖梦）

2012年6月12日 上午 10:10

我给原田利惠女士写了中文邮件，现给你们一阅。我的日本朋友津上先生今天到北京，我问问他能否找日本使馆给我个签证，我能否争取去呢？

尊敬的原田利惠老师：

惊闻您的父亲，我们非常钦佩敬重的原田正纯老师昨天去世了，我们无比悲痛，而且有着深深的遗憾，我多么后悔自己没有坚持在四月再次访问水俣的想法（当时许多条件限制，我放弃了），这成了永远的遗憾，我再也见不到原田正纯——我心灵中的导师了。差不多十年前，我关注水俣，先从土本典昭开始，然后是原田医生的事迹，感动着我。到2008年我们设想去日本做一次访问，但是这设想也因为条件限制没有成为行动，土本先生离开了人世。终于在2011年11月，我们的设想实现了，我终于见到了原田正纯等水俣斗争中的那些勇士们！原田医生为我们讲课，陪我们到莹之家与坂本忍母女见面。他的音容笑貌就在眼前，实在不能相信，他就这么离开了。

匆匆的，直接给你写信，为表达我的哀思，寄托上我们的想念，我能否在通夜和告别仪式堂中敬献花圈？我一会儿找日本朋友商量一下，如何办理这些事情。我也非常后悔自己没有早些办好到日本的多次往返签证，否则我会飞到九州，参加原田正纯医生的葬礼。

请你节哀，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特别是我——都永远怀念原田正纯老师，并继承他的思想、精神和勇气！

肖梦

### 3. 难过与懊悔之后（薛澜）

2012年6月12日 21:01

各位：

得到这个噩耗，跟大家一样非常难过，尤其是懊悔，去年没有跟大家一起去日本，永远错过了与原田先生见面的机会。另外，也要特别感谢肖梦和各位，积极推动水俣的研究，使得去年的水俣之行得以实施。现在，我们一方面是要为原田先生祈祷，另外一个方面也许更要抓紧把水俣的研究继续下去，并使得这些研究能够对中国环境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产生影响，也许这才是对原田先生最好的哀悼。

薛澜 教授兼院长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 4. 《新世纪》“逝者”专栏：医生要回到患者当中（肖梦 贺信）

今天臭名昭著的水俣病，是30年前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一届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为全世界人知晓的。一个叫坂本忍的日本小姑娘出现在会场，她口齿不清，运动失调，汞污染对人体的损伤触目惊心。

成年后的坂本忍写了首诗：我好想成为一只鸟，好想跑一跑，好想披上婚纱，去爱我爱的人，还要大胆地说出来，我是认真的。可是我知道，这只是如果，只是如果，这就是我的人生，沿着这条路，我将走下去。

在斯德哥尔摩的会议上，坂本忍的母亲指着女儿说：水俣还有很多病情更严重的孩子。我们希望世界上不应再有任何像我们正在承受的公害苦难。这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呼吁和请求。

陪同水俣病患者远赴会场的，就是日本医生原田正纯。他从事水俣病研究始于1960年代。当时熊本大学医学院研究报告已经确认，水俣病是由于当地居民长期食用含有甲基汞的海产品所致。而甲基汞来自当地企业、窒素公司向附近海域排放的废水。

病患者维权之路漫长而又艰难。在渔村，那些尚未发病的渔民认为，只要水

俣病被跟随学者进村的媒体曝光，当地的海产品就卖不出去。患者自己在自责和屈辱中度日，日本文化长于自责的思维方式让他们认为，生病是因为某种神秘力量的谴责，因此宁可在与世隔绝中默默承受痛苦。

原田正纯还记得，初到渔村之时，他期望中患者以重任相托的情形并没有出现，医生反被患者拒之门外。后来专注于研究疾病文化意义的哈佛大学人类学家阿瑟·克莱曼提出过一个观点：现代医学的狭窄视野回避了疾病导致的挫折和困惑，一如它只医疾病，不闻疾痛。这正是医学介入水俣病首先遇到的障碍。

然而原田正纯坚持在乡间游走。哈佛大学的蒂莫西·S·乔治曾经记述：一般医生在诊断时，都会要求官员把病人集中在医院或者会议室，但原田不这样做，他是第一个自己召集病人的医生。他有同情心、有耐心，最终获得了患者的信任。

然而仅仅满足于一个医者是远远不够的。

在水俣，“没有窒素就没有水俣”不仅是宣传口号也是历史事实，公司厂长还多次当选当地行政首长。而在日本国内，污染源企业坐拥财团和政治力量支持和庇护。例如池田勇人在担任国际贸易与工业部部长的时候，就曾警告内阁同僚不许承认汞污染和窒素公司的关系。他担任首相后，又提出了10年收入倍增计划，像窒素这样的企业继续被视为支撑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支点。

蒂莫西·S·乔治认为：水俣病不仅是一种环境病、一种人类在加速现代化进程中所付出的代价，它也是一个无情的、犯有谋杀罪的企业隐藏罪恶的过程；是各级政府和社会包括科学团体和媒体互相勾结、混淆视听、容忍悲剧的发生并掩盖事实的过程；是当权者施压，反对说出真相和采取行动的过程。

原田正纯不得不承认：各种问题只能在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发展过程中才能得到解决。而他正好赶上了一个左派政治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的时代。继医生之后，日本法律界、文化界知识分子纷纷介入帮助水俣病患者。受害者的反抗演迅速变成一场反公害社会运动。

就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举行后1年，第一批起诉窒素公司的28个家庭获得胜诉。在接下来的30年中，先是日本法院判定国家为此承担责任，接着村山富市和鸠山由纪夫内阁也先后提出两大法案，对患者进行补偿和赔偿。

原田正纯积极参加支援团体，他在不同年代、不同场合为患者活动提供专业支持，毫不留情的批评行政力量在水俣病发生和认定过程中的种种失误。他给日

本医学界留下的名言是：医生必须再次回到患者中去，向患者们学习。

原田正纯后来曾访问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呼吁吸取日本的教训。遗憾而残酷的是，重要国家无一例外重复着日本的历史：经济快速增长置污染于不顾，直至发展起来之后的国家有能力赔偿污染造成的代价。

2012年6月11日下午，77岁的原田正纯永远告别了他的患者。葡萄牙女歌手 Amalia Rodrigues 的歌声陪他走过了人生中的最后时刻，那首 Barco Negro 在最后一句唱到：我知道亲爱的，你并未真正离开。他的同事们评论说：不屈不挠的原田医生一辈子守候在公害事件受害者身边。

## 5. 逝世一周年祭奠：给原田正纯老师的一封信（肖梦）

### 给原田正纯老师的一封信

敬爱的原田正纯老师：

我知道，快一年了，您在天堂，不过，我相信您一定能听到我的心声，读到您写给我的信。

自从认识您，无论是文字还是影像，您就一直没有离开过我。萦绕脑际的，永远是您对我们——来自中国的人——说的话：如果水俣的教训能够被中国汲取，那是有意义的事。

2011年11月21日，您专程从熊本到水俣来，在水俣学研究中心的水俣基地会议室接待我们，为我们做“水俣学展望”专题讲演，接着陪我们访问水俣病患者的“莹之家”。事先我们并不知道您抱病而来，您本不宜舟车劳顿，可您却为我们花费了差不多一天的精力与时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您对来自中国的考察团所做的最后一次讲演，对我来说，您的讲演弥足珍贵，我做了录音，您的亲切声音让我经常可以重温。

我们原定2011年4月访问水俣，却因东日本地震海啸而延至11月才成行。出发之前，我们已经翻译了有关水俣运动的近百万字的书籍、文章和影像资料，拜读了您的三本书，我知道您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水俣运动中的重要角色，当看到您的时候，我真是抱着相见恨晚的感觉啊。



您的演讲竟然是从福岛核电站开始。您说，“2011年3月东日本发生的大地震是天灾，所以我每次作演讲的时候为了表示哀悼都要放一些这样的照片。但是当我们了解的情况越来越细，信息越来越多之后，发现有很大的人灾的色彩。福岛的核辐射排到海水里，通过海水来淡化，可是核辐射通过食物链会浓缩到动植物当中，这样的可能性是非常巨大的。从人灾这个角度来谈，放射性物质处理失当，说明日本政府并没有真正汲取水俣病的教训！没有能够很好记住水俣所积累的经验。现在迎来了充分汲取水俣病教训的时期。水俣病刚开始也认为是天灾，我们作为人类是无可抗拒的，之后一了解情况就知道事故是人为造成的，换言之有很多公害的因素。从这样的意义上讲，水俣病的事件能够让我们日本公民重新思考，重新审视。”

您演讲的开场白是多么富有启迪性啊！凭着您持续奋斗了几十年的经验，抓住了公害的实质是政府的作为。您告诫我们：水俣病在日本没有结束，公害的治理依然需要各方的努力奋斗。

您的演讲告诉我们“弱者受到的危害总是最重的”！您选择站在弱者一边，到患者中去，您说“真正的专家是那种会真挚地听取来自现场的声音，将其作为科学正确的体系来进行实证、思考的人。”您为我们展示水俣病发生前后的水俣照片、排水口、患者、怕受歧视的患者请求您不要再走访的字条。作为医生的您，您身体力行，用自己的青春年华，走访、医治了那么多的患者，您走进了贫困患者们的世界，您说“医疗医学要保持中立，但是力量要保持平衡，我认为政府和公司拥有极大的权力，而患者是弱势群体，我不能保持中立，保持中立实际上就是帮助公司和国家，我作为医生必须站在患者一边，没法保持中立，这是应该的。”正是因为有您的实际参与，水俣病越出了医学层面，成为一场社会运动。从读您的书到听您的演讲，我脑海中合成了您作为勇士的形象。您的演讲深深地打动了我，

您主张跨领域、跨国界的合作研究与交流。在演讲的第三部分，您提到学术界不同领域学者之间的交流，提到石牟礼道子、宇井纯、桑原史成等，提到水俣病研究会《企业责任》以及自己《水俣学讲义》的出版。您希望更多领域的学者与普通民众一起进行跨领域跨国界的合作研究，思考学问的目的，代代相传地开展反思水俣病、传播水俣病教训的研究。一边听着您的演讲，我脑海中清晰地看

到一幅幅画面掠过，加拿大土著居民居住地，瑞典斯德哥尔摩大会，土本典昭的电影画面，桑原史成和盐田武史的影像，那么多的、来自各方的专业人士参加进来，这是多么宝贵而丰富的斗争历史，能不能还原地把它传递给中国的有识之士呢？

您寄语中国，对我们这些来自中国的人提出了殷切希望。不过，您只字未提二十多年间您对来自中国的人，做过多少次演讲。您把每一个来自中国的人都当成是可以教化的志士同仁，不厌其烦地讲述着水俣的教训，期待我们可以为这个被污染的丑恶世界做点什么。我记住了。

我从事经济学编辑工作有 30 多年了，参与中国经济改革历程，专攻经济制度比较分析。我关注国际经验和比较借鉴，对日本的水俣，起初的了解来自学术文献，更因土本典昭关于水俣的纪录片，土本典昭成为我的偶像，我崇敬水俣战斗中的勇士们，为此深深感动。

2005 年，丰田公司希望在中国推动公益事业，因此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成立中国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次年 CIDEG 学术年会的主题就是环保，学术委员神户大学法学教授季卫东的演讲题目即“日本公害与治理”，水俣病、四日市病等都在论文所及范围内。对中国的发展与环境早已有不少看法的我，非常希望借鉴水俣病的经验和教训，推动中国的环境治理工作。于是，我在 GOOGLE 上查阅到大量水俣病的资料与信息，土本典昭的《水俣病：患者的世界》等影片的资讯，令人震撼动容。我看到水俣成为将负资产变为环境旅游修学的介绍，也看到中国不少单位到日本进行访问，带回来拍摄的影片片段和文章。就此，我们的《比较》杂志发表了若干有关公害和环境治理的文章。但这些都无法令人满意，水俣依然是隔绝的，对中国没有什么实质且普遍的影响。

2007 年，中国的太湖水华污染铺天盖地，松花江流域被吉林化工厂污染，每一事件的处理，除了当时胡舒立领导的《财经》杂志，鲜有深入报道，后续追踪和治理更是遁入无形。我觉得为中国这个正处于快速工业化的国家，从经济学比较分析的视野，紧迫地要做些事情。我们把国际上权威的环境治理报告与文献翻译出版，但依然没有什么影响力。于是我从土本典昭的电影生发萌想：做一部从中国人视角看水俣病的纪录片，采访土本典昭、采访您这样的为水俣病患者而斗争的各界人士、政府官员和水俣病患者抗争与生活的场景，这一定具有视觉上的

冲击力，也许借鉴意义更大。然而，2008年，我的想法没有实现，我没能到日本去，而土本典昭在6月因肺癌去世，他的死让我悲痛不已，我觉得自己仿佛就是他的亲人，却被档在厚厚的泥土之外，再无可能相见，“不知火海”也许永远只是存在我的脑海中他拍摄下的画面。

2008年，中国的三鹿奶粉事件爆发，几万婴幼儿患上肾结石，还有婴幼儿死亡。这是一起极为明显的公害事件，综观国内报章媒体，却没有掀起多少波澜。公害事件有受害者、施害者，有政府行政作为，有法律诉讼，有媒体揭露，有医疗认定，这些角色竟然在三鹿事件中似乎都是缺失的、模糊的。我们所编辑的CIDEG文库，出版了好多本有关环境治理的书，前日本环境官员桥本道夫的《环保行政亲历记》让我们第一次了解到公害认定制度中存在那么多难点和伤害，也深刻体会了在公害发生后，行政部门之间博弈的激烈，以及受害方抗争的艰难。

2009年，我到日本参加会议，在东京一个小酒店偶然看到电视上的访谈节目，好像讲述的是日文中取消了若干汉字，其中包括“怨”和“懣”，记者采访水俣病患者，患者当年游行打出的竖着的幡就是黑底白字的“怨”。当然，我完全凭自己认得的汉字猜测，也许不准确。于是，我更加迫切地想要继续从日本水俣病公害中找出一些可供中国比较借鉴的东西，查阅更多关于水俣的内容，但此时，在中国，已经无法正常使用GOOGLE搜索到多数内容了。

2010年9月，我到东京开会，与原《日经商务》驻中国的记者田原真司夫妇见面，期间谈到为什么我觉得水俣病对中国那么重要的话题。在我的想法中，中国“发展是硬道理”是针对“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来的，三十多年前的时空背景下没错。十年文革，一直在搞运动，周恩来总理提出“抓革命促生产”都会被批判为“唯生产力论”的年代，必须摒弃。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再搞政治运动，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幕，国家开始走向快速发展的道路。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巨大改善，然而，正是对水俣病的探索，让我看到了，中国的发展非常类似日本半个多世纪前，战后的日本，百废待兴，人民饥寒交迫，高速发展经济是不二法门。窒素公司不就是提供化肥生产，增产粮食吗？窒素公司生产了那么多塑料制品方便人们的生活。但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日本发生了水俣等好几起集中的著名公害事件，那些被害者痛苦的生活，

对弱势群体造成的伤害，是无法用先发展再治理的论调来掩盖的。在日本，有您和您的战友们开展着与环境污染对人民伤害的斗争。我们正是在这些文献、影像和画册的史料中，还原了当时的情景，你们可歌可泣的行动，不仅让我们中国人感佩不已，还是激励我们的伟大榜样。

与日本相比，中国有更大的危险，不仅政治文化传统影响下缺少你们这样独立的知识阶层，当下的体制更无法与日本相比：媒体相对不自由，法律界相对不独立，政府行政部门相对不受约束，公民社会尚未形成。可是因环境污染、失去家园等群体冲突却愈演愈烈，这些社会问题都需要有恰当的方式去解决。日本的宝贵经验可以使我们开启智慧之窗，比较借镜。我与田原真司先生不停地联络，希望可以推动“水俣病”相关课题的启动。就在此时，三鹿奶粉中受害者赵连海案发生了，他为了维护自己儿子的权利去抗争，却被判“扰乱社会治安罪”入刑2年半。当时我的心情极为悲痛，但是田原先生告诉我，要抱有希望，因为“这让我想起水俣病历史上的川本辉夫案，他曾经是水俣病患者团体的领导人，本人也是个水俣病人。1972年他因在东京的公害企业（新日本窒素）总部门前抗议活动时，与公司员工发生冲突，警方以伤害罪嫌疑向法院起诉了川本。1975年东京地方法院宣判川本有罪。川本立即上诉。1977年东京高等法院宣布了一项突破性判决‘驳回公诉’，意思就是警方起诉川本的行为是错的，这是日本官司历史上的第一例‘驳回公诉’，判决书也明确承认了水俣病问题上的政府责任，这也是第一例。”这更增强了我要做水俣课题的想法。

2010年底，CIDEG联席会上，我提出关于水俣病考察的课题，怎么才能针对中国——这个崛起中的发展大国——它是否会牺牲社会公平——它能否自觉地保护环境——一旦污染发生，又应该运用什么办法治理环境，解决受害者被侵害的权益，避免公害引发的冲突？这是中国眼下最重要的课题，CIDEG能不能做？清华公管学院NGO研究所的王名教授接受了挑战，他同意牵头组成“社区环境治理的教训与经验研究——以日本水俣市的工业污染及其社区再生为例”课题。

2011年，跨学科的课题组成立，第一步选择相关资料，田原真司担当从日本选材采购邮寄的工作；第二步翻译了百多万字的文献资料；第三步召开课题会议，讨论访问日本水俣之行每位课题组成员的工作和角色。因311地震海啸从4月推迟到11月访问日本，时间充裕，功课做足，田原真司豪情万丈地去联络与水俣

病相关的人，为课题访问日程绞尽脑汁，确实做到最优。是他联络到了熊本学园大学水俣研究所的花田宜昌教授，是在花田教授的大力支持下，11月20日，我们终于踏上水俣之旅，让我们能够聆听您的演讲。

水俣病不是狭义上的污染问题，我们访问的与水俣病相关的经济学家、法学家、律师、社会学家、医生、NGO和NPO、政府官员、媒体记者、摄影家等等，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的角色。水俣之行令我万分激动，即便事前做了再多功课也没有想到自己足够幸运，会在世界这么一个独特的角落，一气儿见到您和近十位当年参与水俣病运动的勇士们。虽然我再也无法见到土本典昭本人，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我终于见到了您，以及一群曾经和土本典昭并肩战斗过的、为了理想迄今仍在战斗的勇士，我觉得您是其中的灵魂人物。

比起那些1970年代以水俣为调查研究的日本前辈，我们只能算是匆匆过客；十天的访问日程极为密集，却依然感觉是浮光掠影；虽然我们事前阅读了相关文献，但面对书上的“人”还是会有失之交臂的痛悔。你们从青年时代投入对弱者的支持，对强者的反抗，为追求社会的公平公正的理想奋斗了大半生。我痛感自己实在是来得太迟了，你们中间已经有好多著名人物离开了人世，纪录片大师土本典昭，冲绳大学宇井纯，法学家宫本宪一，经济学家都留重人等等。我们看到水俣的勇士们，很多仍然执着地坚守在这里，成立熊本学园大学水俣病研究中心，只希望自己在这个对抗公害而付出的经验可以不白白地流逝。他们还成立了一个个的NGO或NPO，为水俣病患者服务，贡献一己之力。我想，去日本考察环境问题的中国人有不少，就是我们这个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课题组的成员也多是跨学科的学者，不过，没有人像我这样对你们这些人如此感同身受，逐渐的，我更加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左派”，那就是能与受压迫的、被屈辱的、社会弱势的站在一起，为他们争取社会公正，能与强权斗争的人，有理想主义的人。

日本归来，我魂牵梦绕，脑海中都是您和他们的身影、表情和声音，这是一次珍贵的心灵涤荡之旅，绝不能让您与他们的经验白白地流逝。水俣是一个宝库，因为参加者众多，而且赶上了战后新左翼运动的浪潮，吸引了各方人才，汇聚在这样一个远离东京的地域，他们深刻地探索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人与自然，社会平等和公正。这是极为独特的历史。此后，我把能找到的文献结合我的感受，做了几个人物专栏，同行的著名记者汪永晨写了水俣纪行，我们发表在中国的杂

志上，希望能更加聚焦你们这些水俣病运动中的勇士，启迪中国有识者奋起帮助中国环境公害受害者和治理污染。

回到中国，为表示答谢留念，我将难忘的水俣之旅访问过的你们的头像合成一张以不知火海为底的明信片。当时我 email 给您的女儿原田利惠女士，请她转交给您，相信您也看到了。

要向您报告的是，我们在您的教导下，都做了哪些事情，虽然与您相比，微不足道。

水俣之行，我们进行了整整 10 天的拍摄，最后制作了 6 分钟的短片——《水俣警示》。2012 年 2 月 13 日，CIDEG 第 10 次理事与学术委员联席会议在清华大学公管学院召开，课题组放映了这部小电影，理事会对我们这种课题成果形式表示高度赞誉，小电影冲击着每个与会者的心灵，他们说能将水俣事件以这种形式再现出来，可以作为中国的各级干部学习课程。工业污染在全世界范围内大量的存在，一时的经济增长和未来的国民健康怎样取舍，任何国家都不可避免地面临这个问题。中国做为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的大国，拥有着广袤的土地和总量丰富人均稀缺的自然资源，特有的政治体制具有强大的控制权力，中国政府选择怎样的发展方式不但会影响她的人民和她的自然环境，也会影响整个世界。水俣事件带给我们有关公害的思考永远应该牢记。

政协委员王名在 2012 年两会前夕向全国政协提交《关于创新社会管理，加强工业污染治理的建议案》。水俣调研报告中课题组每个成员都写下了的水俣之行的所感所思。黄浩明的《环境公害处理机制之研究——日本水俣病事件之观察》发表在《学会》杂志 2012 年第 5 期。曾少军的《中国汞污染治理的现状与策略研究》拟发表在《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 年第 5 期。杨丽撰写的《环境污染治理：日本水俣教训及其启示》参加第二届中国社会管理论坛（2012）、北京青年政治学论坛·2012。除了报道与论文，课题组还组织出版您的《水俣学手册 2：从“负遗产”中学习》、《富裕与弃民们——水俣学的起源》、《水俣病没有结束》3 本书编译为 1 本；乔治·蒂摩西《污染与战后日本的民主斗争》等著作。经多方努力，现在已经获得著作的出版授权，很快就会在中国出版。我们的课题组还将出版两本专著，一是课题组的《日本水俣公害反思录》，二是杨丽的《环境污染治理中的博弈与合作：以日中三个典型汞污染事件为例》。我们还组织了

多场学术沙龙，将中国去过水俣或关注水俣病与环境污染的学者、NGO 领袖等跨学科领域的人士聚集到一起，我们甚至还以 2011 年 11 月 30 日从东京回到北京为线索，成立 3ONGO, 不定期组织大家在每个月 30 日聚会交流。

在您对我们讲演的时候，我曾向您提问，您在 1980 年代曾到过中国吉林松花江流域考察，后来有下文吗？您苦涩地回答，在前往松花江时，看了资料，当地热情接待，就是没能进入现场，没有见到患者。当时，我就下决心回国后要弄清楚松花江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们开始努力按照您的意愿和要求，寻找松花江的水俣病。通过各种途径，我们艰难地寻得重要人物吉林医科大学潘云舟医生的信息，他是中国最早注意到松花江发生包括甲基汞污染在内的水污染问题的医学研究界的代表，吉林市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末端治理措施和调查研究都和他有直接的关系。他主导撰写了《第二松花江汞污染调查》报告，以及《水俣病历史年表》（1989），《水俣病历史年表（续）》（1991），他参加过 1988 年 11 月 7-8 日在日本熊本市召开的“水俣病国际论坛”。也许您那时就结识了他？潘云舟医生更多地代表了地方居民的利益，持草根“专家”的立场，因此可以推断他得罪了政府和企业方面的“专家”。他于 1991 年去世。很快我们发现自己陷入绝境。课题组成员千方百计找到了他的家属，在电话中，潘云舟的家属害怕得不得了，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提及潘医生的研究，更不同意我们前去采访。潘云舟医生生前工作的医院一听到我们想了解松花江水俣病调查情况的要求，就立即挂断电话。我们一事无成，在强大的集权体制面前，在生产国家主义政治面前，在发展几乎是官员考核的唯一标准面前，我们是那么脆弱，不堪一击。没能按照您的理念去跟踪松花江水俣病的患者状况，我感到很愧对您对我们的教导。

课题组的杨丽通过努力，还是把松花江污染的文献进行了梳理。松花江污染及其治理经历了污染发生与扩大、治理缺失，污染高峰、治理开始，出现水俣病、污染持续，确诊水俣病、控制汞排放，修复改善等五个阶段。松花江污染治理一直是以政府为主体的行政主导式治理模式，施害企业在治理中只是配角，患者和渔民只能由政府引导，第三方主要是政府委托的科研团队与少数民间力量。她的研究报告提出的是更多的疑惑，“至今为止，有多少人到过松花江污染现场，有多少人持续跟踪过现场，现在那些显性与隐性的患者及其家庭过得怎么样？当

时是否有赔偿？那里是否存在胎儿型水俣病患者？他们的生活是否有保障？当时有些什么样的制度，执行得如何？现在又有什么样的制度，是否有制度的沿袭与更新？患者们是否组织起来？是否有 NGO 帮助患者及其家庭？是否有过诉讼？法院是否受理，又如何判决？为什么 2012 年在中国举行的某赔偿制度国际会议，依然有现场是号称保密的？保密的现场对受害者赔偿、第三方参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松花江污染充满疑云，难怪不让来自日本的您去现场！

当下的中国，环境污染公害频发，令人震惊与愤怒。中国的事已经刻不容缓，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出版文集、撰写文章、广泛联络中国的各界人士（那些见过您的，写过水俣的，正在中国从事环保工作的）召开各种会议、把水俣病案例作成中国公共污染事件急需的依法维权样本、将 6 分钟左右的水俣警示小电影扩展为 40 分钟左右进入各级干部培训课堂等等。其实，无论男女老幼，无论高低贵贱，我们每个人都既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我们是受害者，是因为我们喝不到干净的水，吃不到没被污染的大米与蔬果，无法躲避无孔不入的重度雾霾天气；我们是施害者，是因为我们已经变得冷漠，我们虽然对受害者同情，却对致害者沉默，对相关部门无奈无力，无法形成你们那样的斗争力量来为弱者抗争，为相关博弈方提供有效的解决问题的路径。

您在演讲中提到已经谈判多年的限制汞的公约，日本政府希望命名为《水俣公约》，您说“我不反对，政府想命名《水俣公约》也不是一件坏事，但是一定要反思政府过去的五十年中做了哪些错事，有那么多生命失去了，怎么样才能避免政府的错误再次发生。”现在，好消息是今年 1 月 20 日有百多个国家已经签署了《水俣公约》，10 月将在您的家乡签订最终的书面协议。坏消息是中国作为全球汞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似乎还没有做好准备。中国的汞排放占全球排放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中国的汞消费量则占全球总消费量的三分之一。按照中国氯碱工业的“十二五规划”预测，到 2012 年，中国电石法聚氯乙烯产量将达到 1000 万吨，汞触媒消耗量将达到 1.2 万吨，汞的消耗量将超过 1000 吨。协议签订了，却发现我们中国缺少精心设计的有效制度和有效的协调执行力。

我们想做的、要做的很多很多，从自己做起，向您学习，运用自己的专业能力以及勇气与执着去面对真相，保护与帮助受害者，追求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现。

原田正纯老师，这封给您的信，是我对您的报告，当初见面的时候，课题组



的人都在争相提问，我觉得自己有机会再到日本，可以单独拜见您，谈我的心里话，虽然我岁数比您小一点，但我还是认为，自己与您是同一时代的人，有许多话题可以和您聊。现在，我再也没有机会当面向您求教，只有通过我的信述说我的心声。您不仅是水保病患者的护卫者，也是一位传递维护世界上每一角落社会公正的使者。当我得知您离世的消息，当我知道您在阿玛利亚的歌声中安睡，我请求美国朋友给我买了一张唱片，她那激越铿锵的声线，百转回肠的旋律，述说着底层人民的心灵，那是我们这些经历过上个世纪中后期革命时代的人都会热爱生命之曲。您的精神会永远鼓舞我们为理想前行。

肖梦

2013年4月16日

于北京